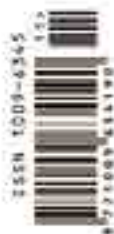


中國注册會計師

The Chines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财政部党组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行业党建工作责任的通知》

关于加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 切实提高审计质量的实施意见



中國注册會計師

The Chines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2020年11期 [总第258期]

主办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编委会主任委员	舒惠好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文武兴 王世定 方 中 田高良 刘晓莲 刘 峰 吴 溪 张连起 张俊民 杨雄胜 陆建桥 林倩丽 赵旭东 唐建华 梁立群 章卫东 郭道扬 曾铁兵 韩江南 潘永和 戴 琼
主编	刘晓莲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出版单位	中国注册会计师编辑部
发行单位	《中国注册会计师》编辑部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2号楼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100039
设计制作	北京枫之杨企业策划有限公司
印刷单位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国际刊号	ISSN 1009-6345
国内刊号	CN11-4552/F
国内定价	6.00 元
编辑电话	010-88250287
投稿信箱	edit@cicpa.org.cn
征订电话	010-88250286

目录

CONTENTS

要闻

- 07 | 习近平：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 07 |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
- 08 | 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视频座谈会
- 08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
- 09 |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
- 10 | 《中国营商环境报告2020》：全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行业建设与发展

- 12 | 财政部党组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行业党建工作责任的通知》
- 13 | 关于加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 切实提高审计质量的实施意见
- 15 | 两结合 双促进 党建引领财会监督新征程

行业改革发展 40 周年专题

- 16 | 风雨兼程四十年 彩云长在有新天——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工作回眸 | 胡少先
- 20 | 发挥平台优势 服务行业发展——苏州工业园区会计服务外包示范基地十周年回顾与展望 | 郭纲 姚青 陈沁
- 23 | 三十年追求职业梦想、强化专业服务、实现人生价值的感悟 | 陈景庚
- 25 | 司法鉴定独树一帜 专业服务有口皆碑 | 万汉英
- 28 | 新世纪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见证 | 李宗义
- 31 | 强化“五好”建设 引领全面发展 | 石文先
- 33 | 从管理学视角看会计监督职能 | 余剑梅
- 37 | 新时代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新路径的探讨 | 陆俊刚

学术研究

- 45 | 分析师实地调研影响审计收费的机理分析：信息有用观还是乐观引导观？ | 许汝俊 黄维娜
- 52 | 新审计报告准则提高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吗？——基于关键审计事项的讨论 | 杨开元 霍晓艳 刘斌
- 60 | 行业多元化、地域多元化对企业外部审计的影响 | 李敏
- 67 |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基于公司治理角度的分析 | 杨姗姗

- 73 | 党组巡视会影响审计意见购买吗? | 张建平 李苗 张嵩珊
- 81 | 高管海外经历、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路径 | 高燕燕 窦娜
- 88 | 内部代理成本、企业避税与财务绩效 | 杨旭东 肖敏 何健健
- 94 | 连锁董事与信息风险的实证分析 | 蔡 慧

审计与鉴证

- 102 | 新证券法下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对策研究 | 陈晓刚
- 105 | 新形势下如何应对会计师事务所不正当低价竞争 | 徐紫明
- 108 | 银行关联交易模型审计探索与实践 | 闫振平 熊回

会计

- 112 | 新债务重组准则实务运用中需注意的事项 | 谢海林
- 114 |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非标资管产品的计量与估值 | 高诚 汪猛 张璋
- 118 | 集中收付模式下创新型智慧“票据池”构建与实施 | 王文广

案例研究

- 122 | 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例研究 | 刘荣军
- 128 | 股权并购中评估增值对后续利润影响的案例分析 | 彭瑞清
- 133 | 从审计项目发生的那些事儿说起——兼谈审计项目质量管理 | 王直群

行业史话

- 136 | 近代英国会计师的起源与发展 | 袁跃华

行业信息

- 40 | 中注协工作
- 42 | 地方注协工作
- 14、16、29、34 | 简讯
- 140 | 财经信息
- 143 | 国际会计职业动态

52 **Have New Audit Report Standards Improved Comparabi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5 to 2018 in Chin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audit reporting standards on the comparabi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t find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standards can improve the comparabi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When key audit matters are disclosed in audit reports, the comparabi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n the next accounting period will improve; and the more the key audit matters are disclosed, the better the comparability becomes; such an improvement is more obvious in cases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audited by non-“Big Four” auditing firms and the non-SOEs. It show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standards that focus on enhancing the communications of key audit matters, has increased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and enhanced the quality of the information in audit reports by strengthen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CPAs, management and those charged with governanc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capital market.

60 **Impacts of Industrial and 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 on External Audits**

On basis of the data of the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19 in China,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the industrial and 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s of companies on their external audits, and explor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quality of corporate internal contro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diversifications and the external audits. It finds that the impacts of the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s of companies on the external audit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impacts generated by the 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s.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s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external audit fees and reduce audit quality, while geographical diversifications will significantly reduce external audit fees and have no impact on the audit quality. The quality of corporate internal control has shown positive impacts; as the quality of internal control improv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f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s on audit fees and audit quality have weakened, whil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geographical diversification on audit fees have been strengthened.

105 **How to Eliminate Unfair Low-price Competition among Accounting Firms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This article defines the concept of unfair low-price competition,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of unfair low-price compet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 mechanism design and the nature of services. Then, it elaborates on the impacts of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n eliminating unfair low-price competition, including cancellation of audit fee standards and amendments to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Securities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proposes that the regulators should put the audit quality as the priority of the regulation, take multipl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reform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mechanisms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so as to eliminate unfair low-price competition.

01

要闻
HIGHLIGHT



习近平：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0月12日至13日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战略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真抓实干、奋发进取，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抓好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展现新的更大作为，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

习近平在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研时强调，自主创新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外发展

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走一条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实施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大家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主战场中选准自己的定位，发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发展更上一层楼，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在汕头市小公园开埠区考察调研时指出，今年是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我特地来汕头经济特区考察调研，就是要向国内外宣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道路，奋发有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锲而不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希望乡亲们携手努力，共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

11月1日出版的第2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

文章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次疫情既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我们要举一反三，进行更有长远性的思考，完善战略布局，做到化危为机，实现高质量发展。

文章指出，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国内循环越顺畅，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文章指出，要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

链。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要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

文章指出，要完善城市化战略，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目标，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

文章指出，科技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调整优化科技投入和产出结构，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要深化对人与自然的规律性认识，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从顶层设计上提高公共卫生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视频座谈会

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视频座谈会，研究分析经济形势，推动做好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李克强指出，减税降费让利是助企纾困的重要支撑，是当前经济稳定恢复的关键举措。要继续狠抓后几个月政策落实，更精准用好财政直达资金，承诺的都要确保兑现到市场主体身上，决不打折扣，增强他们的发展能力。各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坚决防止搞集中清欠税收、乱收费削减政策红利。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为更多中小微企业和困难行业提供有效金融服务。

李克强强调，要加快发展新动能。积极调动市场力量，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推动线上线下消费加速融合、新型与传统消费协同共进，以消费潜力释放更有力拉动经济增长。围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遵循规律，扎

实推进“两新一重”项目建设，在生态环境保护、关键技术攻关等方面挖掘更多新的有效投资增长点。

李克强指出，要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不断深化“放管服”等改革，让更多新市场主体迸发出来、成长起来，增强经济韧性和活力。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落实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拓展进出口空间，努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李克强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基本民生重点工作。多措并举推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确保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落实好失业、低保等保障政策，兜牢受疫情、洪涝灾害影响的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底线。统筹煤电油气供应，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强化责任，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

10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

方案指出，党中央作出兴办经济特区重大战略部署40年来，深圳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创造了发展史上的奇迹，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以设立经济特区40周年为契机，在中央改革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下，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是新时代推动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又一重大举措，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的关一招，也是创新改革方式方法的全新探索。

方案明确，2020年，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城市空间统筹利用等重要领域推出一批重大改革措施，制定实施首批综合授权事项清单，推动试点开好局、起好步。2022年，各方面制度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制度成果，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效。2025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基本完成试点改革任务，为全国制度建设作出重要示范。

方案按照“实施方案+授权清单”形式制定，包括八部分、27项目标任务要求，围绕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制度、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完善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提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方案强调，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创新工

作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有关方面分批次研究制定授权事项清单，按照批量授权方式，按程序报批后推进实施。落实地方责任，强化法治保障，营造改革氛围，健全改革的正向激励机制。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



10月9日，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按照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坚持存量与增量并重、治标与治本结合，发挥各方合力，强化持续监管，优化上市公司结构和发展环境，使上市公司运作规范性明显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不断改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整体质量显著提高。《意见》提出了六个方面17项重点举措。

一是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完善公司治理制度规则，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界限和法律责任，健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渠道和方式，加快推行内控规范体系，强化上市公司治理底线要求，切实提高公司治

理水平。完善分行业信息披露标准，增强信息披露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是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全面推行、分步实施证券发行注册制，支持优质企业上市。完善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收购和分拆上市等制度，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对境内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资发行条件。探索建立对机构投资者的长周期考核机制，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三是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严格退市监管，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严厉打击恶意规避退市行为，加大对违法违规主体的责任追究力度。畅通主动退市、并购重组、破产重整等上市公司多元化退出渠道。

四是解决上市公司突出问题。积极稳妥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坚持控制增量、化解存量，强化场内外一致性监管，强化风险约束机制。对已形成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要限期予以清偿或化解。强化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政策支持。

五是提高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法违规成本。加大对欺诈发行、信息披露违法、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推动增加法制供给，加重财务造假、资金占用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刑事法律责任，完善证券民事诉讼和赔偿制度，支持投资者保护机构依法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

六是形成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工作合力。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强化上市公司主体责任，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完善上市公司综合监管体系，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共同营造支持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

《中国营商环境报告2020》：全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缺受理”、告知承诺制等审批模式。要全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不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破除所有制歧视、地方保护等各类阻碍公平竞争的不平等现象，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进一步推行公正监管，管出公平正义。要加快完善优化营商环境“1+N”法规政策体系，做好涉企政策公开征求意见工作，不断提高政策制定和监管执法科学性和透明度等。三是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服出便利实惠。聚焦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等问题，坚持惠企利民、便捷高效，持续推出便利化举措。四是进一步强化评价引导，激发改革动力。

10月1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中国营商环境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市场准入门槛不断放宽，公平公正监管不断强化，便民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合法权益保护不断加力。

其中，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分别减至40条和37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数量由151项减至131项。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联通46个部门、所有省区市，归集各类信用信息超过500亿条，基本构建起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制度，“双随机、一公开”和“互联网+监管”逐步成为市场监管的基本方式和手段，包容审慎监管探索取得成效。深入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全面推行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基本建成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上线试运行，企业开办、用水用电报装、不动产登记等事项的办理时间压缩一半以上。

下一步，相关部门还将推出系列举措，推进我国营商环境加速迈向国际一流。一是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放出市场活力。要持续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推广“容

02

行业建设 与发展

DEVELOPMENT
OF THE
PROFESSION



财政部党组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行业党建工作责任的通知》

近日，财政部党组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行业党建工作责任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进一步压实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行业党建工作责任，推动新时代行业党建工作作出新探索、实现新突破，继续走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前列。

2008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以会计师等行业为突破口探索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在中组部的指导和支持下，2009年以来，财政部党组全面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以下简称行业）党的建设，探索了“条块结合”的社会组织党建新路，行业党建进入新阶段，面临着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从组织建党向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并重转变，从重形式向发挥作用转变，从有活动向规范化、标准化转变的新任务新矛盾。财政部党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标对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专门寻求中组部指导，制发《通知》，围绕明责、履责、问责，对行业党建工作的一些重要问题作出了明确和规范。

《通知》明确了行业党建工作责任体系。按照党中央有关精神和中组部部署要求，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以及组织部门（两新工委）统筹指导下，财政部门党组加强对行业党建工作的领导，行业党组织具体负责，财政部门党组领导同级行业党组织、上级行业党组织指导下级行业党组织，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由行业党组织管理，充分发挥行业管理体制优势，推动形成统一归口、条块结合、上下联动、责任明晰、有机衔接的行业党建工作格局。

《通知》特别强调，组织关系隶属于属地两新工委或属地党委其他工作部门的行业党组织，要自觉接受同级财政部门党组和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关系一般隶属市（地、州、盟）行业党组织，没有成立行业党组织的市（地、州、盟），由市（地、州、盟）财政部门党组织负责管

理；组织关系暂未转入行业党组织的，行业党组织或财政部门党组织也要加强管理。

《通知》明确了有关方面对行业党建工作责任的内容。财政部门党组对行业党建承担领导责任，落实党对行业的领导，确保行业发展的正确方向；研究解决行业党建工作重大问题，审议行业党建工作规划；协调有关部门单位，推动解决行业党建和统战群团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审查同级注协章程，审定同级注协负责人选；任免同级行业党委委员；监督检查行业党建工作。《通知》对各级行业党组织的具体责任作了界定和区分，避免行业党建工作“上下一般粗”“一个套路打到底”。全国行业党委主要负责事关行业党建工作全局的重大工作，省级行业党组织着重发挥好承上启下作用，市级行业党组织着重抓好经常性工作的落实。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按要求抓好本单位党的建设，领导本单位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引领服务群众，推动事业发展。

《通知》明确了行业党建工作责任落实机制。财政部门党组要把行业党建工作纳入本部门党建工作总体规划，每年至少听取1次工作汇报，由财政部门党员负责同志担任同级行业党组织书记，设置行业党组织办事机构，配备专职党务工作人员，在行业基层党建阵地建设、党员和党务工作者教育培训等方面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对于已经脱钩的注协，要通过行业党组织加强对协会工作的领导，确保脱行政不脱组织，脱钩不脱管。行业党组织要加强对同级注协的政治引领，健全上下级行业党组织的指导机制，推动行业党建工作与协会管理相结合、会计师事务所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相融合，加强对统战群团组织的领导，巩固“书记抓、抓书记”的工作机制。

《通知》明确了行业党建工作责任的考核监督与追责。财政部门党组、行业党组织、行业纪检机构要加强对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下一级党组织年度工作进行考核评价。财政部门党组要把监督检查和考核

评价结果作为对同级行业党组织、协会领导班子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对落实责任不认真、不得力的，要予以追责。行业党组织要对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年度工作进行考核评

价，将考核评价结果纳入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内容，及时约谈党建工作滞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负责人，对推脱不改或敷衍整改的，视情况予以处理。

关于加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 切实提高审计质量的实施意见

■ 财会〔2020〕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国资委，深圳市财政局、国资委，各银保监局：

会计师事务所在促进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根据国务院有关决定精神，为加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切实促进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重要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等有关规定，近年来，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落实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制度，针对不同类型企事业单位审计业务实施会计师事务所资格资质管理，促进了注册会计师行业有序发展。同时，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

当前，调整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政策，并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是新形势下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更加公平、有序、高效的市场环境，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是聚焦实现“坚持准则，不作假账”，提高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及金融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有效保障；是更好地发挥会计师事务所第三方审计作用，健全“三位一体”会计监督体系，切实加强财会监督的重要举措。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化会计审计领域“放管服”改革，取消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等专项业务资格审批，综合采取一揽子政策措施，强化市场约束、增强企业责任与加大监管力度，加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在公平竞争中、在严格监管中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鉴证服务。

（二）主要原则。

1. 有序推动，平稳实施。在调整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政策的同时，加快形成接续性管理措施，引导会计师事务所根据自身规模、能力和专长承接业务，推动改革平稳有序实施。

2. 质量优先，做强做优。树立质量优先导向，加快推动形成市场择优的体制机制，引导要素资源等向优质会计师事务所聚集，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壮大。

3. 突出重点，统一规则。以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及金融企业等公众利益实体审计作为监管重点，完善执业标准体系，维护国家统一审计准则的严肃性，促进形成规范统一的审计市场。

4. 综合施策，协同配合。突出行业监管的系统性协同性，综合运用行政监管、市场约束、行业自律、信用建设等多种方式手段，加强部门间的协同配合，共同促进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

三、具体政策措施

（一）完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政策。财政部联合有关部门制定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办法。备案管理充分运用现有规章制度，突出服务能力和执业质量，促进形成科学有序的管理格局。简

化备案流程、推进网上办理，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突出自主择优的市场导向，调整完善相关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办法。从事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具备相应执业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

(二) 逐步推动开展会计师事务所质量评估。鲜明树立质量优先发展导向，进一步推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做强做优，促进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做精做专，形成大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协同发展的格局。财政部、国资委、银保监会等部门共同推动会计师事务所质量评估结果的运用，为市场主体自主选择提供参考。根据国有企业、金融企业业务特点，推动开展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国有企业及金融企业审计业务专项评估工作，体现专项性与针对性。

(三) 深化会计师事务所符合执业许可条件监督。财政部门依据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规定，结合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国有企业、金融企业等审计业务特点，根据需要组织开展对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能力等情况的核查。根据核查结果，采取出具管理建议书、责令整改、警示函等措施。同相关部门及时共享核查信息，并及时披露核查结果。

(四) 加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监测和管理。财政部通过财政会计行业管理系统，加强对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国有企业及金融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重大事项变更的信息监测，并给予必要的关注、评估等，及时同国资委、银保监会共享有关信息，并视情况向市场公开提示。加强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管理，对首席合伙人、质量控制主管合伙人和其他执行合伙事务合伙人的任职资格、诚信要求等作出细化规定并督促落实。

(五) 加大会计师事务所信息披露力度。在现有财政会计行业管理系统基础上，充分运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审批、重大事项变更备案、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以及有关部门监督检查中取得的信息，建立完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信息披露平台。及时披露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人员构成、主要业务、质量评估情况、表彰荣誉、处罚处理等信息，满足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信息需求，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披露信息涉及相关国有企业、金融企业的，财政部门及时与相关监管部门进行沟通。增

强会计师事务所透明度，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体系建设，研究推动对执业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戒。

(六) 强化企业在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中的责任。企业应当进一步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落实会计师事务所对股东负责的要求，有效发挥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监事会在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中的作用。财政、国资、银保监等部门实行分类指导，督促相关企业合理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充分考虑拟聘事务所同企业资产规模、业务特征等情况的匹配程度。

(七) 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切实加强行业风险教育，引导会计师事务所增强风险意识并根据自身执业胜任能力承接业务，对超出能力范围承接业务的及时劝诫。加大自律监管力度，完善自律规则，加大与行政监管的协同力度。及时完善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密切关注会计师事务所低价竞争等行为，对违反自律规范的严格惩戒。

(八) 加大对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力度。财政部门依法加大对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力度，继续推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进一步加大对上市公司、国有企业、金融企业等公众利益实体审计的监督检查力度。加强监督检查工作的协同和信息共享，国资委、银保监会等部门发现的有关会计师事务所的问题线索移送财政部办理，财政部及时通报相关监督检查结果，切实提高监督检查的针对性、有效性与权威性。

(九) 严格对负有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关责任人的处罚措施。严格落实注册会计师法、证券法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执业违法处罚规定。对出具审计报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会计师事务所依法暂停执业或吊销执业许可，对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会计师视情况依法暂停或吊销其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

(十) 加强行业主管部门与其他监管部门的协同。进一步理顺财政部门作为注册会计师行业主管部门同国资、银保监等部门的关系，形成协调协同工作格局。行业主管部门应及时完善审计准则等执业规则，督促会计师事务所提高审计质量，有效满足其他监管部门对审计质量的需求，并共同维护审计准则规则的统一性、完整性。

四、组织实施

各地财政、国资等部门和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应当提高对加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与提高审计质量的认识，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协同配合，抓好工作落实。应当密切关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方案，积极稳妥地推进相关工作。要及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促进各项重点工作的有序开展，努

力增强会计师事务所的自律性、公正性与专业化水平，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在强化财会监督、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财政部 国务院国资委 银保监会
2020年9月25日

两结合 双促进 党建引领财会监督新征程



9月22日，财政部监督评价局党支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党委组织在京联合检查组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党日活动，着力促进党建与业务“两结合、双促进”。监督评价局党支部书记、局长郜进兴，中注协党委书记、秘书长舒惠好，以及联合检查组参检人员，信永中和、毕马威华振、天职国际、永拓等四家被检查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今年适逢注册会计师制度恢复重建40周年，活动以此为切入点，创新党课形式，丰富党课载体，拓宽党课范围，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由检查组成员与被检查单位党组织共同参与，通过参观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史料陈列馆，使全体党员干部重温了注会行业服务国家建设的奋进历程，同时以“书记现场讲党课”的形式，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凝聚力作用，激发党员干部的责任心、使命感，共同推进做好2020年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联合检查工作。

“回忆历史，不忘初心；了解当下，铭记责任；展望未来，奋斗不止。”郜进兴表示，“伴随着改革开放历程，注册会计师行业不断发展壮大，在服务改革开放、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将财会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财会监督工作举旗定向。注册会计师行业作为财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诚信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在构建“三位一体”财会监督体系中，提升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强化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显得尤为重要。在联合监管工作中，尤其要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要将政府行政监督与行业自律监督相结合，进一步加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监督，避免交叉监管、多头监管、重复监管，切实提高监管权威性，发挥出“1+1>2”的效果。

舒惠好回顾了行业发展历程，特别是

行业改革发展 40 周年专题

风雨兼程四十年 彩云长在有新天

——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工作回眸

■ 胡少先

2020年，是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恢复重建40周年。这40年的沧桑巨变，描画出的是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大开放、大变革、大发展的宏伟画卷，谱写出的是行业广大从业人员不忘初心、艰苦创业、奋斗不息的华彩篇章。这40年发展历程之中，行业党建是那一抹最动人的红色，是那一首最悦耳的歌声。回首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不易，不由得让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我且试以记之。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1980年12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发布《关于成立会计顾问处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会计顾问处（原称会计师事务所），是由注册会计师组成，承办会计公证、咨询等业务的独立单位。”这是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恢复重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顺应国际通行惯例的需要，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由此从无到有地逐渐发展起来了。早期，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会计师事务所要由其上级主管单位发起设立，其仍是挂靠单位下属的一个附属机构；彼时，事务所党组织（如有）也同样隶属于上级主管单位。以天健前身浙江会计师事务所为例，事务所是浙江省

财政厅下属事业单位，党支部归浙江省财政厅机关党委管理。可以说，这种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一些事务所党组织规范化、制度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98年4月，财政部发出《关于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与挂靠单位脱钩的通知》（财会协字〔1998〕22号）。为加快脱钩改制进程，1998年8月财政部又在《关于进一步加快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事务所体制改革的意见》（财办字〔1998〕45号）中强调：“凡是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事务所，必须按照财政部财会协字〔1998〕22号文件要求，在1998年12月31日前，完成脱钩改制的全部工作；其它事务所应在今年做好脱钩改制的各项准备，1999年6月1日前提出方案，1999年12月31日前完成脱钩改制工作；事务所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完成脱钩改制工作的，停止执行注册会计师业务。”1998年底，103家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完成脱钩改制工作；1999年底，全国4805家会计师事务所完成脱钩改制工作。会计师事务所人员在人员、财务、业务、名称四个方面与挂靠单位彻底脱钩，改制为由注册会计师个人发起设立的合伙制和有限责任制事务所。与此同

2009年全面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工作以来，在中组部大力支持指导和财政部党组的坚强领导下，行业党建工作在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迈出了重要步伐，走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前列。他表示，今年中注协将继续围绕“质量管理提升年”活动部署，推动质量管理准则和职业道德守则等标准建设、监管制度建设，推进继续教育培训、综合评价等方面改革，以促进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提升，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同时，积极开展“321”工程，不断提升行业党建工作质量和水平。

此次活动形式新颖，别开生面，党建与

业务“两结合、双促进”。活动中，联合检查组成员均表示，史料馆的参观使大家充分了解了党领导下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发展历程，现场党课也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加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监督的重要意义，要不忘初心、铭记责任，共同履行法定监管职责，以监管合力做好执业质量检查工作。被检查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也纷纷表示，将全力配合检查工作，并以此次检查为契机，不断学习、不断反思、不断改进，通过完善自身建设、苦练内功，为注册会计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时，事务所的党组织关系绝大部分也与挂靠单位进行脱钩，走向社会。为确保事务所党建工作正常运作，经过多方协调，天健党组织关系转隶浙江省人才交流中心，建制为党支部。随着天健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党员日常教育和活动开展遇到新情况、新问题，2004年9月天健党支部升格为党委，这也是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成立的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党委。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008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他指出：“要紧紧围绕协调利益、化解矛盾、规范服务，加强新社会组织党的建设，以行业规模较大、业务主管部门明确、工作基础较好的律师、会计师等行业为突破口，以点带面，积极探索加强新社会组织基层党建工作。”

2009年9月，党中央决定把会计师事务所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单列出来，独立参加第三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并明确由财政部党组负责指导。这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第一次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参加党的重大集中性政治教育活动，为全面推进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工作提供了重要契机。之后，注册会计师行业党组织根据组织部门和财政部门的统一部署安排，陆续开展了创先争优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过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不断强化党的理论学

习、教育、武装工作，引导和促进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2009年10月，中央组织部和财政部党组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为全面加强和改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党的建设明确了工作方向，制定了工作措施，这是指导行业党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10月15日，在中央组织部的支持和指导下，财政部党组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委员会，成为我国第一家全国性行业党组织，使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工程的推进、事务所专题学习活动的开展有了全国统一的指导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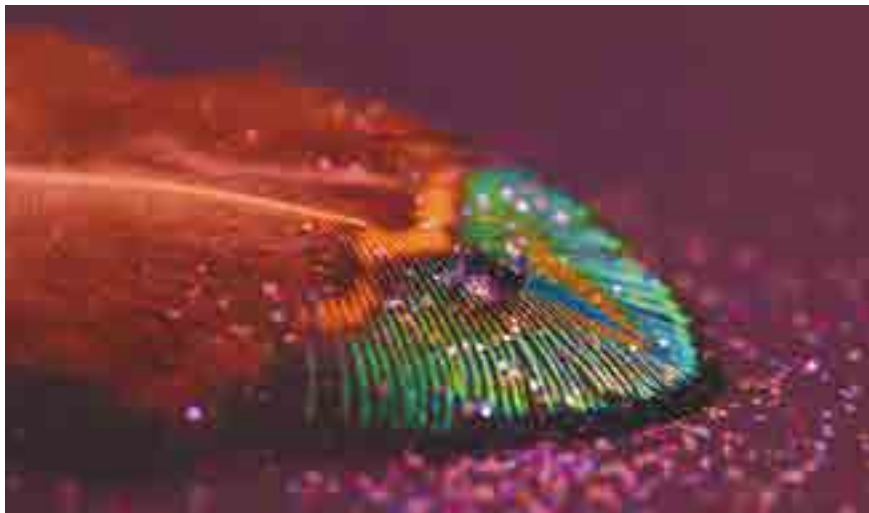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的成立，是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工作乃至行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标志着行业党建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为行业的持续、健康、科学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组织支持和机制保障，也为当年各省市自治区注册会计师行业成立党委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鲜红的党旗在注册会计师行业高高飘起。当时全国共有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1069家、事务所党员3.3万余名，全国行业党委的成立，为行业3.3万名党员找到了政治归属和政治依托。第一届全国行业党委，由财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军兼任行业党委书记，中注协党委书记、秘书长陈毓圭兼任行业党委常务副书记，中注协副秘书长董新钢、中注协党委专职副书记梁立群兼任行业党委副书记，行业党委委员为（按姓氏笔画排序）：白晓红、刘光忠、张克、胡少先、罗克明、郭文杰、程用文。2013年3月王军同志升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之后，全国行业党委书记一职均由财政部分管领导兼任，余蔚平、戴柏华、赵鸣骥同志曾先后担任过书记。目前，财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程丽华兼任全国行业党委书记。中注协和省级行业协会内部也相应设置了党办机构和专职党务工作者。全国现有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3650家、党员43943人，团组织1685家、团员青年103607人，较行业党建工作开展之初，全国行业的党组织规模和党员人数均有了大幅度增长，党建成果显著。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只有党建强，才能发展强”，这已经成为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广大从业人员的一个共识。加强行业党建工作对于推动全行业的规范、科学、高质量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价

值和指导意义。行业发展的新成就也有力地印证了行业党建工作的显著成效。

2008年12月底，全国有会计师事务所7200余家，注册会计师8.3万余人，从业人员近30万人，全行业总收入310亿元。随着经济社会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执业队伍稳步扩大，业务收入规模翻倍增长。目前，全国共有会计师事务所9393家（含分所1174家），注册会计师110365人、非执业会



员170253人，行业2018年度业务收入792.54亿元，包括与会计师事务所统一经营的其他专业机构的业务收入在内的全行业2018年度业务收入1014.8亿元。

自2009年以来，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创建了“条块结合、充分发挥行业党组织作用”的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实现了党的组织和工作“双覆盖”，事务所党组织隶属关系和党员组织关系“双理顺”，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把骨干培养成党员“双培养”。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把贯彻与创新相融合、把党建与业务相结合、把面上和重点相结合，在理顺党建工作体制、机制基础上，基本上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切实推进党建工作各项制度建设，先后开展了“制度建设年”“信息化建设年”“诚信文化建设年”“人才队伍建设年”“国际化建设年”“创新服务年”“质量提升年”“职业化建设年”“质量管理提升年”等多项主题活动，让党建工作在行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以培养行业党建骨干培训班为例，全国行业党委自2010年起在中央党校举办了10期中央国家机关分校处级干部进修班，为事务所和行业协会党务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天健党

务工作者朱炳有、牛景亮、楼诗景、汪修生、段丽菁5位同志曾参加学习，顺利毕业。

2011年以来，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和中央统战部、财政部党组《关于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统战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精神，不断夯实行业统战工作基础，加强行业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提高行业社会地位，扩大行业专业影响力，在支持行业代表人士更好地服务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019年12月，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代表人士服务团成立，本人十分荣幸地担任服务团主任委员。目前，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共有823人次担任各级“两代表一委员”，其中十九大党代表1名，全国人大代表3名，全国政协委员7名，省级党代表6名，省级人大代表28名，省级政协委员63名。注册会计师行业统战工作受到中央统战部和地方统战部门高度肯定。行业代表人士积极履职尽责、参加国家政治活动、参政议政，撰写调研报告多篇，为人民福祉发声，为行业发展谏言，也让社会各界充分理解和认同了注册会计师行业“两代表一委员”的人民情怀和理想信念。本人非常荣幸地先后担任了杭州市第十一次党代表、第十一届浙江省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受聘担任国家监察委员会第一届特约监察员。履职期间，我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始终坚持“专业报国、服务社会”的信念，对党忠诚，为国分忧，为民尽言，尽职尽责，建言献策，为服务国家建设奉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2年6月28日召开的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党委、甘肃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等6个行业基层党组织获得“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2015年12月9日，《人民日报》第13版刊载《正能量引领注册会计师行业前行》的标题文章，着重介绍了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强、发展强”的工作经验，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本人也先后获得“浙江省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浙江优秀党务工作者”等称号。自2012年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委成立以来，注册会计师行业共有包括天健1名团员、1名团干部、天健重庆团委在内的8名团员、2名团干部、9家会计师事务所团组织荣获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团干部）”“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团

委) ”等荣誉称号。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册会计师行业要“紧紧抓住服务国家建设这个主题和诚信建设这条主线”的重要指示精神 and 中介机构要朝着自律性、公正性、专业化方向发展的明确要求，是我国注册会计师党建工作的发展方向和根本遵循。因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维护国家经济信息安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在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事务所要提高政治站位，廓清思想迷雾，澄清模糊认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工作作为重要抓手和政治依托，办好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提升审计质量，规避审计风险，持续对客户进行梳理、排查，对于风险较大的项目，绝不予承接；严格推进总分所一体化的相关规定贯彻落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避免形似而神不至；切实有效防止合伙人脱离客户、脱离业务、脱离队伍；持续推进内部执业质量检查的广度和深度；优化人才奖励措施，稳定人才队伍，打造一支具有高度责任意识、敬业勤勉精神、专业训练有素、职业道德优良、年龄结构合理的执业队伍；建立和完善培养内容各有侧重、分级

分层、形式多样的内部员工教育培训体系和制度，有效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胜任能力和职业道德素质。广大党员要秉承“专业报国、服务社会”的宗旨，弘扬“诚信、公正、务实、专业”的行业核心价值观，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督服务职能，严谨审慎，勤勉尽责，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切实做到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出虚假报告，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专业支持。

此外，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行业党建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在事务所主要负责人不是党员的情形下，如何深化强化事务所党建工作，有待进一步探索实践；在总分所体制下，总分所党组织指导关系有待进一步契合；从业人员流动性较大，管理上存在难度；绝大多数党员处于业务工作第一线，加班多，出差多，工学矛盾突出；有的党组织基础工作不到位，“三会一课”规范化程度不够；有的党组织对组织建设不够重视，支委离职后不上报、不补选；有的党组织活动开展有娱乐化倾向，对待组织生活不够严肃等等。虽然这些问题是事务所党建工作的通病和难点，但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认真思考，并积极寻找解决之道。

鹰击天风壮，鹏飞海浪春。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各级主管部门和行业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注册会计师行业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制度机制创新为保障，牢记初心使命，站稳人民立场，充分发挥好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党建强、发展期”作为一种工作方式和价值追求，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持续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就一定能够持续开创新时代行业党建工作新局面！

作者单位：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发挥平台优势 服务行业发展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服务外包示范基地建设回顾与展望

■ 郭纲 姚青 陈沁

2020年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恢复重建暨行业改革发展40周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注册会计师行业积极进取，不断创新。“十二五”规划期间，中注协提出“将服务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提升行业服务效能、积极拓展行业服务新领域作为实现行业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启动了新业务拓展工作。作为新业务拓展创新和“一特三高”（特殊领域、高端需求、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业务拓展的重要载体及服务需求对接实施平台的会计服务示范基地也应运而生。2010年8月，苏州工业园区在中注协和省注协的关心支持下，成为全国首批会计服务外包试点地区之一，同年12月，苏州工业园区会计服务外包示范基地在园区正式挂牌。十年来，苏州工业园区会计服务示范基地（以下简称示范基地）秉承“创新、服务、发展”的宗旨，采用政府推动、行业参与、市场运作、合力创新的模式，在行业发展和自身建设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专业服务发展滞后、机构规模小、专业人员少、执业能力低、综合服务水平不高，如今已形成专业机构品牌化、服务业态多元化、专业服务标准化、服务管理规范化的态势。

回顾这十年建设发展史，值得我们总结的有：

——持续拓展业务领域，坚持服务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一个行业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度，以及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取决于该行业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种类、范畴和规模。在示范基地成立前，从提供服务类别来看，园区事务所业务以普通鉴证业务为主，业务链未向高端鉴证和咨询延伸。示范基地成立后，结合园区转型升级、进一步打造创新型经济、服务型经济的需求，将专业服务业跨越发展作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环节，鼓励机构积极主动承接高端鉴证业务和咨询业务，促进高端业务市场发展。

借力示范基地平台，会计师事务所实现了做大做强。苏州岳华本来是园区一家年收入500万左右的小所，经由示范基地对接，2014年加入全国百强所大华成为大华苏州

分所，执业范围由原来的传统审计向上市发债、企业并购重组等高端业务延伸，2019年收入达到3000多万。

借力示范基地平台，会计师事务所实现了做精所专。苏州众勤是一家本土中型事务所，在示范基地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探索和推进管理信息化和审计智能化开发，多年来先后研发成功管理信息系统应用平台、审计作业辅助系统和AMIS2事务所管理系统。通过做精做专信息化建设，众勤实现了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建设成果也获得了各级注协的肯定。众勤所长当选中注协行业信息化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中注协行业信息化发展“十四五”规划的起草工作。

当前，园区正处于由外向带动向创新驱动、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阶段。特别是2019年江苏自贸区苏州片区正式挂牌后，园区借助自贸区东风，把做大做强产业作为立区之本，形成了“2+3+1”特色产业体系（“2”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3”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三大战略新兴产业，“1”是现代服务业），包括专业服务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园区注册会计师事务所35家，注册会计师426人，2019年行业业务收入总额6.14亿元，咨询业务占比30%。未来注册会计师行业规模和服务质量将会再上新台阶。

——持续健全组织机制和制度保障，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优化营商环境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是城市决胜未来的关键所在。示范基地始终秉持亲商理念，积极响应园区“着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号召，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让机构和从业人员发展安心、干事顺心、创业开心、生活舒心，为区域专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锻造一副最重要的“筹码”。

打造优质的行业营商环境，系统的顶层设计至关重要。示范基地挂牌之初即成立了领导小组，目前由14个政府职能部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构成，负责研究决定园区专业服务业发展的支持政策和重大事项，并相继出台机构成员资格管理办法、创新业务

试点方案等管理规范，不断健全运行机制。同时制定长期规划和年度发展计划，明确总体目标，谋划工作思路，细化工作任务和举措。

打造优质的行业营商环境，完善的配套载体与扶持政策必不可少。2011年以来，园区政府投入近亿元在湖西CBD专门推出一幢写字楼——星海大厦作为示范基地载体，推动专业服务机构集中入驻，目前星海大厦已经签约入驻的全国百强事务所有瑞华、大华、青矩工程顾问（天职国际）等，周边楼宇入驻的全国百强事务所有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苏亚金诚、北京兴华等，形成了以鉴证和咨询服务为主的专业服务集群。先后出台多项鼓励高端专业服务机构发展的意见和实施细则，吸引和培育高端专业服务机构在园区落户，同时特设“经济贡献突出奖（现代服务业）”以奖励和促进区内优质现代服务业企业发展。

打造优质的行业营商环境，贴心的行业服务不可或缺。示范基地一方面用足用好长效调研机制，倾听行业诉求，反馈政策信息，助力机构争取各类专项扶持资金、人才薪酬补贴及优租房等政策。据统计，2013-2018年园区针对整个高端专业服务机构兑现补贴近1600万元；2013年以来，园区专业服务机构有138人次获得紧缺人才薪酬补贴。另一方面，持续加强人才培养，努力打造与行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专业队伍。通过不断加强培训的组织建设，创新培训手段，完善培训机制，逐步形成了“紧缺人才”、“基础人才”和“行业交流”三大模块的培训体系。2011年以来示范基地共举办培训讲座150多场，其中紧缺人才系列培训课程重点面向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律师和财务总监，累计培训人数上万人次。在省市注协的支持下，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师两项紧缺人才培养于2013年和2017年纳入注协执业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师后续教育体系，实现了学时互通；基础人才培养包括为新员工系列培训和会计实训项目，前者致力于解决中小型事务所新入职员工“最后一公里”问题，后者则有力推动了事务所与高校建立行业人才供需对接。

通过对亲商氛围的营造，园区的发展竞争力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越来越多的专业服务机构和专业人才纷纷选择在园区落户。示范基地成立之初，园区会计师事务所只有14家，其中全国百强所仅3家；目前入驻园区的会计师事务所所有35家，全国百强所达到15家。

专业服务人才的集聚度大为提升，所均注册会计师人数由原来的9名增至12名。

——持续聚焦做新做特，注重推动社会管理方式创新。园区秉承借鉴新加坡经验的成果，一直保持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示范基地成立前，园区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的鉴证服务市场开放度较低。随着经济社会建设不断发展，园区各个职能部门均面临着在人少事多的情况下如何加强政府管理、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困境。为此，示范

打造优质的行业营商环境，贴心的行业服务不可或缺。示范基地一方面用足用好长效调研机制，倾听行业诉求，反馈政策信息，助力机构争取各类专项扶持资金、人才薪酬补贴及优租房等政策；另一方面，持续加强人才培养，努力打造与行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专业队伍。通过不断加强培训的组织建设，创新培训手段，完善培训机制，逐步形成了“紧缺人才”、“基础人才”和“行业交流”三大模块的培训体系。

基地充分发挥政企对接平台的作用，积极引入社会中介机构参与社会管理，取得明显效果，得到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高度认可。示范基地通过拓展创新业务，推动政府行政部门将部分行政指导类、行政咨询类业务更多地外包，借助专业服务机构客观独立的专业团队力量，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和服务效益，推动社会管理服务模式的创新与转变，并为专业服务机构今后广泛开展第三方评估和社会监督工作打下基础。

立足示范基地，集中多方智慧。示范基地联合园区税务、科技、国资、企业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集聚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力量，广泛开展调研和研究，先后推出企业社保缴交稽核、企业公示出资信息检查等十二项创新试点业务。例如示范基地与园区海关推出企业海关事务健康体检业务，委托示范基地中介机构对园区内从事加工贸易业务的企业海关事务守法自律情况进行调查，通过引入中介协助海关监管，有效缓解了海关

监管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提高了海关监管的准确性和效率，该项业务已被南京海关采用，为全省海关职能方式的转变探索了一条新路。

立足示范基地，发挥整体合力。在示范基地的大力推动下，相关职能部门与专业服务机构密切合作，将创新试点业务的操作规程和管理办法汇编成册，通过统一业务操作规程和标准，保证试点质量；积极协调解决创新业务试点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并长期跟踪新业务实施效果，及时调整修改在试点过程中由于形势变化而不再适合推广的业务。据不完全统计，示范基地的会计师事务所累计实现新业务收入1.57亿元，创新业务项目8712个，大大丰富了园区的政府外包市场内容和层次。

——持续推进行业党建，实现党建引领机构行业有序发展。近年来，新社会组织迅猛发展，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也日益成为党建的重要领域，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示范基地成立后，将原园区注册会计师行业党总支升格为专业中介服务行业党委，以党建引领行业发展。目前行业党委共有支部40家，包括16家会计师事务所支部、21家律师事务所支部、2家工程造价咨询公司支部和1家代理记账联合支部，党员588名。

组织建设方面，行业党委委员共七人，其中党委书记为财政局副局长暨示范基地建设领导小组成员，一名副书记为司法局处长，其余委员均为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充分发挥行业党委、业务主管部门和专业服务机构在党建工作中的作用，切实建立起“三位一体、通力合作”的工作机制。

工作实践方面，由于专业服务业党员结构有年轻化（35岁及以下党员占85%）、学历高（95%的党员学历为大学本科及以上）、流动快（人员年平均流动率15%-20%）三大特点，党员队伍思想多元、活动轨迹复杂、分布广泛，因此行业党委探索了“聚心、聚智、聚力、聚声”的“四聚”工作法，通过为机构“送政策+送课程”、为高知群体“送培训+文体活动”、服务基层奉献爱心、统筹资源助力项目等各种举措，从专业特色出发，发挥党建作用，凝聚人心，汇聚人才，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阵地打造方面，行业党委在星海大厦12楼设立党群服务中心，内设党建长廊、电教室、宣誓室、大培训室、多功能厅和健身房

六大功能区，向各支部免费开放，并配备统一风格的场所标牌和上墙制度，充分发挥党建宣传功能、党务+业务培训功能、跨行业资源对接功能、党员生活质量提升功能等“四大功能”。

品牌树立方面，由于专业服务业党建品牌亮点不够突出，较难给社会大众带来形象直观的认识，因此行业党委确定红色品牌名称“红师荟”，体现了行业党委不仅是汇集园区各类专业服务机构党支部的“组织之汇”，也是高知群体和专业人士荟萃一堂的“人才之荟”。同时还制定了品牌视觉识别系统，出台品牌行动计划，培育和打造行业优质红色品牌。

通过以“完善一套党建工作体系、推行一项党建工作法、营建一个党建阵地、打造一个红色品牌”的“四个一”为主线，行业党委充分发挥示范基地的枢纽效应、党群服务中心的阵地辐射效应和党建品牌的示范带动效应，营造了创先争优、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行业先进与典型层出不穷。行业党委被评为2019-2020、2017-2018和2014-2015年度江苏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先进党支部、2015年苏州市先锋基层党组织，党建品牌荣获2018年园区“十佳基层党建品牌”，党群服务中心先后被评为2018年首批苏州市“海棠花红”先锋阵地和2019年园区首批党员教育实践基地。

十年风雨兼程，十年岁月如歌。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恢复重建暨行业改革发展40周年的今天，示范基地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过去，憧憬明天，园区正面临着长三角一体化、创建自贸片区和推进深化开放创新综合试验2.0等重要机遇，示范基地也将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乘势而进，以创新引领转型升级为主线，以增强行业服务能力为核心，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支撑，以加强党建为政治保障，推进新时期的“四个一”工程，即产生一批有核心竞争力的事务所、形成一个区域性人才高地、孵化一批信息化示范特色项目、培育一批新社会组织党建典型。我们将扎实耕耘，担当创新，谱写区域专业服务业发展新篇章，为行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财政局

三十年追求职业梦想、强化专业服务、实现人生价值的感悟

■ 陈景庚

岁月匆匆，回顾职业生涯，已近30年，有收获也有感慨。

我1992年毕业于苏州大学财经学院，后分配至江苏昆山财政局所属的昆山会计师事务所工作，1994年通过中级会计师及中国注册会计师考试，并担任昆山会计师事务所张浦分所所长，1996年1月调至江苏华星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任副所长，2000年1月华星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担任主任会计师至今。在近30年的专业生涯中，我从一个财经专业大学生成长为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深会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也是江苏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和苏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秘书长、苏州工业园区培训协会会长、苏州工业园区中介服务行业党委副书记。

我所在的华星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区域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从事的是专业服务，肩负的是法律、社会和家庭责任，面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各种竞争挑战，如何把握政治方向、与时俱进、坚持底线，做好审计咨询等专业服务，促进事务所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是我们思考和实践的问题。这里谈一下本人从业近30年来的一点想法和感悟。

一、注重政治学习，做好党团建设工作

注册会计师行业是国家特许经营的行业，除了理论和专业服务社会外，还承担了社会经济领域鉴证、咨询等若干责任和义务。响应党的号召、坚持政治学习、积极关心时政、了解宏观政治经济形势，既有利于行业发展，也有利于与党和国家的战略保持一致。华星事务所1996年就在全省行业中率先成立了党支部和团支部，并结合专业和行业特点开展党建、团建工作，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积极开展政治学习和组织活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两学一做等都扎实推进，并在2011年被财政部评为全国先进，本人还作为先进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多年来，华星党团支部弘扬先进，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促进专业发展和行业进步，涌现了一批省市先进党员，实践证明这些党员为华星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带动了整个

团队的凝聚力、向心力建设。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学习，对华星的健康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做好事务所的发展战略，走适合自己的道路

每家事务所的地理、历史、员工、客户和资质等不尽相同，所以要根据各自的情况来确定事务所发展的战略和业务主打方向，比如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工程造价咨询资格等业务资质的大型所，可以在综合性发展的战略下走模块化的专业发展道路，发挥各专业合伙人的作用；有些没有证券等业务资质的事务所可以侧重某个领域和重点客户提供专业服务，逐步培养客户，跟着客户一起发展，必要时也可以与大所战略合作。事务所的发展战略确定后，就要研究市场战略，锁定业务方向，发挥业务特长，寻找、挖掘客户的需求，做好专业服务。

华星所正是结合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原有做好外商投资企业财税服务的同时，抓住资本市场和政府职能转换的机遇，积极在服务拟IPO公司及做好财政绩效审计、企业内控服务、反避税咨询及企业防舞弊、税务咨询等领域积极拓展，根据市场和客户需求不断强化专业服务力量，提升专业服务水平，并在工程咨询等领域积极尝试与财税服务的融合，打出了一条新路，确保了华星咨询在苏州乃至全省行业中应有的服务地位，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注重人才培养，打造一流服务团队

事务所是专业化的服务组织，法律、财务、税收、管理等专业知识要时刻跟进学习。事务所的主任会计师、合伙人要以身作则、带头学习，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确定培训内容，走出去、送进来，特别注重员工职业经验分享，努力培养各个专业的带头人，培育行业能手。专业培训也是对员工的一项福利，事务所合伙人要肯下本钱、肯花功夫。

近30年来，华星共计招聘培养了本科以上学历人才近千人，每年都拿出营业额的3%以上用于员工培训，包括三大国家会计学院

的学习深造、专业学习补助（包括在职研究生补助等），还积极参与国家、省市注协的人才培养计划，曾派优秀员工去香港、新加坡等地事务所进行不低于三个月的岗位学习，员工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及发表专业文章可获公司给予的奖励等等，进一步调动了员工的专业学习氛围，为事务所和全社会培养输送了大量人才。华星除了三百多名还在本所工作的优秀员工外，不少因为职业规划等离开华星的员工，也是所在单位的业务能手，有的已担任地方政府的要职，有的成为了知名企业的老总、财务总监或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等。华星对人才的培养是包容开放的，这也是华星和我作为事务所主任会计师的价值所在。

四、坚守职业底线，强化职业风险管理

会计师事务所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在业务风险出现时，与券商等其他业务主体相比处于弱势，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注册会计师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我们要时刻牢记风险，按照法律法规和行业准则、内部制度做好各项业务，严格三级质量控制，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在质量上要有考核机制，每年业务淡季，除了行业检查外，事务所内部也可以推动质量互查、评比。华星所视质量为生命，坚决严守职业标准，诚信为本、操守为重，至今未发生过一起执业质量事故。打造“值得客户永远信赖”的百年华星，这是本人也是全体华星人的服务宗旨。

五、强化团队文化和品牌建设，提升凝聚力

有什么样的领导人就有什么样的事务所，有什么样的事务所也就有什么样的团队文化。事务所的和谐向上，首先是合伙人的团结，合伙人文化的打造是第一要事。文化和道德建设是事务所制度和法规以外的专业服务力量，也是事务所的价值和竞争力所在，要积极发挥党、团组织和工会的作用，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政治学习、文体娱乐、旅游考察等活动，注重关爱员工及其家庭。同时，还要以大爱之心行善行德，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比如捐赠、献血、公益讲座等，尽己所能、服务社会。华星事务所2014—2015年帮助一家养老院做了工程咨询服务，2008年以来向汶川大地震等多次捐款捐物近100万元，此外每年捐款5万元给苏州市蓝天救援队等。

另外，事务所办公环境改善和员工的职业形象打造，也是团队文化建设和事务所品

牌建设不可或缺的地方，华星在苏州率先贷款购买的办公楼近5000平米。

六、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促进合伙人文化建设

为了提升事务所的内部管理水平，有必要建立和健全包括合伙人协议、业务管理、质量管理、财务管理、档案管理、学习管理、考勤管理、信息管理等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内部规定，让大家有“法”可依，也是避免内部纠纷和法律风险的重要举措。正因为事务所的章程及有关规章制度建立完善，实际执行中注意沟通交流，以制度为前提的人文推动，华星的合伙人及主要业务骨干比较稳定，团结向上，共享共进，这是未来华星持续发展、不断前进的保障。

七、注重信息化建设，提升审计效率

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已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当下的事务所管理如果离开互联网、大数据及信息化平台的运用，将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审计软件、自动化会议系统、必要的咨询数据库等都要积极购置，把员工从琐碎的业务底稿等工作中解放出来，这既能降低成本、提高事务所效率，也是关爱员工的一种表现。为此，华星已花费了百万元用于信息化建设和人员培训，进一步提升内部管理和审计效能。

八、坚持合理的收费标准，努力维护好行业形象

事务所生存不易，市场竞争虽然激烈，但行业收费总要坚持一定的标准，时刻提醒自己是一名注册会计师，从事的是专业化要求高、执业风险大的行业，要努力维护好行业形象。我担任市注协副会长和行业自律委员会主任后，推动促成了“苏州市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协议”的签订，进一步避免了行业低价无序竞争。

回想过往，感慨万分。未来的岁月里，更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坚持理想、坚持学习、坚守底线、坚固风控、坚韧前进、坚强生活，向先进学习，不断进取，努力为注册会计师行业 and 全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江苏华星会计师事务所

司法鉴定独树一帜 专业服务有口皆碑

■ 万汉英

武汉，美丽的江城，两江交汇、三镇鼎立，一个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地方。武汉正浩，正气浩然。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是武汉正浩的精神名片。二十年来，武汉正浩会计师事务所以党建引领、特色立业，在诚信规范、创新发展和优质服务的司法会计鉴定实践中，独树一帜，成为注会行业司法会计鉴定领域的标杆和领跑者。

一、结缘司法鉴定

正浩管理层和业务骨干多为国家机关脱钩改制人员，1999年11月放下“铁饭碗”，迎接新挑战，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创业之路、发展之路。

2000年，赛格证券总公司武汉营业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震惊全国，机缘巧合之下，正浩承接了此案的司法审计。凭借丰富的审计实践经验和审计机关的人才支持，查清了涉案公司的自营账户，摸清了该公司隐匿数亿元资产的去向。

自此一役，正浩与司法会计鉴定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相继承办了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海南赛格证券非法集资案、德隆系案、上海社保案、赌资500亿元中国最大网络赌球案等一系列重特大经济违法犯罪案件的司法会计鉴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承办1.10刘汉刘维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石油窝案、北大方正案、e租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p2p财富基石案等重特大经济违法犯罪案件的司法会计鉴定，汇同北京、四川、湖北、上海、吉林、重庆、辽宁等公安干警、国家审计署工作人员，从海量涉案检材中发现、甄别、锁定证据，为案件侦查审判工作的“完胜”，提供了详实的数据、信息资料和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出具“铁板钉钉”的权威性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均被司法机关采信。

正浩司法会计鉴定实践活动，得到业界内外的广泛认可。获得中注协“经济案件会计证据甄别服务”一特三高项目奖励殊荣，赢得中央政法委、公安部以及北京、四川、湖北等省、市政法机关、办案干警“湖北的审计厉害，能吃苦，很专业”的一致评价和赞誉。

二、特色发展之路

鉴于我国经济领域违法犯罪与经济纠纷案件高发态势，以及经济案件的调查取证和审理过程对司法会计鉴定的需求，在没有统一的全国性鉴定技术标准与规范的情况下，正浩不等不靠，依据相关法律、通则，以自身的专业优势，结合多年的实践经验积累和总结，制定了内部司法会计鉴定程序规范，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提炼、修订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质量控制制度和风险管控机制。同时，以质量为导向，实施执业风险评估、重大疑难问题或争议事项提交专业委员会讨论等举措，在确保提供优质专业服务的同时，实现了零违纪、零风险的风险管控目标。

正浩打破传统审计思维，着力培养综合会计学、审计学与诉讼法学、证据学、调查学等知识结构的复合型人才，创新鉴定方法和工作模式，摸索出一套可供广泛推广使用的司法会计鉴定业务流程：从熟悉案情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入手，深入研讨鉴定方案，结合案件特点选择突破方向；运用“现金流量表法”审查资金流向、“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余股成本及累计获利、“增量资金统计法”计算股票交易资金使用量；通过锁定每个违法证据，形成证据链条，为案件侦查工作提供详实、可靠的信息资料和结案依据。

其中，“德隆系案”操纵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老三股”，“上海社保案”操纵“海欣股份”，余某“抢帽子”操纵证券价格案入选中国证监会稽查局和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证券犯罪案件裁判文书选编》；赌资500亿元中国最大“网络赌球案”、“10·19”特大跨境开设赌场案和“9·11”特大入股菲律宾赌场案被评为公安部2012年十大“铲毒案，树正风”典型案例。一系列司法会计鉴定案例和方法，被司法、金融证券等行政部门、行业专家学者论证认可，列为经典教学案例并编入专业教材推广共享。相关司法会计鉴定信息被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湖北日报、经济日报、中国会计报、法制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业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正浩坚定不移地走司法会计鉴定特色发展之路，从武汉、湖北走向全国，创造了承办重特大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司法会计鉴定百余宗，鉴定总金额6000多亿元，鉴定结果均被司法机关采信的特殊业绩，铸就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司法会计鉴定品牌，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政治意义深远，社会效益显著。

三、以党建带队建

正浩党支部2009年11月成立，随着党建工作的有力推进，政治建设逐步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政治功能不断提升，党员队伍已由当初3名党员发展到现有14名党员，成为一支“忠诚、干净、担当、奉献”和群众威信高的先锋队伍。

党建工作实践中，党支部以党建带队建为抓手，秉持诚信立所、人才兴所、专业强所理念，充分发挥核心引领和保驾护航的战斗堡垒作用。

坚持重要工作岗位有党员身影，阶段性工作有党支部声音，是党支部在执业实践中长期坚持的重要举措。推荐使用党员业务骨干，设置“党员岗”、“责任区”，把党员放在“一线”和最艰难、最复杂的地方工作，把对党员的教育培养、锻炼考验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铆”在一个个“点上”即具体项目上，给党员展示才华、塑造形象、典型引路和发挥作用的平台，也给群众提供向党员学习和对党员进行监督的机会。

党支部及时了解掌握党员及员工思想动态和工作进展，认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尽力排忧解难；重视培育和维护风清气正、健康向上的职场氛围，为人才的成长进步创造有利条件；密切配合管理层组织业务研讨、专业技能培训和工作绩效考评活动，为全面提升公司管理工作质量发挥保证作用；努力践行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的“双培”方针，重视从德才兼备、群众威信高的优秀青年中“培养一批、发展一批、后备一批”，着力提升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先进性。

结合执业特点，常抓不懈的突出制度管理教育。党支部一是针对思想工作实际，以解读制度重要性、必要性和客观标准，强化制度信仰意识；二是结合案例警示教育，在遵规守纪、诚信廉洁等方面筑牢思想“防火墙”；三是严格组织生活制度，强化组织观念、纪律意识；四是贯彻实施正浩特色“铁三条”“守三线”，即审计人员不得向委

托方以外的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相关信息，不得擅自携带审计资料离开工作地点，不得擅自接受媒体采访的特别规定和守住诚信规范“生命线”，违法乱纪“高压线”，廉洁奉公“保证线”；五是选树先进典型，表彰勤勉敬业，弘扬清风正气，引导党员群众牢记职业初心，培养职业精神，履行职业使命。

党建带队建实践活动，释放了党组织凝聚力、影响力，培养了一支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高素质专业队伍，在配合国家司法机关遏制和打击经济社会领域违法犯罪活动，惩治贪腐、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合法权益执业过程中，将正浩公司的优良业绩和执业公信力，展现在案件侦办中和法庭上，写在了注会行业发展的史册上。

四、守初心践使命

随着深化改革、经济发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作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种证据之一，司法会计鉴定在经济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司法会计鉴定作为注会行业新的业务领域，正浩公司无疑是这个领域的领跑者。

注会行业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的复合型人才。相关委托方，比如政法机关、证券机构、纪委监委系统等也需要获取与办案有关的司法会计鉴定知识。自2014年以来，正浩受中注协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等高等院校、以及政法机关、证券机构、纪委监委系统邀请，组织授课团队相继担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湖北大学、中国证监会稽查局、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上海分局、武汉市公安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信息技术中心以及省市纪委监委专题培训班授课人，为弘扬法治、提升业界职业素养和执业水准，推动理论研究和实务运作，起到了促进作用。

十八大以来，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等，完善了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对司法鉴定特别是司法会计鉴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出台全国性统一的司法会计鉴定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显现。

为了规范司法会计鉴定技术标准，提高司法会计鉴定质量，正浩受湖北省司法厅和湖北省司法鉴定管理协会委托，拟订湖北省《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文书规范》和《司法会计鉴定指南》，于2017年由湖北省司法鉴定协会正式印发，填补了湖北省乃至全国

司法会计鉴定领域的空白。两个重要文件的制定，标志着湖北省在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会计鉴定制度，促进司法鉴定机构规范执业、廉洁执业、阳光执业和公正执业，提升司法会计鉴定质量，保证司法会计鉴定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等方面向前迈进一大步。

2015年，正浩董事长万汉英以湖北省政协委员身份，在省政协第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完善司法会计鉴定制度的建议》提案，并通过业内同仁、全国政协委员石文先同步提交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三次会议，引起司法部高度重视。2015年8月，司法部明确回复：“一是适时启动商两高程序；二是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与协调的力度，建立完善统一的司法会计鉴定技术标准和规范；三是进一步明确从事司法会计鉴定的鉴定人准入考核标准，不断完善司法会计鉴定执业素质。同时，推动将司法会计鉴定纳入政府采购目录”。

2016年6月，由司法部、财政部共同组织，中注协具体承办，中国政法大学、国家会计学院、武汉正浩等理论、实务界专家组成的《司法会计鉴定现有技术标准评估》课题组成立。2017年6月，课题组研讨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提出了“司法会计鉴定技术标准和规范”基本框架。在正浩和万汉英委员的不懈努力下，《关于完善司法会计鉴定制度的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有了实质性进展。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正浩公司的责任担当精神，在提升司法会计鉴定公信力、权威性，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中发挥了具有影响力的积极作用，为建立起我国司法会计鉴定制度，促进司法会计鉴定事业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

五、回首二十年

流逝的是岁月，沉淀的是经历，留下的是口碑。砥砺前行，独树一帜。正浩以敏锐的前瞻意识，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在司法会计鉴定领域发挥专业优势，培育核心竞争力，创造了靓丽业绩。司法部授予全国司法鉴定管理先进单位，将中国注册会计师的旗帜插到了一个国家级的领奖台上！

专业服务，服务专业。以专业、敬业、职业和诚信的优势，中直机关、中华天然气、湖北段长江干堤、浙赣线铁路、武汉市政府重大投资项目一系列工程项目造价咨询，赢得广泛好评。中直机关、中纪委给予“正浩公司战斗力很强”的高度评价。

人才兴所，党建强所。正浩以党建带队建，着力打造优质服务平台，客户评价“党建强、平台好、专业精”。是湖北省文明会计师事务所、诚信文化建设先进单位，湖北省和武汉市5A等级信用咨询机构，武汉市首届五星级、十佳会计师事务所和武汉市政府首批服务业重点行业十大领军企业……中注行业党委“全国先进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共青团中央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省、市行业党委以及武汉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先进基层党组织……涌现出“全国司法鉴定先进个人”、湖北省“三八红旗手”、注会行业“巾帼建功”标兵、“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注会行业“优秀青年”标兵一批先进典型。

务实重行，廉洁诚信。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入围省、市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采购平台。

人才济济，备受瞩目。正浩在会计审计、司法鉴定、造价咨询领域，为湖北为武汉为行业，也为正浩人赢得掌声和荣誉；三十余名执业人员被评为省委、省、市行业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员、优秀造价工程师、优秀青年标兵；资深专家获聘高等院校客座教授；受到中注协、省政协、省市财政厅局、司法厅局的领导同志以及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赏。

侠骨柔情，扶危济困。汶川、玉树地震、抗洪抢险、扶贫助困，贫困学子结对帮扶、抗击新冠疫情等灾害灾难面前，正浩人义无反顾，捐款捐物百余万元，以微薄之力，献大爱之心。

蓦然回首创业路，一片冰心在玉壶。正浩紧紧围绕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主题，诚信建设主线，深入学习理解依法治国方略，积极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大局，牢牢把握创新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行业平台和专业、品牌优势，努力践行初心使命、责任担当精神，诚为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和远行的必由之路。

未来，正浩将不忘初心，不辱使命，持续提升专业能力，不断拓展服务空间，在创新发展、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实践中，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专业服务，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行业发展贡献才智、创造价值。

作者单位：武汉正浩会计师事务所

新世纪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见证

■ 李宗义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最早起源于北洋政府时期，谢霖先生1918年取得北洋政府农商部颁发的首个执业证书，迄今已有逾百年的历史。中间虽然有二十多年的断档，但是改革开放后重新恢复注册会计师行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四十年，今天中国注册会计师在国际上已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及行业协会的引领下，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硕果累累。作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者，回首往事感慨不已，展望未来充满信心。

2001年国内外分别发生了银广夏和安然财务造假事件，由于其造假金额巨大，给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国际五大之一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一夜之间轰然而倒，国内最大的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也被撤销。从而给注册会计师行业带来空前的压力，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能力和职业道德均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为了应对危机，美国迅速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和会计监管。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也改组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并开始发布全球统一的会计准则体系——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均直接采用IFRS或者以IFRS为基础制订本国会计准则，从而为跨国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发展进一步扫清了障碍。

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确定会计改革的方向和原则也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从2002年开始，财政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研、征求意见，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确定并启动了行业发展的三大工程：标准工程、人才工程、事务所做大做强走出去工程。首先是通过学习和消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2006年发布了全新的、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体系，并首次向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派出了理事。

其次是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发布了《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培养十年规划》，决定十年内培养1000名社会认同、行业肯定、具有全球视野的会计领军人才。最后，扶持一批国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内涵发展和联合重组，逐渐形成立信、大华、天健、信永中和、大信等民族品牌，并走出国门加入或创建国际会计网络，为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跨国并购、海外上市融资等领域提供专业服务。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三大工程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7年我通过严格的考试面试选拔，有幸入选第三期会计领军（注册会计师）人才班。从2007年7月至2014年9月，我和30名同学参加了十几次集中培训、境外培训和各种形式的研讨、交流，在专业知识、实践技能、沟通能力、战略视角和国际视野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一、以提高胜任能力为目的，集中培训名家荟萃，思想碰撞，精彩纷呈

为了培养出合格的领军人才，财政部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精心为我们设计课程，延请名家讲授，使我们受益颇深。这些课程不仅有宏观经济、战略管理、会计审计、内部控制、行业发展和信息系统等与会计行业密切相关的内容，还有诸如国际政治经济、台海局势、国家安全等内容，更有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宗教、审美与艺术鉴赏、古典音乐、外交礼仪等精品，从不同角度提升我们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综合素质。大师们风趣幽默、深入浅出，谈笑间把复杂深奥的理论转化为轻松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让我们如痴如醉，醍醐灌顶。

尤其是会计领军人才工程的奠基人、原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连续三年为我们做了经典著作、经典人物、经典事件三部曲，鼓励我们研经品典，启智取道。王部长还谆谆教导我们，所谓会计领军人才，一定要做到“有德、有才、

有为”，三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所谓有德，重在恪守诚信，秉持客观公正，以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为己任。所谓有才，要有突出的学术能力，完备的知识结构，高超的组织管理能力。所谓有为，是要将领军人才的“德”与“才”落到实处，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经过七年的学习培训，我的知识储备和综合技能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例如，以前我对法律不太感兴趣，总觉得学习法律很枯燥。在领军班上聆听了法学名师大家的精彩课程后，我领悟到自己从事的审计工作与法律密切相关，不仅要了解相关经济法律制度，例如税法、公司法、合同法、担保法等，而且要多了解一些民事刑事法律制度。此时正好我承担一家大型证券公司因严重违规造成资不抵债，被中国证监会责令破产清算的项目。由于其中涉及大量的民事和刑事法律内容，我下决心要借此机会好好研习一下法律。在工作之余，我买了大量的法律书籍边工作边学习，不仅顺利完成了工作，尽最大努力为国家 and 投资者挽回了损失，还一次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为我的职业生涯又增添了一个硬资质。

在联合集中培训中，我们还与来自企业、学术和行政事业单位的领军人才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大家从各自的专业背景和职业环境出发，既研讨专业，也畅谈职业规划，并对中国会计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未来进行设想和憧憬。思想碰撞出的火花照亮了我们每个人职业发展的前路。

二、飘洋过海，负笈求学，开拓国际视野

进入领军班的第一天，王军副部长就给我们交待了一个重要任务。他说作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领军人才，一定要有国际视野，要能够走出去，为我国大型企业的跨国并购、海外上市融资和资产重组提供会计审计服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要求我们努力学习，必须拿到国际知名的会计执业资质。

从2007年开始澳洲会计师公会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联合举办了国际职业项目IPP，从注册会计师领军人才中选拔优秀人才去澳大利亚学习并有机会考取澳洲注册会计师资格。我也顺利地通过澳洲会计师公会举行的笔试和面试，与其他11名领军人才一起入选IPP项目，并于2008年7月-11月飞赴澳大利亚

墨尔本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学习。令我们更加欣喜的是，还有来自其他亚洲和太平洋地区8个国家的16名同学与我们共同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

在这四个月中，澳洲会计师公会为我们悉心安排了四门核心课程：财务报告与披露、报告与专业实务、公司治理与问责、商业战略与领导。授课的老师都是澳洲著名大学的学者，也是多家跨国公司的顾问，语言生动风趣，态度和蔼可亲。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他们结合很多经典案例来进行详细阐述，例如Enron（安然）公司、澳大利亚HIH保险公司等。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澳洲会计师公会还为我们安排了一些考察活动。我们参观了澳大利亚国会并旁听了众议院辩论，访问了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和贸易部，与KPMG等会计师事务所的同行进行了座谈，还与SWINBORN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专家也专程来向我们就新制订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征求意见。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可以说，这四个月的学习和交流，大大开拓了我们的国际视野，使我们对于国际会计职业发展有了更深的了解。经过四个月的勤奋学习，我们12名中国会计领军人才同学全部通过了澳洲注册会计师考试并取得澳洲注册会计师资格。

2012年6月，在中注协的协调下，全球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会计职业组织——英格兰及威尔士会计师协会（ICAEW）又提供了难得的去英国学习机会。经过选拔，我和其他5位中国注册会计师踏上了英伦求学之旅。在两个多月的紧张学习中，我们与6名其他国家的同学一起系统地学习了英国税法、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审计准则、公司战略与内部控制等课程并参加英国皇家特许会计师（ACA）资格考试。由于我已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和澳洲注册会计师资质，所以ICAEW为我豁免了ACA专业阶段的所有课程，直接进入高级阶段，参加了BUSINESS REPORT、BUSINESS CHANGE和CASE STUDY三门考试。考试结果公布后，12名中外同学中，仅有三名同学顺利通过，其中有包括我在内的两名中国同学。2013年5月ICAEW在北京为我们举办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并颁发了ACA证书。

通过这两次海外学习，我不仅取得两个国际知名的会计职业资质，而且系统学习了

会计领域的前沿学科，并结识了很多国外同行，为下一步跨国执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2008年在与IASB专家的交流中，了解了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修订的方向和主要内容等第一手资料，在以后的执业和培训工作中受益菲浅。

三、勤勉尽职，诚信执业，个人职业发展取得很大进步

从1998年进入注册会计师行业以来，我就深深地喜爱上了这个职业。特别是进入领军人才培训班之后，我更是感觉到无穷的动力鞭策自己不断地向前。同时，我也兼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事务所内部治理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奖惩委员会委员和评审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甘肃省财政厅财务顾问、专家委员会委员，兰州市城关区第七届政协委员、第八届政协常委。

我服务的客户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也都有较大的增长。目前我已累计为包括十几家上市公司在内的数十家大型企业提供审计或咨询服务，所服务的客户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近1500亿元。2011年开始，我为亚洲最大、世界第四大镍冶炼企业、有色行业巨头金川集团公司提供股改和上市审计服务，该公司资产规模1500多亿元，年销售收入1800亿元。股改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疑难问题，作为项目负责人，我积极与项目组成员协商，并向财政部会计司和相关部门咨询，解决了包括资产减值测试、设定受益计划DBP计量、套期业务和点价业务等复杂的困难问题。帮助企业顺利完成股改、引入战略投资者并一次募集资金100多亿元，得到了甘肃省人民政府、国资委和企业的高度评价。

另一方面，近年来不断地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我也接受企业和相关部门的邀请，为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和行业进行数十次培训，讲授包括会计准则、审计准则、企业内部控制、纳税筹划等课程。例如2011年，我受北京证监局委托，为北京地区100多家上市公司进行了企业内部控制培训，得到了证监局和企业的好评。新的《金融工具准则》和《收入准则》发布后，从2018年到2019年，我累计十多次为包括万达集团在内的上市公司和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培训，获得了一致好评。在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我也经常为各级员工

进行业务培训，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与大家进行分享，力求共同提高。

2018年我受财政部甘肃专员办委托，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法》修订提供专业意见，经过半年多的调研、讨论，结合执业过程中总结的经验和教训，针对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部分我提供了十几条修改意见，上报财政部后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多条意见得到了采纳，为行业规范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多年来，在勤勉执业的同时，我还兼任事务所技术委员会委员和内核委员。同时我还被华中科技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和兰州财经大学等高校聘请为研究生校外导师，指导研究生论文，为研究生做专题讲座。二十多年的职业发展之路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也带给我无穷的感受和快乐。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的飞速进步，行业也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作为行业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我将把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感悟毫无保留地用在支持和帮助行业更快更好地发展上，一方面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断地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为客户服务，以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为己任。另一方面，提携和指导行业新生力量，帮助他们规划职业发展方向，为了我们这个行业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贡献绵薄之力。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大有希望！

强化“五好”建设 引领全面发展

■ 石文先

中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委员会成立于2009年，下设6个支部，承担着全所160名党员员工教育管理和与事务所管理层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党委成立以来，在上级行业党委领导和事务所管理层大力支持下，党委以班子好、机制好、队伍好、业绩好、反映好“五好建设”为抓手，不断强化组织自身和党员员工规范化管理，从机制体制方面开展了系列探索和创新，获得了中组部“全国创新争先先进基层党组织”等30多项省部级以上荣誉，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行业变革进一步加快的背景下，引领事务所保持了每年20%以上的高增长，实现了全面发展。

一、开展“红色领英”工程，打造强战斗力领导班子

事务所党委以来，持续将“红色领英”工程，作为事务所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的重点和关键环节。通过规范选举程序和常态化学习培训，确保党委-支部-党小组三级领导班子思想红正、能力突出、结构合理，为党组织有效履职尽责提供了坚强的领导保障。

一是优选一名“红色头雁”。通过公开选举方式选出党委、支部书记和党小组长。确保将政治素养好、业务能力强、品德作风优的党员选出来。事务所党委和支部主要班子成员，全部为部门副主任以上人员，党小组长全部为高级项目经理以上人员。党员员工中担任外勤主管以上管理岗位的有68名，占党员员工总数的45.6%。

二是打造学习型领导班子。党委组建了学习中心组，开展常态化的党建知识学习和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建设。党委班子成员和各支部书记为中心组学员。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多场主题学习教育活动。同时规定在每月“主题党日”活动上，支部书记以上班子成员轮流讲党课，不断强化班子成员学习压力和动力。

三是强化班子示范引领。2019年省行业举办的“我爱党”学习竞赛中，我所由1名党委委员、两名支部书记组成参赛小组，在激烈竞赛中勇夺桂冠。新型冠状病毒暴发后，张秀峰等4名支部班子成员，主动报名下沉社区，参加疫情防控工作。武汉复工复产以来，郭幼英等支部书记，开展了4场大型线上免费公益讲座，10多万人次观看讲座；行业党委开展捐款号召后，所党委组织所内员工捐款捐物60多万元，为武汉疫后重振贡献了力量。

二、坚持向规范要战斗力，打造强管理体制机制

注册会计师行业工作分散，人员流动性强，如何规范党员员工管理，是行业存在的普遍难题。党委通过强化制度建设，将党员员工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实现了党员员工组织生活规范，富有生气活力，工作运转有序。

一是完善管理制度。结合党员管理要求，进一步完善了《中审众环党员员工“三会一课”制度》《中审众环党员与非党员员工结对帮扶制度》《中审众环党员民主测评制度》等规范。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进一步推动了事务所党员工作、学习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二是加强监督管理。在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的基础上，各支部每月召开一次支部会议，党委每季度召开一次党员大会。定期组织党员开展各类活动，同时检查督促党员制度的落实情况、党员员工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加强管理和监督工作，激励党员员工在日常工作、学习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三是建立通报机制。党委制订了详细的党员员工考核方案，把学习情况、执行党的路线、改进工作作风、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党性修养、组织观念、党的宗旨意识、缴纳党费、完成工作任务、发挥党员模范作用、结对帮扶、遵纪守法等内容纳入考核内容，并将考核结果通报给事务所管理层相关行政

职能部门。优秀党员建议管理层作为重点提拔考察对象，在合伙人晋升、工资晋级等方面予以加分。

三、坚持向活动要影响力，打造强党员员工队伍

提升党组织在事务所的地位和影响，必须以一支又红又专的党员员工队伍为支撑。党委通过在党员员工中开展常态化活动，不断增强党组织向心力和凝聚力，构建起了一支政治信念坚定、业务能力突出、作风优良过硬的优秀党员员工队伍。

一是大力开展品牌亮化活动。党委根据每年中央重大战略决策和行业重点安排部署，确立品牌年度主题亮化工程。党组织成立以来，先后开展了“素质发展年”“创新发展年”“质量提升年”“社会责任年”等主题年活动。在全行业创新性的开展了党员注册会计师技术援藏、系列教育扶贫捐赠，以及汶川地震救灾物资公益审计等活动。多年来累计捐款捐物300多万元，得到行业内外一致高度好评。

二是大力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充分发挥党员“红色细胞”作用，积极开展帮扶活动。通过先进支部帮落后支部、党员技术骨干帮普通员工等形式，在业务技术、项目承做和职场心理等方面开展专项帮扶，明确帮扶计划和目标，强化帮扶情况考核。帮扶活动开展以来，3个部门由业务落后部门跃升为先进部门，12名非党员员工发展为党员员工，40多名非党员员工成为入党积极分子。

三是大力开展亮牌服务活动。每年年初，党员员工就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作出承诺，党委定期对党员承诺事项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党员员工每年承诺事项100多件，涉及员工业务能力提升、个人学习生活等多方面，95%以上得到有效落实。在党员员工较多的项目组，还推行了“党员先锋岗”，通过党员之间的比学赶超，营造良好的拼搏赶超的氛围，进一步提升了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

四、聚焦“三大”发展主题，打造强能力优业绩

党委在坚持引领事务所正确政治发展方向的同时，聚焦事务所“三大”经营管理中心工作。组织全体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服务事务所做强做大，实现党建工作对业务经营工作的强力驱动。

一是全力服务重大经营管理决策。建立党委班子成员列席管理层重要会议制度、党委班子与事务所管理层重大事项沟通协商机制，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推动事务所发展中的作用。在事务所合伙制改制，国际、国内联合发展等关键问题上，党组织“参谋助手”的功能充分显现，为事务所各项重大经营管理事项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效保障。

二是全力服务高端人才建设。党委坚持助力事务所人才发展建设，在党员员工中开展常态化的“人才大比武”活动。积极营造学习技术、钻研技术的良好氛围，大力提升了员工整体专业水平。截至目前，党委共组织开展各类员工技能比武活动30余次，60多名技术能手脱颖而出。

三是全力服务重大业务项目。在体量大、要求高、时间紧的重大项目中激发党员“红色细胞”能量，引导、鼓励党员员工冲锋在前。在2016年湖北省涉农财政资金大检查中，全省20多个偏远山区和贫困县市的现场审计工作全部由党员突击队担纲完成，查处违法违规涉农财政资金数亿元，200多人受到党纪政纪惩处，有效维护了国家资金安全，受到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晓东的高度肯定和赞扬。新冠病毒疫情最严重期间，安徽宁安铁路等多个审计项目小组，全部由党员员工担纲完成。党员员工不畏艰险，为党和国家事业恪忠尽责的表现得到当地党委和政府一直高度好评。

从管理学视角看会计监督职能

■ 余剑梅

一、会计学科的管理监督自我设计

(一) 西方会计本质管理监督说溯源

1987年，英国学者拉曼与海拉第在《会计信息系统：原则、应用与未来展望》一书中提出：“会计信息的支持确定了企业中会计监督所能达到的范围，当企业需要监督系统，并明确所进行的监督要达到的目标后，他们便要在会计信息系统上投资。”由此，国内学者杨时展在《会计信息系统三评——决策和受托责任论的争议》中强调：“现代会计是一个以认定受托责任为目的，以决策为手段对一个实体的经济事项按货币计量及公认原则与标准，进行分类、记录、汇总、传达的监督系统。”

很明显，从拉曼与海拉第书名及其原始描述来看，首先，就会计信息这一复合名词而言，会计并非主语，而是信息这一主语的会计名词做状语，用来形容信息主语。由是观之，会计的本质是用以生成专门信息，即会计信息的技术，或曰工具。其次，会计信息与监督职能履行密不可分。有效的企业监督职能发挥离不开会计信息的支持，或者说，会计信息是企业监督系统的基础。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打仗如此，企业管理亦然。不了解监督对象的实际情况，监督目标不明确，所谓监督便无处着手，且不说监督程度的强弱，监督手段性质，作为监督基本手段的约束（否定错误行为）与激励（鼓励正确行为）该用哪个都只能听凭管理者跟着感觉走，既无法服人，遑论效果。

在西方学者看来，会计本质是信息，且该信息是企业管理监督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助于企业实现监督目标。正如经典的企业内部控制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五大要素，会计监督固然需要与内部控制进行相对区别后的分工，体系化却是当下归属财务学科的内部控制当仁不让的、对于会计监督顶层设计原理原则的重要启示。就此而言，曾经的信息系统观、管理活动说与管理控制论本质上都是体系化会计监督的某一个具体侧面。

美国审计程序委员会于1958年更是在《审计程序说明第19号》文件中，明确将内部监督按其特点划分为内部会计监督和内部管理

监督。前者涉及与财产安全和财务记录可靠性有直接联系的各种方法和程序，而后者主要是与贯彻管理方针和提高经营效率有关的方法和程序。应该讲，如果说单纯的内部会计监督只是对财务会计所需记录和反映的交易或事项的事后监督的话，管理监督更强调对交易或事项发生过程的监督，尤其是产品生产过程。更确切地说，会计监督与管理监督属于各司其职的平行关系，会计监督是财务会计对自身账务处理，进而对财务会计信息质量和资产安全的监督；而管理监督就是管理会计意义上的基于提高经营效率目标的会计监督，如基于目标或标准的生产成本监督、基于订货成本和储存成本总和和最小的经济订货量，甚至是基于产成品库存成本最小化的本量利分析。

很明显，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均各有其在企业监督活动中的一席之地，只是，两者监督的对象、手段和目标各有所长。

就财务会计方面而言，众所周知，基于复式记账原理的现代财务会计自诞生之日起便重视基于定期结账要求的账证（账簿和凭证）、账账（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账表（账簿与报表）一致性自查，以及账面永续盘存的结存类账户基于实地抽盘、结算类账户基于函证的账实一致性检查，其目的不外保证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靠性。平心而论，财务会计的这些规定动作既非外在要求，更无演变轨迹，本属复式记账原理内涵本质，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记账原则的体现，是合格财务账套的最低标准。应该说，正是复式记账对于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内在保证作用，成就了财务会计资本盈利能力权威计算工具地位，卢卡·帕乔利本人也因此被载入了现代会计史册。需要指出的是，从根本上来讲，会计监督纯属财务会计基于自身工作质量要求，确保会计信息准确性而开展的自我监督。所谓资产安全，只是保证财务会计信息质量后的附带结果而已，根本无需刻意为之。

相应地，在管理会计方面，实现降本增效目标必须未雨绸缪，不仅要求做好制度化安排，更离不开财务会计的密切配合。就此而言，正如涂必玉（2016）在《会计视角的管

理会计学管理属性探析》一文中指出的：“管理会计责任会计制度的管理有效性离不开财务会计车间核算，甚至是班组核算，财务管理内部银行制度架构的支撑。”管理会计学者欧阳清毕生专注于在各大厂矿企业推广车间核算与班组核算、目标成本法和标准成本法事业，其背后的利用企业既有财务会计资源进行管理会计技术实用化实践化初心，管理会计财务会计会计监督职能一体两面事实，也才不至于继续蒙尘。

（二）财务会计监督观的本土渊藪

我国建国伊始便采用了与前苏联一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鉴于二十世纪初西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出于计划经济缺乏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经济价格这一被俗称为“看不见的手”的货币指标与社会主义者兰格间进行的、持续近三十年的有关社会主义单靠数量指标能否有效配置资源的论战，我国高度重视专事以货币计量手段进行企业发生交易与事项进行记录与反映的财务会计信息质量建设。为加强部门间的会计信息可比性，财政部于1952年将原条条分割的分部门统一会计制度进行了全国性统一。为编制计划和检查计划执行情况服务，成为当时财务会计的首要任务，会计学界也因此将从“记账算账”到“计划监督”视为财务会计质性的华丽转身。

1986年，财政部颁布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提出了会计监督要求，并将之定义为：“单位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等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监督方法、措施和程序。”很明显，财政部的会计监督就是1958年版美国审计程序委员会内部监督中的会计监督。

2001年6月财政部颁布了《内部会计监督规范——基本规范（试行）》，第一章总则第二条对会计监督的定义维持上述1986年《会计基础工业工作规范》描述。而且与第三章内部会计监督的内容第八条会计监督的内容“货币资金、实物资产、对外投资、工程项目、采购与付款、筹资、销售与收款、成本费用、担保等经济业务”的会计监督规定相呼应，除实物资产和筹资两项外，财政部陆续发布了有关七项经济业务的具体的内部会计监督规范文件。综观该七项内部会计监督规范文件，无非基于授权、审批、执行、记录和监督不相容职务分离的内部控制原则，以资金收付为抓手，以授权衡量行为正当性、以预算测度水平合理性。不难看出，

除了以预算标准测试实际成本合理性项属于管理会计监督范畴事项外，会计监督的目标基本只是停留在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财务会计监督层面。

综上所述，无论先天后天，不管中土西方，会计学科的监督性质定位历史悠久、影响广泛且深入人心。只是由于具体实践进程安排一开始就过度偏重与强调了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异”的那一面，对两者具体的监督功能进行了严格区分，甚至割裂。工具的碎片化，直接导致了能效分散化后的会计监督效果不彰效益不高。

二、管理学的管理监督机制理论框架

如果说管理的具体职能从早期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监督五大要素浓缩到如今的计划、组织、领导和监督四大金刚的话，监督从来都是公认的管理职能之一。管理监督在理论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从概念到类型、从目标到内容、从程序到手段都相当成熟的、公认的管理学理论和实践分析框架。

（一）监督的概念

自1948年罗伯特·维纳首次提出控制论以来，控制论的思想和方法渗透到了几乎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管理学领域得到日益广泛而深入的运用。

斯蒂芬·罗宾斯认为，监督是对各项活动的监视，从而保证它们按计划进行，并纠正偏差的过程。托马斯·贝特曼认为，监督就是采用正确的标准衡量计划的执行过程，目的是引导人的行为，以达到组织目标。要全面理解监督的含义，需要把计划与监督联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计划与监督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首先，计划为监督提供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如果只有监督而没有计划，人们将不知道需要监督什么，更无从知晓怎么监督。其次，监督是计划的保证。如果有目标和计划，而没有监督，人们可能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但无法知道干得怎么样、存在什么问题和需要做哪些改进。再次，很多有效的监督方法本身就是计划方法，如预算管理、目标（标杆）管理等。最后，计划工作本身也需要监督，才能保证计划的科学性。总之，计划与监督密不可分，计划越明确、全面和具体，监督的效果越好；监督工作越科学、有效，计划越容易实现。

在监督中采用的措施，则要通过组织结构中每个层次贯彻下去，而组织结构的高效运作，为监督措施顺利执行提供了组织保障。组织结构的设计也要考虑监督职能的需

要，明确命令执行的路径和各级管理者的职责。监督措施的贯彻与执行，也离不开各级管理者的领导作用，尤其是对下级工作绩效的监督，更离不开管理者的指挥与激励。所以，管理工作本质就是一个计划、组织、领导和监督诸职能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过程。

（二）监督的类型

按发生的时间分类，监督可以分为前馈监督、实时监督和反馈监督；按所采取的手段划分，可以分为直接监督与间接监督。

1. 前馈监督。在工作开始之前就进行监督，被称为前馈监督。它是导向未来的，也是管理者最渴望的监督类型，是期望用来防止问题的发生而不是在出现问题时补救。这种监督需要及时准确的信息，因而常常很难办到。

2. 实时监督。实时监督，又称同步监督、现场监督，是发生在活动进行之中的监督。在活动进行之中予以监督，管理者可以在发生重大损失之前及时纠正问题。它的核心是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或者避免已经产生的问题对企业不利扩散。最常见的实时监督方式是直接视察，因而实时监督的应用范围较窄，对生产工作容易进行实时监督，如资本主义大生产前期广泛采用的“工头”制度，如作为管理会计学学科萌芽的泰勒式管理科学，就是实时监督的典型体现。但对那些问题难以辨别、成果难以衡量的工作（如科研、管理）就很难进行实时监督。

3. 反馈监督。最常用的监督类型就是反馈监督，监督作用发生在行动之后。管理者获得信息时浪费或损失已经造成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反馈监督是可用的监督手段，比方说，财务报表就是反馈监督的经典例子。

4. 直接监督。计划的结果往往受到计划执行者的影响，要消除可能出现的偏差，必须通过各种方法改善计划执行者的行为。直接监督就是用来改善员工行为的一种监督方法，需要培养更好的管理人员，使他们熟练应用管理概念、技能、原理和方法，能以系统的观点来改进和完善他们的管理工作，从而防止因管理不善造成不良后果的出现。监督的主体就是直接责任者。从根本上看，直接监督就是一种“人盯人”的监督方法。也只能用在实时监督当中。

5. 间接监督。间接监督通过建立监督系统对被监督对象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方法往往是预先制订计划或标准，通过对比和考核实际结果，追查造成偏差的原因和责任，并

进行纠正。此时监督的主体是直接责任者的监督人。

不难看出，尽管马克思将会计定性为“过程的监督”，从管理学角度看，财务会计在资金收付方面或许勉强可算是直接监督与实时监督的话，财务会计的信息监督与管理会计基于预算的管理监督，以及基于责任会计和分部评价的财务监督却是反馈监督和间接监督。就此而言，当下会计学科自我设计的，脱离了管理学既定的监督原理原则，在实践上又无法自成一体会计监督，被企业拒之门外，责任也不全在企业。会计学科过于强调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工，对两者必要的融合视而不见了。

（三）监督的方法

管理者需要合适的工具来监控和衡量组织绩效，根据监控和衡量组织绩效的工具不同，监督方法一般有信息监督、财务监督和预算监督三大类型。

1. 信息监督。信息对于组织绩效监控和衡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管理者需要正确时间、正确数目的正确信息来监控组织绩效和监督组织活动，不精确、不完全、过度或者过期的信息会严重阻碍监督活动的有效开展。管理者们需要有关实际是什么和标准咋样的信息来帮助他们决定在两者比较中的可接受偏差范围。如果实际绩效和标准之间存在重要的偏差，他们还得依赖信息来寻求需要采取的合适的行动。由是观之，前述英国学者将会计信息投资视为监督前置条件的管理学科渊源，自不待言。

2. 财务监督。财务监督主要通过对财务报表的分析，用相关财务指标来进行管理监督。财务报表分析，又称经营分析，就是以财务报表为依据来判断企业经营好坏，并分析企业经营的长处和短处。财务报表分析方法主要有实际数字法和比率法两种，前者用财务报表中的实际数字进行分析，后者是求出实际数字的各种比率后再进行分析。由于后者相对更加客观，所以较常被采用。财务比率及其分析可以帮助了解企业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除了传统的财务比率，管理者还同时使用经济增加值和市场增加值工具。就此而言，杜邦分析方法每股收益领衔的二进制演化模式背后是将诸核心财务比率指标体系化后的、基于财务会计信息综合化事实，与因素分析方法一道，是用于生产、经营诸企业管理环节对最终经营结果影响方向及其程度测度，发见关键问题进而提出对策的财务监督分析工具。

3. 预算监督。预算监督是在管理监督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类方法。预算的编制是计划工作的一部分，作为一种计划技术，预算是未来某一时期具体的、数字化的计划。它把计划分解成以货币或其他数量单位的预算指标，要求各个部门的运作和开支在预算范围内。预算也是一种监督技术，它把预算指标作为监督标准，用来衡量计划的执行情况，是保证计划完成的有力措施。管理学上常用的预算有投资预算、经营预算和财务预算，乍看貌似与管理会计的经营预算和财务预算理论内容差不多，但是，作为企业日常发生的、包括采购预算、生产预算、销售预算、人工预算、单位成本预算、管理费用预算的经营预算尽管一般用货币来表示，管理学认为，在一部分情况下用物理单位来表示更便于监督，如产品产量、产品的工时和台时消耗等。

很明显，信息监督是管理监督活动，尤其是财务监督和预算监督有效开展的必备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充分发挥会计监督职能，离不开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有效配合，必须遵循管理学揭示的监督原理原则，进行有效的系统性设计，会计监督事半功倍方为可期。

（四）监督的程序

监督是根据计划的要求，设立衡量绩效的标准，然后把实际工作结果与预定标准相比较，以确定组织活动中出现的偏差及其严重程度。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以确保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组织目标的实现。监督的过程一般包括四个基本环节：确立标准、衡量实际行为、实际行为与标准进行对比发现偏差和采取管理行动纠正偏差。

第四步采取管理行动纠正偏差需要决策者掌握相当的生产与营销专门知识，第三步将实际行为与标准行为对比发现偏差，简单的绝对数相对数数字比较与会计学科貌似无关，分部评价却是管理会计专门。更进一步，深入原因分析的以差额分析法和连环替代法为代表的因素分析方法尽管原初的应用领域在财务管理，正如已有学者指出的管理会计存在引进该分析方法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涂必玉2014），管理会计欲提升自身在会计监督框架中的含金量，非以此为分部评价深化方向不可。

与此对照，第一步确立标准就是管理会计的用武之地，除了早期的目标成本、标准成本设计，预算当属放之四海皆准的监督标

准设计工具，尤其是经营预算。至于第二步衡量实际行为，则是显而易见的财务会计基本功能所在。总之，在管理会计责任会计组织制度安排前提下，财务会计车间核算、班组核算到位，乃至精细到人，配合管理会计预算与分部绩效评价工具，企业就能将生产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置于有效监督之下，从而保证计划的完成效率与效果。

三、对标管理学监督理论框架的会计管理监督能效进路

通过对标管理学监督理论框架下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述评，笔者认为，会计监督管理功效切实有效发挥的路径有五：一要转变观念。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虽均属会计学科大类，在总体上，必须在清晰把握其各自功能的前提下进行有机的监督体系性工具整合会通，达成管理学发现的间接监督体系化原理要求，即：以责任会计为本、以财务会计为基、以预算和分部评价工具为用。二要重新认识本量利分析方法的预算编制起点、非经营决策支持的弹性预算工具前置方法定位定性。三要经营预算的数量化原初回归。四要分部评价工具在财务指标杜邦化基础上依托因素分析方法的偏差原因分析深化。五要追踪并结合适应现代服务业项目制经营模式的财务项目会计发展，探索预算与责任会计的项目化转型与创新。

作者单位：福建工程学院

新时代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新路径探讨

■ 陆俊刚

辉煌的“十三五”收官在即，壮阔的“十四五”又将启航。“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作为高端服务业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应深刻认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注重把握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的复杂变化，聚焦面临的老难题和新挑战，深入研判缜密论证，厘清行业的发展路径，谋划“十四五”时期的发展蓝图，夯实行业中长期发展的顶层设计，抢抓全行业科学发展之机遇，把握历史性窗口期，实现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本文以天津市注册会计师行业为例，浅述如下。

一、精准探究行业共性短板，精深对焦机构个性问题

近年来，天津市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各项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无论是在行业党建、业务监管、领军人才、综合评价、专业发展以及协会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天津市资本市场建设、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购买服务、规范企业财务行为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应清醒地看到，行业总体规模与全市的经济发展态势不相衬托，全行业总体实力与发达省市的发展规模存在差距。

1. 行业规模偏弱，机构实力不强，与京津冀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定位及服务属性不相匹配。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全市共有会计师事务所121家，注册会计师2058人，而注册会计师人数在100名以上的仅1家事务所，50—100名的有8家事务所，其余在50名以下；2019年度行业业务收入14.62亿，而业务收入在1亿元以上的有1家事务所，5000万—1亿元的有4家事务所，其余的在5000万以下。由此可见，注册会计师人数较少，业务收入偏低，发展规模不大。尽管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经济指标增速趋缓等因素影

响下，行业的业务收入相比以前年度虽有提高，但是由于自身的规模和实力所限，造成部分中小机构在业务承接和服务市场等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服务品种单一，服务领域受限，创新动能不足，市场竞争下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层面处于被动局面，难以承担高端和复杂的综合业务需求，在市场驱动下主动求变的能力不够，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

2. 内部治理欠完善，创新动能显不足，与今后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相匹配。部分事务所在内部治理方面仍然存在合伙人和股东团队总体结构不合理，风险防控机制缺失、企业文化匮乏和薪酬分配不尽合理等问题，与实现治理机制规范化、常态化相差甚远，差距较大。近年来天津市注协在内部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通过行业奖励、先进经验交流会等形式，形成可推广可借鉴的典型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从协会和机构两个层面，都要认真总结经验，担负起各自的主体责任，注重推介普及，鼓励先进，推动后进，共同把全市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治理工作做好。

3. 复合型专业人才匮乏，综合服务能力欠缺，与服务市场全要素全方位全链条的业务需求不相匹配。人才规模增速较慢，后续储备力量不足。天津市注协自2012年陆续开展了5批行业领军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工作，但目前全行业仍仅有市级领军人才70名，占注册会计师总数的3%。人才匮乏成为行业整体突破和提升的瓶颈之一。加之从业人员薪酬较低、工作强度较大、政府监管趋严、考试难度较高等原因，行业吸引力呈降低之势，相对于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类市场主体形成的巨大需求效应，全行业面临着自身服务能力难以匹配的尴尬落差，面临着人才供给与行业发展缺口较大的严峻挑战。

4. 重业务轻管理，重当前轻长远，与机构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基本规律不相匹配。相当一部分会计师事务所的经营者沉浸于日常业务，满足于当前经营，看重业务收

入，忽略企业管理；看重眼前利益，忽略长远规划。对关乎机构自身建设和持续经营的管理机制缺乏认知和反思，对牵涉本机构市场服务和长远发展的核心价值缺乏构建和培养。长此以往，这些事务所将不得不成为市场需求的看客，成为市场竞争的陪衬，其发展前景难以乐观。

二、把握宏观经济形势，把脉行业发展机遇

1. 我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在服务市场供给和自身业务拓展上，为行业发展带来驱动效应和增长性机遇。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99万亿人民币，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1%，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53.4万亿元，增长6.9%。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持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面对这样宏观大势和有利局面，注册会计师行业要关注和把握这些宏观背景下蕴含和催生的市场机遇，站稳立足点，把脉切入点，找准突破点，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伴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而增长自身实力，在助推经济发展，服务市场需求等方面肩负起新的使命。

2. 国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在服务方式和服务方向上为行业发展带来政策性机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个领域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发了经济发展方式随之发生改变。注册会计师行业不能缺位，要靠前站位，提高市场洞察力，增强商机敏感度，从中挖掘可发挥的维度，寻找可提供的服务空间，要利用这些由改革调整所孵化出的巨大市场空间，发挥智库作用，体现自身价值，以高质量的服务和全方位的融合，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进而带动行业的自身发展。

3.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在服务理念转变和服务模式升级为行业发展带来突破性机遇。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将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一项重要措施，此举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引领。我们要把握正在崛起的新经济时代赋予行业的重大机遇，适应新常态下的市场需求。由服务传统企业转向围绕新型业态和新型实体服务。事务所要

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探索“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集团+”相关内涵的综合服务和专业服务，成为政府决策和企业发进程中解决方案的策划者和提供者，以多方位、多层次、多品种的服务方式赢得市场，递延发展，适应新常态下的市场需求。

4. 大力加强自身诚信建设和提升执业质量，为行业发展带来市场化口碑和品牌性机遇。诚信为本，质量至上，始终是行业安身立命之本。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质量是行业发展的大前提。在新的经济形势和政策环境下，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正在着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其原来自行承担的相关工作，势必将转移到由第三方的专业机构，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来实现。因此要进一步强化诚信意识，服务好各级政府与市场主体的不同需求，借船出海，实现双赢。

5. 互联网思维和信息化手段的日益普及，在运营管理与经营理念上为行业发展带来跨越性机遇。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包括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超前谋划，顶层设计，改变传统审计的作业方式，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执业质量，是必然趋势。近年来天津市注协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例如通过业务报备来提高行业监管水平；通过行业奖励、综合评价等方式对于取得显著成绩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推广和表彰等，收到较好成效。但是在主动适应信息化方面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自身的信息化理念相对滞后，全行业要有危机意识，要未雨绸缪，主动求变，创新业务方式，适应形势发展。

三、统筹谋划绘发展愿景，统领思想抓责任落实

1.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行业发展的制高点，提升站位，不辱使命，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全行业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册会计师行业要“紧紧抓住服务国家建设这个主题和诚信建设这条主线”的重要批示精神，站在党和国家深化改革、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正确处理好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辩证关系，找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融合点和共振点，充分发挥事务所党组织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战斗堡垒作用。要集

中行业智慧，凝聚发展共识，制定好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分阶段、分重点、分领域抓好规划的落地与落实，抓好目标的实操与实现。着力解决行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行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2. 以服务转变增长方式为立足点，把握机遇，迎头赶上，全面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胜任能力。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变增长方式为契机，紧紧围绕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购买服务、金融创新、证券业注册制改革等重大改革主题，深耕细作，延伸服务。与此同时全行业要充分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自贸试验区建设等叠加机遇，把握这些大环境，大机遇，大优势，把握天津发展的历史性窗口期，不断丰富事务所发展内涵，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意识，不断提高执业质量和执业能力。

3. 以进一步加强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为基准点，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大力加强行业诚信建设和社会公信力。行业各级党组织要发挥头雁作用，找准行业通病和质量短板，带头研究解决问题办法，带头推动工作落实；会计师事务所要自觉担负起自身的主体责任，以执业质量为生命线，加强内部治理，提升合伙人和股东队伍的综合素质，努力打造有担当、高素质、精专业的核心团队，以上率下，合力推进，强化质量控制和风险防范；市注协要发挥职能作用，在着力加强培训和督导的同时，加强业务监管和行业惩戒，不断促进行业稳定持续发展。

4. 以着力构建行业人才队伍建设为突破点，典型引领，齐抓共管，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核心竞争力。从行业发展的需求趋势来看，人才队伍的建设任务永远在路上，因为人才培养是行业发展的根本要务，人才不足目前也是制约行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拓展新业务，离不开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实现新跨越，离不开全方位的智力支撑。事务所要加强培养人才，注重涵养人才，在晋升空间、薪酬分配、专业深造、职业发展等方面，对他们予以倾斜和关照，构建育人、留人、用人的良好机制，营造求贤若渴、拴心留人、健康和谐的企业文化，使人才有心灵归属，使人才有用武之地，使人才有发展空间，真正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核心竞争力。

5. 以提高全行业信息化水平为提升点，

转变理念，创新抓手，丰富和拓宽审计执业方式。传统审计工作正遇到互联网技术的严峻挑战，信息化技术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信息化风暴必将促进审计业务模式的转型升级。全行业要积极探索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在服务领域的实施，探索运用“互联网+审计”的服务手段，打造智能化、移动化、互联化的注册会计师行业信息化体系，引导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建设智能审计作业云平台，提升数据处理能力，切实提升全行业的执业质量和工作效率。

6. 以加强和完善协会自身建设为新起点，强化素质，担当作为，自觉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市注协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行业党建工作的最高原则，坚持问题导向，强化使命担当。持续加强队伍建设和能力建设，提高政策执行力，切实提高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综合素质，紧紧围绕国家建设的大局，围绕服务会员，服务公众的根本宗旨，加强对社会需求的、会员关心的、行业发展的重大问题的研究与落实。担当作为，完成好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努力在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合力在新画卷续写新篇章，为推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天津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中注协工作 CICPA NEWS

行业培训

9月15日至17日，委托厦门会院举办第四期远程培训：“国家和注会行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升”，中注协、厦门会院、会计师事务所等相关专家授课。

9月18日，委托北京会院举办直播课堂第五期：“远程审计工作指引”，会计师事务所、全国高端会计人才等相关专家授课，2357名注册会计师参加培训。

9月21日至25日，委托北京会院举办“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与文化建设研修”（面授）培训班，中注协、北京会院、高等院校、会计师事务所等相关专家授课，会计师事务所分管内部治理与文化建设合伙人级别人员50余人参加培训。

9月25日，委托北京会院举办直播课堂第六期：“注册会计师行业改革发展40周年回顾与展望”，中注协、北京会院、江苏省注协、会计师事务所等相关专家授课，1913名注册会计师参加培训。

9月26日至30日，委托厦门会院举办“注册会计师职业技能研讨”直播（培训）班，会计师事务所、高等院校、厦门国家会计学院等相关专家授课，中小事务所合伙人级别人员270余人参加培训。

9月下旬，组织全国高端会计人才注册会计师类（金融审计方向四期）毕业考核，经考核并报财政部领导审定，29人予以毕业。

10月12日至16日，委托北京会院举办“信息化审计与行业发展研修”（面授）培训班，软件公司、高等院校、会计师事务所等相关专家授课，事务所信息化审计业务经理级别以上人员50余人参加培训。

行业标准

9月17日，召开职业道德准则委员会会议，来自财政部、证监会、银保监会、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高等院校的23名委员参加，审议通过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审议稿）》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职业道德守则（审议稿）》。

9月24日，召开审计准则委员会会议，来自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银保监会、会计师事务所、高等院校的22名委员参加，审议通过了《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第5101号——业务质量管理（审议稿）》《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第5102号——项目质量复核（审议稿）》《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21号——对财务报表审计实施的质量管理（审议稿）》等。

行业监管

9月14日，与财政部会计司联合召开提升审计质量座谈会。

9月21日，召开会计师事务所民事责任专家论证会。

9月24日，印发《关于加强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自律监管的意见》，就加强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自律监管的全流程、全链条提出明确要求。

行业研究

10月10日，发布《关于完善企业破产配套制度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函。

国际及港澳台交流

9月24日，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国际会计教育专家组（IPAE）召开线上会议，中注协代表参会。

10月8日，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IESBA）工作组召开线上会议，中注协代表参会。

中注协工作 CICPA NEWS

中注协专业标准与技术指导部主任吴耀姝当选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IESBA）理事，任期从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中注协国际及港澳台事务部副主任宋祉健连任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国际会计教育专家组（IPAE）成员，任期从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地方注协工作 UPDATES OF LOCAL CPA INSTITUTES

北京

9月22日,北京注协与河北省注协联合举办针对张家口贫困区县财务人员的扶贫送教活动,来自张家口市直单位、区县、乡镇及农村的1300余名财务人员参加培训。

9月22日,北京注协召开执业质量集中检查现场座谈会,会计师事务所检查组组长及监管部工作人员参加。

天津

9月10日,天津广信会计师事务所党支部向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兰采乡兰采村无偿捐赠30万元,为该村200户贫困户、贫困边缘户铺装电热炕。

9月17日,天津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邀请专家举办“四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行业基层党支部书记、党员代表、发展对象、预备党员、综合事务中心党员干部共计110余人聆听授课。

山西

9月27日,山西省2020年注册会计师考试组织管理工作及巡考人员培训会议在太原召开,各市考办负责人、全体巡考人员和机考公司代表等100余人参加。

江苏

9月26日,江苏省注册会计师行业高端人才一期班部分学员代表走进高淳社会福利院,为院里重度智残、体残和多重残疾的收养人员送上温暖。

浙江

9月25日至29日,浙江省注册会计师行业第一批后备管理人才培养首期集训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办,省注协副会长兼秘书长韩江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公共管理培训部主任张各兴在开班仪式上发表讲话。

安徽

9月24日,安徽省注协召开全省2020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组织管理视频工作会议,就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做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组织管理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福建

经福建省注协秘书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2020年省注协继续为通过年检的执业注册会计师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帮助广大注册会计师应对意外风险,完善福建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帮扶机制。

河南

9月22日,河南省注协召开第四届常务理事会第18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函证服务中心,推动全省注册会计师行业规范化、专业化、信息化建设。

9月22日,河南省注协召开注册会计师数据应用服务机构建设项目推进会。省注协副会长邵新军、秘书长徐东升,精诚、希格玛河南、赫朗等会计师事务所及网络技术机构代表等参加会议。

近日,河南省注协发布《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加快行业信息化建设指导意见》,从信息化建

地方注协工作 UPDATES OF LOCAL CPA INSTITUTES

设的重大意义、加强领导、标准规范、流程再造等方面提出指导性意见。

湖南

9月23日，湖南省注协举办全省2020年首批注册会计师培训班，来自省内会计师事务所的120名学员参加培训。

9月25日，湖南省注协就相关部门反映的审计报告未粘贴防伪标识的情况，集中约谈7家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广东

9月19日，广东省注协召开六届十八次常务理事会议，省注协会长欧斌主持会议，19名常务理事出席会议，监事长陈锦棋等3名监事列席会议。

近日，广东省注协联合广州、深圳等12个地级以上市注协，举办“E路CPA 勇往直前”会计师事务所专场(网络)招聘会,对接34所高校、130家会计师事务所,为高校毕业生提供超过2600个工作岗位。

近日，广东省注协出台《关于加强广东省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的若干措施》，坚持全省行业“一盘棋”工作格局，坚持问题和目标导向，提出15条加强行业诚信建设措施。

广西

9月15日，广西省财政厅副厅长罗海山主持召开中共广西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疫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总结行业党委第三季度党建工作完成情况，对下一季度的工作做了布置，审定共青团广西注册会计师行业委员会组建及委员选举工作方案和行业警示防控党建座谈会方案。

海南

近日，海南省注协举办“2020年度行业风险警示教育及新业务拓展”继续教育培训班。来自全省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合伙人及注册会计师共120余人参加培训。

四川

9月24日，四川省注协召开2020年度行业科研课题立项评审会，邀请来自省内高校、会计师事务所的7位专家学者担任评委，对17家会计师事务所和5所高校提交的44个课题进行立项评审。

宁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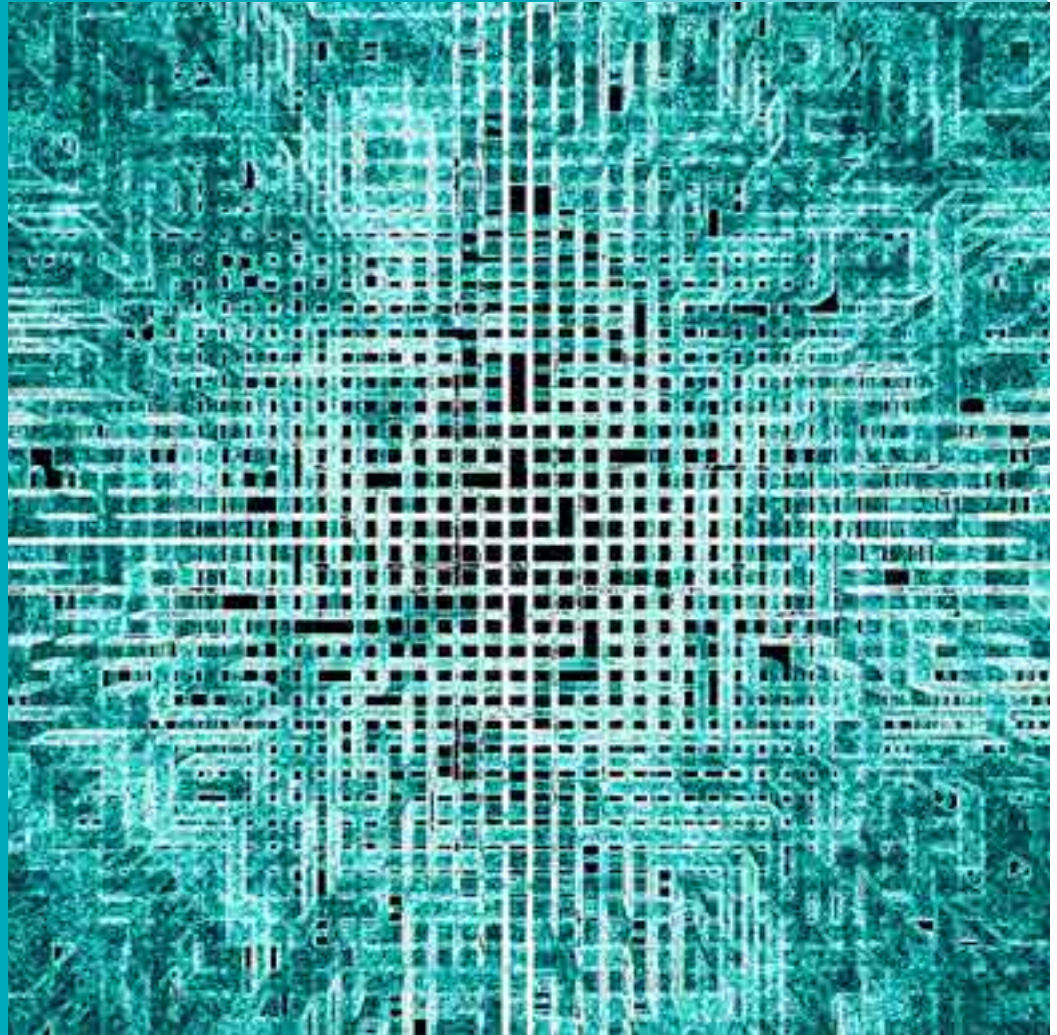
9月22日至29日，宁夏注协举办第五期会计师事务所助理人员培训班，来自全区各会计师事务所的45名审计助理人员参加培训。

青海

近日，青海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组织全省170余名党团员，在湟源县小高陵党性教育培训基地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03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分析师实地调研影响审计收费的机理分析：信息有用观还是乐观引导观？

■ 许汝俊 黄维娜

摘要 本文以分析师预测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分析师实地调研行为影响审计收费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分析师实地调研会降低其预测偏差，支持了调研信息有用性假说，否定了管理层乐观引导假说，一定程度上表明分析师调研信息能够作为其盈余预测重要且有效的信息来源；分析师预测偏差提高了审计收费，表明了预测偏差带来了更多公司战略风险及经营风险分歧，因此，事务所更倾向于通过提高审计收费予以应对，而分析师调研行为会通过降低预测偏差进而降低审计收费；明星分析师、高经验分析师实地调研行为会强化实地调研通过预测偏差影响审计收费的中介效应，说明从调研信息利用效率来看，明星分析师和高经验分析师充分辨别及利用了相关调研信息，降低了预测偏差，减小了相关审计风险，进一步降低了事务所审计收费水平。

关键词 新兴资本市场 分析师预测偏差 审计收费 实地调研行为 中介效应

分析师通过对盈余公告及不易被一般投资者察觉的信息解读为投资者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决策参考，其信息获取和传播是发布盈余预测报告或评级的重要依据。国外分析师信息获取行为的相关披露及投资者关系信息披露的限制导致国外有关调研活动的研究较少，即使存在也只对个别公司予以分析。但在国内，由于相关法规的不断完善，分析师调研行为实践得到支持，不断促进上市公司及外部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2015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规定中明确了在互动易上披露投资者关系调研问题的相关规范，使得不少上市公司被要求提供投资者关系信息，该指引规定上市公司在业绩说明会、分析师会议、路演等投资者关系活动结束后二个交易日内，应当编制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并将该表及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演示文稿、提供的文档等附件（如有）及时在深交所互动易刊载，同时在公司网站（如有）刊载。广义上来看，与上市公司直接交流的调研者包含了投资者、证券分析师等对公司信息具有明显需求的几类群体，调研人员性质差异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其挖掘信息的能力，而鉴于公司信息披露要求及未来发展需要，作为公司内部的相关管理者等群体

理论上会对不同调研者产生不同的关注及态度，与此同时，各外部利益相关者也会因调研活动而互相关联，基于公司及自身职业生涯发展做出更为理性的行为。目前有关分析师预测偏差与审计费用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结合分析师预测过程之一的调研行为的分析尚为鲜见。作为分析师预测过程之一的调研行为是否对分析师预测及其与外部审计工作之间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尚未有所涉及。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师相关调研数据探索预测偏差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分析师预测行为过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分析师与审计师互动研究及新兴资本市场主体行为特点的探索提供更多信息。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在资本市场中，分析师既是上市公司公开信息的解读者，又是外部监管者，他们通过对上市公司信息的搜集及分析，进而对投资者提供投资决策参考，并对上市公司形成一定的外部监督压力。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作为上市公司外部监督形式之一，有关其研究也层出不穷，审计工作量和审计风险作为影响审计费用最直接的因素，通常与企业会计信息、财务信息质量密切相关。诸多学者认为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和会计信息质

表1 变量释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符号	变量释义及计算
被解释变量	审计收费	Auditfee	表示审计收费,用审计费用对数衡量
解释变量	分析师预测偏差	EPSDev	分析师对i公司的盈余预测偏离度
	分析师独立或参与调研	Survey	存在独立或参与调研i公司的分析师取1,以调研报告记录为准
	高特定经验分析师	Anaexp	表示分析师特定经验,用分析师对特定i公司跟踪的次数作为分析师对该公司特定经验
	明星分析师	Star	表示明星分析师,前年末评为明星分析师取值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	国内十大所	BigN	年度前十大所取1,否则取0
	成长性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衡量
	公司规模	Size	总资产对数衡量
	总资产报酬率	ROA	t 期末净利润/ $(t$ 期初资产总额+ t 期末资产总额) $\div 2$
	资产负债率	Lev	t 期末总负债/总资产
	股权集中度	Ownership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审计意见类型	Auditopi	t 期审计意见类型,若为非标审计意见类型取1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uditfee	13.69	13.59	0.679	12.54	16.07
EPSDev	0.595	0.146	1.401	0	10
Survey	0.0530	0	0.224	0	1
BigN	0.0860	0	0.280	0	1
Growth	0.213	0.141	0.379	-0.385	2.343
Size	22.44	22.21	1.364	20.08	26.66
Ownership	36.15	34.85	15.21	8.770	75
Lev	0.413	0.400	0.202	0.0510	0.848
ROA	0.0660	0.0580	0.0530	-0.0740	0.240
Auditopi	0.0100	0	0.100	0	1

表3 分年度分析师调研统计

变量	年份	总频数	存在调研	比例 (%)	不存在调研	比例 (%)
Survey	2012	16639	639	3.84	16000	96.16
	2013	15849	1128	7.12	14721	92.88
	2014	15574	1109	7.12	14465	92.88
	2015	15595	801	5.14	14794	94.86
	2016	18732	682	3.64	18050	96.36
	总计	82389	4359	-	78030	-

量能够减少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量和审计风险,从而降低审计费用。与此同时,低财务报告信息质量也被证实可能引起的声誉风险与诉讼成本,会增加溢价与审计范围进而提高审计费用,但也有学者发现高财务报告质量与高审计费用的关联性。

作为与分析师同为外部治理机制的会计师事务所,两者的互动研究近年来受到一定关注,两者关联路径主要集中于信息披露、声誉压力、业绩压力等方面,因此,学者们

开始探索分析师预测偏差与审计费用之间的相关性。基于声誉压力与业绩压力,相关研究表明分析师跟进人数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审计投入,而从审计失误视角的相关研究也表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高度关注来自于更多的分析师跟进,若出现审计失误,事务所审计师会在审计工作上投入更多精力来应对审计失误带来的声誉受损,进而提高审计费用。但也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高分析师跟进反而会降低审计费用,且分析师跟进人数每上升一人,审计费用将下降近10%。现在很多企业会选择购买审计意见,而审计意见的购买行为来源于分析师的高预测偏差,且企业购买审计意见的倾向会随着明星分析师数量的增加而变强,基于信息互补,分析师跟进行为所带来的高信息披露量反而使得审计投入成本的降低,此外,有学者也尝试从预测指标类型与审计投入关系进行分析。从盈余管理预测的角度来看,高质量的审计能够为分析师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抑制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提升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的有效性,因此审计质量越高,越能降低分析师预测偏差,但是高质量的审计往往带来的是高审计费用。国外学者研究发现盈余管理预测的准确性与审计费用正相关,其他学者也证明Ball等(2012)的主要结论,并且发现审计费用与年度预测的准确性呈负相关或不相关。

而实地调研作为分析师获取信息最重要、最直接的渠道,是形成其对公司价值预期的重要保障。《新财富》在2003年面向“最佳分析师”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70%的“最佳分析师”实地调研其跟踪的上市公司比例高达80%以上,其中调研其跟踪的所有上市公司的分析师占比为30%,但是由于该方法获取信息的难度大,数据较为缺乏,所以分析师实地调研的相关文献不足。当前涉及分析师调研行为的相关研究尚为鲜见,已有文献集中于调研及其类型差异对分析师预测精度的影响、调研行为及其特征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等方面,但相关研究却呈现不同的结论,国内学者发现我国证券分析师预测精度随着调研行为产生而提高,且这种调研行为与会计信息可比性密切相关。另外,一些实地调研的相关活动,如投资者见面会也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研究表明投资者见面会确实能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精度,降低预测偏差,证明了调研信息对盈余预测行为的重要影响。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预测精度并非一定会随着调研行

表4 基于预测偏差的分析师调研对审计收费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Auditfee	EPSDev	Auditfee
Survey	-0.129***	-0.204***	0.019***
	(-13.20)	(-9.14)	(2.72)
EPSDev			0.004***
			(3.45)
BigN	-	0.037*	0.019***
		(1.66)	(2.72)
Growth	-	-0.196***	0.584***
		(-12.83)	(86.44)
Size	-	-0.096***	0.048***
		(-15.15)	(10.32)
Ownership	-	-0.001	0.382***
		(-1.46)	(198.21)
Lev	-	-0.120***	-0.001***
		(-2.92)	(-4.75)
ROA	-	-8.993***	-0.051***
		(-70.91)	(-4.08)
Auditopi	-	0.701***	-0.266***
		(11.81)	(-6.65)
Constant	13.438***	3.555***	0.156***
	(414.53)	(23.42)	(8.63)
year	控制		
industry	控制		
Observations	80,543	63,740	63,740

注: ***p<0.01, **p<0.05, *p<0.1

为产生而提高，他们发现分析师对上市公司进行调研活动会导致其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测精度下降，且预测乐观度较高，而如果存在关联分析师的实地调研行为，则这种调研活动会进一步导致其预测精度下降且乐观性提升。此外，调研行为也被证实能够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且在低质量信息环境中表现更为明显。

从会计师事务所视角来看，事务所在分析师选择是否进行调研及后续对调研内容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虽然调研引起的高关注会提高审计失败的成本进而引发审计费用的提升，但是引发关注也会通过提高公司财务报告质量进而引起审计费用的下降，所以从引发关注方面两者关系并不清晰。结合预测偏差方面来看，由于分析师调研行为对其预测精度的影响并非单向，且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后果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分析师调研行为在分析师预测偏差与审计收费二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也非定向：首先，基于调研信息绝对有用假说，如果调研行为获取的信息对盈

余预测具有较大的边际贡献，且相较于年报及其他报告而言，调研信息的获取成本更小且具有更强的针对性，那么分析师进行调研会进一步降低其预测偏差；其次，基于调研活动中管理层乐观情绪引导假说，很多包括分析师在内的投资者调研行为都将被管理层对公司未来盈利的乐观情绪所引导，即很多时候分析师调研行为所获取的相关信息并非中立信息，尽管与管理层的沟通是分析师最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但管理层在信息的释放及披露上显现出了较高的乐观情绪，致使分析师后期盈余预测偏差相较未调研分析师预测更大，即分析师实地调研并不能带来预测偏差的降低，反而进一步提高了预测偏差。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对立假设：

假设H1a：分析师实地调研行为会降低分析师预测偏差，支持信息有用假说；

假设H1b：分析师实地调研行为会提高分析师预测偏差，支持管理层乐观情绪引导假说。

与此同时，基于事务所视角，由于分析师对相关上市公司的预测偏差越大，则越有可能表明对同一公司发布预测报告的分析师在公司战略上存在不同意见。进一步地，相关公司的战略风险较高，而高战略风险也引致了高审计风险，因此，事务所进行外部审计时需要关注的信息也会越多，相关高审计风险所带来的工作成本也越大，进而导致审计费用的提升，一定程度上相关审计费用的提高便是对上市公司高战略风险引致的高审计风险的一种价值补偿。所以，事务所审计收费会随着分析师预测偏差的增加而有所上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分析师预测偏差会提高（或降低）战略风险及审计风险程度，进而致使事务所提高（或降低）审计收费。

此外，分析师预测精度来源于其对上市公司的了解程度，该程度是通过其定期跟踪及调研等相关活动来实现的。相较于低经验分析师和非明星分析师，高经验分析师和明星分析师对相关公司的了解更为详尽，且这类分析师在信息的搜集、挖掘及处理上水平更高，主要表现在信息处理效率及调研信息的辨别及利用效率上。一方面，高经验分析师和明星分析师根据自身多年积累的经验及行业专长，能够相较其他分析师对特定公司的信息具有更高的处理效率，对相关信息的理解更为深刻，对预测精度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高经验分析师和明星分析师虽然在实地调研过程中也会遇到管理层基

表5 基于预测偏差的分析师调研对审计收费的中介分析（明星分析师异质效应）

变量	(1)	(2)	(3)	(4)
	非明星分析师	明星分析师	非明星分析师	明星分析师
	EPSDev	EPSDev	Auditfee	Auditfee
Survey	-0.207***	-0.183***	0.020***	0.012
	(-8.55)	(-3.12)	(2.68)	(0.73)
EPSDev			0.003**	0.009***
			(2.27)	(3.12)
BigN	0.040	0.018	0.586***	0.576***
	(1.64)	(0.33)	(78.73)	(35.63)
Growth	-0.206***	-0.153***	0.048***	0.048***
	(-12.25)	(-4.19)	(9.20)	(4.54)
Size	-0.094***	-0.106***	0.381***	0.389***
	(-13.70)	(-6.57)	(180.00)	(82.73)
Ownership	-0.001	-0.000	-0.000***	-0.001***
	(-1.45)	(-0.29)	(-3.60)	(-3.64)
Lev	-0.113**	-0.151	-0.060***	-0.015
	(-2.53)	(-1.43)	(-4.36)	(-0.50)
ROA	-8.816***	-9.900***	-0.339***	0.072
	(-64.14)	(-30.38)	(-7.73)	(0.73)
Auditopi	0.744***	0.535***	0.164***	0.129***
	(11.35)	(3.80)	(8.13)	(3.14)
Constant	3.481***	3.973***	5.165***	4.934***
	(21.35)	(9.49)	(102.74)	(40.41)
year	控制			
industry	控制			
Observations	52,745	10,995	52,745	10,995

注：***p<0.01, **p<0.05, *p<0.1

于乐观情绪引导所提供的非中立信息，但他们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相关信息的有用性，并适时适量地利用到对上市公司的盈余预测行为上，能够一定程度上提升其预测精度，降低预测偏差，进而公司战略及审计风险下降，降低事务所应对审计风险的收费水平。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3：高经验分析师、明星分析师调研行为会进一步降低分析师预测偏差，进而导致审计收费下降。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搜集了2012-2016年分析师盈余预测的数据及分析师独立调研、参与调研数据，且通过相关资料收集对应标准及指标信息，其中分析师调研数据通过公司调研报告手工搜集与整理，分析师预测数据、审计费用及所有财务指标数据均来自WIND、CSMAR数据库。

为了使研究更加准确，本文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了预测机构或分析师及调研机构不明确的样本；（2）剔除了金融类、ST等特殊处理的公司；（3）没有考虑同名分析师跳槽的特殊情况，即不同券商的同名分析师视为多名分析师进行研究；（4）分析师如果存在同一年度内的多次预测，则取最后一次预测为准；（5）剔除了国外券商机构、香港及台湾券商数据（占比较少）；（6）所有连续变量均经过上下1%的异常值处理。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借鉴前期文献，本文将审计费用取对数，用Auditfee表示。

2. 解释变量：（1）借鉴谭松涛等（2015）对分析师预测偏差的相关度量方法，以分析师预测上市公司每股盈余为指标，用预测每股盈余与实际每股盈余差额的绝对值除以实际每股盈余绝对值作为最终的盈余预测偏差值，即每单位实际盈余所承担的预测偏差。具体算法如下：

$$EPSDev_{i,j,t} = |FEPS_{i,j,t} - EPS_{i,j,t}| / |EPS_{i,j,t}|$$

其中*i*、*j*、*t*分别表示上市公司*i*、分析师*j*与预测、调研当年*t*。其余变量计算如表1所示。

（2）分析师调研变量根据分析师调研报告记录中的署名为准，当年度参与对某公司的调研行为的分析师称为调研分析师，相关调研变量取值为1。

（三）模型设计

为了验证前述假设，本文拟设计如下模型进行验证：

$$EPSDev = \beta_0 + \beta_1 Survey + \beta_2 BigN + \beta_3 Growth + \beta_4 Size + \beta_5 ROA + \beta_6 Lev + \beta_7 Ownership + \beta_8 Auditopi + \varepsilon \quad (1)$$

$$Auditfee = \beta_0 + \beta_1 EPSDev + \beta_2 Survey + \beta_3 BigN + \beta_4 Growth + \beta_5 Size + \beta_6 ROA + \beta_7 Lev + \beta_8 Ownership + \beta_9 Auditopi + \varepsilon \quad (2)$$

模型（1）-（2）用于检验分析师参与实地调研对分析师预测偏差的影响及引致的审计收费程度变化。进一步地，本文也对明星分析师差异、不同经验分析师差异下实地调研的影响结果进行了深入分析，予以验证分析师预测偏差作为实地调研影响审计收费的中介效应。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6 基于预测偏差的分析师调研对审计收费的中介分析（经验分析师异质效应）

变量	(1)	(2)	(3)	(4)
	低经验分析师	高经验分析师	低经验分析师	高经验分析师
	EPSDev	EPSDev	Auditfee	Auditfee
Survey	-0.148***	-0.227***	0.020**	0.013
	(-6.04)	(-5.21)	(2.35)	(1.13)
EPSDev			0.000	0.008***
			(0.01)	(4.91)
BigN	0.024	0.047	0.594***	0.566***
	(0.96)	(1.14)	(69.43)	(51.35)
Growth	-0.172***	-0.212***	0.048***	0.046***
	(-9.83)	(-7.60)	(8.09)	(6.15)
Size	-0.065***	-0.134***	0.381***	0.384***
	(-8.98)	(-11.50)	(156.06)	(121.72)
Ownership	-0.000	-0.001	-0.001***	-0.000**
	(-0.60)	(-1.46)	(-4.48)	(-2.11)
Lev	-0.084*	-0.115	-0.054***	-0.045**
	(-1.79)	(-1.53)	(-3.42)	(-2.21)
ROA	-7.242***	-11.266***	-0.280***	-0.252***
	(-50.26)	(-47.76)	(-5.56)	(-3.79)
Auditopi	0.709***	0.616***	0.171***	0.146***
	(9.28)	(6.58)	(6.61)	(5.77)
Constant	2.668***	4.534***	5.186***	5.055***
	(15.40)	(16.33)	(88.13)	(67.04)
year	控制			
industry	控制			
Observations	39,316	24,424	39,316	24,424

注：***p<0.01, **p<0.05, *p<0.1

表7 匹配效果检验

因变量	匹配变量	匹配前后	均值		标准化偏差
			处理组	对照组	
Survey	Anaexp	匹配前	0.329	0.379	-10.5
		匹配后	0.329	0.329	0
	Star	匹配前	0.168	0.173	-1.4
		匹配后	0.168	0.168	0
	Bigbroker	匹配前	0.408	0.337	14.8
		匹配后	0.408	0.408	0

本文对相关样本从整体、分年度分析师调研及事务所声誉差异下的调研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首先，从整体样本来看（表2），审计费用对数均值及中位数分别为13.69、13.59，而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为12.54、16.07，可以看出审计收费差异并不十分巨大，且样本中的审计费用分布较为均匀。而每股盈余的预测偏差均值与中位数分别为0.595、0.146，而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为0和

10.00，表明了样本中分析师预测偏差的差异还是较大的，预测偏差的不同对分析师本身及跟进的相关公司都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分析师样本中独立或参与调研过的样本占到总样本的5.29%，绝大多数跟进公司并发布盈余预测的分析师并未进行更多的调研行为，而调研与否可能与分析师特征及公司特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观测来进行深入分析。与此同时，公司成长性、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资产负债率及总资产收益率均值和中位数差距也较小，说明样本的各类指标分布较为均匀。此外，发布非标审计意见的公司仅占到样本总数的1%，说明大部分上市公司获得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其次，从分年度分析师独立或参与调研情况来看（表3），2012-2016年中分析师独立或参与调研的占比不高，均在年度样本4%-7%左右，其中2013年及2014年分析师调研频次达到近1100次左右，在5年的分析师调研数据中绝对值最高。

（二）回归结果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表4），通过引入分析师预测偏差，发现分析师实地调研与预测偏差回归系数为-0.204，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一定程度上表明分析师实地调研行为显著降低了分析师预测偏差，支持了调研信息有用性假说，基本验证了假设H1a。进一步地，从预测偏差与审计费用的关系来看，预测偏差与审计收费的回归系数为0.004，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了事务所审计收费确实会随着预测偏差的增大而提高，结合分析师实地调研行为与其预测偏差的关系来看，分析师实地调研行为通过降低其预测偏差进而对审计收费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解释了预测偏差作为分析师实地调研与审计收费关系的中介作用，且支持调研信息有用性假说，验证了假设H2。与此同时，从控制变量结果来看，前十大事务所收费较非十大更高，高公司规模、低资产报酬率、非标审计意见类型等都会显著增加审计费用，这与前期文献相一致。

（三）进一步分析

本文进一步区分明星分析师及分析师经验类型来深入研究高低经验分析师实地调研行为对预测偏差的影响进而对审计收费影响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表5、表6），明星分析师较非明星分析师组别在中介效应回归下具有更大的系数，而高经验分析师较低经验分析师样本中调研行为均显著降低了分析师预测偏差，高经验分析师下回归系数略

表8 内生性检验及结果

变量	1:1PSM匹配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EPSDev	Auditfee	非明星分析师 EPSDev	明星分析师 EPSDev	非明星分析师 Auditfee	明星分析师 Auditfee	低经验分析师 EPSDev	高经验分析师 EPSDev	低经验分析师 Auditfee	高经验分析师 Auditfee
Survey	-0.204*** (-9.14)	0.019*** (2.72)	-0.207*** (-8.55)	-0.183*** (-3.12)	0.020*** (2.68)	0.012 (0.73)	-0.148*** (-6.04)	-0.227*** (-5.21)	0.020** (2.35)	0.013 (1.13)
EPSDev		0.004*** (3.45)			0.003** (2.27)	0.009*** (3.12)			0.000 (0.01)	0.008*** (4.91)
BigN	0.037* (1.66)	0.584*** (86.44)	0.040 (1.64)	0.018 (0.33)	0.586*** (78.73)	0.576*** (35.63)	0.024 (0.96)	0.047 (1.14)	0.594*** (69.43)	0.566*** (51.35)
Growth	-0.196*** (-12.83)	0.048*** (10.32)	-0.206*** (-12.25)	-0.153*** (-4.19)	0.048*** (9.20)	0.048*** (4.54)	-0.172*** (-9.83)	-0.212*** (-7.60)	0.048*** (8.09)	0.046*** (6.15)
Size	-0.096*** (-15.15)	0.382*** (198.21)	-0.094*** (-13.70)	-0.106*** (-6.57)	0.381*** (180.00)	0.389*** (82.73)	-0.065*** (-8.98)	-0.134*** (-11.50)	0.381*** (156.06)	0.384*** (121.72)
Ownership	-0.001 (-1.46)	-0.001*** (-4.75)	-0.001 (-1.45)	-0.000 (-0.29)	-0.000*** (-3.60)	-0.001*** (-3.64)	-0.000 (-0.60)	-0.001 (-1.46)	-0.001*** (-4.48)	-0.000** (-2.11)
Lev	-0.120*** (-2.92)	-0.051*** (-4.08)	-0.113** (-2.53)	-0.151 (-1.43)	-0.060*** (-4.36)	-0.015 (-0.50)	-0.084* (-1.79)	-0.115 (-1.53)	-0.054*** (-3.42)	-0.045** (-2.21)
ROA	-8.993*** (-70.91)	-0.266*** (-6.65)	-8.816*** (-64.14)	-9.900*** (-30.38)	-0.339*** (-7.73)	0.072 (0.73)	-7.242*** (-50.26)	-11.266*** (-47.76)	-0.280*** (-5.56)	-0.252*** (-3.79)
Auditopi	0.701*** (11.81)	0.156*** (8.63)	0.744*** (11.35)	0.535*** (3.80)	0.164*** (8.13)	0.129*** (3.14)	0.709*** (9.28)	0.616*** (6.58)	0.171*** (6.61)	0.146*** (5.77)
Constant	3.555*** (23.42)	5.130*** (110.81)	3.481*** (21.35)	3.973*** (9.49)	5.165*** (102.74)	4.934*** (40.41)	2.668*** (15.40)	4.534*** (16.33)	5.186*** (88.13)	5.055*** (67.04)
Observations	63,740	63,740	52,745	10,995	52,745	10,995	39,316	24,424	39,316	24,424

注: ***p<0.01, **p<0.05, *p<0.1

大,一定程度上表明高经验分析师调研所带来的信息利用更为充分。与此同时,低经验分析师样本下并未表现出预测偏差与审计收费之间明显的因果关系,高经验分析师样本中随着预测偏差的增加,审计收费确实会有明显的提高,且回归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与低经验分析师组别差距明显。总体来看,明星分析师、高经验分析师调研行为引致的低预测偏差一定程度上显著降低了审计收费,基本验证了假设H3。

(四) 内生性检验

分析师调研并不是随机发生的,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选择性的行为,存在一种替代性假说,即分析师更倾向于调研风险更高的公司,这类公司本身的审计费用就较高,所以本文设计PSM检验和回归来解决此类内生性问题。为了进行PSM匹配回归,通过引入影响分析师调研的因素:分析师特定经验(Anaexp)、是否为明星分析师(Star)及是否隶属于大券商(Bigbroker),进行PSM平衡性检验。实

证结果表明(表7),高经验分析师、明星分析师及大券商所属分析师更小概率进行公司调研行为,而平衡性检验匹配后样本标准化偏差小于5%,表明匹配效果较好,适合进一步回归检验。通过匹配样本回归(表8),发现分析师调研行为与预测偏差依然呈现负向显著关系,预测偏差与审计费用间也依然呈现正向显著关系,而在分组检验中也存在与上述主回归相似的结果,再次验证了前述相关假设及结论。

(五) 稳健性检验

1. 鉴于审计收费是基于公司层面的指标,所以本文尝试以分析师对特定公司的预测分歧度(DIS)为基础(预测分歧度:采用不同分析师在同一年度对同一公司的预测值标准差表示)探索分析师调研比例(存在调研的分析师占对特定公司跟进的总分析师人数比例(Surveyratio))对预测分歧度的影响,进而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进行相关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限于篇幅,表略,

下同),随着调研分析师人数比例的增加,对特定公司的预测分歧确实会显著降低,进而也会进一步降低审计收费,再次证明分析师预测偏差和分歧度作为分析师实地调研影响审计收费的中介机制,进一步验证了相关假设。

2.通过对同一年同一家公司发布盈余预测的所有分析师预测偏差取均值(AFDev),进而形成公司-年样本预测数据,相关调研数据改变为存在调研的分析师占对特定公司跟进的总分析师人数比例(Surveyratio)作为解释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参与公司跟踪的分析师调研比例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分析师预测偏差均值,而再次引入调研和预测偏差均值变量后发现回归中预测均值的降低也会进一步降低审计收费,一定程度上再次支持了信息有用假说,进一步证明了相关假设。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行为金融理论,通过引入分析师实地调研数据探索了分析师实地调研影响审计收费的内在机理,证实了分析师实地调研行为会通过降低预测偏差进而降低审计收费。相关实证结果表明:(1)分析师实地调研行为降低了分析师预测偏差,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分析师调研行为信息有用性假说,而非管理层乐观引导假说,即调研信息有助于分析师进行盈余预测,提高预测精度,进一步降低分析师对企业战略的分歧;(2)分析师预测偏差与审计收费间呈现正向关系,表明分析师预测偏差确实带来了上市公司更高的战略风险与经营风险,进而提高了审计风险,此时,事务所会通过进一步提高审计收费来予以应对;(3)明星分析师、高经验分析师实地调研行为确实能够强化分析

师实地调研通过其预测偏差影响审计收费的关系,进一步降低企业战略风险分歧,相较于低经验分析师,对相关公司的了解更为详尽,且在调研信息的搜集、挖掘、辨别及处理上水平更高,对调研信息的利用也更为充分,一定程度上会提升预测精度,降低相关审计风险,进而事务所收费水平也会更低。

鉴于以上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事务所在面对不同分析师的预测行为时,应该充分考虑相关分析师特征及其预测综合能力,清晰准确地辨别其预测偏差行为的内因,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升审计收费,以应对分析师预测偏差所引起的高审计风险;(2)分析师在进行相关盈余预测及调研行为时,应加强与上市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事务所的交流与沟通,充分了解上市公司具体且实际的情况,避免最大限度减少由于管理层乐观情绪引导而提供的非中立信息,发挥调研信息对分析师自身盈余预测的边际贡献,进一步降低其对公司战略差异所引起的高审计风险,与事务所形成良好的协同外部治理机制;(3)上市公司及相关事务所应足够关注与高经验分析师的交流与沟通,在为其提供更多具体及有用信息的基础上,从分析师方面获取更多与公司决策及发展密切相关的信息,进一步降低公司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通过相关分析师实地调研行为提高外部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正确判断。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优博项目“分析师跟踪网络与融资决策”(2018Y1147)。

作者单位: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 Chen, X., Cheng, Q., Lob, K..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alyst Reports and Corporate Disclosures: Exploring the Roles of Information Discovery and Interpret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0, 49 (3): 206-226.
2. Soltes, E.. Private Interaction Between Firm Management and Sell-Side Analyst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4, 52 (1): 245-272.
3. 高万青. 信息披露质量、审计风险与审计定价关系研究—基于深交所A股公司的经验证据[J]. 经济经纬, 2014, 31 (4): 150-155.
4. Hribar, P., Kravet, T., Wilson, R. A New Measure Of Accounting Quality[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14 (19): 506-538.
5. 李琰, 温菊英. 证券分析师预测偏差与审计质量. 天津商业大学学报. 2015 (5)
6. 尤克清, 张昊晨. 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对审计意见购买的影响.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7 (6)
7. 翟胜宝, 张雯, 曹源, 朴仁玉. 分析师跟踪与审计意见购买. 会计研究. 2016 (6)
8. 施先旺, 李志刚, 刘拯. 分析师预测与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研究—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视角.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5 (3)
9. 胡奕明, 金洪飞. 证券分析师关注自己的声誉吗?. 世界经济. 2006 (2)
10. 谭松涛, 崔小勇. 上市公司调研能否提高分析师预测精度. 世界经济. 2015 (4)
11. 杨飞. 如何成为明星分析师?—分析师上榜新财富决定因素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6 (11)
12. 陈胜蓝, 马慧. 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声誉与规模经济性的传递效应. 审计研究. 2013 (6)

新审计报告准则提高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基于关键审计事项的讨论

■ 杨开元 霍晓艳 刘斌

摘要 本文利用2015-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了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准则的实施能够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当审计报告中披露了关键审计事项时，能够促使下一会计期间的会计信息可比性有所提高，且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越多，可比性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可比性的提高主要体现在非四大事务所审计的样本和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本文的研究发现说明，以关键审计事项沟通为主要变化的新审计报告准则的实施，通过强化注册会计师、管理层及治理层的责任，在增加审计报告信息含量的同时提高了信息质量，对提高资本市场效率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新审计报告 关键审计事项 可比性 信息不对称

一、引言

审计报告作为连接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关系的纽带，在资本市场扮演着重要角色。频繁的财务造假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准则制定者对传统的审计报告模式进行重新审视。传统的审计报告格式统一，不同公司仅在审计意见段存在差异，且审计意见类型存在同质化趋势，因此投资者很难从趋同的审计报告中甄别出有效的信息。基于此，英国与欧盟率先在2013年和2014年进行了改革。随后2015年，国际审计准则委员会（IAASB）发布新审计准则，首次要求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关键审计事项。为了与国际准则保持一致，我国财政部于2016年12月23日颁布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等12项准则，其中改革的关键在于增加关键审计事项段，并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及相应审计程序，以提高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增强审计报告的信息相关性和有用性。这一要求自2017年1月1日起在A+H股上市公司中率先执行，并在2018年1月1日起在A股上市公司中全面铺开。

2010年9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在FASB发布的第8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中达成的联合概念框架项目

认为，可比性是保证会计信息有用性的最基本特征，能够使得同样的项目看起来相似，不同的项目看起来不同。可比性作为一项增进性质量特征，可以更好地发挥会计信息的鉴别功能和治理功能（刘睿智等，2015）。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Fang等，2018），即同行业公司间的信息能够互相补充，为市场带来增量信息，使投资者能更清晰地推断出它们在经济上的异同，提升投资效率（FASB，2010），还能够降低分析师预测误差，提升分析师预测准确度（De Franco等，2011）。另外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还能够缓解公司与外部的信息不对称，改善信息环境，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胥朝阳和刘睿智，2014），引导资源优化配置（FASB，2010）。

审计与会计之间密不可分、相互制约。新审计报告准则的颁布能否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影响，以及会产生何种影响，值得进行深入探讨，本文拟从新审计报告准则这一政策改革研究会计信息可比性。本文研究发现，新审计报告准则的实施能促进企业当期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另外，关键审计事项是新准则的核心内容，本文继续检验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发现当审计报告中披露了关键审计事项时，

表1 主要变量的定义与度量

变量名	变量的定义与度量
CompAcct10	第t年的公司可比性指标, 将所有与目标公司同年同行业配对组合的可比性值从大到小排序, 取可比性最高的十对组合的均值
CompAcctInd	第t年的公司可比性指标, 将所有与目标公司同年同行业配对组合的可比性值从大到小排序, 取中位数
Post	时间虚拟变量, 当样本时间大于等于2017年时, 取值为1, 否则为0
Treat	是否披露关键事项虚拟变量, 当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时, 取值为1, 否则为0
Size	公司规模, 等于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ev	财务杠杆, 代表公司负债水平, 等于公司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
MB	市账比, 衡量上市公司成长性, 等于公司市面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
Growth	成长性, 等于营业收入增长率
Lholding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Roa	总资产收益率, 等于公司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
Absacc	盈余管理程度, 采用经业绩调整的修正琼斯模型计算的操控性应计
Vol	股票收益流动性, 等于当年度公司周收益率的方差

表2 描述性统计

	N	Mean	St.Dev	Median	min	max
CompAcct10	2659	-0.0019	0.004	-0.0005	-0.028	-0.00007
CompAcctInd	2659	-0.0098	0.0071	-0.0076	-0.046	-0.00302
Post	2659	0.479	0.499	0	0	1
Size	2659	22.65	1.26	22.44	20.34	26.30
Lev	2659	0.428	0.201	0.417	0.068	0.86
MB	2659	2.227	1.426	1.749	0.878	8.661
Growth	2659	0.155	0.300	0.116	-0.485	1.606
Lholding	2659	0.325	0.134	0.310	0.081	0.688
Roa	2659	0.044	0.0541	0.037	-0.152	0.215
Absacc	2659	0.054	0.050	0.040	0.0001	0.249
Vol	2659	0.005	0.0051	0.003	0.0006	0.025

表3 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Variables	(1)	(2)	(3)	(4)	(5)
(1)CompAcct10	1.000				
(2)CompAcctInd	0.664***	1.000			
(3)Post	0.063***	0.191***	1.000		
(4)Treat	0.024	0.011	-0.061***	1.000	
(5)Num	0.045**	0.128***	0.882***	0.052***	1.000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会促使企业下一会计期间的可比性有所提升, 且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越多, 可比性提升也越多。考虑到会计信息质量与事务所和产权性质紧密相关, 本文继续对以上结论按照事务所类型和产权特征进行分样本检验, 发现可比性的提升主要体现在非四大事务所和非国有企业中。本文的研究证明了新审计报告准则在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 提升非四大事务所审质量, 抑制非国有企业盈余

管理方面的积极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审计是连接企业与资本市场间的中间环节, 是财务报告披露前的最后一道关卡, 审计报告准则在信息披露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言而喻。新审计报告准则的实施从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层两个方面影响到企业的会计信息可比性。

一方面, 新审计报告准则的实施增强了注册会计师的责任(Gimbar, 2016), 提高了审计质量。新增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事项》指出注册会计师在确定关键审计事项时应关注:(1)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较高的领域或识别出的特别风险;(2)与财务报表中涉及重大管理层判断的领域相关的重大审计判断;(3)本期重大交易或事项对审计的影响。并且新准则还要求注册会计师既要披露风险项, 又要披露针对相关事项具体执行的审计程序, 因此, 注册会计师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投入更多的资源识别财务报告中可能存在的重大事项及特别风险。为了应对新审计准则的要求, 注册会计师会加强自身专业素质的提高, 引入相关行业专家, 提高自身专业胜任能力和执业水平, 从而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许静静等, 2019)。另外注册会计师需要将原本只用在审计工作底稿中展示的内容在审计报告中予以披露,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审计工作更加透明(PCAOB, 2017), 促使注册会计师主动发现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柳木华等, 2020)。其次, 关键审计事项来源于与治理层沟通的事项, 注册会计师承担的契约责任以及诉讼风险会使其更加注重与公司间的沟通(张继勋等, 2016), 尤其是涉及到会计政策的选择和会计估计的判断时, 注册会计师要求保守地报告并通过会计准则的保守解释来证明管理层选择的合理性(Hackenbrack等, 1996), 从而有助于企业选取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 将盈余管理行为限制在更加合理的范围内。另一方面, 新审计报告的实施会“倒逼”企业主动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审计是对会计行为的监督, 新审计报告准则对注册会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促使注册会计师采取更严格的审计措施, 以发现更多的错报、漏报(洪金明, 2020), 这将使管理层面临准则和注册会计师

表4 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与会计信息可比性回归分析

	全样本		纯A股	
	(1)	(2)	(3)	(4)
	CompAcct10	CompAcctInd	CompAcct10	CompAcctInd
Post	0.000314*	0.00166***	0.000283*	0.00159***
	(1.95)	(5.41)	(1.91)	(5.19)
Size	-0.000345	-0.000374	-0.000462	-0.000178
	(-0.42)	(-0.21)	(-0.57)	(-0.10)
Lev	0.00194	-0.000749	0.00238*	-0.000118
	(1.41)	(-0.32)	(1.80)	(-0.05)
MB	-0.000123	-0.000202	-0.000135	-0.000185
	(-1.37)	(-1.35)	(-1.56)	(-1.23)
Growth	0.000269	0.00162***	0.000484**	0.00165***
	(1.06)	(3.41)	(2.49)	(3.41)
Lholding	-0.00473	-0.0160**	-0.00338	-0.0140*
	(-1.33)	(-2.16)	(-0.99)	(-1.87)
Roa	-0.000627	0.00308	-0.00169	0.00334
	(-0.45)	(0.76)	(-1.38)	(0.81)
AbsAcc	-0.000988	-0.000624	-0.00106	0.0000742
	(-0.62)	(-0.25)	(-0.68)	(0.03)
Vol	0.00143	-0.105***	-0.000391	-0.110***
	(0.12)	(-5.02)	(-0.03)	(-5.39)
_cons	0.00675	0.00401	0.00895	-0.00110
	(0.35)	(0.10)	(0.47)	(-0.03)
N	2659	2659	2599	2599
adj.R ²	0.018	0.165	0.025	0.177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10, ** p < 0.05, *** p < 0.01

的双重压力，迫使管理层在经济事项发生时采取更加稳健的核算方式，减少盈余管理行为。

综上所述，在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后，不论是注册会计师增加的责任还是管理层的防御，都将影响到会计信息的产生与披露，进而影响到会计信息可比性（周冬华等，2018）。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新审计报告准则的实施会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

传统的审计报告以标准化的文本发表审计意见，而没有体现出具体的审计过程，尤其是重大事项的风险评估过程和具体的审计应对程序。因此，传统的审计报告信息含量并不能满足外部使用者的需求。增加关键审

计事项后的新审计报告弥补了这一缺陷，终结了以通过或不通过为标志、标准措辞、短式审计报告的传统模式，实行非标准措辞、个性化披露、长式审计报告的新模式。具体而言，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事项描述段和审计应对段。其中，事项描述段是注册会计师识别出来的关键审计事项的内容，主要涉及到重大交易事项、重大管理层判断和特别风险，其披露能够向外部投资者传递更多公司基本面的信息（王艳艳等，2018），从而降低公司信息的不确定性（Bens等，2017），增加审计报告的相关性和有用性（Cohn，2013；张继勋和韩冬梅，2014）。审计应对段则是注册会计师对确定的关键审计事项实施的相关审计程序，不仅能向投资者传递更多公司相关的信息，还有利于投资者对审计程序的了解（Humphrey等，2009），降低其对公司的风险认知。总体而言，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体现了审计报告准则改革的初衷，提高了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缩减了报告的使用者期望获取的内容与审计报告实际提供的信息之间的差距，降低了公司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缓解有助于代理成本的降低，约束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使其贯彻落实企业会计准则的实行，对于相同的经济业务，不同企业采取趋同的会计处理方法，改善信息环境，从而提高下一会计期间的可比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 当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时，会提高企业下一会计期间的会计信息可比性。

虽然新审计报告准则强制要求A股上市公司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但是对数量并无要求。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差异具有不同的信号传递作用（洪金明，2020）。一方面，由于关键审计事项来源于与治理层沟通的事项，因此，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得越多的公司，表明注册会计师和治理层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沟通（李延喜等，2019），有利于充分发挥治理层对管理层的监督和制约作用，避免管理层选择激进的会计处理方式；另一方面，披露数量作为一种直观的信息含量的表现形式，间接代表了披露范围的大小。当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越多，涉及到的披露范围越大，投资者能够从关键审计事项中提取出的有用信息越多，因而对公司的了解

表5 是否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与下一会计期间的可比性回归分析

	全样本		纯A股	
	(1)	(2)	(3)	(4)
	CompAcct10	CompAcctInd	CompAcct10	CompAcctInd
Treat	0.000330** (2.25)	0.000924*** (3.25)	0.000282** (2.43)	0.000853*** (3.09)
Size	-0.000239 (-0.31)	0.000586 (0.32)	-0.000396 (-0.53)	0.000675 (0.36)
Lev	0.00190 (1.39)	-0.000595 (-0.24)	0.00235* (1.78)	-0.000298 (-0.12)
MB	-0.0000774 (-0.75)	-0.000172 (-1.05)	-0.000100 (-1.03)	-0.000171 (-1.05)
Growth	0.000334 (1.31)	0.00192*** (3.93)	0.000546*** (2.75)	0.00188*** (3.84)
Lholding	-0.00454 (-1.29)	-0.0153** (-1.99)	-0.00345 (-0.98)	-0.0151* (-1.90)
Roa	-0.000704 (-0.50)	0.00275 (0.67)	-0.00176 (-1.41)	0.00311 (0.76)
AbsAcc	-0.00130 (-0.87)	-0.00204 (-0.86)	-0.00129 (-0.86)	-0.00160 (-0.70)
Vol	-0.0126 (-1.09)	-0.164*** (-6.61)	-0.0125 (-1.09)	-0.165*** (-6.68)
_cons	0.00436 (0.24)	-0.0172 (-0.40)	0.00755 (0.43)	-0.0190 (-0.43)
N	2659	2659	2599	2599
adj.R ²	0.019	0.142	0.025	0.156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10, ** p < 0.05, *** p < 0.01

程度更加深刻（孙再凌，2020），更能有效地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李延喜等，2019），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越多，越能够提高下一会计期间的会计信息可比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新审计报告准则自2018年1月1日起在A股上市公司间开始全面实施，即A股公司2017年的审计报告开始采用新准则，为便于检验政策实施的效果，本文选取2015-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对研究数据做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

融保险类公司；（2）剔除ST样本；（3）剔除变量计算时数据缺失的样本。本文所有财务数据和股票交易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关键审计数据来自CNRDS数据库，并经过手工整理获得，数据整理及统计分析软件为STATA 16。为排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均采取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二）核心变量测度

1. 被解释变量：会计信息可比性。DeFranco et al.（2011）将会计系统定义为经济事项向财务报表转换的映射过程，用公式表述为 $Financial\ Statement_i = f_i(Economic\ Events_i)$ ，其中 f_i 为公司的会计系统，即转换机制。同时，De Franco et al.（2011）认为如果两家公司的会计信息转换差异越小，它们会计系统的可比性越强。也就是说，给定同一经济事项，对于两个企业 i 和 j ，如果它们的会计信息是可比的，那么它们的转换系统 f_{i0} 和 f_{j0} 之间的差异就很小。根据这一逻辑，参照 De Franco et al.（2011）的方法，本文估算会计系统的过程如下：

首先，利用公司 i 第 t 期前连续16个季度的数据估计模型（1）：

$$Earnings_{i,tq} = \alpha_i + \beta_i Return_{i,tq} + \varepsilon_{i,tq} \quad (1)$$

其中， $Earnings_{i,tq}$ 代表季度会计盈余，为季度净利润与期初权益价值的比值； $Return_{i,tq}$ 为季度股票收益率，代表经济事项对公司的净影响。

其次，两个企业间转换系统的差异程度代表这两个企业的可比性大小，差异越大，可比性越低。为了测量这种差异的大小，假定两个企业和都经历了相同的经济事项（用 $Return_{i,tq}$ 表示），分别用各公司的转换函数来计算预期盈余，具体见下式：

$$E(Earnings)_{i,tq} = \hat{\alpha}_i + \hat{\beta}_i Return_{i,tq} \quad (2)$$

$$E(Earnings)_{j,tq} = \hat{\alpha}_j + \hat{\beta}_j Return_{j,tq} \quad (3)$$

其中， $Earnings_{i,tq}$ 是在给定企业的转换函数和企业的股票回报率下计算得到的企业 i 在第 t 期 q 季度的预期盈余； $Earnings_{i,tq}$ 是在给定企业的转换函数和企业的股票回报率下计算得到的企业 j 在第 t 期 q 季度的预期盈余。这样就可以算出两公司在经济业务相同的情况下预期盈余的差异程度。

表6 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与下一会计期间的可比性回归分析

	全样本		纯A股	
	(1)	(2)	(3)	(4)
	CompAcct10	CompAcctInd	CompAcct10	CompAcctInd
Num	0.000125** (2.10)	0.000329*** (2.61)	0.000110** (2.12)	0.000315** (2.45)
Size	-0.000198 (-0.26)	0.000728 (0.39)	-0.000364 (-0.48)	0.000794 (0.41)
Lev	0.00186 (1.35)	-0.000701 (-0.29)	0.00232* (1.76)	-0.000393 (-0.16)
MB	-0.0000979 (-0.99)	-0.000239 (-1.46)	-0.000117 (-1.22)	-0.000228 (-1.40)
Growth	0.000319 (1.27)	0.00187*** (3.87)	0.000537*** (2.74)	0.00185*** (3.80)
Lholding	-0.00458 (-1.30)	-0.0154** (-2.00)	-0.00347 (-0.98)	-0.0152* (-1.91)
Roa	-0.000669 (-0.48)	0.00285 (0.69)	-0.00173 (-1.39)	0.00321 (0.79)
AbsAcc	-0.00132 (-0.88)	-0.00212 (-0.90)	-0.00130 (-0.87)	-0.00167 (-0.73)
Vol	-0.0112 (-0.99)	-0.159*** (-6.51)	-0.0113 (-1.00)	-0.160*** (-6.57)
_cons	0.00352 (0.19)	-0.0201 (-0.46)	0.00689 (0.38)	-0.0215 (-0.48)
N	2659	2659	2599	2599
adj. R ²	0.018	0.139	0.024	0.153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10, ** p < 0.05, *** p < 0.01

表7 考虑事务所类型的影响

	假设一			
	四大 (1)	非四大 (2)	四大 (3)	非四大 (4)
	CompAcct10	CompAcct10	CompAcctInd	CompAcctInd
Post	0.00130 (0.66)	0.000375*** (2.76)	0.00444 (1.57)	0.00169*** (7.22)
假设二				
Treat	-0.00127 (-0.85)	0.000456*** (3.35)	0.00192 (1.14)	0.000831*** (3.00)
假设三				
Num	-0.000322 (-0.66)	0.000209*** (3.73)	0.000477 (0.72)	0.000329*** (2.78)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10, ** p < 0.05, *** p < 0.01

最后，定义可比性为两公司预期盈余差异绝对值平均数的相反数：

$$CompAcct_{ij,t} = -\frac{1}{16} \sum_{tq}^{tq} |E(Earnings_{ii,tq}) - E(Earnings_{ij,tq})| \quad (4)$$

CompAcct_{ij,t}值越大，表明企业和之间的可比性越强。根据该方法，计算出公司与行业内其他公司间的会计信息可比性，然后将计算出的可比性值从大到小排序，取排在前十的可比性值的平均值作为公司的可比性指标值，记为CompAcct10_i，该值越大，公司i的可比性越强。同时，CompAcctInd_i为所有与公司配对组合的可比性值的中位数。

2. 解释变量：关键审计事项。为验证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对可比性的影响，本文设置虚拟变量Post，当样本数据是2015-2016年时，Post取值为0，当样本数据是2017-2018年时，Post取值为1；为验证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是否会影响可比性，本文设置虚拟变量Treat，当审计报告中披露了关键审计事项时取值为1，否则为0；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用变量Num表示。

3.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选择参考了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参考Jayaraman和Verdi、Francis等文献，加入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市账比MB、成长性Growth（营业收入增长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Lholding、盈利能力Roa、盈余管理Absacc、股票收益流动性Vol（采用当年度公司周收益率的方差来度量）。

4. 模型构建。为验证假设1，本文构建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5，其中Compacct_{i,t}指第t年的两个可比性的指标CompAcct10_i和CompAcctInd_i，Post为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的虚拟变量。

$$Compacct_{i,t} = \beta_0 + \beta_1 Post + \sum_{q=1}^m \beta_q ControlVariables_{i,t-1} + \varepsilon_{i,t-1} \quad (5)$$

为验证假设2，本文构建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6，其中Treat为是否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虚拟变量，当被审计单位当年披露了关键审计事项取值为1，否则为0。

$$Compacct_{i,t} = \beta_0 + \beta_1 Treat + \sum_{q=1}^m \beta_q ControlVariables_{i,t-1} + \varepsilon_{i,t-1} \quad (6)$$

为验证假设3，本文继续构建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7，其中样本区间与方程7-1

表8 考虑产权性质的影响

假设一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1)	(2)	(3)	(4)
	CompAcct10	CompAcct10	CompAcctInd	CompAcctInd
Post	-0.000109	0.000413***	0.000849	0.00186***
	(-0.37)	(2.89)	(1.55)	(5.87)
假设二				
Treat	0.0000193	0.000379***	0.000301	0.00102***
	(0.05)	(3.56)	(0.54)	(3.90)
假设三				
Num	0.0000351	0.000131***	0.0000439	0.000382***
	(0.25)	(2.93)	(0.18)	(3.16)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10, ** p < 0.05, *** p < 0.01

表9 稳健性检验 (1)

	全样本		纯A股	
假设一				
	(1)	(2)	(3)	(4)
	CompAcct10	CompAcctInd	CompAcct10	CompAcctInd
Post	0.000315**	0.00165***	0.000282*	0.00161***
	(2.00)	(5.59)	(1.93)	(5.43)
假设二				
	(1)	(2)	(3)	(4)
	CompAcct10	CompAcctInd	CompAcct10	CompAcctInd
Treat	0.000298**	0.000910***	0.000260**	0.000857***
	(2.06)	(3.39)	(2.22)	(3.26)
假设三				
	(1)	(2)	(3)	(4)
	CompAcct10	CompAcctInd	CompAcct10	CompAcctInd
Num	0.000116*	0.000333***	0.000102*	0.000324***
	(1.96)	(2.76)	(1.95)	(2.63)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10, ** p < 0.05, *** p < 0.01

表10 稳健性检验 (2)

假设一		
	全样本	纯A股
	CompAccti	CompAccti
Post	0.00215***	0.00209***
	(7.66)	(7.47)
假设二		
Treat	0.00129***	0.00124***
	(4.98)	(4.88)
假设三		
Num	0.000500***	0.000491***
	(4.34)	(4.19)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10, ** p < 0.05, *** p < 0.01

致, Num为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

$$Compaccti, t = \beta_0 + \beta_1 Num + \sum_{q=1}^m \beta_q ControlVariables_{i, t-1} + \varepsilon_{i, t-1} \quad (7)$$

以上变量定义及度量方法如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会计信息可比性指标CompAcct10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019和-0.0005, 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为-0.028、-0.00007, 标准差为0.004, 说明样本公司之间的可比性较低且存在较大差异。CompAcctInd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CompAcct10类似。另外从表中可以看出, 两个可比性指标的计算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CompAcct10在数值上明显大于CompAcctInd的数值, 本文认为这是由于计算方法不同造成的。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前后的虚拟变量Post均值为0.479, 接近0.5, 说明样本前后分布均匀。其他控制变量在经过Winsorize处理之后均在合理范围之内。

(二) 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的虚拟变量Post与可比性指标显著正相关, 且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越多, 可比性越高, 初步证明了假设1与假设3。是否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虚拟变量Treat与可比性的两个指标虽然正相关, 但不显著, 需要进一步做回归分析加以验证。

(三) 回归分析

1. 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与会计信息可比性。表4列示了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回归结果。在全样本组中, 时间虚拟变量Post对可比性两个指标的系数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 分别为0.000314和0.00166, 说明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后提高了审计质量, 抑制了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 进而提高了会计信息可比性。为了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本文进行了分样本检验, 剔除了同时在A股和H股上市的样本, 结果仍然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

2. 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对下一会计期间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表5报告了假设2的检验结果。在全样本组中, 是否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虚拟变量Treat与CompAcct10、CompAcctInd的系数分别为0.000330和

0.000924, 且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如果审计报告中披露了关键审计事项, 有利于提高信息含量, 降低公司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促使下一期间的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当剔除了A+H股, 结论依然成立。

3. 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对下一会计期间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假设3关键审计数量与下一期间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在全样本组中, 关键审计事项数量Num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两个指标间的系数分别是0.000125和0.000329, 且至少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越多, 越利于公司与外部的沟通, 帮助投资者更好地监督管理层行为, 从而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在剔除了A+H股后, 结论保持不变。

五、进一步研究

(一) 考虑事务所类型的影响

会计师事务所是审计实施的主体, 不同类型的事务所的审计资源、审计质量有较大差异, 尤其是在国际四大与非四大事务所之间差异明显。前文已述, 新审计报告准则的实施, 尤其是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能够显著提升被审计单位的会计信息可比性, 那么该作用在不同类型的会计师事务所中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一方面,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比非四大更强的专业胜任能力。通常情况下, 大规模的事务所拥有更加优质的资源, 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 尤其是四大的审计收费较高, 吸纳的优秀人才也较多, 审计经验更加丰富, 因此在进行审计工作时会使用更加专业的技术和程序(Craswell等, 1995)。而非四大相比来说各类资源有限, 专业胜任能力不及四大事务所。另一方面,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更高的审计独立性。国际四大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 并面临更高的声誉风险和诉讼风险, 如果四大事务所审计质量不高, 或者因为向被审计单位妥协而出具了错误的审计报告, 一旦被查出, 则会严重损害声誉, 影响到事务所正常经营。并且, 四大事务所的客户通常规模较大, 审计收费较高, 因此在同样的声誉受损程度下, 面临的经济损失会更加严重。

前文指出, 新审计报告准则下, 注册会计师会加强自身专业素质的提高, 引入相关

行业专家, 提高自身专业胜任能力和审计透明度, 从而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许静静等, 2019), 但是由于四大事务所一直以来的专业胜任能力和审计独立性都要高于非四大, 因此新准则的实施更有利于非四大事务所提高审计质量, 对可比性的影响会更加明显。本文对前文中的三个假设按照四大与非四大进行分样本检验, 结果如表7所示。不论是用CompAcct10还是CompAcctInd做可比性的衡量指标, 在非四大事务所的样本中三个假设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而在四大事务所的样本中三个假设均不再显著, 说明虽然非四大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不如四大, 但是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 尤其是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有利于其提升审计质量, 对可比性的提升作用也更加明显。

(二) 考虑产权性质的影响

政策实施的效果一方面会受到政策本身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与个体特征紧密相关。企业的产权性质关系到所处的监管环境以及管理层的行为。因此, 新审计报告准则的实施对可比性的影响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下可能会有所不同。一方面, 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而言, 国有企业面临的监管更加严格。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严格受到政府的监管, 尤其是在近几年反腐力度增强的状况下, 其面临的监管更加严苛。另外, 网络的发达也促使国有企业面临各类媒体的监督, 全方位的监管使得国企盈余操纵的成本增大、动机变小。而与之相对比, 非国有企业面临的监管会相对弱一点。另一方面, 对比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 由于经营目标不同, 信息操纵的动机也有所不同。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体现在响应国家政策、履行社会责任、维护企业形象(Eng、Mak, 2003), 而非国有企业则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 且高管利益往往与经营业绩挂钩, 这种不同使得二者在信息披露方面有着显著差异。国有企业代表着政府形象, 管理层犯错成本较高, 因此需要通过严于律己维护声誉。而非国有企业该方面的制约较少, 管理层尽可能以提高利润为发展目标。

在盈余操纵动机不同的情况下,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信息环境自然有所差异, 已有学者通过深交所发布的企业信息透明度评价报告发现, 国有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要高于非国有企业(张程睿, 2006)。在这种情

况下,新审计报告准则带来的外部监管的提升对非国有企业的边际效应更强,更能够抑制非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作用更加明显。本文继续按照是否是国有企业对前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分样本检验,研究结果如表8所示。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三个假设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国有企业样本中三个假设均不再显著,说明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尤其是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可比性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关键审计事项的强制性披露对非国有企业起到了明显的监督作用。

六、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上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通过如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 增加控制变量。会计信息可比性是指经会计系统加工后,相同事项生成的会计信息应当相似;不同事项生成的会计信息应当体现其差异(方红星等,2017),因此,归根结底与,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是公司间会计处理方法的差异。而影响会计处理方法选择的关键人物是企业的管理层。因此,本文加入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的变量Dual、董事会规模Bordsize,另外,独立董事对管理层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因此本文还加入了独立董事比例Independent。具体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三个假设均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

2. 更换可比性指标。前文计算可比性时取排在前十的可比性值的平均值CompAcct10和中位数CompAcctInd作度量指标,此处继续选择公司*i*相对于同行业其他公司的年度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平均值CompAcct*i*做稳健性检验,

具体结果如表10所示。不论是全样本还是剔除A+H股,三个假设全部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七、研究结论

本文将关键审计事项的作用延伸到会计信息质量方面,研究发现,新审计报告准则的实施能够显著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在具体探讨关键审计事项的作用后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能够为投资者带来增量信息,促进下一期间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并且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越多,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考虑到事务所是审计实施的主体,本文按照四大与非四大进行分样本检验,发现以上结论在非四大审计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说明新审计报告的实施能够提升非四大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进而提高被审计单位的会计信息可比性。最后,按照产权性质进行检验后发现,由于非国有企业的监管压力低于国有企业,而盈余动机高于国有企业,使得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在非国有企业中更能够发挥抑制盈余操纵的积极作用,对可比性的促进也更加明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资本市场背景下去产能的会计财务研究”(18AGL009);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区县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标准与实施路径研究”(20SKGH119)。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丽红,张呈,张龙平,牛艺琳.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盈余价值相关性.审计研究.2019(03)
2. 方红星,张勇,王平.法制环境、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会计研究.2017(07)
3. 韩冬梅,张继勋.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审计人员感知的审计责任.审计研究.2018(4)
4. 韩丽荣,刘丁睿.关键审计事项是否向股票市场传递了投资风险信号.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01)
5. 刘斌,黄坤,酒莉莉.独立董事连锁能够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吗?.会计研究.2019(04)
6. 李延喜,赛赛,孙文章.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是否提高了盈余质量?.中国软科学.2019(03)
7. 王艳艳,许锐,王成龙,于李胜.关键审计事项段能够提高审计报告的沟通价值吗?.会计研究.2018(06)
8. 许静静,朱松,周萍.A股关键审计事项全面披露特征及政策效果研究——基于2018年首次全面披露的分析.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06)
9. 杨金凤,陆建桥,王文慧.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的整合效果研究——以会计信息可比性为视角.会计研究.2017(06)
10. 张继勋,韩冬梅.标准审计报告改进与投资者感知的相关性、有用性及投资决策.审计研究.2014(3)
11. Cascino S, J. Gassen. 2015. "What Drives the Comparability Effect of Mandatory IFRS Adoption".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1):242-282.
12. Chen C.W., D.W. Collins, T. Kravet and R.D. Mergenthaler. 2015. "Financial Statement Comparability and the Efficiency of Acquisition Decisions".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Iowa and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行业多元化、地域多元化对企业外部审计的影响

■ 李敏

摘要 多元化经营已成为企业改善业绩的对外战略首选。本文选择2011-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行业多元化、地域多元化对企业外部审计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多元化经营与企业外部审计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发现,企业的行业多元化和地域多元化对外部审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行业多元化会显著提高外部审计费用,同时会降低审计质量。地域多元化会显著降低外部审计费用,但对企业审计质量不存在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表现出积极作用,随着内部控制质量提升,行业多元化对审计费用、审计质量的正负影响均得到减弱,地域多元化对审计费用的负影响则得到加强。

关键词 行业多元化 地域多元化 外部审计 内部控制质量

一、引言

近几年我国产业加快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两个局面,一方面是传统行业的企业经营压力不断上升,利润不断下降,企业遭受经营危机,另一方面是新兴行业的企业不断崛起,加速发展。与此同时,两类企业纷纷踏入多元化发展进程,传统行业的企业希望通过跨行业投资来弥补主营业务的业绩不佳,而新兴行业的企业希望通过收购业务相关企业“打通”上下游产业链,降低企业营运成本。这也使得多元化经营成为企业改善业绩的战略首选,多元化经营也成为了学术研究热点。现有学者关于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多元化与企业绩效、财务风险、融资决策、资本成本的关系(林钟高等,2015;王雁南等,2019;张耕等,2020),而对多元化是否影响企业外部审计的研究相对较少。理论上,多元化经营属于企业的内部战略决策,其多元化程度和多元化绩效不受外部审计的影响,同样作为外部审计机构,其对上市公司的审计结果应是独立的,因此企业多元化战略与外部审计不相关。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龚光明等,2014;廖义刚等,2014;陈天志等,2020)提出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既可能是为了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战略调整,也可能是企业管理层为了控制公司资源、利益输送和获取私人利益

的关联交易行为。管理层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与外部投资者、利益相关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这可能导致代理关系的加剧和管理层借助多元化战略实施盈余管理。Trueman&Titman(1988)的研究表明,企业管理者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程度与公司信息不对称正相关。尽管审计机构有责任去挖掘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还原真实的企业盈余信息,但多元化经营的复杂性仍会导致审计师“有心无力”,进而影响审计质量。此外,企业多元化经营也对审计师的专业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企业业务量的变化将影响审计工作量,因此多元化经营也将影响企业的审计费用。这些表明企业的多元化策略与外部审计存在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基于此,本文将企业多元化经营分为行业多元化和地域多元化,分析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外部审计费用、审计质量的影响。

大股东缓解管理层因多元化经营战略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加剧有两种措施,一是可以聘请具有更高审计专业能力的会计师事务所,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具有“大所”的经验优势和审计师优势,能有效判断企业多元化经营中涉及的各行业业务,由此获得高质量的审计报告;二是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如果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原因是管理层的私人动机,那么缓解这种动机最有效的

表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衡量
被解释变量	审计费用	AutFee	审计费用对数
	审计质量	AutQ	盈余管理水平
解释变量	多元化程度	DT	熵指数
		count	跨行业(跨地域)数量
调节变量	内部控制质量	IQ	净资产收益率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总资产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管理者激励	ei	采用高管持股比例衡量
	股权集中度	oc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
	会计师事务所类型	big8	“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取1, 否则取0

表2 统计性描述

变量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	1%分位数	99%分位数
AutFee	10654	13.721	0.661	12.542	15.918
AutQ	10573	0.059	0.057	0.001	0.313
行业DT	10408	0.358	0.424	0.000	1.606
行业count	10408	2.287	1.601	1.000	8.000
地域DT	10681	0.841	0.544	0.000	1.971
地域count	10681	4.435	2.475	1.000	11.000
IQ	10846	0.068	0.104	-0.441	0.343
asset	10857	22.135	1.165	20.021	25.628
lev	10857	0.397	0.193	0.048	0.836
ei	10857	0.069	0.135	0.000	0.607
oc	10857	0.519	0.146	0.197	0.851
big8	10857	0.452	0.498	0.000	1.000

表3 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外部审计的影响

因变量	Autfee		AutQ	
	(1)	(2)	(3)	(4)
行业DT	0.075***		0.006**	
	(0.012)		(0.003)	
地域DT		-0.025***		-0.001
		(0.009)		(0.002)
size	0.511***	0.520***	-0.003*	-0.002*
	(0.005)	(0.005)	(0.001)	(0.001)
lev	0.033	0.028	0.043***	0.040***
	(0.027)	(0.027)	(0.006)	(0.006)
ei	-0.338***	-0.339***	0.013	0.017*
	(0.037)	(0.037)	(0.009)	(0.009)
oc	0.006	0.004	-0.001	0.001
	(0.018)	(0.018)	(0.004)	(0.004)
big8	0.029***	0.025***	-0.005**	-0.005**
	(0.009)	(0.009)	(0.002)	(0.002)
常数项	2.371***	2.224***	0.097***	0.095***
	(0.118)	(0.117)	(0.028)	(0.027)
估计方法	FE	FE	FE	FE
N	10229	10481	10163	10403

注: *表示 p<0.10,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下同。

办法就是改进管理者的权责范围、加强内部控制, 如实施股权激励措施、改善考核制度等。考虑到本文研究对象是多元化经营与企业外部审计的关系, 因此如果采用会计师事务所类型作为调节变量, 模型会产生内生性问题。此外, 尽管多元化经营可能影响外部审计行为与结果, 但理论上企业聘请哪种类型的会计师事务所与多元化程度无关, 因此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不相关也会扭曲调节模型的适用性。基于此, 本文以企业内部控制变量作为调节变量, 探索内部控制变量对企业多元化程度与外部审计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是企业为了更多地占领市场和开拓新兴产业, 或者规避单一业务风险而发起创立新业务或对外投资收购其他公司的一种战略投资行为。相对于专业化经营, 多元化经营增加了企业整体业务复杂性和盈利不确定性, 也将加剧审计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影响审计师的审计行为。本文将多元化分为行业多元化和地域多元化。行业多元化经营从三个方面影响外部审计费用。首先, 多元化加剧了外部投资者与管理层信息不对称。企业业务范围扩大加剧了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经营信息的了解程度, 特别是企业的内部隐蔽交易行为 (Dunn&Nathan, 1998), 在这种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审计风险加大, 如一些应审而漏审事项可能增多, 会计师事务所所有更高的溢价风险补偿。其次, 多元化经营带来的业务复杂性会增加审计的工作量 (王化成等, 2012), 审计师不得不跨行业和跨地域对企业涉及的各个部门进行审计, 消耗的时间、人力和物力增多, 出现审计误差的可能性也增高, 因此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最后, 多元化经营会导致企业财务风险上升。多元化经营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资金, 同时也会产生更高的管理成本, 企业短期财务风险加剧, 而企业财务风险与审计风险正相关 (张梅和韩身智, 2013), 这也使得会计师事务所需要更高的审计风险补偿。陈天志等 (2020)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检验发现, 审计费用随着多元化程度提升而显著增加。多元化经营也会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影响企业审计质量。主观方面, 如果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来自于高管牟取私利动机, 那么多

表4 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效应

因变量	Autfee		AutQ	
	(1)	(2)	(3)	(4)
行业DT	0.092***		0.010***	
	(0.012)		(0.003)	
行业DT×IQ	-0.477***		-0.100***	
	(0.045)		(0.011)	
地域DT		-0.006**		-0.000
		(0.003)		(0.002)
地域DT×IQ		-0.384***		-0.015**
		(0.029)		(0.007)
size	0.517***	0.523***	-0.002	-0.002
	(0.005)	(0.005)	(0.001)	(0.001)
lev	-0.038	-0.059**	0.031***	0.036***
	(0.027)	(0.027)	(0.006)	(0.006)
ei	-0.318***	-0.316***	0.016*	0.019**
	(0.037)	(0.037)	(0.009)	(0.009)
oc	0.002	0.000	-0.002	0.001
	(0.018)	(0.018)	(0.004)	(0.004)
big8	0.033***	0.030***	-0.004*	-0.004**
	(0.009)	(0.009)	(0.002)	(0.002)
常数项	2.277***	2.192***	0.081***	0.090***
	(0.117)	(0.116)	(0.028)	(0.027)
估计方法	FE	FE	FE	FE
N	10219	10471	10153	10393

元化投资和经营中的隐蔽性更强，管理者更有可能借助多元化业务的隐蔽性实施盈余管理。而审计师很难发现这些跨行业跨地域的盈余操纵行为，导致审计报告质量下降。此外，为了让外部投资者信任企业的多元化业务转型成果，企业管理者在外部审计时更倾向于选择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以便于审计意见收买，使企业表面上有靓丽的审计报告，而真实的盈余信息偏离了审计报告。客观方面，多元化经营通常涉及多个行业、多个子公司，业务复杂度上升，但审计师的专业能力有限，对一些跨行业的业务不熟悉，导致审计过程中出现错审、漏审的概率增加，也将降低审计质量。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行业多元化程度对企业外部审计费用有正影响；

H1b：行业多元化程度对企业外部审计质

量有负影响。

企业的另一种多元化是地域多元化，即企业的市场扩张，企业销售收入来自于多个地区。行业多元化引起的信息不对称主要来自投资者和审计师无法甄别不同行业的经营特征、盈利模式和行业周期差异，这使得依据传统的审计程序进行审计会忽略一些财务信息，无法体现真实的盈余结果。而地域多元化引起的信息不对称主要来自地区间的政策差异、市场价格差距、汇率波动等，这些差异经过严格审计能消除一部分信息遗漏，如国内外的汇率因素、地区毛利率的价格因素等。因此总体上地域多元化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有可能表现为负影响，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企业将经营从一个市场扩充到多个地区，有利于止损。现阶段企业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并且产业集聚效应也非常明显，这就使得一家企业如果只在一个地区经营，长时间肯定有较强的竞争对手，因此企业扩张到其他市场，不仅是开辟了新市场，同时也能降低企业的运营风险，企业风险降低能减轻审计师的风险溢价。其次，企业将经营从单一市场向多地区市场发展，给市场投资者和审计师传递了积极的扩张信号，反而降低了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Gonzalo&Stefan（2010）对众多文献分析后指出，企业地域多元化发展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等所带来的风险。刘翠英等（2016）实证也得出地域多元化程度与审计风险显著负相关，带来更低的审计风险溢价。地域多元化也可能提高了企业审计质量。应计抵销假说认为外部投资者对企业各部门所做的预测都会有误差，这些误差往往不是正相关的，这也使得相比于专业化运营的企业，对多地域运营的企业其绝对对误差的预测可能更小（Thomas，2002），即审计师能提高对企业经营状况的掌握程度，由此而提高审计质量。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地域多元化会增加管理层盈余管理的难度。Wulf（2009）指出不同管理者都有扭曲企业财务信息来寻租的动机，但是地域多元化经营给单个管理者进行向上或向下的盈余操纵行为增加了难度，反而会使其放弃盈余管理。龚光明等（2014）的研究表明地区多元化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呈正相关。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地域多元化程度对企业外部审计费用有负影响；

表5 多元化数量对企业外部审计的影响

因变量	Autfee		AutQ	
	(1)	(2)	(3)	(4)
行业count	0.016*** (0.003)		0.001* (0.001)	
行业count×IQ	-0.110*** (0.009)		-0.017*** (0.002)	
地域count		-0.005** (0.002)		-0.001 (0.002)
地域count×IQ		-0.074*** (0.006)		-0.002* (0.001)
size	0.520*** (0.005)	0.520*** (0.005)	-0.001 (0.001)	-0.002 (0.001)
lev	-0.052* (0.028)	-0.069** (0.027)	0.032*** (0.007)	0.037*** (0.007)
ei	-0.321*** (0.037)	-0.310*** (0.037)	0.016* (0.009)	0.017** (0.009)
oc	0.001 (0.018)	0.000 (0.018)	-0.002 (0.004)	0.001 (0.004)
big8	0.034*** (0.009)	0.032*** (0.009)	-0.004* (0.002)	-0.005** (0.002)
常数项	2.202*** (0.116)	2.272*** (0.118)	0.076*** (0.027)	0.077*** (0.028)
估计方法	FE	FE	FE	FE
N	10219	10471	10153	10393

H2b: 地域多元化程度对企业外部审计质量有正影响。

对于实施多元化经营的企业, 高效的内部控制至关重要。从企业内部来看, 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可以约束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 规范企业的经营, 降低违约风险和息不对称, 提升企业财务报告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同时, 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能更好地控制企业财务风险, 减少企业在多元化发展中出现资金断链、管理紊乱现象的概率, 促进多元化业务能更加公开、顺利地运营。而从审计师角度, 内部控制质量更高的企业降低了审计过程中面临的风险, 能增加审计师的信任程度, 进而减少审计程序步骤, 这样能降低审计费用, 另一方面企业合理的内部控制也能提升审计效率, 使审计师能专注于对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专门审计, 能提高审计质量。刘栗(2016)对内部控制是否会影响企业多元化与审计意见的关系展开了检验, 得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多元

化经营对审计意见的负面效应。基于此, 提出如下假设:

H3a: 内部控制质量对行业多元化与审计费用(审计质量)的正(负)相关存在逆向调节效应;

H3b: 内部控制质量对地域多元化与审计费用(审计质量)的负(正)相关存在同向调节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11-2019年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进行分析, 进一步筛选: (1) 剔除*ST类企业; (2) 剔除存续时间少于7年的企业; (3) 剔除主要变量缺失的企业。最终得到1216家制造业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企业多元化指标计算原始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 其余指标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二) 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

为检验上面假设, 建立以多元化为解释变量、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Autfee_{it} = \alpha \times diver_{it} + \sum_j \delta_j \times 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AutQ_{it} = \alpha \times diver_{it} + \sum_j \delta_j \times 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方程(1)和(2)中, $Autfee_{it}$ 是第*i*个企业第*t*年的审计费用, $AutQ_{it}$ 是第*i*个企业第*t*年的审计质量, $diver_{it}$ 是企业多元化指标, 包括行业多元化和地域多元化两个维度, $control_{it}$ 为控制变量。

为判断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效应, 在方程(1)、(2)基础上引入多元化与内部控制的乘积交叉项:

$$Autfee_{it} = \alpha \times diver_{it} + \beta \times (diver \times IQ)_{it} + \sum_j \delta_j \times 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AutQ_{it} = \alpha \times diver_{it} + \beta \times (diver \times IQ)_{it} + \sum_j \delta_j \times 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IQ是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diver \times IQ$ 是多元化程度与内部控制质量的乘积交叉项, 用于观测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效应。对上述模型, 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进行估计, 同时为避免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 利用面板数据系统广义矩方法(SYS-GMM)进行稳

表6 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外部审计影响的SYS-GMM估计

因变量	Autfee		AutQ	
	(1)	(2)	(3)	(4)
行业DT	0.220** (0.016)		0.024*** (0.000)	
行业DT×IQ	-1.328*** (0.000)		-0.071* (0.070)	
地域DT		-0.511*** (0.000)		-0.020 (0.152)
地域DT×IQ		-0.995*** (0.000)		-0.120*** (0.000)
size	0.683*** (0.000)	0.579*** (0.000)	-0.012*** (0.000)	-0.001 (0.824)
lev	0.161 (0.525)	-0.175 (0.168)	0.055** (0.023)	0.058* (0.053)
ei	2.164*** (0.000)	0.600* (0.083)	-0.015 (0.488)	0.009 (0.707)
oc	-0.156 (0.536)	-0.046 (0.857)	0.132*** (0.002)	0.010 (0.701)
big8	0.021 (0.691)	0.024 (0.648)	-0.011*** (0.009)	-0.042*** (0.000)
常数项	-1.602** (0.012)	1.425** (0.025)	0.239*** (0.000)	0.040 (0.563)
AR(1)-p	0.000	0.000	0.000	0.000
AR(1)-p	0.537	0.254	0.765	0.895
Sargan-p	1.000	1.000	0.999	0.999
N	10219	10471	10153	10393

健性检验。

(三) 变量选取

1. 多元化diver。行业多元化和地域多元化分别以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的三位码行业、以企业的分省和分国家经营作为地域划分标准，通过企业分行业和分地域的营业收入数据计算多元化程度。目前衡量业务多元化指标中，包括Herfindahl指数、熵指数、跨行业数量等，为使结果更加稳健，本文同时用熵指数和跨行业（跨地域）数量两个指标。熵指数计算公式为：

$$DT_{it} = \sum_{j=1}^n p_{jt} \ln(1/p_{jt}) \quad (5)$$

p_jt是第j项行业（地区）业务收入占整体收入的比例。熵指数取值越大，企业多元化程度越高。

2. 审计费用。直接采用企业每年审计费用自然对数表示。

3. 审计质量。学术上对于企业审计质量

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四类，一是审计师专业能力，二是会计师事务所类型，三是审计意见，四是可操控盈余水平。考虑到审计师专业能力较难衡量、会计师事务所类型衡量并不准确、审计意见是审计结果而非审计质量的代理，因此本文采用盈余管理水平刻度企业审计质量，具体借鉴宋常等（2019）采用修正后的Jones模型计算，变量值越大，审计质量越低。

4. 内部控制质量。目前学术上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主要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衡量，该指数能反映企业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水平。但是通过初步测算，本文发现该指数与企业多元化存在高度正相关，使得在引入二者交叉项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该指数也存在较多的缺失值和跳跃值，影响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定性。鉴于此，本文选择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表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企业盈利水平越高，往往意味着企业有良好的管控制度，相反一家业绩很差的企业，也说明内控是失效的，因此采用净资产收益率衡量内部控制质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5. 控制变量。选取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管理者激励、股权集中度、会计师事务所类型五个变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给出了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到样本企业的平均年审计费用对数值为13.721，大约是91万元，其中1%分位数为12.542（28万元），99%分位数为15.918（818.5万元）。盈余管理水平变量均值为5.9%，其中1%分位数为0.1%，99%分位数为31.3%。多元化经营指标中行业DT为0.358，行业数量为2.287，说明平均每家企业有2-3个行业收入，其中最多的企业涉及8个行业的业务；地域DT为0.841，地域数量为4.435，说明平均每家企业有4-5个地区收入，其中最多的企业涉及11个地区的业务。衡量企业内控质量的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为6.8%，其中1%分位数为-0.441，99%分位数为0.343，表明企业的内控质量存在较大差距。企业平均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为22.135，平均资产负债率为39.7%，平均高管持股比例为6.9%，平均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为51.9%，选择“八大”会计师事

表7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估计结果

组别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Autfee		AutQ		Autfee		AutQ	
因变量	(1)	(2)	(3)	(4)	(5)	(6)	(7)	(8)
行业DT	0.176*** (0.022)		0.009* (0.005)		0.068*** (0.014)		0.011*** (0.003)	
行业DT×IQ	-0.347*** (0.074)		-0.023 (0.017)		-0.583*** (0.056)		-0.158*** (0.014)	
地区DT		-0.033* (0.017)		-0.002 (0.004)		-0.013** (0.051)		-0.000 (0.003)
地区DT×IQ		-0.291*** (0.057)		-0.076*** (0.013)		-0.403*** (0.034)		-0.044*** (0.008)
size	0.472*** (0.010)	0.481*** (0.010)	-0.001 (0.002)	-0.001 (0.002)	0.523*** (0.007)	0.525*** (0.007)	-0.003** (0.002)	-0.004*** (0.002)
lev	-0.286*** (0.050)	-0.269*** (0.050)	0.014 (0.012)	0.019* (0.011)	0.043 (0.033)	0.003 (0.033)	0.041*** (0.008)	0.045*** (0.008)
ei	-1.094** (0.462)	-1.122** (0.442)	-0.151 (0.107)	-0.137 (0.101)	-0.299*** (0.038)	-0.289*** (0.038)	0.017* (0.009)	0.018** (0.009)
oc	0.005 (0.030)	0.013 (0.030)	0.002 (0.007)	0.003 (0.007)	0.001 (0.021)	-0.007 (0.022)	-0.003 (0.005)	-0.000 (0.005)
big8	0.054*** (0.014)	0.056*** (0.014)	-0.003 (0.003)	-0.003 (0.003)	0.021* (0.012)	0.016 (0.012)	-0.005 (0.003)	-0.005* (0.003)
常数项	3.253*** (0.218)	3.090*** (0.217)	0.071 (0.050)	0.072 (0.049)	2.170*** (0.143)	2.196*** (0.142)	0.119*** (0.035)	0.146*** (0.034)
估计方法	FE	FE	FE	FE	FE	FE	FE	FE
N	3228	3335	3220	3325	6991	7136	6933	7068

务所的比例为45.2%。

(二) 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外部审计的影响

表3显示了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其中前两列因变量为企业审计费用，后两列因变量为企业审计质量。列(1)中行业DT变量系数显著大于0，说明行业多元化程度与企业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列(2)中地域DT变量系数显著小于0，说明地域多元化程度与企业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类型系数显著大于0，高管持股比例系数显著小于0，说明规模越大、聘请“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和高管持股比例越低的企业审计费用越高。后两列显示，行业DT变量系数显著大于0，说明行业多元化程度与企业审计质量负相关。列(4)中地域DT变量系数显著小于0且不显著，说明地域多元化程度与企业审计质量不相关。此外，资产负债率、高管持股比例系数大于0，

企业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类型系数小于0，表明资产负债率越低、高管持股比例越低、企业规模越大、聘请“八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审计质量越高。

表3结果支持了假设H1a和H1b，支持假设H2a，但假设H2b未得以验证。对此，本文认为尽管地域多元化增加了管理层盈余管理的难度，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不能排除个别集团高管与某个子公司的“合谋”行为而加剧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这会使得审计师的估计出现偏差，因此在正负两方面机制的影响下地域多元化对审计质量影响不显著。

(三) 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效应

在表3的基础上引入多元化程度与企业内控质量的交叉项，表4列(1)显示行业多元化程度变量仍显著大于0，而交叉项行业DT×IQ系数显著小于0，说明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行业多元化与审计费用的正相关存在逆向调节作用，更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将弱化行业多元化程度对企业审计费用的正影响程度。列(2)显示地域多元化程度变量仍显著小于0，同时交叉项地域DT×IQ系数小于0，说明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地域多元化与审计费用的负相关存在同向调节作用，更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将加强地域行业多元化程度对企业审计费用的负影响。

表4列(3)显示行业多元化程度变量仍显著大于0，交叉项行业DT×IQ系数也显著小于0，说明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行业多元化与审计质量的负相关存在逆向调节作用，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行业多元化程度对企业审计质量的负影响越小。列(4)显示地域多元化程度变量负向但不显著，交叉项地域DT×IQ系数小于0，总体表明更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高企业审计质量。表4结果支持了假设H3。

(四)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结果是否可靠，进一步从三个角度展开稳健性分析：一是多元化程度指标采用行业数量和地域数量代替，二是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消除内生性问题，三是区分了国有和民营企业。表5显示从主要变量来看，各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与表4一致，说明多元化指标采用熵指数和直接采用数量指标时，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与外部审计的关系具有相同的结果。

表6显示AR(1)、AR(2)以及Sargan的概率

p值都通过了检验,说明SYS-GMM估计时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从多元化程度及交叉项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看,仍然与表4结果相同,说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关于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与外部审计的关系结论是一致的。

表7显示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估计结果,可见除了国有企业样本下行业DT×IQ不显著以外,其余主要解释变量的符号与显著性与前表相同,说明上面得到的多元化经营、内部控制与企业外部审计三者关系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均成立。此外,比较国企和民企,国有企业的行业(地区)多元化对审计费用的正(负)影响程度大于民营企业,而行业多元化对审计质量的负影响程度小于民营企业,说明国企多元化程度更不利于外部审计质量,也会导致审计费用增长越高。

结合表5-7结果,行业多元化、地域多元化对企业外部审计的影响结论具有一致性,说明表3和表4所得到的结论稳健。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择2011-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分析了行业多元化、地域多元化对企业外部审计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多元化经营与企业外部审计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发现,企业的行业多元化和地域多元化对外部审计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行业多元化程度会显著提高企业外部审计费用,同时会降低企业审计质量,地域多元化程度会显著降低企业外部审计费用,但对企业审计质量不存在显著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表现出积极作用,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会降低行业多元化对审计费用的正影响,同时会减弱行业多元化对审计质量的负影响,会强化地域多元化对审计费用的负影

响,同时随着内部控制质量达到一定水平后,也会驱动地域多元化对审计质量产生正效应。

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 在多元化经营中更加注重地域多元化策略。通过分析发现行业多元化不利于企业审计质量,也将增加审计成本,相反地域多元化有利于企业外部审计。因此企业在多元化经营中应该更多考虑地域多元化,总体上地域多元化不涉及新的行业领域,企业仅在新地区开辟市场,能提高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市场竞争能力,相反行业多元化会产生更多的投资额、管理难度更大,容易产生企业系统性风险。因此对于财务能力一般的企业,在多元化策略中应尽量选择地域多元化而避免行业多元化。

2. 加强内部控制,完善管理层的激励制度。分析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提高能降低行业多元化程度的负面效应,同时强化地域多元化程度的正面效应,说明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质量能减轻企业与审计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提高企业审计质量。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管理层的管控制度,约束管理层的私人利益行为,改进管理层的激励制度,使高管与大股东、企业价值利益一致,这样能使管理层在制定和执行决策时以企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减少损害企业价值的行为。

基金课题: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高质量发展下的中小民营企业投资效率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0SJA2383);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院级科研项目:会计信息、审计质量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研究(项目批准号:XK205XS18003)

作者单位: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雁南,李自杰,张般若.区域多元化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经济问题.2019(5)
2. 张耕,高鹏翔.行业多元化、国际多元化与公司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数据的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20(1)
3. 林钟高,郑军,继桂.环境不确定性、多元化经营与资本成本.会计研究.2015(2)
4. 龚光明,黄诗音.多元化经营、媒介功用与会计信息质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审计与经济研究.2014(4)
5. 陈天志,周虹.多元化经营战略与审计费用.财会月刊.2020(6)
6. Trueman B., Titman S. An explanation for accounting income smooth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8, 26(3): 127-139.
7. Dunn K., Nathan S. The effect of industry diversification on consensus and individual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Z].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Atlanta GA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1998.
8. 张梅,韩身智.财务风险、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与低价揽客——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经济问题.2013(7)
9. 刘翠英,解媛,孔维伟.地域多元化、审计风险与审计风险溢价实证研究.财会通讯.2016(12)
10. 刘栗.多元化经营、内部控制与审计意见——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西南财经大学.2016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

——基于公司治理角度的分析

■ 杨姗姗

摘要 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检验,具体从董事会特征(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和两职兼任)和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和机构投资者持股)两个方面展开研究。理论分析结合实证检验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董事会规模越大、独立性越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这种积极影响越大;管理层持股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提高;两职兼任和股权集中度则对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 CSR 财务绩效 公司治理 调节作用

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话题越来越受到学者和实践者的关注。传统观点认为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则是政府的主要责任。随着社会的发展,除了财务绩效之外,公司治理及其对CSR和企业绩效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

Cornett等(2008)发现由独立董事主导的董事会更有能力限制CEO从事破坏公司价值的投资。Jo和Harjoto(2011)发现外部和内部的公司治理都刺激了CSR的参与,而CSR的参与提高了企业的价值。然而一些管理者可能出于个人原因,会有满足自身利益的冲动,从而投资于CSR活动。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我们可以认为一个好的公司治理框架可以防止管理层将宝贵的资源投入到不盈利的CSR活动中。然而,如果开展CSR活动的公司具有较差的公司治理,CSR的可信度可能会降低。实际上,正如Davidson等(2005)发现的那样,身兼公司CEO和董事长两职的人更有可能操纵公司的利润。

上述证据表明,公司治理可能在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然而,只有少数研究考察了这一问题(Bai和Chang, 2015),却未能涵盖公司治理的不同

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旨在整合更广泛的公司治理机制,包括董事会结构和所有权结构,探究公司治理是否能够影响CSR与财务绩效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

(一) CSR和财务绩效

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认为CSR对企业绩效有负面影响。该理论认为CSR的参与是对企业资源的浪费,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是为股东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企业必须考虑所有影响或被企业影响的各种群体的利益,通过调整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公司可以间接提高经营绩效,从而为股东带来更多的财富(Reverte, 2012; 李明和管威, 2017)。因此,CSR被认为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如果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待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这两种理论可能是一致的。事实上,一个想要增加利润的公司需要为客户提供卓越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它还需要为员工提供满意的工作条件和良好的薪酬,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生产力。此外,一个公司如果从事不道德的行为,将会损害其在社会上的声誉,不利于生产经营。客户、员工和社区都是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公司需要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

表1 变量定义表

被解释变量	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解释变量	财务绩效	ROA	税后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
	企业社会责任	CSR	国泰安公司所推出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数据库”衡量
	董事会规模	BSize	董事会人数
	董事会独立性	BDepend	独立董事人数除以董事会人数
	两职兼任	Both	若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则等于1, 否则为0
	股权集中度	EConcent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管理层持股	MEqu	管理层持股比例
控制变量	机构投资者持股	IEqu	公共养老金基金持股比例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自然对数
	研发强度	RD	研发投入与主营业务收入比值
	杠杆水平	Lever	资产负债率
	行业	Indu	虚拟变量
年度	Year	虚拟变量	

表2 CSR与公司财务绩效的关系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8)
CSR	0.384*** (3.440)	0.291*** (2.970)	0.362*** (2.860)	0.322*** (2.540)	0.369*** (2.730)	0.231*** (3.110)	0.349*** (2.850)	0.320*** (2.910)
董事会规模		0.124* (1.910)						0.023 (1.030)
董事会独立性			1.672** (2.100)					0.199*** (2.953)
两职兼任				0.024 (0.070)				0.102 (1.070)
股权集中度					-0.254 (-1.040)			-0.025 (-0.180)
管理层持股						-1.423** (-2.340)		-1.304** (-2.270)
机构投资者持							0.913*** (3.520)	0.112** (2.080)
规模	0.709** (2.350)	0.340*** (3.010)	0.039*** (2.880)	0.107*** (3.120)	0.213** (2.340)	0.100 (0.970)	0.107*** (3.124)	0.003*** (2.980)
杠杆	-2.275*** (-3.690)	-2.321*** (-3.570)	-2.401*** (-3.750)	-2.224*** (-2.960)	-2.604*** (-3.530)	-2.712*** (-3.000)	-2.402*** (-3.310)	-2.019** (-2.157)
截距	0.882*** (2.870)	0.325*** (2.960)	0.209** (2.140)	1.512*** (2.530)	1.462** (2.070)	0.999*** (2.930)	0.227*** (2.630)	0.208*** (2.610)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R ²	0.395	0.397	0.413	0.392	0.394	0.328	0.336	0.425
F值	70.252***	69.356***	63.297***	68.449***	60.123***	64.219***	57.360***	69.298***
N	13465	13465	13465	13465	13465	13465	13465	13465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系，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最终目标。综上所述，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H1: CSR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积极的。

(二) CSR、公司治理和财务绩效

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长与CEO兼任是研究人员研究董事会最常用的维度(Mallin等, 2013)。股权结构包括三个维度，即大股东的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管理层持股。拥有绝对优势股权比例的

所有者被认为拥有更有效的监督管理，并在执行公司战略时影响经营管理。在大多数国家，机构投资者拥有较多的公司股权，它们是影响CSR和公司治理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管理层持股被认为能够减少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当管理层成为公司所有者时，他们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

1. 董事会规模。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董事会监督管理层，以防止他们从事可能有利于自身而非股东利益的行为。但是，规模过大的董事会可能会导致协调和沟通问题，从而允许以短期利润为导向的管理者控制并减少企业对CSR活动的投资(Walls和Hoffman, 2013)。但是，从资源依赖的角度来看，更大的董事会规模将有利于企业开展CSR活动。原因在于，更多的董事会成员意味着更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学历背景，董事会成员通过提供资源、经验和专业知识而使公司受益，对于有利于公司发展和股东长期利益的CSR活动，董事会成员能够给予支持(Brown等, 2006)。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 董事会规模越大，CSR对财务绩效积极影响越大。

2. 董事会独立性。董事会独立性是指董事会中非执行董事或外部董事的数量，这个数字越高，董事会就越被认为是独立的。委托代理理论提倡使用独立董事缓解代理问题，因为他们有能力更好地监督管理层行为。与内部董事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不同，独立董事可以确保公司高管的行为符合公司利益。利益相关者理论还建议建立一个独立的董事会，因为这些独立董事将代表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而提高经营绩效。而且，许多研究人员发现董事会独立性与CSR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Hong等, 2016)。基于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提出以下假设：

H3: 董事会独立性越高，CSR对财务绩效积极影响越大。

3. 两职兼任。关于董事长和总理由一人兼任是否合理，形成了完全相反的观点。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能够提高决策效率，减少信息沟通成本。兼任者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十分了解，能够降低董事会成员对管理层行为的非专业性干预。但是两职兼任可能意味着委托代理成本的增加，管理层更有能力为了私人因素而损害股东利益。经验证据

表3 CSR、公司治理与财务绩效

变量	(1)	(2)	(3)	(4)	(5)	(6)	(7)
CSR	0.039** (2.040)	0.036** (2.020)	0.037*** (2.910)	0.071*** (2.610)	0.060*** (2.670)	0.054** (2.010)	0.045** (2.030)
董事会规模	0.095 (1.020)	0.016 (1.030)	0.028 (0.920)	0.066 (1.120)	0.038 (0.953)	0.002 (0.210)	0.324 (1.140)
董事会独立性	0.284*** (3.010)	0.293*** (3.110)	0.207*** (2.960)	0.174*** (3.040)	0.167** (3.070)	0.269*** (2.180)	0.261*** (2.990)
两职兼任	1.024 (0.990)	1.019 (1.030)	0.968 (1.320)	0.934 (1.070)	0.949 (1.470)	0.962 (0.870)	0.721 (0.930)
股权集中度	0.216 (0.880)	0.231 (1.47)	0.329 (1.196)	0.401 (1.500)	0.228 (1.327)	0.371 (1.574)	0.490 (1.667)
管理层持股	-1.213*** (-3.040)	-1.182*** (-2.760)	-1.014*** (-3.010)	-1.039*** (-3.210)	-0.402** (-2.960)	-0.482** (-2.300)	-0.405** (-2.010)
机构投资者持股	0.102*** (3.090)	1.119*** (2.970)	1.149** (2.380)	1.092** (2.000)	1.241** (2.220)	1.082*** (2.692)	1.132** (2.357)
CSR×公司治理变量							
董事会规模	0.327*** (2.740)						0.254*** (2.770)
董事会独立性		0.143** (2.150)					0.109** (2.320)
两职兼任			0.107 (0.968)				0.141 (0.110)
股权集中度				-0.029 (-1.530)			-0.020 (-1.110)
管理层持股					-0.002*** (-3.090)		-1.006*** (-3.141)
机构投资者持股						0.126** (2.120)	0.147*** (3.140)
规模	0.012** (2.340)	0.015** (2.090)	0.013*** (3.020)	0.010*** (2.990)	0.010*** (2.830)	0.009*** (2.940)	0.012** (2.070)
杠杆	-0.103 (-0.930)	-0.095 (-0.660)	-0.105* (-1.829)	-0.099 (-1.320)	-0.092 (-1.620)	-0.093 (-1.174)	-0.016 (-1.000)
截距	-0.009*** (-3.010)	-0.010** (-2.070)	-0.011** (-2.270)	-0.018*** (-2.960)	-0.012** (-2.307)	-0.013*** (-3.110)	-0.019*** (-2.480)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R ²	0.396	0.329	0.358	0.410	0.407	0.402	0.0.431
F值	36.229***	33.190***	32.672***	31.654***	35.228***	32.094***	38.276***
N	13465	13465	13465	13465	13465	13465	13465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较为一致表明两职兼任并不会对CSR产生显著影响。蒋尧明和郑莹（2014）对2012年沪市上市公司的CSR评级进行研究，发现两职是否兼任与公司CSR评级并无显著相关性。买生和杨一苏（2017）基于我国2009-2015年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董事长与CEO的兼任并不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影响。综合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4：两职兼任与否对CSR和财务绩效的关系并无显著影响。

4. 股权集中度。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动机，大股东的存在意味着投资者对公司管理决策具有更强的监控

力度。因此，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看，大股东将支持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活动投资，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投资对企业的长期价值有积极的影响。实证研究倾向于认为，大股东不赞成公司积极主动履行CSR，而倾向于只承担CSR所要求的最低标准（Rees和Rodionova, 2015）。但是，无论是支持CSR还是不支持CSR的股东都将监督管理层，并确保管理者至少不会从事负面或破坏企业形象的活动（Mallin等, 2013）。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如下：

H5：股权集中度越高，CSR对财务绩效积极影响越大。

5. 管理层持股。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当控制权和经营权分离时，就会产生利益冲突，因为管理者可能会以牺牲公司所有者即股东利益为代价来为自己谋利。为了降低代理成本，股东可能会给予管理层股权激励，以增强双方利益的一致性。在利益一致性假设下，管理者更倾向于开展CSR活动，为公司创造长期价值。但是随着管理者在公司拥有更多的股权，他们也获得了更多的控制权，对于管理层行为的监督变得更加困难，此时可能会发生为了追求私人利益，减少CSR活动投资的现象。实证研究表明管理层持股对CSR活动参与并无任何积极影响（Borghesi等, 2014）。Arora和Dharwadkar（2011）发现CEO拥有的股份数量对CSR活动有负面影响。Deutsch和Valente（2013）研究了高管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之间的关系，发现这两个变量是负相关的。综合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6：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CSR对财务绩效积极影响越小。

6. 机构投资者持股。近年来，机构投资者持股已经成为企业监管的重要方面。委托代理理论认为，机构投资者相比非机构投资者更有动机也更有能力监督管理层。事实上，由于机构投资者拥有公司相当大比例的股权，他们倾向于更积极地参与公司的决策，并利用他们的控制权来迫使管理者从事符合股东利益的活动。然而，一些机构投资者如银行和共同基金，通常强调短期业绩，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长期性，他们很可能认为关于CSR的投资是一种企业资源的浪费，因此会向公司管理层施加压力，减少此类活动的开展。而其他一些基金，如养老基

金，则看重长期收益，因此此类机构投资者更倾向于支持企业CSR投资，并通过其所拥有的控制权，确保企业管理层投资于创造价值的CSR活动。经验证据表明同样发现以长期收益为导向的机构投资者与企业CSR呈正相关关系（Mallin等，2013）。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7：以长期收益为导向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CSR对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越大。



三、变量选择和度量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财务绩效，通常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代理变量，计算方法为税后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

2. 解释变量。文章的解释变量为CSR，由于CSR属于一个综合指标，涉及员工、社区、政府等多方面的评价，因此还未有统一的度量方法和权威的评估结果。本文将采用国泰安公司公布的每股贡献值作为CSR的度量。国泰安公司所推出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数据库”，在公司为股东所创造的每股收益基础上，加入税收、工资、债务、捐赠等为其他利益相关者创造的价值，并且扣除经营管理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成本。国泰安公司的CSR评估避免无法量化信息带来的主观评估，具有很强的客观性。

调节变量包含董事会特征（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以及两职兼任）和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和机构投资者持股）；董事会规模采用董事会人数度量；

董事会独立性采用独立董事所占比例度量；如果董事长与总经理由一人担任则两职兼任等于1，否则为0；股权集中度采用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度量；管理层持股采用管理层持股比例度量；机构投资者持股采用公共养老基金持股比例度量。

对于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其他变量均需要纳入到实证模型中进行控制。除了公司治理变量外，另外选择企业规模（总资产自然对数）、研发强度（研发投入与主营业务收入比值）、杠杆水平（资产负债率）。此外还加入基于两位行业代码生成的行业虚拟变量和基于年份生成的时间虚拟变量。

四、实证结果和分析

（一）样本来源

本文选择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所有指标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筛选条件：（1）非金融行业；（2）无ST、PT等特殊处理；（3）财务指标无缺失。为了剔除异常值的干扰，对连续变量进行99%和1%缩尾处理。最终获得样本13465个样本数据，时间跨度2009-2018年。

（二）模型构建

基于理论假设构建实证模型如下：

$$ROA_{it} = \alpha_0 + \alpha_1 CSR_{it} + \alpha_2 BSize_{it} + \alpha_3 BDepend_{it} + \alpha_4 Both_{it} + \alpha_5 Econcent_{it} + \alpha_6 MEQu_{it} + Control + \varepsilon_{it} \quad (1)$$

$$ROA_{it} = \beta_0 + \beta_1 CSR_{it} + \beta_2 CSR_{it} \times BSize_{it} + \beta_3 CSR_{it} \times BDepend_{it} + \beta_4 CSR_{it} \times Both_{it} + \beta_5 CSR_{it} \times Econcent_{it} + \beta_6 CSR_{it} \times MEQu_{it} + \beta_7 CSR_{it} \times IEqu_{it} + \beta_8 BSize_{it} + \beta_9 BDepend_{it} + \beta_{10} \alpha_4 Both_{it} + \beta_{11} Econcent_{it} + \beta_{12} MEQu_{it} + \beta_{13} IEqu_{it} + Control + \eta_{it} \quad (2)$$

其中，模型（1）用来检验企业CSR对财务绩效的直接影响，模型（2）引入CSR和董事会特征的交互项，检验假设H1-H7。

（三）CSR和财务绩效关系的检验

表2报告了CSR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检验结果，暂时未涉及董事会特征和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检验。模型（1）包括CSR、规模、杠杆以及年份和行业变量，此时CSR系数估计结果为0.384，t值为3.440，在1%水平显著大于零，说明CSR与财务绩效之间呈现正相关，这种关系在所有的模型中都成立。一致的系数估计结果支持了第一个假设，即CSR与

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和模型(7)依次控制公司治理变量,最后模型(8)同时包含所有变量。首先就董事会特征来说,模型(2)中董事会规模的系数估计结果为0.124, t 值为1.910,虽然在10%水平下显著大于零,但是显著性水平依旧较低。当纳入所有变量时,董事会规模的系数估计结果变为0.023, t 值为1.030,并未获得统计显著性。模型(3)中董



事会独立性的系数估计结果为1.672, t 值为2.100,在5%水平下显著大于零,说明董事会独立性越高,企业财务绩效越好。模型(8)中董事会独立性的系数估计结果为0.199, t 值为2.953,在1%水平下显著大于零,此时即使纳入全部变量,董事会独立性和财务绩效正相关关系的结果依旧成立。模型(4)中两职兼任的系数估计结果为0.024, t 值为0.070,模型(8)中系数估计为0.102, t 值为1.070,均没有获得统计显著性。

股权结构中,股权集中度的估计结果表明其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并无任何显著相关性。模型(5)中系数估计结果为-0.254, t 值为-1.040,模型(8)中为-0.025, t 值为-0.180,均没有获得统计显著性。管理层持股在模型(6)中系数估计结果为-1.423, t 值为-2.340,模型(8)中为-1.304, t 值为-2.270,均在5%水平显著小于零。模型

(7)中公共养老基金的持股比例的系数估计结果为0.913, t 值为3.520,模型(8)中为0.112, t 值为2.080,至少在5%水平下显著大

量零。

综合表2所呈现的实证结果,初步可以判断CSR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董事会特征和股权结构均与财务绩效显著相关。以上估计结果并未考虑公司治理变量的调节作用,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接下来将通过在实证模型中引入公司治理变量和CSR的交互项,对前文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四) 公司治理变量的调节作用检验

为了验证前文假设,引入一系列公司治理变量和CSR的交互项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表3所呈现的所有模型估计结果,CSR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且显著,再次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CSR对公司财务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关于董事会规模的调节作用,模型(1)中CSR×董事会规模的系数估计结果为0.327, t 值为2.740,在1%水平下显著大于零。纳入所有变量后的估计结果如模型(7)所示,此时CSR×董事会规模的系数估计结果为0.254, t 值为2.770,在1%水平显著大于零。以上估计结果说明董事会规模越大,CSR对公司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大,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

关于董事会独立性的调节作用,模型(2)中CSR×董事会独立性的系数估计结果为0.143, t 值为2.150,在5%水平显著大于零。模型(7)中CSR×董事会独立性的系数估计结果为0.109, t 值为2.320,同样在5%水平显著大于零。以上估计结果说明董事会独立性正向调节CSR与公司财务绩效的关系,意味着董事会独立性越高,CSR对公司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越大,因此假设3得到验证。关于两职兼任的影响,模型(3)中CSR×两职兼任的系数估计结果为0.107, t 值为0.968。模型(7)中的系数估计结果为0.141, t 值为0.110,均未获得统计显著性。实证结果表明两职兼任并未对CSR和公司财务绩效的关系产生影响,因此假设4得以验证。

关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模型(4)中CSR×股权集中度的系数估计结果为-0.029, t 值为-1.530。模型(7)中系数估计结果为-0.020, t 值为-1.110,均未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股权集中度并不会对CSR和公司财务绩效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关于管理层持股的影响,模型(5)中CSR×管理层持股的系数估计结果为-0.002, t 值为-3.090。模型(7

）中的系数估计结果为-1.006，t值为-3.141，均在1%水平显著小于零，说明管理层持股负向调节CSR与公司财务绩效的关系，持股比例越高，CSR对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小，因此假设6得到验证。最后关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影响，模型（6）和模型（7）中CSR×机构投资者持股的系数估计结果分别为0.126和0.147，t值为2.120和3.140，至少在5%水平下显著大于零，意味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CSR对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越大，因此假设7得以验证。

综合CSR、公司治理与财务绩效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董事会独立性越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CSR对企业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越大；管理层持股则负向调节CSR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至于董事会独立性和股权集中度，实证结果揭示出并无显著影响。

五、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公司治理角度，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CSR）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认为CSR能够提高公司财务绩效，并且公司治理能够显著影响CSR和公司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独立性会增强两者的关系，股权集中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会正向调节CSR与公司财务绩效的关系，而管理层持股却能够抑制CSR对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相关研究结论归纳如下：（1

）CSR对公司财务绩效具有积极影响。无论是否引入公司治理的调节作用，CSR与公司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并不会发生改变。（2）公司治理中的董事会特征会显著影响CSR与公司财务绩效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董事会规模越大，独立性越高，CSR对公司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越大。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与否并不会对两者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3）公司治理中的股权结构同样会对CSR与公司财务绩效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专注长期投资回报的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增强CSR对公司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CSR对公司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小，股权集中度并不会对CSR和公司财务绩效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作者单位：河南中医药大学计划财务处

主要参考文献

1. Cornett M M, Marcus A J, Tehranian H.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ay-for-performance: The impact of earnings management[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8, 87(2):357-373.
2. Jo H, Harjoto M A.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Value: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1, 103(3):351-383.
3. Davidson R, Jenny Goodwin - Stewart, Kent P.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 *Accounting & Finance*, 2005, 45(2):241-267.
4. Bai X, Chang 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marketing competenc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rket environment[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 32(2):505-530.
5. Reverte C. The Impact of Bette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on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2, 19(5):p.253-272.
6. 李明, 管威. 企业社会责任风险与企业绩效的交互跨期影响——基于17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企业经济*. 2017(05)
7. Mallin C A, Michelon G, Raggi D. Monitoring Intensity and Stakeholders' Orientation: How Does Governance Affect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3, 114(1):29-43.
8. Walls J L, Hoffman A J. Exceptional boards: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 and positive deviance from institutional norms[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3, 34(2):253-271.
9. Brown, W., Helland, E., & Smith, J.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practices.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6, 12(3):855-77.
10. Hong B, Li Z, Minor D.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6(1)
11. 蒋尧明, 郑莹.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高水平上市公司治理特征研究——基于2012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4(11)
12. 买生, 杨一苏. 董事会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财会通讯*. 2017(6)

党组巡视会影响审计意见购买吗？

■ 张建平 李苗 张嵩珊

摘要 党组巡视是新时期国家进行党内监督和党风建设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本文以2013-2017年间被巡视的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巡视监督对企业审计意见购买的影响。结果表明：巡视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企业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且在政治关联较强的国企中更加显著。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巡视监督能够强化企业由于寻求高质量的审计而进行审计师变更的作用。同时，巡视程度会影响巡视对企业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抑制程度。本文不仅丰富了巡视监督和审计意见购买的相关文献，而且对于监管部门制定有关国有企业的监管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巡视监督 审计意见购买 国有企业 审计师变更

一、引言

巡视监督是上级对下级党组织的政治监督。十八大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监督制度，在巡视范围和内容、方法和手段以及范围和力度等方面都进行了完善和创新，巡视制度逐步规范，巡视的制度和巡视工作的开展进入了全新阶段。党组巡视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建设中取得了良好效果，而目前国内学者多从其他的视角研究国家相关倡廉政策的实施效果，鲜有文献研究巡视监督对我国企业直接产生的具体影响和经济后果。本文选取2013-2017年间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Lennox(2000)的审计意见购买模型检验巡视监督对企业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巡视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国有企业审计意见购买的发生频率，并能通过削弱政治关联来抑制国企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随着巡视程度的加强，该抑制作用会增强。同时，当企业为了提升审计质量及良好的信号传递而进行审计师变更时，巡视监督监督效应能够强化企业对变更的正向积极作用。

同时，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对审计意见购买的存在性(Krishnan, 1994; Lennox, 2000; 李爽等, 2002; 李青原等, 2014; Newton等, 2016)、意见购买的动机(唐跃军, 2011; 张利红等, 2013; 谢裕慧等, 2018; 李明睿, 2019)、意见购买的途径(Chow等, 1982; 李爽和吴溪, 2004; 周福

源, 2012; 张强, 2015; 唐跃军, 2017)和监管(吴联生, 2005; 唐跃军, 2007、2008; 耀友福, 2018)等内容研究。而对于是由哪种具体的行为或因素影响企业进行审计意见购买，却鲜有探讨。本文基于党组织巡视监督这个视角展开对审计意见购买的影响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二、文献回顾

1. 监管与审计意见购买。监管是抵制审计意见购买的重要方式，证监会、审计委员会等相关的监管机构，会通过对被监管公司的经济活动、财务报表以及其他的异常重大事项的分析，并针对不同的公司、不同的收益等会采取不同的监管策略，从而实现对它们的监管。目前，一些文献认为某些监管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并不能起到抑制作用。例如，Cushing(1999)认为对意见购买的严格监管所获得的利益不一定会超过道德准则监督和实施监管所增加的管制成本。陆正飞、童盼(2003)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证监会2001年的14号规则颁布后，具有审计意见购买动机的公司更能够实现审计意见购买。李爽、吴溪(2004)通过检验发现监管诱致性审计师变更比自愿性审计师变更的审计定价水平更高。吴联生(2005)通过建立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发现不同的监管者对于变动收益下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最优监管策略各不相同，但是对于固定收益下的最优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定义
S_{it}	审计师变更, 虚拟变量, 国企发生审计师变更, 赋值为1, 否则为0
OP	获得不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之差
Insp	国有企业当年是否受到党组织巡视, 是为1, 否则为0
Relation	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 是为1, 否则为0
Grow	公司成长性,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Lev	公司当年的资产负债率
Ito	企业当年存货周转率
AccRec	应收账款周转率
Roa	资产收益率衡量每单位资产创造多少净利润
Board	董事会规模
IndDir	独董比例, 董事人数与董事会人数的比值
Cf	企业现金流,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总资产
Size	公司当年的资产总计的自然对数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Switch	4241	0.120	0.320	0	1	0
OP	4241	-0.460	1.460	-12.750	1.590	-0.200
Insp	4241	0.134	0.341	0	1	0
Relation	4241	0.421	0.494	0	1	0
Lev	4241	0.500	0.200	0.080	0.920	0.510
Size	4241	22.760	1.310	20.060	26.660	22.610
Ito	4241	16.910	56.780	0.080	457.300	4.470
AccRec	4241	93.980	396.100	0.720	3243	8.730
Growth	4241	0.480	1.400	-0.680	9.780	0.140
ROA	4241	0.030	0.050	-0.140	0.170	0.030
Board	4241	1.770	0.280	1.100	2.400	1.790
IndDir	4241	0.370	0.070	0.230	0.570	0.360
Cf	4241	0.040	0.070	-0.150	0.240	0.040

监管策略大致相同, 并认为最优监管策略并不能杜绝审计意见购买行为。而有些文献则认为监管对审计意见购买能产生积极的抑制作用。通过从审计委员会的存在性、独立性和勤勉程度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发现公司在董事会中设立审计委员会, 并切实提高其独立性和勤勉程度,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管理层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唐跃军, 2008; 左晶晶等, 2013)。此外, 媒体对审计意见购买也具有一定的监督治理作用。研究发现, 媒体负面报道对公司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具有明显的改善效果, 可以减少审计意见购买行为(耀友福, 2018; 周兰等, 2018)。但仅仅依靠外部的监管既不充分也不经济, 所以审计师本身的道德也尤为重要, 王

春飞(2006)提出审计师能否恪守信用是减少审计意见购买的一道重要防线。

2. 巡视对国有企业的监督作用。现有文献集中于对巡视监督进行定性分析, 包括对巡视监督制度发展的探析和论述(陈燕, 2016; 谢撼澜, 2018; 李伯超等, 2019); 对党内巡视监督的改革创新的研究(李小珊, 2016; 李英强等, 2017; 徐健等, 2019); 还有些学者对巡视监督的效能进行了分析, 钟龙彪(2016)对在提升巡视监督效能中遇到的问题和进路进行了探讨。而有关党组织巡视的监督机制的实证研究较少。唐大鹏等(2017)经过实证检验, 发现巡视中内部控制关注度会对被巡视单位产生影响, 从而证明了巡视是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一种独立的监督机制, 党组织巡视监督能够发挥其震慑作用, 及时发现并整改有关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问题, 能够使监事会监管成本降低, 从根本上制约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们的违规行为(段永传等, 2018)。孙德芝和郭阳生(2018)分析了巡视监督对公司的违规行为的直接影响, 发现巡视监督能够抑制企业的违规行为。通过构建国有企业监督体系, 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企业经营等方面的监督权, 并对整改工作适时监督检查, 激活国企治理的活性。齐岳等(2018)采用事件研究法, 对中央巡视组公布国有企业巡视结果后的市场反映进行了检验, 发现投资者在市场的不同状态下表现出不同的理性程度, 而且巡视结果的公布对于不同行业的影响不同, 如对制造业以及能源行业国有企业的收益率具有负向影响, 而对运输业以及钢铁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然而, 鲜有文献直接研究巡视对审计意见购买产生的经济后果和影响。

三、研究假设

十八大后国内的很多学者都对反腐倡廉政策所产生的效应进行了分析。钟覃琳等(2016)以十八大召开后展开的一系列倡廉行动为背景, 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商旅招待费水平的检验, 发现倡廉行动能够提高公司绩效, 并通过渠道效应的研究发现, 其是通过作用在加快资产周转率、提高生产效率等渠道上, 最终体现在企业的绩效上。王茂斌和孔东民(2016)也对十八大前后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情况进行了探讨, 发现十八大后上市

表3 相关性分析

变量	Switch	OP	Insp	Lev	Size	Ito	AccRec	Growth	Roa	Board	IndDir	CF
Switch	1											
OP	0.013	1										
Insp	-0.007	0.036**	1									
Lev	0.009	0.176***	0.024	1								
Size	-0.025	0.002	0.198***	0.424***	1							
Ito	-0.005	-0.123***	0.008	-0.089***	-0.016	1						
AccRec	-0.01	-0.959***	-0.043***	0.017	0.014	0.021	1					
Growth	0.069***	-0.015	-0.001	0.116***	0	-0.071***	0.040***	1				
Roa	-0.028*	-0.208***	0.021	-0.422***	0.053***	0.091***	0.069***	-0.02	1			
Board	-0.009	-0.112***	-0.026*	0.032**	0.094***	0.008	-0.002	-0.039**	-0.006	1		
IndDir	-0.003	-0.003	0.039**	0.028*	0.115***	0.013	-0.026*	0.008	-0.01	-0.546***	1	
CF	-0.009	-0.141***	0.052***	-0.187***	0.061***	0.109***	0.045***	-0.134***	0.341***	0.050***	-0.007	1

公司高管的薪酬敏感性显著提高了。王贤彬等（2017）以地方高级官员被查落马事件为外生冲击，研究发现高官落马产生的震慑效应能显著降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能够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改善投资资源的配置效率。而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一种重要实现方式，可以为倡廉行动提供实现的路径。一方面，国有企业开展的内部巡视是企业加强党建的重要措施，也是推进依法治企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中也证明了其对国有企业的违规、违纪等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国有企业以巡视巡察的方式在内部进行全面“体检”，从严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及时发现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及时纠正（肖孝飞，2017）。另一方面，监察法在十九大之后明确将实现国有企业监察全覆盖的纳入行动行列。盛丹和刘灿雷（2016）研究发现外部监管不仅能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还能提高国有企业的改制成效。唐大鹏等（2017）实证检验了巡视反馈中的相关问题的内控关注度对被巡视单位的“威慑效应”和“说服效应”。巡视监督能显著减少国企违规的发生频率，而且能减轻违规严重程度（孙德芝等，2018）。

基于以上研究以及对监管与审计意见购买的相关文献回顾，笔者认为，巡视监督能够弱化企业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可能原因是：一方面，被巡视单位根据整改建议采取一系列手段进行整改后，企业本身内部的治理环境和经营状况得到改善，审计意见得到合理的完善，管理者没有动机进行审计意见购买；另一方面，巡视作为一种监督，会

增加企业的审计意见购买风险，况且基于巡视组对被巡视单位产生的威慑作用，会使管理者更加谨慎地考虑是否选择购买审计意见。然而，巡视监督有可能会强化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基于国企高管面临的业绩考核压力的视角，加上巡视组通过“回头看”等方式对被巡视单位监督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检验，以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监督责任和企业的发展。因此，当被巡视单位无法有效落实巡视整改建议，而这些需要整改的事项又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审计报告，同时面对着“回头看”的压力，企业责任主体恐于受到指责和惩处，可能会促使企业为了获取“不清洁”的审计意见而进行审计意见购买。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1：

H1a：在其他条件不变得情况下，巡视监督会抑制审计意见购买行为；

H1b：在其他条件不变得情况下，巡视监督会强化审计意见购买行为。

（二）政治关联在巡视对公司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影响中的作用

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会影响企业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从而影响公司外部审计师的选择和审计意见购买等。郑军（2010）认为对于前一期被出具非标意见的公司来说，政治关系可以帮助公司通过现任审计师实现审计意见购买（通过政治关系向现任审计师施压实现）。刘启亮等（2010）发现政治联系与私人关系的合谋确实能给客户带来较为有利的审计意见。对于既定的盈余质量，有政治关联的国企，获得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会显著降低，这说明政治关联可能会导致审计意见购

表4 巡视监督与审计意见购买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无政治关联组		有政治关联组	
	(1)		(2)		(3)		(4)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OP	-1.574***	-2.59	0.633	0.33	1.119	0.29	0.149	0.06
Insp			-0.345	-1.00	-0.599	-1.35	0.405	0.67
OP×Insp			0.801*	1.68	0.675	0.99	1.694*	1.86
LEV	1.658*	1.95	-0.118	-0.04	-1.294	-0.24	1.162	0.35
Size	-0.0440	-0.91	-0.089	-0.82	-0.016	-0.08	-0.168	-1.17
Ito	-0.003**	-1.97	-0.001	-0.12	0.003	0.33	-0.007	-1.03
AccRec	-0.006***	-2.61	0.002	0.36	0.004	0.31	0.001	0.11
Growth	0.113***	3.52	0.096	1.17	0.172	1.35	-0.001	-0.01
ROA	-4.904***	-3.18	1.242	0.32	2.954	0.52	0.300	0.04
Board	-1.762***	-2.70	0.608	0.31	1.850	0.50	-1.357	-0.50
IndDir	-5.290**	-2.54	0.999	0.16	3.088	0.27	-3.758	-0.42
CF	-0.452	-0.50	2.797	1.21	1.436	0.39	4.305	1.33
Cons	4.225**	2.08	0.266	0.04	-3.557	-0.29	5.397	0.67
年份/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241		1063		593		435	
PseudoR ²	0.050		0.058		0.066		0.119	

表5 审计师行业专长、巡视监督与审计师变更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Spe	-0.0230	-0.19	-0.271	-0.99
Insp			-0.782**	-2.05
Spe*Insp			0.803*	1.83
LEV	-0.372	-1.14	1.051	1.53
Size	-0.003	-0.07	-0.114	-1.23
Ito	0	0.14	-0.002	-0.65
AccRec	0	-0.36	0	0.56
Growth	0.141***	4.67	0.0790	1.03
Roa	-2.531*	-1.92	0.597	0.22
Board	-0.206	-0.89	-0.130	-0.28
IndDir	-0.556	-0.57	-1.096	-0.54
Cf	0.603	0.75	1.08	-1.285
Cons	-0.184	-0.17	2.583	1.23
行业/年份	控制		控制	
N	4241		1063	
Pseudo R ²	0.049		0.058	

买等其他合谋行为(杜兴强, 2011)。

随着监管和惩处力度的加大, 与企业有政治关联的高官会减少与企业的利益联系, 以防被监管者发现。2012年(十八大)之后, 与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相比, 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

降低(陈胜蓝等, 2018)。外部监管和制度环境的改善, 能够削弱政治关联的效果。腐败治理可能抑制企业的寻租动机, 促使企业摆脱政治关联依赖, 从而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余鹏翼等, 2018)。企业的政治关联行动与独立审计质量负相关, 但是较完善的制度环境以及合理有效的政府市场干预可以降低这种负相关(华莹莹, 2019)。中央和省(区、市)党委根据相关规定, 通过建立专门机构展开的巡视, 会大大抑制企业想要寻求政治庇护的积极性, 从而抑制企业想要通过政治关联实现审计意见购买的行为。据此提出假说H2:

H2: 企业高管政治关联越强, 巡视对审计意见购买的抑制作用越大。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十八大后, 巡视工作的开展进入了全新阶段, 巡视制度逐步得到规范和完善, 因此选择2013年作为样本数据的开始年份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出巡视成果。本文借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人民网、百度引擎等, 手工收集并整理了2013-2017年被巡视的国有企业集团及其下属单位作为被巡视的国企名单样本, 并通过国泰安CSMAR数据库搜集其他的相关数据。同时, 本文还对研究样本做了以下处理: 剔除ST和ST*的公司; 剔除金融保险业的企业; 剔除有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 部分变量按1%的比例进行缩尾处理, 最后筛选得到4241个研究样本。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审计师变更作为因变量, 参照翟胜宝等(2016)分析师跟踪对是否会弱化(强化)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研究, 用哑变量审计师变更Sit表示, 当国企当年发生审计师变更时, 赋值为1, 否则为0。

2. 解释变量。OP表示获得不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之差。Insp表示国有企业当年是否受到党组织巡视的虚拟变量, 是为1, 否为0, 为了避免自相关问题, 在这里所用的巡视变量都做了滞后一期处理。OP×Insp: 获得不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之差和国有企业当年是否受到党组织巡视的交互变量, 其系数就是本文所考察的巡视监督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影响效应。

OP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借鉴

表6 巡视程度对审计意见购买的影响

变量	Logit 回归		Probit 回归	
	(1)	(2)	(3)	(4)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OP	-1.605***	-2.65	-0.886***	-2.61
Inspexe	0.0390	0.22	0.0200	0.22
OP× Inspexe	0.550*	1.90	0.309*	1.91
Lev	1.669**	1.98	0.920*	1.95
Size	-0.0450	-0.94	-0.0220	-0.85
Ito	-0.003**	-2.02	-0.002**	-2.12
AccRec	-0.006***	-2.67	-0.003***	-2.63
Growth	0.113***	3.50	0.062***	3.39
ROA	-4.897***	-3.18	-2.740***	-3.27
Board	-1.766***	-2.72	-0.974***	-2.72
IndDir	-5.333**	-2.57	-2.980***	-2.61
Cons	4.253**	2.11	2.212**	1.99
行业/年份	控制		控制	
N	4241		4241	
Pseudo R ²	0.051		0.050	

表7 匹配后的巡视监督与审计意见购买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无政治关联组		有政治关联组	
	(1)		(2)		(3)		(4)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OP	-1.611***	-2.66	0.349	0.18	0.902	0.23	-0.151	-0.06
Insp			-0.379	-1.08	-0.617	-1.39	0.310	0.49
OP× Insp			0.742	1.55	0.627	0.93	1.542*	1.67
Lev	1.758**	2.08	0.559	0.21	-0.740	-0.13	1.839	0.53
Size	-0.0570	-1.17	-0.143	-1.27	-0.058	-0.27	-0.231	-1.42
Ito	-0.003**	-2.02	-0.001	-0.21	0.003	0.29	-0.008	-1.11
AccRec	-0.006***	-2.68	0.001	0.21	0.003	0.25	0.000	-0.00
Growth	0.111***	3.45	0.0860	1.03	0.163	1.26	-0.006	-0.05
ROA	-5.001***	-3.22	0.577	0.15	2.569	0.43	-0.625	-0.09
Board	-1.776***	-2.73	0.382	0.19	1.640	0.44	-1.527	-0.56
IndDir	-5.371***	-2.58	0.301	0.05	2.457	0.21	-4.229	-0.47
CF	-0.464	-0.51	2.623	1.12	1.414	0.38	3.854	1.14
Cons	4.495**	2.23	1.821	0.29	-2.268	-0.19	7.061	0.83
年份/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241		1063		593		435	
Pseudo R ²	0.050		0.058		0.066		0.119	

Lennox (2000) 提出的审计意见估计模型，建立模型 (1)：

$$Q_{it}^s = \alpha_0 + \alpha_1 S_{it} + \alpha_2 X_{it} + \alpha_3 S_{it} X_{it} + \alpha_4 Q_{it-1}^s + \alpha_5 Q_{it-1}^s 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Q_{it}^s 表示公司i在t期间所获得的审

计意见类型 (Q_{it}^0 表示公司i在t期间没有审计师变更情况下的审计意见类型)，当公司i在t期间收到不清洁的审计意见时， $Q_{sit}=1$ ，否则 $Q_{sit}=0$ 。 Q_{it-1} 表示公司i在t-1期间收到的审计意见类型，当公司i在t-1期间收到不清洁的审计意见时， $Q_{it-1}=1$ ，否则为0。 X_{it} 表示公司i在t期间的控制变量。

通过回归计算出模型 (1) 中的各个变量系数 α ，然后再将其带入模型 (1) 中就可以计算出 Q_{sit} 的预测值 \hat{Q}_{sit}^s 。然后运用 (2) 和 (3) 公式运算得出公司变更和不变更审计师时分别被出具不清洁的审计意见的概率。不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之差 OP 即为：

$$P(\hat{Q}_{it}^1=1) - P(\hat{Q}_{it}^0=1) = P(Q_{it}^1=1 | S_{it}=1) - P(Q_{it}^0=1 | S_{it}=0) = \frac{\exp(\hat{Q}_{it}^1)}{1 + \exp(\hat{Q}_{it}^1)} - \frac{\exp(\hat{Q}_{it}^0)}{1 + \exp(\hat{Q}_{it}^0)} \quad (2)$$

$$P(\hat{Q}_{it}^0=1) = P(Q_{it}^0=1 | S_{it}=0) = \frac{\exp(\hat{Q}_{it}^0)}{1 + \exp(\hat{Q}_{it}^0)} \quad (3)$$

3. 调节变量。借鉴孙德芝 (2018)、应千伟等 (2016) 对企业高管是否存在政治关联的分组，本文对治理层和管理层曾任或现任人大代表、政府机构部门、地方委员等国有企业定义为存在政治关联组 $Relation$ ，取值1，其他情况为0。

4. 控制变量。参照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本文设置如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Grow$) 代表公司的成长性、用资产负债率 (Lev) 代表公司的财务风险、偿债能力 (Ito 、 $AccRec$)、用资产收益率 (Roa) 代表公司的盈利能力、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Size$) 表示公司规模，本文还控制了董事会规模 ($Board$)、独立董事比例 ($IndDir$)、流动比率 (Cr)、产权比率 (Er)、现金流 (CF)。具体如表1所示。

(三) 模型设定

为了判断样本公司是否进行了审计意见购买，建立模型 (4)，当 $\beta < 0$ 时，即 OP 与审计师变更 S_{it} 呈负相关，就意味着公司成功实现了审计意见购买。

$$S_{it} = \beta_0 + \beta_1 OP + \beta_2 X_{it} + Year + Ind + \varepsilon_{it} \quad (4)$$

本文参照卢闯等 (2015) 和谢裕慧等 (2018) 的研究模型，剔除了没有受到巡视监督的国有企业，只针对受到巡视的企业进行

表8 巡视监督与替代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无政治关联组		有政治关联组	
	(1)		(2)		(3)		(4)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OP1	-0.914***	-2.60	0.376	0.33	0.563	0.20	0.061	0.04
Insp			-1.352	-0.79	-2.642	-1.03	-1.814	-0.73
OP1×Insp			0.670	0.52	1.461	0.74	1.510	1.02
Lev	-0.136	-0.41	0.802	1.02	0.062	0.04	1.821*	1.71
Size	-0.020	-0.43	-0.100	-1.08	-0.023	-0.12	-0.195**	-2.55
Ito	0	-0.45	-0.002	-0.57	0.001	0.35	-0.008**	-2.22
AccRec	0	-1.07	0	0.67	0	0.45	0.001	0.85
Growth	0.121***	3.86	0.094	1.19	0.169	1.48	0.009	0.04
ROA	-3.781***	-2.77	0.908	0.29	2.311	1.04	0.118	0.03
Board	-0.523**	-1.96	0.00	-0.00	0.881	0.85	-1.608***	-3.28
IndDir	-1.934*	-1.74	-0.513	-0.19	0.596	0.09	-4.080*	-1.66
CF	1.440*	1.67	1.541	0.81	-0.472	-0.41	3.259	0.97
Cons	2.346	1.63	1.212	0.30	-2.195	-0.23	6.270	1.25
年份/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241		1063		593		435	
Pseudo R ²	0.050		0.058		0.066		0.119	

表9 巡视程度与替代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Logit 回归		Probit 回归	
	(1)	(2)	(3)	(4)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OP1	-0.946***	-2.68	-0.522***	-2.63
Inspexe	-2.305**	-1.96	-1.279**	-2.06
OP1×Inspexe	1.709**	1.99	0.947**	2.05
Lev	-0.163	-0.49	-0.0920	-0.51
Size	-0.0170	-0.36	-0.006	-0.25
Ito	0	-0.45	0	-0.60
AccRec	0	-1.08	0	-1.20
Growth	0.122***	3.86	0.067***	3.76
ROA	-3.750***	-2.75	-2.109***	-2.90
Board	-0.511*	-1.91	-0.282**	-2.02
IndDir	-1.893*	-1.70	-1.084*	-1.84
Cons	2.293	1.59	1.130	1.44
行业/年份	控制		控制	
N	4241		4241	
Pseudo R ²	0.051		0.051	

巡视年份前后的政策效应研究，并将巡视监督的监督效应全部滞后一期，设定巡视变量（Insp），如果当年企业受到党组的巡视调查，则将实施后的年份的Insp变量全部取值为1，未实施的年份为控制组，取值为0。结合不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后得到如下双重差分

模型：

$$S_{it} = \beta_0 + \beta_1 OP + \beta_2 X_{it} + \beta_3 Insp + \beta_4 OP \times Insp + Year + Ind + \varepsilon_{it} \quad (5)$$

当 $\beta_4 > 0$ 时，即获得不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之差OP与巡视监督Insp的交互项和审计师变更Sit呈正相关，那么就说明巡视监督会弱化审计意见购买；而当 $\beta_4 < 0$ 时，即OP与Insp的交互项呈负相关关系，那么就意味着巡视监督会强化企业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Sit的均值为0.120，说明样本中的国有企业审计师变更频率为12%；Insp的均值为0.134，中位数为0.341，说明在样本期间被巡视的国有企业并不是很多。Lev的均值为0.500，说明样本企业的平均负债率为50%，表明了样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处于比较适中的水平；IndDir的均值为0.370，符合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人数至少要占所有董事的三分之一的规定；Cf的均值为0.040，中位数为0.070，说明样本企业的现金流处于正常水平。

（二）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中的数据来看，由于未加入其他变量和未控制行业年份，所以当年的不清洁审计意见与审计师变更没有显著作用，同时巡视监督与审计师变更没有明显关系。此外，所有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大部分小于0.5，表明模型较为合理，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分析

表4报告了模型（4）和模型（5）的回归结果。模型（4）的回归结果列（1）表明，不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之差OP与审计师变更的估计系数为-1.574，且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当审计师变更会引起公司被出具不清洁的审计意见的概率降低时，公司会选择变更审计师，从而达到购买审计意见的目的。反之，若审计师变更使公司获得不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增大，那么公司会选择继续聘用原来的审计师。所以，模型（4）的回归结果证明了公司为了避免获得不清洁的审计意见，会通过变更审计师实现审计意见购买。

为了验证巡视监督对审计意见购买行

为的影响，在模型（4）中加入了Insp和OP×Insp构成了模型（5）。从模型（5）的回归结果列（2）可以发现，不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之差和巡视监督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0.801（p<0.1），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如果审计师变更会导致公司获得的不清洁审计意见概率降低，巡视监督能够以其执纪问责力度和高压态势来抑制公司管理层通过审计师变更获得更有利的审计意见的动机；如果审计师变更会导致公司获得的不清洁审计意见概率上升，那么巡视监督会强化公司继续聘用原审计师的行为。该结果证明了假设H1a而非H1b，即在其他条件不变得情况下，巡视监督会抑制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列（3）是无政治关联企业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不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之差和巡视监督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而列（4）反映的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回归结果表明，不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之差和巡视监督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正而且在10%的水平显著。这说明了，巡视监督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抑制作用会随着政治关联强度的增大而增大。从而验证了假设H2。

六、进一步检验

（一）审计师行业专长、巡视监督与审计师变更

由于审计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和轮换体系的建立，审计服务质量受到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专长、技术、规模和声誉等影响，当企业对审计服务要求提升时，通常会选择更换具有较高质量水平的事务所来满足其经营发展需要。因此，审计师变更可能是由于继任审计师拥有更高的专业知识和胜任能力，企业认为变更后的审计师能利用其职业能力为企业提供更高水平的鉴证业务。在此借鉴仇立文、张立民（2019）的做法，建立如下模型：

$$S_{it} = \beta_0 + \beta_1 \text{Spe} + \beta_2 X_{it} + \text{Year} + \text{Ind} + \varepsilon_{it} \quad (6)$$

其中Spe为审计师专长，为了检验巡视监督的影响，在模型（6）中加入巡视监督变量Insp和审计师专长与巡视监督的交互变量Spe×Insp，构建如下模型：

$$S_{it} = \beta_0 + \beta_1 \text{Spe} + \beta_2 X_{it} + \beta_3 \text{Insp} + \beta_4 \text{Spe} \times \text{Insp} + \text{Year} + \text{Ind} + \varepsilon_{it} \quad (7)$$

从表5中的结果来看，审计师的行业专长（Spe）与审计师变更（Switch）关系不显著，说明审计师的行业胜任能力与审计师的变更不存在显著关联性，即审计师的行业专长不是导致审计师变更的主要原因。从（2）列可以看出，加入巡视监督影响作用后，Spe×Insp与Switch的系数为0.803且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巡视监督能够强化企业由于寻求更高质量、专业性更强的审计师而进行审计师变更的行为，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在脱离巡视监督管理的情况下，企业进行审计师更换并不是追求高质量的审计，而是为了达到购买审计意见的目的。

（二）巡视程度与审计意见购买

对被巡视单位的巡视进程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到巡视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抑制程度，所以为了进一步探究巡视监督对审计意见购买的抑制作用，本文采用Inspexe变量代表巡视程度，其定义为：如果当年公布启动巡视，则为1，当年公布完成巡视，则为2，公布对国企进行回访，即进行巡视“回头看”，则赋值为3，否则为0。并采用Logit和Probit回归分别进行巡视程度对企业进行审计意见购买的影响的检验，将审计师变更与获得不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之差OP与巡视强度进行交乘回归。表6中第（1）、（3）两列反映的是审计师变更与OP×Inspexe的回归结果。从表中的结果来看，OP×Inspexe在两种回归方式下都是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了加强巡视监督的监督审查力度可以抑制企业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并且巡视程度越大，其监督效应越强。

七、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假设，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做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

（一）倾向得分匹配

本文采用PSM倾向性匹配作为检验。本文的实验组为受到巡视的上市企业在巡视年以及以后年份，取值为1，而该类公司在被巡视前的年份为对照组，按1:1进行了无放回匹配，分别选取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公司规模（Roa）、企业成长性（Growth）、企业现金流（Cf）、公司规模（Size）5个特征变量用于匹配，逐一剔除没有匹配到的上市国企，最终得到1052个匹配样本。

从表7可以看出，匹配后的OP×Insp的相

关系数与匹配前的相比,并没有显著差异。无论是匹配前还是匹配后,在全样本中巡视监督前OP的相关系数均显著为负,而在加入巡视监督后,不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之差OP与巡视监督Insp的交互项系数均为正数;匹配后的无政治关联组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但依然不显著,而有政治关联组的交互项系数为正并依然在10%的水平上显著。匹配前后,结论具有一致性,较好地支撑了假设。

(二) 变量替代

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借鉴仇立文等(2019)、翟胜宝等(2016)的做法,使用预期符合正太分布的审计意见的拟合值(OP1)替代OP进行检验,构造模型如下:

$$S_{it} = \beta_0 + \beta_1 OP_{1t} + \beta_2 Insp_t + \beta_3 OP_{1t} \times Insp_t + \beta_4 X_{it} + Year + Ind + \varepsilon_{it} \quad (8)$$

从表8可以看出,在加入巡视监督变量前,审计师变更与OP1的相关系数为-0.914,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了国有企业进行了审计意见购买。而加入巡视监督变量后,审计师变更与OP1×Insp的交互项的系数是0.670,系数为正;与无政治关联组相比,有政治关联组的OP1×Insp显著性较强。从表9可以看出,OP1×Inspex在两种回归方式下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了巡视程度越大巡视监督的监督审查功能对企业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抑制作用越强,其监督效应越大,这与OP×Insp的结果无显著差异。表明了使用预期审计意见的拟合值之差作为替代变量,结论仍然成立。

八、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选取2013-2017年的巡视监督的数据,运用Lennox(2000)的审计意见购买模

型,以及构建的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巡视监督对企业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巡视监督会弱化不清洁的审计意见对被巡视单位的消极影响,降低被巡视的企业购买审计意见的动机,即巡视监督对企业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具有抑制作用,且在企业存在政治关联时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同时通过PSM检验、变量替换等检验,发现结论具有一致性,从而证明了结论的可靠性。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巡视监督能够促进影响企业为了追求高质量审计而进行审计师变更的行为。此外,巡视程度越大,其抑制企业审计意见购买行为更强,可见巡视监督作为一种监督利剑确实能够起到治理公司的作用。

为了更好的发挥巡视的监督效应,并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两点建议:一是建立并完善相关的企业内部制度。国有企业应有完善的与巡视制度“遥相呼应”并“协同治理”的制度和机制,既要明确巡视与企业内部监督的界限,又要协同治理,从而更加完善国有企业的监督体系,规范国企管理,堵塞监管漏洞,通过巡视整改帮助解决审计意见购买等阻碍企业发展的违法违规行为。二是完善巡视制度。巡视前、巡视中、巡视后都要有完善的制度约束,巡视前要有完善的制度明确巡视的对象、内容、时间、方式等,巡视中要有明确的制度约束巡视组自身的行为,巡视后的“回头看”工作也要紧抓、落实,高质量推进巡视全覆盖,促进国企的深化改革。

基金项目:广州市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羊城青年学人课题(2020GZQN33),广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2017年科研培育项目一般项目(2017k_jpy06),广东财经大学粤港澳大湾区资本市场与审计治理研究院一般项目(2018A02),广东财经大学反垄断执法与大数据分析研究中心研究项目(2019D01)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 李爽,吴溪.审计师变更的监管思想、政策效应与学术含义——基于2002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监管措施的探讨.会计研究.2002(11)
- 唐跃军.审计质量VS.信号显示——终极控制权、大股东治理战略与审计师选择.金融研究.2011(05)
- 谢裕慧,刘文军,石德金.股权激励实施前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研究.财经研究.2018(11)
- 李明睿.公司债务违约风险与审计意见购买的实证研究.中国注册会计师.2019(03)
- 吴联生.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特征与监管策略.经济研究.2005(07)
- 唐跃军.审计收费、审计委员会与意见购买——来自2004-2005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金融研究.2007(04)
- 徐健,魏晓文.新时代党建理论创新发展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24)
- 唐大鹏,武威,王璐璐.党的巡视与内部控制关注度: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会计研究.2017(03)
- 孙德芝,郭阳生.巡视监督能够抑制公司的违规行为吗.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12)
- 王茂斌,孔东民.反腐败与中国公司治理优化:一个准自然实验.金融研究.2016(08)
- Krishnan, J. 1994. Auditor Switching and Conservatism. The Accounting Review, 69 (1) : 200~215.
- Lennox, C. 2000. Do Companies Successfully Engage in Opinion - shopping? Evidence from the UK.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 29 (3) : 321~337.

高管海外经历、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路径

■ 高燕燕 窦娜

摘要 本文以2013-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和验证高管海外经历、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高管海外经历可以显著提升高管风险偏好和企业创新投入,风险偏好在高管海外经历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风险偏好这一中介效应受市场化进程的负向调节作用和产权性质的正向调节作用影响,在市场化进程较慢地区和国有企业中,海归高管的加入可以进一步改善企业风险规避从而提高创新投入。研究结论从风险偏好的中介效应角度拓展了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人才海外经历对企业创新影响的作用路径。

关键词 海外经历 风险偏好 企业创新 中介效应

知识转移与溢出是推动新兴经济体国家创新发展和市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Almeida, 2004)。《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发挥企业家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培养造就一大批勇于创新、敢于冒险的创新型企业家,建设专业化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而海归高管作为国家“人才引进”的重要力量,凭借其先进的知识经验、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社会资源常被形容为具备过人的自信和胆识,在促进知识流动、弥补国内重要技术和创新缺口方面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已有研究表明,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往往已经在国外打拼多年,他们在国外所接受的先进教育和职业培训,有助于缩小本土企业与国外企业之间的知识差距,所拥有的丰富海外经验可以帮助企业识别和挖掘国际市场的商业机会,克服国内企业的短视问题,所形成的复杂社会网络,还可以帮助企业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源约束(Saxenina, 2009)。Hambrick(1984)首次提出高层梯队理论,指出高管个人特征及背景会极大地影响他们对战略的理解和认知,进而推进其决策和选择,并且高层管理团队的多样性有助于成员更多的分享不同观点和想法,对企业决策产生积极影响。此后国内外学术界针对高管背景特征对公司治理、投资决策等的影响开展

了大量研究。随着近几年企业创新成为热门话题,也有不少学者开始探讨高管人口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其中风险偏好作为高管的重要心理特征开始引起关注。但目前还鲜有文献将高管海外经历这一人口特征与其心理特征中的风险偏好相结合,进一步研究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路径。基于此,本文以2013-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海外经历、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路径。

一、理论分析及假设提出

(一) 高管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投入

基于知识溢出效应,提高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渠道是对外部知识的获取。作为企业重要人力资本的海归高管可以为企业提供丰富的国际化知识和经验,具有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能够对本土企业的创新发挥重大促进作用(Liu, 2010; 宋建波, 2017)。同时,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作为对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的内部异质性资源之一,通过自身人脉和经验获得的资源,可以成为国内企业与全球市场、全球前沿技术信息沟通的一座桥梁,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源约束(Zhang, 2019),提高创新投入。另外,根据高层梯队理论,CEO在制定研发创新等复杂的资源分配计划时会与高管团队进行交流互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计算
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投入	Rd	Ln (当年研发支出)
解释变量	高管海外经历	ForeignBack	有海外经历高管人数/高管总人数
中介变量	风险偏好	Risk	风险资产占总资产比例
调节变量	市场化进程	Market	市场化进程大于中位值水平取1, 否则取0
	产权性质	State	国有企业取1, 否则取0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Ln (平均总资产)
	两职合一	Dual	总经理和董事长是同一人取1, 否则取0
	成长能力	Growth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
	财务杠杆	Lev	总负债/总资产
	盈利能力	Roa	净利润/期末总资产
	资产结构	Tangibility	固定资产/期末总资产
	现金比率	Cash	期末现金资产/总资产
	管理层持股	Large	管理层持股比例
	股权集中度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企业年龄	Age	观测年份减去企业上市年份
	独董比例	Outdir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总人数
	高管平均年龄	Tage	高管年龄总和/高管总人数
	年份	Year	5年, 设置4个虚拟变量
行业	Industry	15个行业, 设置14个虚拟变量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中位数	极大值	样本量
Rd	18.3520	1.7137	12.2290	18.3737	22.4235	3618
ForeignBack	0.0619	0.0784	0.0000	0.0435	0.3810	3618
Risk	0.1280	0.1155	0.0000	0.0982	0.4858	3618
Market	0.5509	0.4975	0.0000	1.0000	1.0000	3618
State	0.6507	0.4768	0.0000	1.0000	1.0000	3618
Size	22.9019	1.3107	20.3823	22.7377	26.9710	3618
Dual	0.1559	0.3628	0.0000	0.0000	1.0000	3618
Growth	0.1249	0.3562	-0.4279	0.0706	2.1993	3618
Lev	0.5077	0.1862	0.1188	0.5074	0.9234	3618
Roa	0.0319	0.0516	-0.1567	0.0263	0.1886	3618
Tangibility	0.2372	0.1643	0.0098	0.1979	0.7396	3618
Cash	0.1583	0.1027	0.0023	0.1348	0.9148	3618
Large	0.0196	0.0658	0.0000	0.0001	0.3963	3618
Top1	0.3587	0.1513	0.0812	0.3384	0.7510	3618
Age	18.9048	4.3635	7.0000	19.0000	31.0000	3618
Outdir	0.3718	0.0558	0.3077	0.3333	0.6000	3618
Board	9.0740	1.8540	5.0000	9.0000	15.0000	3618
Tage	50.5001	2.7322	44.0833	50.4211	57.2000	3618

动并提出方案, 尤其CEO职业生涯后期的决策行为更容易受到企业高管团队的影响与制约 (Hambrick, 1984)。由此可见, 企业经营决策是高管团队成员的个人特征、知识以及经验融合的结果。而这一团队的多样性可以使企业获得更丰富的认知资源, 为企业的创新变革、组织绩效和战略决策提供强大的动力 (Seigyoung, 2005)。Clark (2010) 的实证结果也证实, 当高管中拥有不同的工作经验和教育背景时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投入, 优化高管团队的结构也是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的途径之一。综上, 本文认为, 高管的海外经历具有知识溢出效应和缓解企业资源约束效应, 帮助企业克服“安于现状”的短视现象, 努力寻求创新。当高管中具有海外经历的人数越多时, 这种创新驱动作用越强。由此, 本文提出假设:

H1: 高管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投入呈正相关关系。

(二) 高管海外经历与风险偏好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 面对不确定性环境时, 受个人心理因素和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 人们的决策行为并非完全理性, 风险态度和决策经常会偏离金融理论的最优模式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可变性。现有研究发现, 除高管的性别、年龄、任期等会影响其风险偏好 (程惠霞等, 2014; 汤颖梅等, 2011; 赖黎等, 2016) 外, 他们的教育背景与职业经历也会对决策过程产生影响 (Clark, 2010; 郭道燕等, 2016)。这是因为, 教育背景和以往工作经历代表一个人的知识认知和技能基础, 不同学科和工作领域有不同的训练目的和方法, 管理者在收集和解释信息的时候会去适应和强化他们所经受的训练, 这样通过长时间的熏习, 他们的价值观和认知偏好会逐渐改变。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 在国外曾接受先进教育、接触更前沿的商业知识和职业培训, 由此拥有更开阔的眼界和丰富的社会资源。因此, 相对于没有海外经历的高管, 他们被认为具有更强的创造能力、先进经验和高度专业化的技能, 制定决策时会更有信心、更倾向于为了成功而冒风险。由此本文认为, 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由于教育程度较高、职业经历丰富并且拥有先进的知识和管理经验, 在决策过程中会表现出更高的自信度和风险容忍度。当高管中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人数越多时, 对“收益越高风险越大”的理念认同会愈加一致, 高管风险偏好得以加强。由此, 本文提出假设:

H2: 高管海外经历与风险偏好呈正相关

表3 H1、H2和H3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Rd	Risk	Rd
ForeignBack	0.010*** (2.77)	0.086*** (3.37)	0.009** (2.42)
Risk			0.015*** (5.07)
State	0.012 (0.18)	-0.991** (-2.10)	0.027 (0.42)
Market	0.218*** (4.10)	2.267*** (6.00)	0.183*** (3.50)
Size	0.744*** (23.75)	-1.822*** (-9.33)	0.772*** (24.45)
Dual	-0.151** (-2.08)	0.015 (0.03)	-0.151** (-2.10)
Growth	0.102 (1.35)	-0.564 (-1.12)	0.111 (1.46)
Lev	0.273 (1.58)	5.293*** (3.88)	0.191 (1.11)
Roa	3.044*** (5.45)	-4.918 (-1.21)	3.120*** (5.70)
Tangibility	-0.324 (-1.53)	-31.993*** (-23.99)	0.169 (0.71)
Cash	0.178 (0.57)	-22.859*** (-12.06)	0.531 (1.60)
Top1	0.038 (0.19)	1.865 (1.37)	0.009 (0.04)
Large	0.628 (1.18)	-4.208 (-1.34)	0.693 (1.29)
Age	-0.014* (-1.93)	-0.007 (-0.15)	-0.014* (-1.92)
Outdir	0.712 (1.42)	-4.290 (-1.30)	0.778 (1.56)
Board	0.012 (0.69)	-0.262*** (-2.59)	0.016 (0.93)
Tage	-0.000 (-0.01)	0.185** (2.45)	-0.003 (-0.26)
Constant	0.411 (0.48)	51.751*** (10.44)	-0.387 (-0.44)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618	3618	3618
F值	58.28	61.93	59.27
Adj.R ²	0.439	0.455	0.445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 T 值，下同。

关系。

(三) 高管风险偏好的中介作用

在企业的所有投资项目中，创新活动由于其产出的不确定性和滞后性，会使企业经历更大的风险挑战，常被称为“冒险者的游戏”。高管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的决策和执行主体，其风险偏好也成为企业创新投入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表明，风险厌恶型的高管倾向于选择安全性较高的投资方案，更容易放弃研发投资活动；尤其在市场经济波动较大期间，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导致厌恶风险型的高管减少投资，从而导致企业减少对创新活动的投入（Todd和Gormley, 2016）。Cucculelli和Ermini（2013）证实具有较强风险偏好的CEO将更倾向于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提高企业创新水平来促进企业发展。Ana（2015）等的研究也发现CEO面对组织风险的态度和偏好会对企业的创新产生直接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企业的创新投资不仅仅取决于CEO个人特征及风险偏好，还更多受到高管团队互补作用的影响，尤其是高风险以及需要长期资源分配的决策通常需要与高管团队中的成员谈判协商决定（Hirshleifer, 2012）。Bantel和Jackson（1989）考察美国199家银行高管后发现拥有不同经历的高管在态度、知识和观点上会有所不同，这些不同促使高管团队进行了更多的企业研发活动；并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经历越丰富的高管团队在发起技术创新投资方面表现的越积极主动。前文已分析，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风险接受度一般较高，风险偏好会使他们为追求成功而甘愿承担创新活动的风险，由此提出第三个假设：

H3：在高管海外经历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过程中，风险偏好发挥中介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我国上市公司从2007年开始披露研发数据，但此后几年内仍有大量公司未披露或披露不充分，直到2013年后研发数据披露才明显增多。因此本文以2013-2018年沪深A股中公布研发投入信息的954家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进行以下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公司；（2）剔除数据缺失以及未连续披露公司；（3）剔除被ST、*ST以及财务指标存在异常公司。最终，获得了603家样本公司的3618个平衡面板数据。高管海外经历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中的高管个人特征数据，如有缺失则根据年报中披露的高管个人简历手工整理

表4 市场化进程与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变量	(1)	(2)
	Rd	Rd
ForeignBack	0.007** (1.97)	0.009** (2.55)
Risk	0.017*** (6.09)	0.018*** (6.41)
Market	0.160*** (3.33)	
Risk×Market	-0.012*** (-2.72)	
State		0.040* (0.64)
Risk×State		0.009** (2.06)
Size	0.785*** (27.23)	0.791*** (27.38)
Dual	-0.115* (-1.71)	-0.104 (-1.54)
Growth	0.075 (1.01)	0.075 (1.01)
Lev	-0.064 (-0.39)	-0.143 (-0.88)
Roa	2.852*** (5.44)	2.934*** (5.40)
Tangibility	0.037 (0.19)	0.065 (0.34)
Cash	0.699** (2.33)	0.710** (2.37)
Top1	0.161 (0.81)	0.161 (0.80)
Large	0.752* (1.75)	0.903** (2.00)
Age	-0.010 (-1.46)	-0.009 (-1.23)
Outdir	0.219 (0.43)	0.123 (0.24)
Board	0.017 (1.11)	0.016 (1.04)
Tage	-0.003 (-0.30)	-0.002 (-0.17)
Constant	-18.588*** (-23.84)	-18.806*** (-23.41)
行业效应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样本量	3618	3618
F值	61.72	62.62
Adj.R ²	0.428	0.426

加以补充。企业创新投入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并辅以企业年报手工整理。其余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和Wind数据库。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主要的连续变量进行首尾各1%的Winsorize处理。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投入（Rd）。本文借鉴唐清泉等人的研究，使用企业当年研发支出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创新投入。另外，使用企业当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作为稳健性测试中企业创新投入的代理变量。

2. 解释变量：高管海外经历（ForeignBack）。现有的研究中，主要通过3种方法衡量高管海外经历：（1）构建虚拟变量，当企业高管中至少有一人在海外学习或工作时，取值为1，否则为0。（2）海归高管人数，即企业高管中曾有海外经历的人数之和。（3）海归高管比例，即企业中海归高管人数除以高管总人数。考虑到虚拟变量和总人数反映高管海外经历存在片面性和绝对性，本文采用企业当年曾在海外工作或学习高管人数占高管总人数的比例来衡量高管海外经历。

3. 中介变量：风险偏好（Risk）。高管风险偏好指高管面临企业经营风险时采取的不同态度。根据已有文献，高管的风险偏好会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产配置等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一般情况下，企业的风险资产占比越高，代表该企业高管的风险偏好越强。本文借鉴汤颖梅、郭道燕等人的研究，采用企业当年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账款、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及投资性房地产五项风险资产之和占企业当年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高管风险偏好水平。

4. 调节变量：市场化进程（Market），根据王小鲁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9）》公布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定义企业所在地当年的市场化进程指数大于当年中位值水平，取值为1，否则为0。产权性质（State），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

5.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企业规模、两职合一、成长能力、财务杠杆、盈利能力、资产结构、现金比率、管理层持股、股权集中度、企业年龄、独董比例、董事会规模和高管平均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同时控制了年份效应和行业效应。上述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三) 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高管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投入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高管海外工作经历组			高管海外学习经历组		
	Inno	Risk	Inno	Inno	Risk	Inno
ForeignWork	0.034***	0.127***	0.030***			
	(4.40)	(4.39)	(3.85)			
ForeignStudy				0.002	0.142***	-0.003
				(0.28)	(4.59)	(-0.34)
Risk			0.032***			0.034***
			(6.66)			(6.94)
Controls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618	3618	3618	3618	3618	3618
F值	24.92	38.19	23.91	22.85	37.71	28.08
Adj.R ²	0.366	0.396	0.379	0.364	0.397	0.377

表6 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Sobel检验 (Z值)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	
		下限 (P)	上限 (P)
Rd (全样本)	3.642***	0.0435835	0.0598329
Rd (市场化进程较慢组)	2.865***	0.0332081	0.0596147
Rd (国有企业组)	2.734***	0.0422488	0.0676604

之间的关系(H1), 构建模型1:

$$Rd_{it+1} = \alpha_0 + \alpha_1 ForeignBack_{it} + \alpha_2 Controls_{it}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 \quad (1)$$

为了检验高管海外经历与风险偏好之间的关系(H2), 构建模型2:

$$Risk_{it} = \beta_0 + \beta_1 ForeignBack_{it} + \beta_2 Controls_{it}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 \quad (2)$$

为了检验高管风险偏好在高管海外经历影响企业创新投入过程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H3), 借鉴温忠麟(2014)检验中介效应的三步法, 在模型1、2的基础上构建模型3:

$$Rd_{it+1} = \gamma_0 + \gamma_1 ForeignBack_{it} + \gamma_2 Risk_{it} + \gamma_3 Controls_{it}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 \quad (3)$$

本文通过逐步检验模型1、2、3中回归系数 α_1 、 β_1 、 γ_1 、 γ_2 显著性的方法验证风险偏好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检验过程共分为三步: (1) α_1 显著, 应进行下一步检验; 反之则说明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无影响即检验终止。(2) β_1 和 γ_2 都显著, 应进行下一步检验; β_1 和 γ_2 中至少有一个不显著, 应进行Sobel检验。如果Sobel检验的结果显著, 说明风险偏好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如果Sobel检验的结果不显著, 说明风险偏好不存在中介效应即检验终止。(3) γ_1 显著, 说明风险偏好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γ_1 不显著, 说明风险偏好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三、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以看到, 企业创新投入(Rd)的极小值是12.2290, 极大值是22.4235, 标准差是1.7137, 表明不同企业创新投入的差异性仍然较大, 仍有部分企业缺乏创新投入。高管海外经历(ForeignBack)的均值是0.0619, 即大约每100位企业高管中有6位高管具有海外经历, 表明在企业高管中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仍然属于少数群体。另外, 采用企业的风险资产占比(Risk)衡量高管风险偏好, 其均值是0.1280, 极小值是0, 极大值是0.4858, 表明不同的企业高管风险偏好水平各不相同。其余变量中, 企业规模(Size)、年龄(Age)以及高管平均年龄(Tage)的标准差都较大, 表明不同的企业和高管仍存在较大差异。

(二) 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方法作为基准模型并控制年份效应和行业效应。另外, 由于企业创新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借鉴虞义华等(2018)的做法将企业创新投入滞后一期处理。回归结果见表3, 由模型1可知, 高管海外经历(ForeignBack)对企业创新投入(Rd)的回归中, 回归系数 α_1 为0.010, 在1%水平显著, 说明了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H1得到验证。对于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企业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 其创新投入越大; 企业年龄和两职合一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成立时间较长、两职合一的企业对创新活动的投入仍然较少。

由表3模型2可知, 高管海外经历与风险偏好的回归系数 β_1 为0.086, 在1%水平显著正相关, 说明海外经历高管占比较高的企业风险偏好一般较强, 支持H2。在模型3中, 高管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回归系数 γ_1 为0.009, 在5%水平显著正相关; 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回归系数 γ_2 为0.015, 在1%水平显著正相关。根据温忠麟检验中介效应的三步法并结合上文的分析, α_1 、 β_1 、 γ_1 、 γ_2 均显著为正, 表明风险偏好在高管海外经历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H3得到验证。由中介路径分析结果可知, 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 是风险偏好在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往往具有更开阔的眼界和丰富的社会资源, 对企业创新这一高风险、高成本活动的风险接受度也会更高, 从而促

进了企业创新投入。

四、进一步分析

1. 市场化进程的调节效应。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根植于社会环境中，不管是高管的偏好、行为还是企业的创新活动都与其所处市场环境密不可分、相互交织。虽然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但由于地域辽阔，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因历史背景、社会文化、地理位置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存在明显差异（王小鲁，2019）。考虑到地区市场化进程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延续性，本文进一步探讨在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下，高管风险偏好在高管海外经历影响企业创新之间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如何变化。前文已分析高管风险偏好的中介效应显著，故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高管风险偏好与市场化进程的交互项（Risk×Market），构建如下交互回归模型：

$$Rd_{it+1} = \mu_0 + \mu_1 ForeignBack_{it} + \mu_2 Risk_{it} + \mu_3 Market_{it} + \mu_4 Risk_{it} \times Market_{it} + \mu_5 Controls_{it}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 \quad (4)$$

表4报告了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由表4列（1）可以看出，高管风险偏好与市场化进程的交互项（Risk×Market）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风险偏好的中介作用受到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负向调节。究其原因，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产品竞争也愈加激烈，企业本身的创新意识较强，而且这些地区通常经济较发达，更容易吸引到具有多元化思维的高管，避免短视缺陷，所以海归高管的知识溢出效应减弱，高管风险偏好在海外经历影响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并不明显。而在市场化进程较慢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制度环境等相对落后，海归高管的加入可以为企业带来丰富的管理经验，知识溢出效应可以显著改善高管的风险规避倾向，使得企业更加偏好高风险、高成本的投资项目，进而促使企业加强创新投入。

2. 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考虑到作为控制企业经营决策的治理机制，企业的所有权安排会对高管风险偏好和企业创新活动产生影响。本文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高管风险偏好与企业产权性质的交互项（Risk×State），构建如下交互回归模型：

$$Rd_{it+1} = \lambda_0 + \lambda_1 ForeignBack_{it} + \lambda_2 Risk_{it} + \lambda_3 State_{it} + \lambda_4 Risk_{it} \times State_{it} + \lambda_5 Controls_{it}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 \quad (5)$$

表4列（2）回归结果表明，交互项（Risk×State）的系数为0.009，在5%水平显

著为正，表明高管风险偏好的中介作用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正向调节，即产生了被调节的中介效应。这可能是由于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2015年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更是明确提出，要培育世界一流创新企业和发挥企业家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导向和支柱，势必要成为国家创新的主体。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开始打破固有限制积极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任职，一定程度上也正是看中海外经历对企业创新的积极推动作用。海外高管渊博的学识、广阔的视野、丰富的社会资源及由此产生的自信，无形中会提高高管为追求成功而敢于冒险研究的勇气并显著增加企业的创新投入。而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和灵活的制度，使非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长期以来一直强于国有企业。对非国有企业而言，创新是生存之道、是刚需，高管是否具有海外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不显著也就不难理解。

五、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以下稳健性测试：

1. 替换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借鉴虞义华等的研究，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选择研销比（Inno）即企业当年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作为企业创新投入的代理变量。另外，将海外经历进一步细分为海外工作经历和海外学习经历，即高管海外经历定义为有海外工作经历高管人数（ForeignWork）和海外学习经历工作人数（ForeignStudy）分别占高管总人数的比值。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5，回归结果表明本文的H1、H2、H3在高管海外工作经历组得到验证，再次支持前文的结论；而在高管海外学习经历组中，风险偏好这一中介效应并不存在。进一步表明相较于海外学习经历，高管的海外工作经历更有助于改善高管的风险规避问题，从而提高企业创新投入。

2. Sobel检验和Bootstrap法。本文将样本根据市场化进程快慢和企业产权性质进行分组，并借鉴温忠麟的做法采用Sobel检验和Bootstrap法对高管风险偏好的中介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由表6可知，Sobel检验中Z值均显著，Bootstrap法中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值，说明高管风险偏好这一中介效应显著存在，再次验证了H3，即风险偏好在高管海外经历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创新投入衡量企业创新，基于高层梯队理论、行为金融理论、资源约束理论和知识溢出效应等对高管海外经历、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实证研究发现：（1）高管海外经历与风险偏好显著正相关，企业中拥有海外经历的高管越多，制定决策时的风险偏好越强烈，可以改善企业高管的风险规避问题。

（2）高管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企业中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越多，越有助于提高企业对创新这一高风险、高成本活动的投入，而且在这一过程中高管风险偏好发挥部分中介效应。（3）高管风险偏好这一中介效应受市场化进程和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影响，在市场化进程较慢地区和国有企业中，海归高管的加入可以进一步改善企业风险规避从而提高创新投入。

本文的启示包括：（1）企业应建立并完善海外高管的聘用机制。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知识溢出效应、提高企业创新投入、改善企业创新不足的现象，企业在聘用高管时可以多关注此方面的经历背景，创造条件吸引更多海归人才加入到企业高管队伍中。而且风险偏好不同的高管在工作中有不同的决策风格，企业应依据职位需要和高管风险偏好进行合理的人事安排，如选择风险偏好较强的海外高管进入与研发投资相关的岗位，以此促进企业创新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2）企业应建立并完善高管的海外培训机制。管理的本质是一种实践，在某些情形下，阅历比简历更重要。给

予高管更多的海外培训和海外工作机会，将有助于他们增长学识、形成多元化的思维结构、开拓广阔视野、提升创新勇气，这些综合能力的培养对于企业的国际化和企业价值增长大有裨益。（3）政府应加大海外人才引进，激励企业创新。研究表明，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可以显著改善市场化进程较慢地区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的风险规避倾向从而提高企业创新投入，政府在激励市场化进程较慢地区和国有企业创新时应重点关注海外人才的引进。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8YJC630037）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8BGL06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 Saxenina, A.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J]. *Economic Geography*, 2009(1): 116-224.
2. Hambrick, D. C. and 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193-206.
3. Liu, X., and Lu, J., and I Filatotchev. Returnee entrepreneurs,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innovation in high-tech firms in emerg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0, 41(7):1183-1197.
4. Clark, T., and F. Steven, and W. Mike. Top Management Team Advice Seeking 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MT Heterogeneit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11):1343-1364.
5. Todd, A. G., and A. M. David. Playing it safe? Managerial preferences, risk, and agency conflict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6(3):431-455.
6. Hirshleifer, D. A., Low A., Teoh S.. "Are Overconfident CEOs Better Innovator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2(67):1457-1498.
7. Bantel, K.A., Jackson, S.E. Top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s in banking: doe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op team make a differe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9(10):107-124.
8. 宋建波, 文雯, 王德宏. 海归高管能促进企业风险承担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财贸经济*. 2017 (12)
9. 唐清泉, 徐欣, 曹媛. 股权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9 (08)
10. 郭道燕, 黄国良, 张亮亮. 高管财务经历、风险偏好与公司超速增长——来自中国经济“黄金期”的经验证据.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6 (10)
11. 虞义华, 赵奇峰, 鞠晓生. 发明家高管与企业创新.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03)
12.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05)

内部代理成本、企业避税与财务绩效

■ 杨旭东 肖敏 何健健

摘要 本文基于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9—2017年数据,检验了企业避税行为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内部代理成本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的合理避税措施会对其财务绩效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内部代理成本会显著削弱避税之于财务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且这种影响机制在国有性质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结论表明企业的避税活动不仅能产生节税收益提升财务绩效,同时也会受到内部代理成本的负向影响。该结论有效补充了企业避税的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并为企业合理避税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 代理成本 企业避税 财务绩效

一、引言

近些年来,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项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经济发展提供助力。税收优惠政策,使得同一集团内不同企业之间的税率存在一定差异,企业集团就有动机利用税率差异,通过一些避税行为达到降低集团整体税负的目的(Klassenetal., 1993; Gramlichetal., 2004; Loetal., 2010; Shevlinetal., 2012)。税收规避作为企业的一种税收筹划活动,是企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可以实现社会财富由国家向企业的转移(DesaiandDharmapala, 2009),减少企业的税收支出,提高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LanisandRichardson, 2011);而货币资金是企业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可以用于缓解融资约束(陈作华, 2018; 刘树海, 2019)、改善资金方面的困境、扩大企业的投资规模(刘行和叶康涛, 2013; 陈北国和杨孝安, 2015),进而影响企业的资产回报率。

企业在进行纳税筹划以使其符合税收优惠政策时,也会带来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成本支出,造成负面效应(Balakrishnan, 2011; Hope, 2013; 姚立杰和付方佳, 2018)。由于避税活动本身的隐蔽性和复杂性(蔡宏标和饶品贵, 2015),企业财务信息

的不透明会加剧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的程度(ChenandChu, 2005; Desaietal., 2007; 陈冬, 2012),为管理者自利寻租行为提供了机会(Schadewaldetal., 2005; 叶康涛和刘行, 2014; 刘英男和赵洋, 2019),掩盖其谋取私利的真实目的(Kimetal., 2011)。两权分离所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会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内部代理成本,而代理成本本身会负向调节避税所能带来的积极影响。因此,本文利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9—2017年数据,对企业避税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内部代理成本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进行研究。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企业避税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是将本应上缴给税务机关的利润留存在内部的一种方式。有效避税节约了税收成本支出,增加了企业的税后收益(HanlonandHeitzman, 2010; 汪猛和徐经长, 2016),充裕了企业的现金流(LanisandRichardson, 2011; 刘行和叶康涛, 2013)。充足的货币资金是企业经营服务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有利于企业合理安排支出,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童锦治和黄克珑, 2015)。一方面,企业可以利用节约的现金流进行有效投资(陈北国和杨孝安, 2015

表1 变量定义表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及说明
被解释变量	公司绩效	ROA	公司的资产报酬率
解释变量	避税程度	DDBTD	会计—税收差异与总应计利润的残差值
	代理成本	Agent	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控制变量	资本结构	lev	负债/总资产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现金流量比	ocf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
	托宾Q	tq	市值/(总资产—无形资产净额—商誉净额)
	企业年龄	age	企业上市的年数
	股权集中度	shares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两职合一	dual	总经理与董事长是否两职合一的虚拟变量
	管理层持股比例	mshare	管理层持股数量/总股数
	产权性质	state	是否国有, 若为国有企业取为1, 否则取0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ROA	11034	0.0743	0.0497	-0.1245	0.0632	0.258
DDBTD	11034	0.00425	0.02031	-0.08734	-0.00516	0.08267
Agent	11034	0.0921	0.0688	0.0097	0.0781	0.5352
size	11034	22.3362	1.2584	19.5197	22.1611	26.0627
lev	11034	0.4287	0.1981	0.0563	0.4268	0.9431
ocf	11034	0.0609	0.0892	-0.2487	0.0583	0.3597
tq	11034	2.2567	1.8828	0.209	1.725	10.0071
mshare	11034	0.112	0.1852	0	0.0012	0.6563
dual	11034	0.2255	0.4179	0	0.0012	0.6563
shares	11034	0.3611	0.1512	0.085	0.3433	0.75
state	11034	0.4357	0.4959	0	0	1
age	11034	11.008	6.2178	3	10	28

表3 企业避税与财务绩效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ROA	
DDBTD	0.0636*** (27.0969)	
lev	-0.0293*** (-10.0325)	-0.0412*** (-13.5640)
size	0.0083*** (18.1047)	0.0107*** (23.1514)
ocf	0.1726*** (29.1364)	0.1861*** (30.7054)
tq	0.0079*** (17.7504)	0.0088*** (19.1746)
mshare	-0.0007 (-0.2515)	0.0013 (0.4879)
dual	-0.0013 (-1.4633)	-0.001 (-0.9958)
shares	0.0085*** (3.2307)	0.0083*** (2.9873)
state	-0.0092*** (-9.6026)	-0.0105*** (-10.4097)
age	0.0004*** (4.5026)	0.0005*** (5.417)
_cons	-0.1332*** (-12.4085)	-0.1858*** (-17.0360)
行业	控制	
年份	控制	
N	11034	11034
r ² _a	0.431	0.3768
F值	154.5189	111.4946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 GaryRFetal., 2016), 扩大投资规模。投资作为企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良好的投资机会可以为企业带来持续稳定的高额收益, 最终转化为净利润, 提高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另一方面, 充裕的现金流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刘行和吕长江, 2018; 刘英男和赵洋, 2019), 减少银行信贷以及其他长期借款的负担, 进而有效降低企业借款利息和其他偿债成本, 变相提高了企业的净利润, 有助于企业财务绩效的稳步提升。据此, 提出如下假设:

H1: 企业合理避税将会提高企业财务绩效。



(二) 内部代理成本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现代企业两权分离衍生了委托代理关系, 所有者和管理层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易带来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BerleandMeans, 1932)。内部代理问题势必会产生内部代理成本, 主要包括股东的监督成本、管理层的守约成本以及决策变化所产生的剩余成本三部分(JensenandMeckling, 1976)。两权分离程度越高, 企业所有者往往需要承担越多的代理成本(肖作平, 2012; 彭若弘和于文超, 2018)。在现代企业中, 信息不对称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疑难问题(王鹏, 2008; 罗明琦和宋常, 2014; 姚贝贝和林爱梅, 2018)。因为管理层相对于所有者而言, 在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过程中掌握着更多的信息资源, 所以有机会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导

表4 内部代理成本与财务绩效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ROA		
	全样本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Agent	-0.1157*** (-14.4409)	-0.0609*** (-4.7240)	-0.1393*** (-14.5156)
size	0.0101*** (21.7021)	0.0090*** (15.8612)	0.0143*** (18.8612)
lev	-0.0521*** (-17.2093)	-0.0455*** (-10.6833)	-0.0560*** (-13.4314)
ocf	0.1800*** (30.0523)	0.1619*** (19.3662)	0.1906*** (23.339)
tq	0.0095*** (19.8194)	0.0130*** (18.4137)	0.0087*** (16.0384)
mshare	0.0019 (0.6954)	0.1872*** (7.1959)	0.0081*** (2.8668)
dual	0.0008 (0.7721)	-0.0022 (-1.1641)	0.0016 (1.3368)
shares	0.0052* (1.8759)	0.0018 (0.4565)	0.0178*** (4.5466)
age	0.0005*** (6.0563)	0.0006*** (5.5922)	0.0005*** (4.1221)
_cons	-0.1519*** (-13.5545)	-0.1546*** (-11.2935)	-0.2442*** (-13.0824)
行业	控制		
年份	控制		
N	11034	4807	6227
r2_a	0.3906	0.4049	0.4129
F值	115.7993	60.0648	80.5676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表5 内部代理成本、企业避税与财务绩效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ROA		
	全样本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D_agent	-0.1292*** (-3.3486)	-0.1966*** (-2.8422)	-0.1198*** (-2.5872)
DDBTD	0.0766*** (17.4179)	0.0724*** (10.4128)	0.0778*** (13.6278)
agent	-0.1162*** (-14.5452)	-0.0629*** (-4.8157)	-0.1390*** (-14.7202)
size	0.0074*** (16.1114)	0.0073*** (12.91)	0.0100*** (13.4626)
lev	-0.0378*** (-12.9538)	-0.0316*** (-7.5074)	-0.0415*** (-10.4115)
ocf	0.1662*** (28.4842)	0.1563*** (19.0362)	0.1712*** (21.5917)
tq	0.0085*** (18.4787)	0.0120*** (17.1688)	0.0078*** (14.8974)
mshare	-0.0002 (-0.0609)	0.1552*** (6.6972)	0.0045* (1.6779)
shares	0.0052* (1.8759)	0.0018 (0.4565)	0.0178*** (4.5466)
age	0.0005*** (6.0563)	0.0006*** (5.5922)	0.0005*** (4.1221)
_cons	-0.0945*** (-8.5898)	-0.1218*** (-8.9138)	-0.1466*** (-8.0690)
行业	控制		
年份	控制		
N	11034	4807	6227
r2_a	0.4499	0.4492	0.4742
F	154.7452	72.928	113.1942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致内部代理成本的支出增加，最终影响期末净利润，削弱企业财务绩效。据此，提出如

下假设：

H2：内部代理成本将会削弱企业财务绩效。

(三) 内部代理成本的调节作用

企业大多利用关联交易等复杂的交易活动来进行税收筹划（黄蓉和易阳，2013）。虽然这么做能够带来税后增值收益，但由于筹划过于复杂，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会计信息的噪音，降低会计信息的透明度，恶化企业的会计信息环境。这种不明朗的信息环境为管理层自利行为提供了机会（Desai and Dharmapala, 2006）。管理层可能会利用避税活动所带来的“监管真空”掩盖自身谋取私利（张玲和朱婷婷，2015）、进行利益掏空的行为（Schadewald, 2005；陈冬和唐建新，2013），加剧企业内部委托代理冲突。内部委托代理问题的加剧会进一步增加内部代理成本，成本支出的增加会削弱企业避税所能带来的财务绩效的提升（LaPorta et al., 1999；Claessens et al., 2002；王鹏和周黎安，2006；王鹏，2008），产生效率损失（Slemrod, 2004）。此外，企业避税节省的现金流可以用于投资行为，但代理问题使得管理层可能做出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投资决策（罗明琦和宋常，2014），造成投资异化现象。风险厌恶型的管理者可能会放弃风险大但净现值可观的投资项目，进而造成投资不足（Myers SC, 1977）；而风险偏好型的管理层则偏好于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容易造成过度投资（Jensen FE, 1993）。因此，以避税为由，投资不足以及投资过度等短期行为都会产生决策失败成本，使得投资效率降低（罗明琦和宋常，2014），造成内部代理成本的增加，最终导致财务绩效下降。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内部代理成本会反向调节企业避税对于财务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2008年新的所得税法开始实施，企业所得税由原来的33%下调到25%，为了保持数据的可比性和一致性，本文以2009年至2017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对初始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了金融行业样本公司，金融行业公司与其他公司相比实施的是不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产生的差

表6 变量替换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EBIT		
	全样本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E_agent	-0.2048*** (-3.0228)	-0.2624** (-2.2571)	-0.1313** (-2.2537)
ETR	0.0329*** (3.4383)	0.0548*** (3.6306)	0.0236*** (2.6256)
_cons	-0.9215*** (-38.3826)	-1.2092*** (-35.0314)	-0.5049*** (-22.7656)
行业	控制		
年度	控制		
N	11033	4806	6227
r2_a	0.4973	0.5509	0.4693
F	64.9114	39.1472	68.6522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异较大；(2)剔除了主要变量缺失的样本；(3)删除了ST和*ST公司样本，因其财务数据异常。同时，为避免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对文中所有的连续变量在1%和99%的水平上进行Winsorize处理。经过上述处理，得到有效的样本年度观测值11034个。本文的数据来自于CSMAR和WIND数据库，采用EXCEL和stata14.0进行数据处理和实证检验。

(二) 主要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企业避税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一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ROA_{i,t} = \alpha_0 + \alpha_1 DDBTD_{i,t} + \sum control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前文提出假设，在一定的条件下，代理成本与财务绩效之间是负向影响效应，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本文构建模型二进行实证检验：

$$ROA_{i,t} = \beta_0 + \beta_1 Agent_{i,t} + \sum control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为了检验代理成本对企业避税与财务绩效之间的负向调节作用，本文构建模型三进行回归分析：

$$ROA_{i,t} = \gamma_0 + \gamma_1 D_agent_{i,t} + \gamma_2 DDBTD_{i,t} + \gamma_3 Agent_{i,t} + \sum control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上述模型中，ROA是资产报酬率，表示公司的财务绩效，后续稳健性检验中采取息税前利润EBIT来衡量。目前学术界对于企业避税程度的衡量标准尚未统一，根据前人研究，本文将避税程度的衡量方法分为两大类，一类使用企业实际所得税率及其变形，另一类则使用会计一税收差异及其变形来衡量。本文用DDBTD来衡量企业的避税程度，DDBTD是会计一税收差异与应计利润

回归得到的总残差值，该指标的选取参照了Desai and Dharmapala (2006)、彭少伟和王伟(2011)、陈旭东和王雪(2011)以及施先旺和刘馨月(2017)的做法。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BTD = \alpha TACC + \mu_i + \varepsilon_{i,t}$ ，其中BTD为会计利润总额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额，TACC为总应计利润，用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之差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 μ_i 表示公司i在样本期间内残差的平均值， $\varepsilon_{i,t}$ 表示t年度残差与公司平均残差 μ_i 的偏离度。 $DDBTD = \mu_i + \varepsilon_{i,t}$ ，代表着会计一税收差异中不能被应计利润解释的那一部分。该指标衡量



的是企业避税的程度，该值越大，表示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在后续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将采取实际所得税率与名义所得税率之差ETR来衡量企业避税程度。根据叶康涛和刘行(2014)、罗炜和朱春艳(2010)的研究，代理成本采用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来衡量。D_agent是企业避税程度与代理成本的交乘项，用来实证检验代理成本与企业避税程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选取了企业规模、资本结构、企业年龄、现金流量、托宾Q、管理层持股比例、产权性质等变量进行控制，由于在不同行业和年度层面公司的实际税负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本文还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相关变量定义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从描述性统计表2可以看到, DDBTD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差异很大, 表明不同企业之间的税负差异很大; DDBTD的均值为正, 表明我国税法上的应纳税所得额小于会计利润, 说明大部分企业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避税活动, 降低了企业的实际税负。ROA的最大值为0.258, 最小值为-0.1245, 表明不同企业之间的资产报酬率差异很大。Agent的最小值为0.0097, 最大值为0.5353, 说明代理成本在不



同公司之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在控制变量中, lev的最大值接近于1, 最小值为0.0563, 表明企业之间的资本结构差异较大, 且其均值和中位数均接近0.5, 说明近一半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高达50%。ocf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差异较大, 也表明不同企业的现金流量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dual的均值为0.2255, 说明有22.55%的公司存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情况。管理层持股比例两极分化现象严重, 说明企业的管理层持股情况存在较大差异。state的均值为0.4357,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中有43.57%的公司是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所占比例与国企相比略高一些。

(二) 多元回归分析

1. 避税程度与公司绩效的多元回归分析

表3为企业避税程度与公司绩效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到, 企业的避税程度DDBTD和公司绩效ROA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一实证结果支持了避税的传统观, 即避税为企业节约了费用开支, 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 降低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有利于企

业整体绩效水平的提高。在控制变量中, 公司规模、现金流水平、托宾Q、管理层持股比例和企业上市年限均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 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情况相一致, 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另一方面, 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 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 企业的财务风险也相应越高, 企业的资金压力相应也就越大, 不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 同时, 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的平均财务绩效差。

2. 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的回归分析

表4展示了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 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 代理成本Agent与公司绩效ROA之间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负相关关系, 说明公司的代理成本越高, 管理层自利行为也越明显, 公司合理避税产生的现金流用于提升绩效的可能性也越小。

3. 避税程度、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的回归分析

表5报告了在考虑内部代理成本的情况下, 企业避税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由表5可知, 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代理成本Agent及其与避税程度的交乘项D_agent进行回归后, 交乘项与公司绩效ROA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 说明代理成本在避税程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之间起到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根据叶康涛和刘行(2014)的研究, 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 公司内部代理成本也就越高, 企业的避税活动虽然能够提升企业绩效, 但是由于代理成本的存在, 企业的避税行为也会加剧企业的代理问题。为了给公司带来更多的节税收益, 管理层要进行非常专业化的纳税筹划活动, 同时也面临着被税务部门稽查的风险。因此, 为了防范税务稽查的风险并得到补偿, 管理层会通过一系列复杂且模糊的交易来掩盖其税收规避行为, 从而使避税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更多地用于企业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和补偿行为。从这一层面上而言, 避税行为会加剧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引发更严重的代理问题, 加剧企业的代理成本, 而代理成本显然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和长远的发展。因此, 在代理成本的调节作用下, 企业避税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研究结论更为稳健, 本文参照杨旭东等(2019)、叶康涛和刘行(2014)、江

轩宇(2013)的做法,将企业避税的指标用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之差来衡量。另外,将公司财务绩效用息税前利润与公司资产的比值EBIT来衡量,代理成本和企业避税程度的交乘项用E_agent来衡量。通过回归发现(表6),企业避税程度ETR和财务绩效EBIT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同时,在全样本中,E_agent和财务绩效EBIT之间在1%的显著性水平负相关,这进一步验证了H3,说明代理成本的存在显著调节了企业避税与财务绩效之间的正向影响效应,结果比较稳健。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9—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企业避税、代理成本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在一定条件下,企业避税能够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2)基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代理成本的存在,会显著地负向影响公司财务绩效;(3)不管是在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代理成本都能显著地对企业避税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上述研究表明,避税活动为企业节约了现金流,为管理者的投资活动提供了更多的盈余资金,加强企业的资产流动性,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企业财务绩效。但另一方面,在考虑避税带来的节税收益的同时,也要权衡其带来的成本支出,代理成本的存在,会显著改变避税活动对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和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企业要树立科学的避税观,不能仅仅看到避税带来的收益而忽视其带来的避税成本,企业要从整体上权衡

避税活动带来的收益与成本。企业要更加注意避税活动导致的管理层自利行为以及代理问题。其次,企业的避税活动要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不能违反法律法规。避税行为作为一种介于“灰色地带”的财务活动,如若操作不当,极易受到外部税收监管部门的监管而使企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最后,企业的避税活动为企业节约的现金流要加强管理,基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要十分警惕,企业要合理有效地利用避税活动为企业带来的节税收益,避免代理问题的存在使得避税活动带来的收益反而削弱企业的价值。因此,企业需要基于有效税收筹划的角度,全面统筹规划避税收益与成本,加强对避税活动的管理控制,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和企业价值的提升。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9C1683);邵阳市社科评审委项目(项目编号:19YBB46)。

作者单位:邵阳学院会计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 Balakrishnan, K., J. Blouin and W. Guay, 2012. "Does Tax Aggressiveness Reduce Corporate Transparency?"
2. Chen, S., X. Chen, Q. Cheng and T. Shevlin. 2010. Are Family Firms More Tax Aggressive than Non-Family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95 (1):41-61
3. Chen, Kong-Pin., C. Chu, and Y. Cyrus. 2005. "Internal Control versus External Manipulation: A Model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Evasion."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6(1):151-164.
4. Desai, M. A., A. Dyck, and L. Zingales. 2007. Theft and Tax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4 (3):591-623
5. 蔡宏标, 饶品贵. 机构投资者、税收征管与企业避税. *会计研究*. 2015(10)
6. 陈北国, 杨孝安. 企业避税活动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财会月刊*. 2015(12)
7. 陈作华, 方红星. 融资约束、内部控制与企业避税. *管理科学*. 2018 (03)
8. 刘树海. 货币政策冲击、存货持有行为与企业避税强度——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经验证据. *税务研究*. 2019(01)
9. 刘行, 吕长江. 企业避税的战略效应——基于避税对企业产品市场绩效的影响研究. *金融研究*. 2018(07)
10. 彭若弘, 于文超. 环境不确定性、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 *投资研究*. 2018 (10)
11. 姚立杰, 付方佳, 程小可. 企业避税、债务融资能力和债务成本. *中国软科学*. 2018(10)
12. 肖作平. 委托代理关系、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价值. *证券市场导报*. 2012(12)

连锁董事与信息风险的实证分析

■ 蔡慧

摘要 本文从董事的社会联结视角,考察了连锁董事对公司信息风险及其构成成分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连锁董事数量、连锁董事比例均有助于降低公司信息风险;将信息风险分解为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后,连锁董事对这两种风险均有降低作用;在连锁董事总影响力较大的公司中,连锁董事数量和连锁董事比例对信息风险及其构成成分的降低作用更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连锁董事对基本面信息风险的影响会逐渐减弱,而对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的影响不会发生改变。

关键词 连锁董事 信息风险 社会网络

一、引言

经济活动中固有的信息不对称和人为因素的干预、无效传导为信息风险的滋生提供了条件。信息风险是指与利益相关者决策相关的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较低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较差的可能性,可以导致会计信息质量波动性增加。信息风险从风险的视角反映了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也为投资者辨识公司重大盈余管理提供了甄别指标,当信息风险超过某一阈值时,则需要密切关注公司重大盈余管理存在的可能性。虽然信息风险和会计信息质量息息相关,但信息风险将不确定性和波动性纳入至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价体系中,更有助于分析公司信息披露与经济现实中的偏差问题及该偏差所产生的经济后果。

已有关于信息风险的研究基本基于正式制度探讨影响信息风险的因素,尚未基于非正式制度因素研究董事联结对信息风险的影响。事实上,董事作为公司经营决策的核心力量,在公司经营活动中扮演联结作用,这种关系与联结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因素,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着重要影响。在两家及两家以上公司董事会担任相关职务的董事,即为连锁董事。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结在公司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且连锁董事这一群体与公司之间

已然形成了一个关系网络。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个人无法完全依靠自身固有的能力在社会网络中搜集和获得信息、利用资源,而需依赖于社会层面包括家族及家族外网络的支持。公司的经营决策行为能够通过社会网络在不同群体间传递。一方面,连锁董事能为公司带来声誉、资源、信息等多样化的社会资本,连锁董事可以通过其网络关系为其任职的公司传递信息和知识;另一方面,镶嵌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能够强化连锁董事的监督职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管理层的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从而使得公司信息风险降低。由此,本文试图从董事网络这一角度,将公司的财务与会计行为置于社会关系网络中,探讨连锁董事如何通过其社会关系与社会联结这一非正式渠道影响公司的信息风险,以丰富连锁董事这一领域的文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 文献回顾

从已有的关于信息风险的研究来看,影响信息风险的因素主要包括会计重述、公司治理、公司成长机会、无形资产比例、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创新投入等等。学者们基于应计质量的波动性,将信息风险分解为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最小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大值
Irisk	9472	0.0041	0.0879	0.0668	0.0725	0.3776
Frisk	9472	0.0481	0.0890	0.0815	0.0303	0.2091
Mrisk	9472	-0.1087	-0.0011	-0.0181	0.0662	0.2567
Inlock1	9472	1.0000	3.4837	3.0000	2.4601	12.0000
Inlock2	9472	0.0909	0.4001	0.3333	0.2738	1.2727
Size	9472	19.1604	22.0004	21.8435	1.2385	25.6377
Lev	9472	0.0523	0.4577	0.4569	0.2153	1.0361
ROA	9472	-0.1882	0.0546	0.0507	0.0582	0.2445
Top5	9472	0.1762	0.5222	0.5247	0.1548	0.8595
Refin	9472	0.0000	0.2238	0.0000	0.4168	1.0000
Maho	9472	0.0000	0.0515	0.0001	0.1195	0.5701
TobinQ	9472	0.9044	2.7583	2.0908	2.1183	14.9152
Cflow	9472	-0.2033	0.0421	0.0413	0.0752	0.2574
Growth	9472	-0.6288	0.2017	0.1008	0.5978	4.7398
Indratio	9472	0.3077	0.3715	0.3333	0.0531	0.5714
Bsize	9472	1.6094	2.1571	2.1972	0.1942	2.7081
Duality	9472	0.0000	0.2284	0.0000	0.4198	1.0000

表2 均值差异检验

变量	按连锁董事数量分组					
	(1)少连锁董事		(2)多连锁董事		Difference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1)-(2)	t值
Irisk	0.0911	0.0742	0.0834	0.0696	0.0077***	5.07
Frisk	0.0905	0.0311	0.0869	0.0290	0.0036***	5.70
Mrisk	0.0006	0.0679	-0.0034	0.0636	0.0040***	2.88
变量	按连锁董事比例分组					
	(1)低连锁董事比例		(2)高连锁董事比例		Difference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1)-(2)	t值
Irisk	0.0908	0.0738	0.0838	0.0704	0.0069***	4.57
Frisk	0.0901	0.0311	0.0874	0.0291	0.0027***	4.22
Mrisk	0.0007	0.0675	-0.0035	0.0642	0.0042***	3.04

险，基本面信息风险是与公司固有特征相关的风险，操控性信息风险则是与管理层操控会计信息相关的风险。会计重述会降低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和管理层声誉，从而导致操控性信息风险加剧，资本成本增加。独立董事兼职席位有助于提高公司审计质量，降低信息风险。成长性较好、杠杆率较高以及面临财务困境的公司信息风险较高，有形资产占比较高、公司规模较大以及经营现金流较多的公司信息风险较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信息风险呈现U型关系，董事会规模可以降低信息风险，创新投入增加会导致公司信息风险提升，且创新投入对信息风险的增加主要体现在加剧操控性信息风险上。从上述可

见，虽然既有文献直接检验了信息风险的影响因素，但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主要围绕公司特征这一正式制度层面展开，缺少从非正式制度和财务报告生成层面对信息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

(二) 研究假说

1. 连锁董事与信息风险。财务报告是公司向投资者传递关于其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关键信息，也是外部利益相关者识别风险、做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低质量的财务报告往往会增加公司与外部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而信息不对称为信息风险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从财务报告的形成过程看，董事会作为重大经营决策的主体，需要对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财务报告所反映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监督。现有研究表明，董事联结关系可以使公司与其他公司在经营决策上具有相似性和关联性，例如并购决策、慈善捐赠、会计政策选择等。

连锁董事对信息风险产生影响主要源于如下原因：第一，连锁董事的信息传递功能。董事的联结关系在其兼任的多家公司之间具有信息中介的作用，是不同公司之间获取信息和资源的重要渠道。虽然公司可以利用网络、出版刊物等媒介获得其他公司的财务报告等公开信息，但难以从中获取有关公司管理实践、战略决策等内部信息。董事在行使其经营决策和监督职能的过程中，能够直接参与其任职公司的投融资决策行为，从而为不同公司间进行隐蔽的私下交流、传递信息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公司间的董事联结为公司与外部进行信息传递提供了重要平台，可以促进信息交换和公司行为的传播。连锁董事可以通过其在多个公司兼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地将公司信息扩散出去，进而可以缓解公司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公司信息风险。另一方面，资源依赖理论认为，连锁董事不仅能够为公司解决更多的行业、法律和技术层面的问题，还能够帮助目标公司与其他公司、供应商和金融机构建立联系。通过这种资源联结关系可以降低公司交易成本，增强公司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从而提高公司绩效水平。公司可以通过提供真实的、高质量的盈余信息来为外界呈现公司良好的发展前景，而不必以虚假呈报、虚构交易、调整报表等方式进行市值管理。而高质量的盈余信息具有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作用，进而可以降低信息风险。

第二，连锁董事的监督和决策职能得到强化。通过董事网络所获取的社会资本，可

表3 连锁董事与信息风险

变量	Irisk		Frisk		Mrisk	
	(1)	(2)	(3)	(4)	(5)	(6)
Inlock1	-0.0013***		-0.0003***		-0.0010***	
	(-4.48)		(-2.64)		(-3.62)	
Inlock2		-0.0129***		-0.0031***		-0.0099***
		(-4.94)		(-2.89)		(-3.99)
Size	-0.0041***	-0.0040***	-0.0026***	-0.0026***	-0.0014*	-0.0014*
	(-4.89)	(-4.86)	(-7.60)	(-7.59)	(-1.75)	(-1.73)
Lev	0.0601***	0.0600***	0.0396***	0.0395***	0.0203***	0.0202***
	(14.60)	(14.58)	(23.56)	(23.55)	(5.20)	(5.18)
ROA	0.0074	0.0077	-0.0199***	-0.0198***	0.0231*	0.0234*
	(0.52)	(0.54)	(-3.41)	(-3.40)	(1.71)	(1.73)
Top5	0.0340***	0.0340***	0.0116***	0.0116***	0.0209***	0.0209***
	(7.06)	(7.07)	(5.92)	(5.92)	(4.59)	(4.59)
Refin	0.0076***	0.0076***	0.0025***	0.0025***	0.0050***	0.0051***
	(4.42)	(4.44)	(3.59)	(3.60)	(3.11)	(3.13)
Maho	-0.0389***	-0.0391***	-0.0233***	-0.0234***	-0.0146**	-0.0147**
	(-5.69)	(-5.71)	(-8.35)	(-8.36)	(-2.25)	(-2.27)
TobinQ	0.0039***	0.0039***	0.0020***	0.0020***	0.0020***	0.0020***
	(9.17)	(9.15)	(11.69)	(11.68)	(4.83)	(4.81)
Cflow	-0.0629***	-0.0628***	-0.0250***	-0.0249***	-0.0353***	-0.0352***
	(-6.09)	(-6.08)	(-5.92)	(-5.91)	(-3.60)	(-3.60)
Growth	0.0229***	0.0229***	0.0055***	0.0055***	0.0178***	0.0178***
	(19.08)	(19.10)	(11.27)	(11.27)	(15.69)	(15.70)
Inratio	0.0111	0.0114	-0.0174***	-0.0173***	0.0297**	0.0300**
	(0.73)	(0.75)	(-2.81)	(-2.80)	(2.07)	(2.09)
Bsize	0.0053	0.0007	-0.0070***	-0.0081***	0.0120***	0.0085**
	(1.21)	(0.17)	(-3.88)	(-4.50)	(2.87)	(2.04)
Duality	0.0060***	0.0060***	0.0003	0.0003	0.0053***	0.0053***
	(3.22)	(3.21)	(0.45)	(0.44)	(3.02)	(3.02)
Constant	0.1052***	0.1147***	0.1352***	0.1375***	-0.0309	-0.0236
	(5.24)	(5.78)	(16.50)	(16.98)	(-1.62)	(-1.26)
Industry/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9472	9472	9472	9472	9472	9472
Adj-R ²	0.1463	0.1467	0.1864	0.1865	0.0818	0.0821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1%、5%、10%水平下显著，下同。

以促使连锁董事享有更高的社会声誉，更渴望获得其他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等精英阶层的认同感。声誉机制能够激励董事维持其客观性，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声誉较低会使董事的职业生涯受到严重影响，声誉较高则会提高董事的议价能力。声誉机制有助于激励董事更好地履行职责，增强董事的监督动机，进而可以有效制约公司管理层的相机抉择行为，减弱管理层操纵会计信息的动机。黄海杰等（2016）研究发现，董事

的声誉对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董事声望越高，其引起的社会关注越广，其失职行为会为其带来巨大的声誉损失。可以预期，在声誉机制下，连锁董事会积极履行其监督与决策职能，充分发挥其治理效应。通过与其他公司分享其经验，连锁董事可以更有效地监督公司规范会计信息披露，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信息风险。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连锁董事可以降低公司的信息风险。

2. 连锁董事与信息风险构成成分。信息风险按照其性质和来源，可以分解为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基本面信息风险主要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环境、商业模式等固有经济特征，包括公司的盈亏状况、运营周期、资产周转率、所处的地理位置等；而操控性信息风险与会计信息操纵联系紧密，例如管理层的会计政策、会计方法选择等均会影响操控性信息风险，操控性信息风险是除基本面信息风险之外的信息不确定性的体现。公司固有层面经济特征的不稳定会增加基本面信息风险，会降低公司的竞争位势；管理层对会计信息的操纵越严重，会增加公司的操控性信息风险。可见，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分别代表了公司固有层面和操作层面的风险，其本质上的潜在差异有助于本文深入探讨连锁董事对不同类别信息风险的影响形式及传导路径。

基本面信息风险的大小取决于公司内在固有的基本面经济特征。虽然公司的经营环境、行业性质、商业模式、管理方式等基本经济特征是由公司自主决定的，具有长期持续性，短期内较难进行调整。但连锁董事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传递知识和经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公司的基本面特征。Stuart and Yim (2010) 研究发现，连锁董事及其社会网络在控制权变更中起着重要作用，拥有连锁董事的公司更容易发生并购重组行为。并购重组会促使公司改变商业模式、改善管理方式、提高经营管理效率，进而可以改变公司的基本面经济特征。并购重组能为公司带来产业扩大与股权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最终可以产生价值创造的协同效应。此外，连锁董事的资源联结作用可以促进公司内部及外部间的相互协作、资源共享的改善，最终也会形成公司价值提升的协同效应。可见，连锁董事通过改变公司基本面特征，可以降低基本面信息风险。

区别于基本面信息风险，操控性信息风险与公司的信息管理行为有密切的联系。外

表4 连锁董事与信息风险：PSM检验

匹配方法	按连锁董事数量分组匹配					
	Irisk (1)		Frisk (2)		Mrisk (3)	
	ATT	t值	ATT	t值	ATT	t值
最近邻匹配	-0.0084***	-3.75	-0.0019**	-2.05	-0.0063***	-3.02
半径匹配	-0.0130***	-3.24	-0.0032**	-2.06	-0.0097***	-2.61
核匹配	-0.0072***	-4.13	-0.0031***	-4.26	-0.0040**	-2.50
匹配方法	按连锁董事比例分组匹配					
	Irisk (4)		Frisk (5)		Mrisk (6)	
	ATT	t值	ATT	t值	ATT	t值
最近邻匹配	-0.0061***	-2.70	-0.0007***	-3.72	-0.005**	-2.56
半径匹配	-0.0050**	-2.53	-0.0008***	-2.92	-0.0042**	-2.31
核匹配	-0.0073***	-4.14	-0.0020***	-2.72	-0.0052***	-3.22

表5 Heckman两阶段模型检验

变量	Irisk		Frisk		Mrisk	
	(1)	(2)	(3)	(4)	(5)	(6)
Inlock1	-0.0014**		-0.0001**		-0.0013**	
	(-2.49)		(-2.43)		(-2.50)	
Inlock2		-0.0158***		-0.0014***		-0.0144***
		(-3.14)		(-2.70)		(-3.0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MR	0.0666***	-0.0144***	0.0385***	0.0390***	0.0302***	0.0379***
	(6.83)	(-3.05)	(8.98)	(8.40)	(3.53)	(4.06)
Constant	-0.2258***	-0.1023**	-0.0406*	0.0364**	-0.1904***	-0.1396***
	(-4.48)	(-2.47)	(-1.84)	(2.06)	(-4.28)	(-3.85)
Industry/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9472	9472	9472	9472	9472	9472
Adj-R ²	0.0843	0.0892	0.0407	0.0410	0.0659	0.0685

表6 采用未来一期因变量的回归

变量	Irisk(t+1)		Frisk(t+1)		Mrisk(t+1)	
	(1)	(2)	(3)	(4)	(5)	(6)
Inlock1	-0.0013***		-0.0002*		-0.0010***	
	(-4.02)		(-1.74)		(-3.46)	
Inlock2		-0.0122***		-0.0023*		-0.0100***
		(-4.40)		(-1.93)		(-3.7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1554***	0.1642***	0.1512***	0.1529***	0.0010	0.0083
	(7.46)	(7.98)	(17.18)	(17.57)	(0.05)	(0.42)
Industry/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7524	7524	7524	7524	7524	7524
Adj-R ²	0.1664	0.1667	0.2229	0.2229	0.0906	0.0908

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解读能力有限，为管理层操纵会计信息、加剧操控性信息风险提供了条件。公司可以通过隐性选择会计政策

和会计方法来实施盈余管理行为。此外，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也可以作为隐藏盈余管理的工具，公司可以利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等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来掩饰公司的盈余操纵。虽然基于盈余操纵和信息管理对公司经营成果进行粉饰的行为在短期内可以被掩盖，从长期来看，随意进行信息管理很难不被外部利益相关者发现。连锁董事因同时任职于多家公司而具备更加多元化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提升连锁董事的决策和监督能力。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声望，连锁董事会努力履行其职能，对管理层的信息管理和盈余操纵行为进行监督，从而制约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操控性信息风险。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连锁董事不仅可以降低公司的基本面信息风险，还可以降低操控性信息风险。

三、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考察了连锁董事对信息风险的影响。本文研究所需的公司层面数据主要包括治理数据、财务数据和高管人物特征数据，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本文对初始样本作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3)对相关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进行Winsorize处理，以排除异常值对结果的可能干扰。最终得到9472个有效观测值。

(二) 主要变量与检验模型

1. 信息风险指标。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本文对信息风险衡量如下：

第一步，根据会计利润与现金流量的逻辑关系，以总流动应计模型为基础得出应计质量的拟合值 $\hat{\varepsilon}_{i,t}$ 。总流动应计模型如(1)式：

$$TCA_{i,t} = \alpha_0 + \alpha_1 \frac{CFO_{i,t-1}}{A_{i,t-1}} + \alpha_2 \frac{CFO_{i,t}}{A_{i,t}} + \alpha_3 \frac{CFO_{i,t+1}}{A_{i,t+1}} + \alpha_4 \frac{\Delta REV_{i,t}}{A_{i,t-1}} + \alpha_5 \frac{PPE_{i,t}}{A_{i,t-1}} + \varepsilon_{i,t} \quad (1)$$

(1)式中， $TCA_{i,t}$ 为公司i第t年的总流动应计， $A_{i,t}$ 为公司i第t年的总资产， $CFO_{i,t}$ 为公司i第t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Delta REV_{i,t}$ 为营业收入变动额， $PPE_{i,t}$ 为公司i第t年的固定资产， $\varepsilon_{i,t}$ 为公司i第t年的会计应计指标。

第二步，计算应计质量的波动性，采用t-4年至t年共计五个年度求 $\hat{\varepsilon}_{i,t}$ 的标准差 $\sigma(\hat{\varepsilon})$ ，以此作为信息风险(Irisk)的度量。 $\sigma(\hat{\varepsilon})$ 值越大，信息风险越高。

表7 改变连锁董事的度量方式

变量	Irisk	Frisk	Mrisk
	(1)	(2)	(3)
Ln(Inlock1)	-0.0020**	-0.0002**	-0.0022**
	(-2.01)	(-2.49)	(-2.33)
Controls	Yes	Yes	Yes
Constant	0.1992	0.1845**	0.0155
	(1.05)	(2.30)	(0.91)
Industry/Year	Yes	Yes	Yes
N	9472	9472	9472
Adj-R ²	0.1519	0.2071	0.0814

表8 进行公司聚类调整

变量	Irisk		Frisk		Mrisk	
	(1)	(2)	(3)	(4)	(5)	(6)
Inlock1	-0.0013***		-0.0003**		-0.0010**	
	(-3.18)		(-1.99)		(-2.56)	
Inlock2		-0.0129***		-0.0031*		-0.0099***
		(-3.49)		(-1.78)		(-2.80)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1052***	0.1147***	0.1352***	0.1375***	-0.0309	-0.0236
	(2.99)	(3.26)	(10.35)	(10.58)	(-0.90)	(-0.69)
Industry/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9472	9472	9472	9472	9472	9472
Adj-R ²	0.1463	0.1467	0.1864	0.1865	0.0818	0.0821

第三步，按信息风险的构成成分将其分解为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分解方式如(2)式：

$$\sigma(\hat{\varepsilon})_{i,t} = \beta_0 + \beta_1 Size_{i,t} + \beta_2 \sigma \left(\frac{CFO_{i,t}}{A_{i,t}} \right) + \beta_3 \sigma \left(\frac{Sale_{i,t}}{A_{i,t}} \right) + \beta_4 Opcy_{i,t} + \beta_5 NEarn_{i,t} + \mu_{i,t} \quad (2)$$

其中，Size是企业规模， $\sigma(CFO/A)$ 是企业经营现金流量波动性， $\sigma(Sale/A)$ 是企业营业收入波动性，Opcy是企业运营周期，NEarn是企业亏损概率。首先，以 $\mu_{i,t}$ 的拟合值 $\hat{\mu}_{i,t}$ 来度量操控性信息风险(Mrisk)；其次，以 $\sigma(\hat{\varepsilon})_{i,t}$ 与 $\hat{\mu}_{i,t}$ 之差来度量基本面信息风险(Frisk)。

2. 检验模型。为检验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Risk(Irisk, Frisk, Mrisk) = \beta_0 + \beta_1 Inlock + \beta_i Controls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 \quad (3)$$

式(3)中，被解释变量为信息风险(Irisk)、基本面信息风险(Frisk)和操控性信息风险(Mrisk)。解释变量为连锁董事

(Inlock)，参考Cai and Sevilir(2012)和Dass et al.(2014)的做法，若同一年在两家及两家公司担任董事，则为连锁董事。本文采用连锁董事数量(Inlock1)和连锁董事比例(Inlock2)两个指标度量公司连锁董事，其中连锁董事数量以公司拥有的同一年在多家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数量衡量，连锁董事比例等于连锁董事数量与董事会总人数的比值。

Controls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公司规模(Size)，等于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杠杆率(Lev)，等于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盈利能力(ROA)，等于息税前利润除以总资产；股权集中度(Top5)，等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再融资(Refin)，若公司当年或下一年提出或实施增发配股，则取值为1，否则为0；高管持股比例(Maho)，等于高管持有的股数与公司股票发行总数的比值；公司价值(TobinQ)，等于权益市场价值与负债账面价值之和除以总资产；经营现金流(Cflow)，等于经营性现金流量与总资产之比；成长性(Growth)，等于营业收入增长率；独立董事比例(Indratio)，等于独立董事人数除以董事会总人数；董事会规模(Bsize)，等于董事会总人数的自然对数；两职合一(Duality)，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时取1，否则为0。此外，本文还控制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

(三) 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公司信息风险(Irisk)的均值为0.0879，基本面信息风险(Frisk)和操控性信息风险(Mrisk)的均值分别为0.0890和-0.0011，可见基本面信息风险的绝对值比操控性信息风险的绝对值更大，说明相比操控性信息风险，样本公司的基本面信息风险更高。连锁董事数量(Inlock1)的均值为3.4837，最小值为1.0000，最大值为12.0000，说明不同公司拥有的连锁董事数量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公司只有1位连锁董事，有的公司却有12位连锁董事，平均来看，样本公司拥有的连锁董事数量为3个左右。连锁董事比例(Inlock2)的平均值为0.4001，说明样本公司拥有的连锁董事比例平均为40.01%。股权集中度(Top5)的均值为0.5222，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较为集中。再融资(Refin)的均值为0.2238，说明有22.38%的公司公布或实施了增发、配股提案。高管持股比例(Maho)的均值为0.0515，说明上市公司平均持股比例为5.15%。

(四) 均值差异检验

表9 基于连锁董事总影响力分组的检验

变量	Irisk				Frisk	
	高影响力	低影响力	高影响力	低影响力	高影响力	低影响力
	(1)	(2)	(3)	(4)	(5)	(6)
Inlock1	-0.0014*** (-3.23)	0.0004 (0.31)			-0.0003* (-1.76)	0.0007 (1.36)
Inlock2			-0.0134*** (-3.46)	-0.0021 (-0.2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0705*** (2.66)	0.1676*** (5.41)	0.0858*** (3.27)	0.1684*** (5.39)	0.1303*** (12.19)	0.1473*** (11.41)
Industry/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980	4492	4980	4492	4980	4492
Adj-R ²	0.1477	0.1620	0.1480	0.1620	0.1791	0.1970

变量	Frisk		Mrisk			
	高声誉	低声誉	高声誉	低声誉	高声誉	低声誉
	(7)	(8)	(9)	(10)	(11)	(12)
Inlock1			-0.0011*** (-2.63)	-0.0005 (-0.39)		
Inlock2	-0.0033** (-2.13)	0.0049 (1.16)			-0.0011*** (-2.63)	-0.0005 (-0.3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1338*** (12.62)	0.1453*** (11.17)	-0.0577** (-2.30)	0.0171 (0.58)	-0.0460* (-1.85)	0.0204 (0.69)
Industry/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980	4492	4980	4492	4980	4492
Adj-R ²	0.1793	0.1969	0.0881	0.0917	0.0881	0.0918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均值差异检验。本文按照连锁董事数量的行业年度均值将样本分为少连锁董事组和多连锁董事组，按照连锁董事比例的行业年度均值将样本分为低连锁董事比例组和高连锁董事比例组，分别比较了少连锁董事组与多连锁董事组、低连锁董事比例组与高连锁董事比例组在信息风险、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方面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少连锁董事组与低连锁董事比例组的信息风险（Irisk）、基本面信息风险（Frisk）和操控性信息风险性（Mrisk）的均值均显著高于多连锁董事组和高连锁董事比例组，说明连锁董事较多的公司拥有更低的信息风险、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初步证实本文的假设1和假设2。

四、检验结果

（一）基本分析

表3报告了连锁董事对信息风险及其构成

成分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和列（2）为连锁董事对信息风险的检验结果，连锁董事数量（Inlock1）和连锁董事比例（Inlock2）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013和-0.0129，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连锁董事可以降低公司信息风险，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列（3）和列（4）为连锁董事对基本面信息风险的回归结果，连锁董事数量（Inlock1）和连锁董事比例（Inlock2）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003和-0.0031，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连锁董事较多的公司基本面信息风险较小；列（5）和列（6）为连锁董事与操控性信息风险的回归结果，连锁董事数量（Inlock1）和连锁董事比例（Inlock2）与操控性信息风险（Mrisk）显著负相关，说明连锁董事可以降低公司操控性信息风险，支持了本文的假设2。

（二）考虑内生性问题

为了证实连锁董事的确能够降低公司信息风险，而非信息风险较低的公司倾向于选择具有“联结”特征的董事，本文进行如下检验：

1. 如果公司信息风险降低是由连锁董事带来的，那么对于连锁董事较少的公司，信息风险应较高。因此，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法），从高维度选择配对数据，进而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首先，将连锁董事数量和连锁董事比例按照行业年度均值分为少连锁董事组与多连锁董事组、低连锁董事比例组与高连锁比例董事组。其次，将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再融资、公司价值、上市年限、董事薪酬、董事会规模、产权性质等多方面特征降维为一个概率值，寻找到连锁董事数量较多及连锁董事比例较高的公司（处理组）多维度特征类似的匹配公司（控制组）。最后，比较少连锁董事组与多连锁董事组、低连锁董事比例组与高连锁比例董事组的信息风险差异。表4报告了PSM法的检验结果。ATT表示基于PSM法得出的拥有不同连锁董事数量的公司信息风险水平的差异，ATT为负则表示连锁董事较多的公司信息风险较低。按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法将样本进行配对后，连锁董事数量较多和连锁董事比例较高的公司信息风险、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水平均显著低于连锁董事数量较少和连锁董事比例较低的公司。这说明，连锁董事对信息风险、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的降低作用是显著的。

2. 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模型控制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参考刘斌等（2019）的研

表10 连锁董事对信息风险的长期影响

变量	两年平均信息风险及其构成成分					
	Irisk		Frisk		Mrisk	
	(1)	(2)	(3)	(4)	(5)	(6)
Inlock1	-0.0013*** (-4.24)		-0.0002* (-1.70)		-0.0011*** (-3.76)	
Inlock2		-0.0128*** (-4.64)		-0.0022* (-1.87)		-0.0107*** (-4.10)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1310*** (6.35)	0.1403*** (6.88)	0.1431*** (16.49)	0.1447*** (16.87)	-0.0141 (-0.72)	-0.0063 (-0.33)
Industry/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7524	7524	7524	7524	7524	7524
Adj-R ²	0.1687	0.1691	0.2148	0.2148	0.0924	0.0927
变量	三年平均信息风险					
	Irisk		Frisk		Mrisk	
	(7)	(8)	(9)	(10)	(11)	(12)
Inlock1	-0.0014*** (-4.00)		-0.0001 (-0.92)		-0.0013*** (-3.73)	
Inlock2		-0.0134*** (-4.24)		-0.0014 (-1.01)		-0.0119*** (-3.9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1327*** (5.65)	0.1430*** (6.17)	0.1558*** (15.59)	0.1568*** (15.92)	-0.0256 (-1.14)	-0.0164 (-0.74)
Industry/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964	4964	4964	4964	4964	4964
Adj-R ²	0.1838	0.1842	0.2362	0.2362	0.1056	0.1059

究，在第一阶段的Probit模型中，在控制了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再融资、公司价值、上市年限、董事薪酬、董事会规模、产权性质等变量的基础上，本文设立以“连锁董事数量是否较多”以及“连锁董事比例是否较高”为因变量的定性回归模型。对于该因变量的定义，若连锁董事数量及连锁董事比例超过当期行业年度中位数，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之后，根据定性回归模型计算IMR (Inverse Mills Ratio)，将其代入主回归模型进行第二阶段回归，检验结果如表5。结果显示，相比连锁董事数量较少和连锁董事比例较低的公司，连锁董事数量较多和连锁董事比例较高的公司信息风险、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显著较低。由此证明，在控制了连锁董事的选择性偏误后，连锁董事较多的公司信息风险、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均更低。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

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1. 采用未来一期的因变量回归。考虑到连锁董事对信息风险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本文采用未来一期的信息风险、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重新回归，结果如表6。表6中连锁董事数量 (Inlock1) 和连锁董事比例 (Inlock2)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连锁董事有助于降低公司的信息风险、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并未改变之前的结论。

2. 改变连锁董事的度量方式。本文采用连锁董事数量的自然对数作为连锁董事的衡量方式，重新回归结果如表7。列 (1) 至列 (3) 的结果显示，连锁董事与信息风险、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均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连锁董事可以降低公司的信息风险、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本文之前的结论是稳健的。

3. 进行公司聚类调整，结果见表8。其中，列 (1) 和列 (2) 为连锁董事与信息风险的回归结果，可见连锁董事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列 (3) 和列 (4) 为连锁董事与基本面信息风险的回归结果，可见连锁董事与基本面信息风险显著负相关；列 (5) 和列 (6) 为连锁董事与操控性信息风险的回归结果，可见连锁董事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结果表明，连锁董事能够导致公司的信息风险、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降低，与前文结论一致。

五、进一步分析

(一) 基于连锁董事影响力的分组检验

连锁董事的声誉越高，所产生影响力越大，从而对信息风险的降低作用会更加明显。参考倪娟等 (2019) 的做法，以连锁董事当年总共任职的公司数量作为对连锁董事影响力简单的衡量，任职的公司数量越多，其影响力越大。在公司层面，本文将连锁董事当年任职的公司数量加总求和，以此度量公司所拥有的连锁董事的总影响力。由此预期公司所拥有的连锁董事总影响力越大，其对信息风险及其构成成分的降低作用越明显。根据连锁董事总影响力的行业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连锁董事影响力高于样本中位数的公司组和连锁董事影响力低于样本中位数的公司组。表9汇报了基于连锁董事总影响力的分组检验结果。列 (1) 至列 (4) 是连锁董事对信息风险的回归结果，在影响力较高的组中，连锁董事数量、连锁董事比例对公司信息风险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而

在影响力较低的组中，连锁董事数量、连锁董事比例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连锁董事总影响力加大的公司，对信息风险的降低作用更加显著。列（5）至列（8）为连锁董事对基本面信息风险的回归结果，列（9）至列（12）为连锁董事对操控性信息风险的回归结果，与列（1）至列（4）的结论类似，连锁董事总影响力越大，越能够降低公司的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综上，表明相对于影响力低的连锁董事，总影响力大的连锁董事对信息风险及其构成成分的降低作用更加明显。

（二）连锁董事对信息风险的长期影响

在之前的分析中，本文探讨了连锁董事对当期信息风险的影响，即前述研究主要考察的是连锁董事对公司信息风险的短期影响，发现连锁董事可以降低公司的信息风险及其构成成分。为检验连锁董事是否有助于降低公司的长期信息风险，本文进一步考察了连锁董事对公司信息风险的长期影响。本文分别采用两年平均信息风险及其构成成分、三年平均信息风险及其构成成分衡量公司的长期信息风险，检验结果如表10。列（1）至列（6）为连锁董事对两年平均信息风险及其构成成分的影响，可见连锁董事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连锁董事可以降低两年期信息风险、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列（7）至列（12）为连锁董事对三年平均信息风险及其构成成分的影响，可见列（7）和列（8）、列（11）和列（12）中连锁董事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列（9）和列（10）中连锁董事的系数虽为负，但不显著，说明长期来看，连锁董事可以降低公司的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但无法降低公司的基本面信息风险。该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连锁董事对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的影响没有发生改变，而对基

本面信息风险的影响会逐渐消失，这可能与董事换届有关。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董事换届会影响董事联结的期限，在三年期满董事濒临换届之时，为确保其声誉不受损失，连锁董事可能更倾向于减少管理层的信息操纵行为，而对公司本身的基本面特征改善的动机不明显。

六、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从董事的社会联结视角，考察了连锁董事对公司信息风险及其构成成分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连锁董事数量和连锁董事比例均可以降低公司信息风险；将信息风险分解为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后，发现连锁董事既可以降低公司基本面信息风险，也能够降低操控性信息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连锁董事对信息风险、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的降低作用只存在于影响力较高组，说明连锁董事总影响力越大，其对公司信息风险、基本面信息风险和操控性信息风险的降低作用更明显；连锁董事对两年期平均信息风险及其构成成分均有降低作用，连锁董事可以降低公司三年期平均信息风险和三年期平均操控性信息风险，但无法降低公司三年期平均基本面信息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连锁董事所拥有的信息、资源及影响力等社会资本，以及连锁董事的社会联结功能所发挥的非正式调节机制，在公司的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盐城工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 Francis J, LaFond R, Olsson P, et al. The market pricing of accruals qua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5, 39(2): 295-327.
2. Cai Y, Sevilir M. Board connections and M&A transaction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2, 103(2): 327-349.
3. Portes A.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8, 24: 1-24.
4. 张文珂, 张芳芳, 刘淑莲. 企业信息风险如何引致市场资源配置活动?——基于并购重组的视角. 会计研究. 2017(11)
5. 马如静, 蒙小兰, 唐雪松. 独立董事兼职席位的信号功能——来自IPO市场的证据. 南开管理评论. 2015 (04)
6. 向锐, 章成蓉. 公司财务特征与会计信息风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1 (07)
7. 王加灿, 许慧. 上市公司制度环境、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风险探析.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1 (12)
8. 王兵. 独立董事监督了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视角. 金融研究. 2007(01)
9. 黄海杰, 吕长江, 丁慧. 独立董事声誉与盈余质量——会计专业独董的视角. 管理世界. 2016(03)
10. 刘斌, 黄坤, 酒莉莉. 独立董事连锁能够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会计研究. 2019(04)
11. 倪娟, 彭凯, 胡熠. 连锁董事的“社会人”角色与企业债务成本. 中国软科学. 2019(02)

新证券法下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对策研究

■ 陈晓刚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新证券法）已于2020年3月1日起施行。新证券法的一大亮点就是压实中介机构市场“看门人”的法律责任，对注册会计师等中介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根据上市公司及其审计机构监管实践，结合相关案例对新证券法下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业务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审计对策，以期对广大注册会计师有所帮助。

一、新证券法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的主要变化

1. 业务资格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新证券法规定，从事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以外的其他证券服务业务，应当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将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资格由原证券法的审批制改为了新证券法的备案制，这是新证券法落实“放管服”要求取消相关行政许可的直接体现。

2. 全面加大处罚力度，同时取消了对未造成后果的审计程序性问题的处罚。新证券法大幅度提高对会计师事务所未勤勉尽责，所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处罚力度，将罚款金额从原来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提高到一倍以上十倍以下，新增无业务收入的情形，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责任人的罚款金额从三万元到十万元提高至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情节严重的，并处暂停或者禁止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同时，取消了对未造成后果的审计程序性问题的行政处罚。新证券法对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在内的证券服务机构的规定作了大幅度调整，在落实“放管服”要求，取消对未造成后果的审计程序性问题的处罚的同时，相应全面加大了处罚力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罚没款金额，另一方面，在备案制条件下，可以预见会加大并处暂停或者禁止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处罚力度。

3. 规范了审计工作底稿保存规定。新证

券法新增对会计师事务所有关文件和资料的保存规范以及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有利于对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合法合规情况进行追溯核查，也有利于会计师事务所证明其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

二、新证券法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的主要影响

1. 业务竞争将进一步加剧。新证券法将业务资格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这意味着由原来经财政部证监会审批的40家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垄断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业务，将会由更多的会计师事务所申请备案后参与，将进一步加剧行业的竞争压力。

2. 选择客户的风险成为最大的风险。新证券法取消了对未造成后果的审计程序性问题的行政处罚，同时相应全面加大了对“未勤勉尽责，所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行为的处罚力度。这意味着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在客户（这里主要指发行人、上市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被处罚的欺诈发行、违规信息披露行为，注册会计师在执业中又存在相关违法违规行，且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将会承担新证券法规定的行政处罚；而对于客户不存在被处罚的欺诈发行、违规信息披露行为情况下，仅存在部分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审计证据不充分、不适当的问题，将不会承担行政处罚后果，监管部门可以通过行政监管措施或者日常监管措施予以相应处理。从近几年证监会查处的发行人、上市公司欺诈发行、违规信息披露案件来看，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都被追究了相应的行政责任，如欣泰电气欺诈发行及违规信息披露案，北京兴华所及王全洲、杨轶辉、王权生3名注册会计师被行政处罚，这更加突出了注册会计师选择客户的极端重要性。

3. 审计失败的后果更加严重。新证券法不仅加大了对会计师事务所未勤勉尽责，所

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处罚力度，同时规定了“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委托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在第九十五条新增了代表人诉讼制度，这将极大的扩大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赔偿责任。注册会计师一旦审计失败，除承担前述的行政处罚和可能的巨额民事赔偿责任外，还需要承担信用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特别是近年发生的众华所雅百特审计失败案、中天运所粤传媒审计失败案、立信所*ST国药审计失败案等案件，以及最近媒体热议的康美药业案和康得新案，将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推到了风口浪尖，在监管部门对财务造假违法违规保持“零容忍”以及坚持“一案多查”的监管政策下，注册会计师审计失败被发现和处罚的概率更高、后果更加严重。

4. 审计工作底稿作用更加凸显。审计工作底稿形成于审计工作全过程，并全面反映审计工作过程，要充分反映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思路和审计轨迹，包括审计工作经历哪些环节，某个环节上注册会计师从哪些方面进行测试，被测试事项的实际面貌如何，注册会计师如何发表意见等等。新证券法新增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底稿的保存管理条款，规定自业务委托结束之日起算，审计工作底稿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十年，且任何人不得泄露、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毁损。并规定了相应的罚则，对注册会计师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进一步凸显审计工作底稿的重要性。

三、审计工作对策建议

1. 做好业务承接与保持，把好风险控制第一关。在新证券法下，注册会计师面临备案制实施后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和审计失败后果更加严重的双重压力，如何做好业务承接与保持，把好风险控制第一关，成为注册会计师的当务之急。

一是严格按照审计准则要求做好基础工作。注册会计师必须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11号——就审计业务约定条款达成一致意见》等相关审计准则的规定，做好业务承接与保持基础工作。

二是多措并举开展风险评估工作。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要高度重视上市公司

财务报表审计业务的承接与保持，采取有效措施，扎实开展风险评估工作。首先，对于“炒鱿鱼 接下家”的上市公司，要通过与上市公司沟通交流、与前任注册会计师充分沟通、通过互联网查询收集上市公司相关信息等程序，充分了解分析上市公司变更事务所的真正原因，特别是对于连续两年亏损、尚在业绩承诺期内、有大量媒体负面报道等情况的上市公司，在承接其财务报表审计业务时要慎之又慎。其次，对于已经提供多年财务报表审计服务的上市公司，要关注上市公司内部人事变动、组织架构调整、业务模式变更及拓展新业务等情况，和外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化、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行业形势变化、新的金融政策调整、税收政策变化等情况，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治理层诚信以及上市公司经营情况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业务保持进行综合分析评估；第三，对在前述风险评估工作中发现部分疑点，无法判断风险水平的情况，可进一步采取与监管部门沟通汇报、申请查询上市公司证券期货市场诚信记录等手段，进一步收集监管部门掌握的相关信息，提高风险评估工作的有效性。

2. 保持职业怀疑，做好审计工作。从近几年证监会查处的发行人、上市公司欺诈发行、违规信息披露案件来看，主要的财务造假行为都是为了增加收入、做大利润，其动机主要是满足IPO、再融资或重组条件、达到业绩承诺或者股权激励条件、避免被ST或者退市等，如登云股份是为了满足IPO条件、中安科及欢瑞世纪是为了满足重组条件、圣莱达是为了避免被ST。主要的手段是虚构收入、提前确认收入、虚减成本费用、跨期确认费用、虚增非经常性损益、操作资产减值损失和利用关联交易造假，如海联讯为IPO提前确认收入、欢瑞世纪为重组提前确认收入、抚顺特钢为年报少确认成本、登云股份为IPO及年报少确认费用、圣莱达为年报虚增非经常性损益。注册会计师应该始终保持职业怀疑态度，从以下方面做好审计工作，防范审计风险。

一是做好风险评估，打好审计基础。新审计准则全面贯彻风险导向审计理念，将风险评估作为整个审计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中，充分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所处的环境是审计工作的起点，实施风险评估程序，对注册会计师识别相关的

舞弊风险至关重要。注册会计师应当保持职业怀疑，通过与被审计单位董事、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相关生产、销售、库房管理等其他人员，就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内部控制、会计核算政策、相关经营管理活动流程等进行询问交流，通过观察和检查被审计单位生产、销售、采购等重要生产经营过程，尽可能多地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所处的环境、内部控制及其执行情况，并针对不同人员对相关事项和流程的描述，结合观察和检查中收集的相关资料，执行分析程序，对被审计单位是否会发生舞弊进行判断，并进一步分析管理层面临哪些压力，可能采取哪些舞弊手段，为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提供基础。

二是做细控制测试，找出风险领域。上市公司存在的内部控制设计缺陷或运行缺陷是舞弊者所要寻求的机会。注册会计师在进行财务报表审计时要重点关注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是否存在董事会、经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的情形，综合运用询问适当人员、观察重要生产经营活动、检查相关文件资料、对重要流程进行穿行测试和重新执行等方法，重点审核与收入、成本费用、货币资金、应收账款等重点项目有关的内部信息传递和财务报告流程，审核不相容职责分离情况，审核有关内部审批程序是否有效并一贯执行；注册会计师应针对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系统的运行原理、操作流程、授权审批、异常处理等进行深入了解和必要测试，以确定该信息系统是否不存在或存在很少人工干预，从而保证相关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必要时可寻求技术支援或利用专家工作。

三是实施实质性分析，找准审计重点。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中，除在风险评估时运用分析性程序外，在实质性审计程序中，充分运用实质性分析程序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注册会计师可综合运用传统和非传统的分析方法，如将本期销售收入或销售产品数量、成本费用与可比期间销售收入或销售产品数量、成本费用进行比较，本期销售收入、成本费用增长幅度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及整个行业数据进行比较；又如分析营业收入与成本费用配比变动情况；将关注到的媒体对上市公司的相关质疑或报道，与上市公司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进行比较

分析；对某些特殊行业（如大众消费品生产的上市公司），可将营业收入与其披露的市场占有率及其销售数量进行分析对比，并进行适当的市场调查，就可能发现相关舞弊迹象。通过上述实质性分析程序，找到相关异常项目或领域，并设计和实施恰当的细节测试程序。

四是充分关注高风险审计项目，做好实质性细节测试。注册会计师要重点关注存在境外业务占比较高、业绩大幅波动、持续处于盈亏临界点、尚在业绩承诺期间或者股权激励考核期间等情况的上市公司，综合运用函证、监盘、计算、分析性复核、核对、审阅、询问、观察等审计方法，重点对收入、成本费用、货币资金、应收款项、存货等实物资产，商誉、金融工具、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重大非常规交易等项目和领域做好实质性细节测试，以控制审计风险。

3. 强化审计工作底稿管理。鉴于审计工作底稿的极端重要性，为确保管理规范、使用方便、安全可靠，防止出现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毁损的情况，建议从以下方面强化管理。一是严格按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档案管理办法》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31号——审计工作底稿》的要求，做好基础管理工作；二是落实管理人员责任制，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分管审计档案工作的合伙人，以及管理审计档案的部门负责人和具体人员，都要进一步提高对审计档案管理工作的认识，强化责任担当，做好审计档案管理工作；三是强化管理场所和设备，会计师事务所应当设立专用、安全的审计档案保管场所，并配备必要的设施和设备；四是高度重视电子数据管理，电子审计工作底稿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审计档案，会计师事务所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电子审计工作底稿的安全可靠。

作者单位：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

新形势下如何应对会计师事务所不正当低价竞争

■ 徐紫明

摘要 打击和治理不正当低价竞争一直是行业监管的热点话题，行业收费标准取消、《反不正当竞争法》和《证券法》修订等外部环境变化使其面临新的挑战。本文通过对不正当低价竞争进行概念界定，从供求关系、机制设计和服务性质三个方面分析了不正当低价竞争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详细阐述了行业收费标准取消、《反不正当竞争法》和《证券法》修订等外部环境变化对治理不正当低价竞争的影响，最后提出监管部门应当将监管重心转移到审计质量上来，多措并举加强信息披露，改革独立董事选聘机制，以更好地治理不正当低价竞争行为。

关键词 不正当低价竞争 证券法 审计质量 审计收费 独立董事

不正当低价竞争一直是监管部门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打击和治理会计师事务所不正当低价竞争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4年12月下发通知取消了行业收费标准，界定不正当低价竞争失去了量化标准；二是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7年11月4日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取消了价格竞争的相关规定，这使得打击和治理不正当低价竞争失去了法律依据；三是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12月28日通过了《证券法》的修订，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由“审批制”改“双备案制”，这可能会加剧审计市场的恶性竞争。这些外部变化对打击和治理不正当低价竞争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注册会计师行业应该如何应对？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些问题对大力提升审计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不正当低价竞争形成的原因

明晰不正当低价竞争形成的原因是治理和打击不正当低价竞争的基础。可以从供求关系、机制设计、竞争环境和服务性质等四个方面分析不正当低价竞争形成的原因，这四个方面的因素有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并交织在一起。

（一）供求关系

1. 高质量审计需求不足。我国资本市场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是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先，由于中国经济处于转型阶段，资本市场

对独立审计价值的认识有待提升，对高质量审计的自发性需求较少；其次，中国资本市场的违规成本较低，存在“鼓励性惩罚”现象，对高质量审计需求产生了挤出效应；最后，即使资本市场存在高质量审计需求，但由于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也处于转型期，自身存在很多问题，难以提供高质量审计供给。

2. 审计供给竞争激烈。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会计师事务所9005家，而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只有40家，与西方审计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审计的市场集中度较低，凸显了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部分会计师事务所为了谋求生存，在外部监管和处罚力度有待提升的背景下，采用价格竞争手段是普遍存在的。

（二）机制设计

1. 付费机制不合逻辑。虽然律师和审计师同属高端服务业，但服务收费标准是存在本质区别的。与律师以服务换收入、以结果定报酬的收费标准不同，审计师的收费标准主要取决于审计成本和审计市场供求关系。其中，审计成本是确定审计收费的主要依据。除办公房租、固定资产和审计软件投入等外，审计成本主要取决于审计耗工时间和小时工资水平。被审计单位的特点（企业因素）、会计师事务所的特点（审计师因素），以及审计所处的实际环境（环境因素）均会影响审计成本。此外，为了避免审计师的独立性受到侵蚀，审计费用必须先确定，不允许或有收费的存在。另一方面，审计服务的付费方式比较特殊。与需求方直接向律师购买服务不同，审计服务并非付费方（上市公司管理层）自身所用，而主要是由不支

付审计费用的外部报表使用者使用。因此，审计师被夹在利益目标存在冲突的付费方与使用者之间，审计服务进入了“买者不用、用者不买”的怪圈。由于审计师维护的是社会公众利益，而不是满足付费者的需求，因此，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压低审计费用，而不是提高审计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事务所的低价竞争。

2. 中标机制不合理。实务中部分企业采用招标方式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业务，且一般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而如果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定价，按照目前的中标机制，结果往往是价低者得。虽然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审计招标行为，比如报价分值的权重不应高于20%，先评技术标后评价格标等。但是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规范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服务性质

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服务具有经验品属性，即资本市场难以事先判断其审计质量，只能事后感知审计质量。因此，审计师声誉作为一种信号显示机制，成为了资本市场衡量审计质量的一个重要替代指标，也是会计师事务所获得溢价的重要来源。然而，中国审计市场的声誉机制并不完善，近些年一系列会计师事务所毁誉案，使审计市场出现了严重的声誉危机。无论是国内所还是国际“四大”成员所，都未向利益相关者提供相应的审计质量声誉保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资本市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不信任，使得资本市场更倾向于压低审计费用，加剧了低价竞争。

二、外部环境变化对治理不正当低价竞争的影响

（一）丧失了界定不正当低价竞争的量化标准

如何界定不正当低价竞争一直是打击和治理不正当低价竞争面临的技术难题。本文将不正当低价竞争界定为以下两类行为：一是亏本贱卖，即会计师事务所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审计服务的商业行为；二是损害质量的低价促销，即会计师事务所以低于正常市场价格但高于边际成本价格销售审计服务且伴随损害审计质量的商业行为。从不正当低价竞争这一抽象概念中可以看出，界定不正当低价竞争的关键是如何量化“成本价格”。2010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与财政部共同制定了《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要求各地清理规范各自辖区的会计师

事务所服务收费，并向社会公布最新制定的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办法和收费标准，随后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各自的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办法和收费标准，这为量化“成本价格”提供了参考标准。但是，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价格竞争是最重要的市场竞争机制，低价竞争是最重要的价格竞争模式。由监管部门制定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办法和收费标准显然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相违背。因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4年12月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取消了行业收费标准。行业收费标准取消后，如何量化“成本价格”进而界定不正当低价竞争便失去了量化标准。丧失了界定不正当低价竞争的量化标准，使得对不正当低价竞争行为的监管具有更强的主观性，难以服众。

（二）丧失了治理不正当低价竞争的法律依据

修订前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虽然修订前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对象是商品而不是服务，但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积极推动下，监管部门和实务界都认为不正当低价竞争是违法行为，修订前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成为了注册会计师行业打击和治理不正当低价竞争行为的重要法律依据。但是，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7年11月4日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取消了价格竞争的相关规定，这使得打击和治理不正当低价竞争失去了法律依据，变得无法可依，这就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变革打击和治理不正当低价竞争的着力点。

（三）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环境

为保护公众利益，维护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证监会和财政部于1996年出台《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对从事证券相关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审计市场被割裂为证券相关业务市场和非证券相关业务市场两部分，并对证券相关业务市场实行严格管控。考虑到与西方审计市场相比，我国审计市场的市场集中度较低，这加剧了行业内部竞争，监管部门一直

致力于提高审计市场集中度，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由1998-2000年间的106家逐步降低至2013年以来的40家。但是，2020年3月1日起实施的新《证券法》，将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相关业务的“审批制”改“双备案制”，这意味着今后有更多的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从事证券相关业务。新《证券法》实施伊始，深圳堂堂、北京蓝宇、北京凯亚国嘉、北京永坤、广州众天、吉林延边、新疆福锐、惠州市丛安等会计师事务所纷纷跃跃欲试。根据经济学供需平衡理论，在需求保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增加供给很可能会加剧审计市场的恶性竞争，这将诱发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价格竞争，加剧不正当低价竞争。

三、新环境下完善不正当低价竞争治理的对策建议

基于不正当低价竞争产生的原因以及外部环境变化对治理不正当低价竞争产生的影响，本文就新外部环境下完善不正当低价竞争治理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将监管重心转移到审计质量上来

丧失了界定不正当低价竞争的量化标准和治理不正当低价竞争的法律依据，意味着监管部门将难以直接监管不正当低价竞争行为，但是不正当低价竞争行为的危害依然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以牺牲审计质量为代价的，将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公众利益，而这些都是《证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打击和治理的对象。因此，监管部门应当将监管重心从界定不正当低价竞争行为转移到是否提供低质量审计服务进而是否维护公众利益上来。修订后的《证券法》加大了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未勤勉尽责的责任追究，加大事后监督处罚力度，同时引入证券违法集体诉讼连带赔偿责任，大幅提高了审计师的违法成本。因此，监管部门在以质量监管为重心的同时，还应当从严从快从重对不正当低价竞争导致的审计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大力落实违法成本。

（二）多措并举加强信息披露

打击和治理不正当低价竞争以来，监管部门通过发布审计快报、公开会计师事务所报备的审计师变更原因等一系列信息披露举措大大减少了不正当低价竞争行为。监管部门可以在以下信息披露方面继续发力：一是要求上市公司及时披露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商定审计费用。已有研究发现2008-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仅有19.77%的上市公司在审计报告之前披露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

所事先商定的审计费用。二是确保审计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信息披露的准确性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和根本。但是长期以来财务报告审计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一直被诟病。2020年5月12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就林州重机的审计费用进行了问询，林州重机在回函中承认审计费用披露存在错误，2017年的审计费用不包括内部控制审计费用，2019年的审计费用多报了100万元。回复公告一出，市场一片哗然。纷纷呼吁监管部门应当对林州重机的信息披露行为进行处罚，切实确保审计信息披露的准确性。

在打击和治理不正当低价竞争的过程中，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约谈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不正当低价竞争为主题的约谈已经成为常态。对不正当低价竞争行为进行约谈可以从事前和事中打击和治理不正当低价竞争，避免不正当低价竞争造成负面经济后果，损害公众利益。另一方面，证券交易所的问询机制则是以上市公司为主要问询对象，就审计定价监管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因此，治理不正当低价竞争还需要监管部门的约谈和问询及时介入，从事前和事中对不正当低价竞争行为形成震慑和监督。

（三）改革独立董事选聘机制

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是解决高质量审计需求不足问题的关键。各国上市公司普遍通过设立独立董事负责注册会计师选聘事宜。但是独立董事制度是“舶来品”，它主要适用于股权相对分散的资本市场。但是我国资本市场的股权是高度集中的，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大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并不明显。如果独立董事的选聘也由董事会决定，大股东、管理层和独立董事很可能形成利益共同体，大股东不会监督管理层，独立董事也不会监督大股东。因此，对独立董事的选聘进行改革势在必行。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改革独立董事选聘机制：一是完善独立董事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建立并完善独立董事数据库，将拥有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人员的任职经历、发表意见情况和被惩戒情况等信息对外公布，以便中小投资者提名独立董事。二是管理层和独立董事的选聘决策权分离。管理层和独立董事选聘决策权依然属于董事会，但是董事会成员只能拥有管理层选聘决策权或者独立董事选聘决策权，来自同一控制人的董事会成员必须做出相同的选择。

作者单位：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江苏分所

银行关联交易模型审计探索与实践

■ 闫振平 熊回

随着金融科技不断发展，银行关联交易不再局限于授信、资产转移和资产评估、法律等提供服务类交易，还包括数据、流量和科技服务等交易。面对变化多样的关联交易发展形势，要保证对关联交易的有效管控，防范合规风险，关联交易审计策略与方法也需要与时俱进。本文针对银行关联交易审计工作进行探索，并分享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基于大数据思维的审计工具建设与审计方法实践。

一、银行关联交易的含义与审计意义

在银行业，各商业银行需同时遵循一般企业会计准则和银行业监督管理相关规定。《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从一般企业角度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从行业监管角度对关联交易的事项和形式进行了更加细化和适用的描述。由于不同监管机构各自不同的需要，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对关联交易定义的描述存在个别差异，但从本质上看其内涵是一致的，即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劳务或义务等交易事项。

银行关联交易是客观存在且为法律法规所认可的。基于正常商业条款的有效关联交易，可以促进银行与关联方之间相互协作，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长期的、大量的关联交易会使得银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性，影响其独立运营能力，增加风险扩大和传导的可能性，且金融行业风险的连锁反应更加深远和广泛。进一步而言，随着银行股权结构的多元化，银行还可能存在特权集团介入、内部人控制等发展阻力，若关联交易管控不当，会造成银行自身以及股东或债权人的利益侵害，带来合法合规性风险。所以，关联交易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防控的重中之重，定期开展审计监督已成为内外部法规的强制性要求，也是促进银行规范经营和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

二、关联交易的风险与审计要点

关联交易的基本原则是诚实信用及公允，其内控管理的根本目的是防范利益输送风险。关联交易内控管理包括关联方清单和关联交易审批管理，通过流程节点的过程控制，促进各项工作的规范有效开展，保障关联交易的合规性、真实性、公允性。因此，关联交易审计应以内部控制五要素为基点，结合行业特点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关联方认定与维护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名单审批的规范性和公示的全面性；（2）关联交易事前审批的充分有效性，包括交易识别与认定的准确性，申报审批流程的规范性，交易目的与定价公允性评估的必要性与充分性；（3）关联交易事中管控的及时有效性，包括合同签订与实际执行的一致性、额度跟踪管理的及时性与有效性；（4）关联交易事后分析的全面有效性，包括交易信息收集与统计的规范性、数据分析与报告的全面性、外部监管报告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年报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与完整性等。

三、关联交易审计工具建设

随着银行业务及管理流程的信息化和数据化进程加快，审计方法与工具也需要不断改进和优化。本文在银行关联交易审计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利用大数据分析的思维方法开展审计工具的建设。区别于传统的抽样审计方式，大数据审计强调被审计对象的完整性和相关性，即对被审计对象的所有相关数据进行全覆盖审查。以关联交易为例，完整的相关数据包括：签报审批系统、合同管理系统、财务系统、关联交易系统/台账、内外部报告及财务报告披露信息等格式化或非格式化数据。以上述数据为着力点，基于大数据思维的关联交易审计工具建设——模型审计过程如图1所示。

1. 审计数据准备。首先采集关联交易相关的全量数据，具体包括经公示的最新关

关联方名单、名单公示流程记录、关联交易台账、关联交易申报和审批记录、立项需求申请审批记录、合同台账、合同签订申请审批记录、交易资金划转记录、发票开具记录等各类涉及关联交易信息的数据。其次进行数据清洗，主要解决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问题。针对以上各个来源的交易数据，通过适当方法补充缺失值、修订错误值和异常值、删除重复值和无关值，并对各字段进行统一规范，包括字段类型、格式、单位等，形成全量的、相关的、规范的标准数据集。

2. 数据关系分析。经过第一步处理后的数据集，需要结合审计目的进行转换和再加工，以形成审计分析性数据基础。例如，对各个数据表进行关联关系分析，建立以交易对手名称为主键的关系数据库，通过交易对手名称来唯一识别每张表中每一行数据信息；将各数据表中交易对手名称与关联方名单进行匹配，筛选出全部可能的关联方交易数据；通过联接等方法生成能够完成审计目标的审计分析性数据表，也是后续审计模型分析的基础。

3. 审计模型建设。关联交易审计模型的建设，就是设置特定的判断规则或统计维度，通过系统编程来实现自动化、高效率的模型分析。其中规则模型的设置依据主要包括：（1）关联交易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银行业监管制度规定银行关联方名录更新频率应每季度不少于一次，模型规则可以设置为每年关联方名单实际更新公布的次数是否不少于四次、时间间隔是否不大于三个月等；制度规定重大关联交易应在批准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监管机构报告，可以设置计算重大关联交易报告监管与交易审批的时间差再行比较。（2）根据审计风险评估和内控要点，建立规则模型以识别关键风险事项、流程或逻辑不符的事项。比如，通过模型分析关联交易申请审批与合同签订时间的先后顺序，判断是否存在逆流程审批事项；通过对比关联交易申请记录和交易资金进出信息，对比查找应申报而未申报的关联交易。（3）通过数据间的勾稽关系进行核查，发现异常数据。比如，通过对比关联交易申请审批额度与实际交易金额，查找超额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4. 模型应用与异常排查。应用规则模型进行审计，根据判断条件批量执行任务，可

以快速筛查和定位可能存在问题的数据，再结合审计人员的经验和专业判断来开展下一步实质性程序，对异常数据或差异情况进行问题排查。同时，根据最终的排查结果来评估模型的应用效果。除了规则模型之外，还可以建立描述性统计模型，通过可视化图表协助审计人员更加直观地从大量数据中寻找规律和趋势，也便于从不同角度进行数据统计展示，以多方位地发现异常，进一步探索完善条件判断类的规则模型。

5. 模型验证与优化。审计工具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建立常态化、连续性的审计机制，每一次模型审计结果可以反过来验证前期模型的准确性，从而为模型优化提供依据，不断更新改进并迭代应用于审计工作中。

四、关联交易审计模型的应用

在银行关联交易审计中有效地应用模型工具，可以全面快速地定位问题范围。但从模型审计流程来看，模型分析结果还需要结合传统审计方法（如检查文件、访谈、重新执行等）加以核查证实，从而巩固模型审计工具的应用效果，对被审计事项做出更加准确的评价。而且，实际工作中还存在未完全信息化、数据化的审计事项。因此需要根据关联交易管理规范 and 具体审计事项，进一步探讨审计方法和审计工具的综合应用实践。

1. 公司政策与内控环境审计。公司政策与内控环境是指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制度建设、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等。审计对策主要是检查程序，包括：检查关联交易相关制度是否完善，如公司章程是否对本行股东关联方做出限制性约定，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及监事等职责权限规定；董事会是否制定公司一般关联交易和重大关联交易的具体审批制度，组织架构、执行程序及职责划分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原则，是否设计兼顾风险与效率的分层控制。重点关注是否存在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的情形。

2. 关联关系图谱分析与关联方清单审计。关联方清单管理，可能存在关联方定义不合规、关联方名单不准确或不完整的风险。审计对策包括检查和模型分析：（1）检查银行关联方定义是否合规。通过文件检查，比对关联方定义的外部监管法规、会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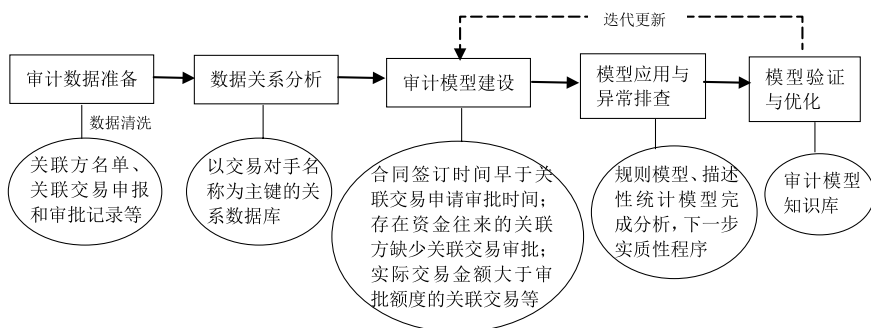


图1 关联交易模型审计流程示例图

制度和银行内部管理规定。对于可能存在相关规定明确定义范围外的其他情况，检查判断是否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2）关联方名单收集流程是否控制有效。根据关联交易管理单位收集关联方信息的记录，判断是否定期开展与更新信息收集程序，所收集信息是否符合关联方定义，是否按规定进行申报与审核，是否及时公示并公告等。针对其中的名单更新时间、审批权限等条件规则，可以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设置模型进行全面排查。（3）通过历史累积数据及外部可靠数据源进行关联方完整性审核。关联方名单作为后续发生关联交易的判断依据之一，其准确性与完整性直接影响后续交易活动的管理。根据银行内部已积累信息及外部可获取的相关公司信息，建立关联关系图谱进行数据间的相互印证，可以为审计工作提供直观有效的依据。

3. 关联交易数据分析与审批执行审计。关联交易审批与执行的审计重点在于：关联交易的申报是否完整、审批流程是否规范、交易定价政策及公允性是否合理。夯实此阶段的数据基础，能显著提升应用规则模型的审计效率和效果。

（1）关联交易的识别与认定审计。如何发现隐瞒或漏报的关联交易是审计重点和难点之一。运用审计工具对全量交易数据进行模型分析，能极大地帮助开展关联交易的完整性审计。具体来讲，审计模型通过对比校验关联交易台账、关联交易申报和审批记录、采购申请记录、合同签订台账、交易资金往来及发票记录中的关联方、交易事项和金额信息，全面查找流程不完整或无法匹配的关联方交易事项，重点排查定位与关联方签订合同或发生资金往来、但缺少关联交易申请审批的情况。审计基于模型分析发现

的差异情况或异常数据，再逐个开展进一步测试程序。但要准确核查应申报而未申报的关联交易，还需要对关联交易的认定进行合理的专业判断。首先，要明确关联交易的定义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其次，判断是否发生转移资源、劳务或义务的行为，即是否涉及利益转移，包括提供金钱、产品、软件、服务或通过其他方式提高另一方收入或降低成本，比如给关联方授信、采购关联方的资产、采购或提供关联方服务、其他涉及与关联方之间进行利润分配或责任承担的合作等。最后，避免关联交易认定的常见误区：一是误将与关联方之间无交易实质的经济活动纳入关联交易管理，比如与关联方一起开展非商业活动；二是仅以关联方之间是否发生资金转移为唯一判断依据，比如因向关联方提供免费服务而未纳入关联交易范围。

（2）关联交易的审批审计。关联交易审批流程的规范性审计，以系统控制测试和细节测试为主，模型分析为辅。重点评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按照不同的关联交易类别设置不同权限的审批流，比如授信类与非授信类交易审批，是否符合信贷专业分工；一般关联交易和重大关联交易审批，是否按照内外部规定职责划分设置有权审批人等。二是申报与审批要点清晰明确，评判逻辑具有合理性、一致性。通常，关联交易申请审批要点记录属于非结构化数据，以往主要依赖审计人员的专业判断。但随着审计模型的应用，可以利用查询程序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批量预处理，提高效率。三是严格落实审批流程系统控制，审批额度及定价有据可依且充分相关。审计模型可以通过全量数据排查例外审批记录，也可以快速核查关联交易审批依据的完整性。四是对内外部规定严令禁止的交易行为进行系统控制，即通过系统在发生或审批环节进行流程控制，比如通过授信系统名单控制以拒绝向发起人股东以及各自的关联公司发放任何授信，通过审批条件设置（如必选担保条件）以控制向关联方发放信用贷款。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是关联交易风险评估与内控管理的关键。以往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性的审计方法，主要是检查交易必要性及价格公允性的支持性证明文件及分析评估方法论依据，一般是指可比非受控价格证明（比如市场同类交易价格、本行与非相关第三方同类交易价格、合作方与非相

关第三方同类交易价格等），或者聘请外部机构独立评估并出具书面评估报告。但银行有些新兴的交易模式可能不存在市场可比交易价格，此时应用审计模型进行统计分析有助于定价合理性判断，比如纵向分析某项交易不同时期的价格及变化情况，或者横向比较银行不同部门的同类交易价格。除了价格因素之外，还可以设置各种与关联交易效率效果相关的指标模型进行数据分析，作为关联交易必要性和定价公允性的辅助判断工具。



(3) 关联交易的执行审计。关联交易执行有效性的审计目的是识别异常流程和执行差异情况，规则模型审计方式可能更为适用，包括：关联交易合同签订是否存在逆流流程执行，合同约定是否与审批意见一致，交易实际落实是否与合同约定一致，额度跟踪管理是否控制有效等。就具体审计内容来说，一是对比关联交易审批时间与合同签订时间，识别逆流审批的关联交易事项。二是分析关联交易审批要素与合同关键要素（交易对手、交易单价及总价等），识别合同签订不一致的关联交易事项。三是对比关联交易审批/合同要素与资金清结算信息，识别实际交易执行不一致、存在合同约定以外的其他支付形式或者实际已超额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等。

4. 内外部报告管理审计。关联交易信息的报告包括内部报告和外部报告，内外部报告信息的一致性、及时性与完整性，体现了管控程序的有效性。在银行内部，一般关联交易及重大关联交易应分别向规定权限组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进行报告或备案。对外而言，银行除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关联方披露的规定进行披露外，还应当定期向监管机构报送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关联方名单、关联交易情况的报告。模型审计需要先将内部报告、财务报表披露和监管报送等信息进行数据化，然后通过全量数据比对分析，进一步发现前述关联交易管理流程中被隐藏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特别关注报告信息不一致或不及时的异常情况。

五、关联交易审计研究方向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AI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推动着银行内部审计策略和方法的变革，运用大数据、AI技术将是内部审计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关联交易审计工作中，如何高效地利用数据解决审计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比如设计更加全面准确的规则模型开展全量数据分析，建立交易数据统计及指标模型进行定价公允性分析，应用AI技术有效查询、处理和利用各项非结构化数据、非电子化数据等。智能化审计方向也是大势所趋，首先要建立智能化的审计思维，只有从思想上与时俱进，才会有方式方法变革的可能；其次加强审计人员的数据分析、模型建设与AI工具应用能力是关键，审计工作的执行效果需要依赖审计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再次，构建信息化审计系统平台及智能审计工具是技术基础；最后，要建立健全数据管理机制，优化整合和共享数据资源，确保能够准确、完整、及时顺畅地获取和应用审计所需数据。

作者单位：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债务重组准则实务运用中需注意的事项

■ 谢海林

2017年以来，财政部先后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等准则，对相关业务作出了新的规范要求。债务重组准则作为规范特殊交易事项的准则，为保持准则间的协调，2019年5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的通知》（财会[2019]9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简称新准则）进行了修订。这些新准则在实务运用中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下文予以解析。

一、几个关键时点的判断及会计处理

债权人受让金融资产时，金融资产初始成本要按公允价值计量，那么应当以何时的公允价值计量呢？是重组合同生效日、资产受让日，还是债权终止确认日？新准则没有明确。笔者认为，应当是资产受让日，这样才满足新金融工具准则对金融资产确认的规定。当资产受让日与债权终止确认日不一致时，通过“其他应收款”或“其他应付款”进行账务处理。当资产受让日在前，则确认金融资产的同时确认一项其他应付款，待债权终止确认时予以转销；当债权终止确认在前，减少债权同时确认一项其他应收款，待资产受让时予以转销。

债权人受让非金融资产时，非金融资产初始成本要按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计量。同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按资产受让日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计量，这样才能与其他会计准则规定不冲突。当资产受让日与债权终止确认日不一致时，也是通过“其他应收款”或“其他应付款”进行账务处理。混合重组方式中，要求对非金融资产按重组合同生效日各项资产公允价值对初始成本进行分配，这并不影响受让的资产按受让日放弃债权的

公允价值计量，两者不矛盾。

针对债务人而言，以资产清偿债务时，也会存在资产终止确认日与债务终止确认日不一致的情况，比照债权人的处理，通过“其他应收款”或“其他应付款”进行账务处理。同理，债务人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时，应当以权益工具确认日的公允价值计量，权益工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时，按权益工具确认日重组债务的公允价值计量。权益工具确认日与债务终止日不一致的，通过“其

债权人受让非金融资产时，非金融资产初始成本要按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计量。同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按资产受让日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计量，这样才能与其他会计准则规定不冲突。当资产受让日与债权终止确认日不一致时，也是通过“其他应收款”或“其他应付款”进行账务处理。混合重组方式中，要求对非金融资产按重组合同生效日各项资产公允价值对初始成本进行分配，这并不影响受让的资产按受让日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计量，两者不矛盾。

他应收款”或“其他应付款”进行账务处理。

二、债权、债务公允价值的确定

债权人受让非金融资产时，要求非金融资产初始成本以放弃债权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实务中，债权的公允价值是不好直接取得的，很少能够通过公允价值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确定债权公允价值。若借助专业评估或估值机构的工作，企业付出的成本较高且效果不一定太好。由于新准则规定，放弃债

权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异计入“投资收益”。本着谨慎性原则，笔者认为债权公允价值不能明显高于账面价值，也不能明显低于账面价值，否则公司按预期信用损失法计提的债权坏账准备就与实际不符。针对要进行债务重组的债权，一般都是存在特别收回风险的，应当单项分析计提坏账准备。单项计提则应考虑债权的公允价值减去相关处置费用，故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不能相差太大。若没有更好的确认公允价值的方法，



建议公允价值等于账面价值。

债务人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当权益工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时，要以债务公允价值计量。实务中，债务的公允价值也是不好直接取得的。债务的公允价值一般不会高于账面价值，但会低于账面价值。新准则规定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权益工具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本着谨慎性原则以及可操作性分析，债务人应当根据自身的资产负债情况，考虑内外经营环境变化，企业未来经营业绩变动、债务的特殊性等，预测一个债务清偿率，按预测的债务清偿率*债务账面价值计算债务公允价值。

三、债务人以公允价值计量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投资工具清偿债务的处理

新准则规定，以金融资产清偿债务的，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对于指定以公允价值计量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

性权益投资工具清偿债务的，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应当直接转入留存收益中。单从字面意思理解，好像这一类金融资产通过债务重组，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可以计入损益。但实质却不是这样，如果这样处理，就与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不一致。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处置此类金融资产时，处置价款与账面价值的差异，直接计入留存收益。故笔者认为，以此类金融资产清偿债务，也不能产生损益，而是直接计入留存收益。否则，同样的经济业务采用不同结算方式，得到不同的结果是不合理的，还会让部分企业为实现某些目的，借此虚构债务重组事实，调节企业利润，这就不符合会计准则制定的初衷了。

新债务重组准则已于2019年6月起实施，财政部于2020年4月出版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应用指南·2019》，对债务重组准则的实施进行了规范与指导。但对债务重组中几个关键时点的判断及会计处理、债权债务公允价值如何确定、债务人以公允价值计量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投资工具清偿债务的会计处理等没有作明确规定，需要有关部门及时作出相关解释或指导意见。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非标资管产品的计量与估值

■ 高诚 汪猛 张璋

非标准化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非标资管产品），是由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等金融机构接受委托，对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的集合资产计划。通常在银行间和交易所以外市场进行交易，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理财产品和资金信托、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类产品。自2006年美国金融机构首次开展非标准化债券资管业务以来，非标产品不仅在资金融通规模上持续膨胀，业务种类与产品设计也不断丰富。因其具有天然的市场导向、分散投资 and 专业化运作等优势，近年来受到高净值个体与投资机构的竞相追捧。我国的非标资管业务诞生于本世纪初的银信合作，成长于2008年前后的“四万亿”，至2012年证监会、保监会允许各类金融机构以“通道”形式发行相关创新产品，使得整个资管行业得到加速发展。以银行理财产品为例，普益标准发布报告称：截至2018年末，存续规模业已突破23万亿人民币。但快速崛起的背后也隐藏着业绩操纵、多层嵌套、杠杆不清，交易结构日趋复杂，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的项目风险无法向投资者及时传递等一系列问题，且在产品开发时较少受到资本金和流动性等监管约束，极易积累系统性风险。随着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金融领域愈发将缓释化解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特别自《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发布以来，资管类创新产品的供求双方都面临着“控风险、严监管”的转型挑战。2017年4月，财政部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2-24号以及第37号（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企业最晚应于2021年1月1日起执行。绝大多数非标资管产品，将被分类至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使得企业财务报告和绩效对于资本市场的波动性更加敏感。在新形势、新准则下，如何确保

非标资管产品的计量结果客观公允，无疑在计量理念与估值管理等方面对企业提出更高要求。针对普遍缺乏公开活跃交易市场的非标资管产品，需要企业结合投资标的特性，恰当选用估值技术、估值方法与估值模型以进行有效计量，并配套形成决策流程以规范、指导非标资管产品的估值应用。

一、旧准则计量模式与问题

在旧准则下，理财产品、信托计划、资管计划和基金投资等，依据产品具体投向不同，置于投资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或“持有至到期投资”等科目进行核算。特别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的产品项目，如果能够采用合理方式获取估值变动的，可以公允价值作为后续计量依据，而“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可按照成本计量。所以，对于大多数非标资管产品来说，企业仅以投资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在收到分红时确认投资收益，而日常无需关注持有产品的投资方向、杠杆水平或价值波动等情况，即不需穿透至底层资产项目。

这种“集合”式管理通常被企业认为“好处”颇多：首先，成本模式的存在使得该产品在报表中基本不会出现业绩“下行”，后续计量仅需在分红时确认投资收益，财务表现较为稳健，容易向投资者传递价值型增长“信号”。甚至对于部分私募基金类产品，依据合伙协议可由投资者决定收益分配的时间与规模，以此“蓄水池”相机调节利润。其次，不关注产品底层的投资方向、杠杆水平或价值波动，实质上默许或纵容了资管产品通过结构设计、关联交易和放大杠杆等方式，“巧妙”绕过有关投资范围、行业限制和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从而借助集合资产管理外表，刻意掩盖项目、对手和流动性等方面风险，盲目追逐报表资产的收益水平，造成企业实际承担的系统性风险（Beta系数）显著上升。另外，期末无需重新估

表1 保本及非保本产品具体评级映射关系

发行人外部评级	保本产品对应评级收益率曲线	非保本产品对应评级收益率曲线
AAA	AAA	AAPlus
AAA-	AAAMinus	AA
AA+	AAPlus	AAMinus
AA	AA	APlus
AA-	AAMinus	A
A+	APlus	AMinus
A	A	AMinus
A-	AMinus	AMinus
BBB	AMinus	AMinus
BBB-	AMinus	AMinus
0	AMinus	AMinus

值，人财物力的节约却造成账面价值无法迅速、定量捕捉市场因子。在集合资产管理外表下，难以全面揭示与计量相关收益风险，并及时、准确地反映投资产品的真实收益水平，从而无法对非标资管产品进行准确定价，投资绩效考量缺乏合理依据，降低了财务报告的价值相关性和决策有用性。

二、新准则下的计量模式与改进思路

新准则将金融工具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摊余成本（Amortized Cost，以下简称“AC”）、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Fair Value through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以下简称“FVOCI”）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and Loss，以下简称“FVTPL”）。取消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模式，并要求执行业务模式与合同现金流量特征测试（Solely Payment of Principal and Interest on the Principal Amount Outstanding）以决定投资产品和项目分类。据此，绝大多数的非标资管产品将被划分至FVTPL，期末应采用合理方法，即有效估值方式以确认公允价值，并将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对应旧准则来看，非标资管类产品的计量改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公允价值模式普遍使得财务绩效更加贴近资本市场。按照“如实反映”观（Faithful Representation），财务报告能够更加真实、可靠地还原资产内在价值，及时跟踪和反映市场变动情况。除行使特别指定权外，资产

价值波动将被财务报表定期捕捉，并体现为即期损益；对于指定为FVOCI的投资类产品，持有期内以及退出时的价值波动都不再影响损益。在制度层面堵上了因分类确认导致的利润调节“缺口”，从而更好地体现了资产负债观。（2）“开包”穿透至底层明细，通过逐项计算底层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以得到产品净值，将是对集合资产公允价值进行客观公允计量的有效方式。这与2018年4月发布的《资管新规》中的“净值型”理念高度契合，即从“资产←→资本”价值链两端，鼓励“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合理引入投资者治理机制，以引导企业回归资管价值创造本源，并抑制复杂嵌套与杠杆不清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在企业间蔓延。（3）执行新准则需要企业构建以公允价值为核心输出的计量实施体系，即针对缺乏公开活跃交易市场的非标资管产品，形成一套科学的估值应用的决策流程。充分考量各类估值方法适用条件与模型输出的合理性、准确性，使得估值结果能够全面、及时反映资管产品的实际风险敞口，为投资业绩的多口径、综合考评提供有力支撑。既能强化企业风险识别、计量、防范与控制等管理能力，又有助于业财融合、市场化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的改进创新。

三、估值技术、估值方法与估值模型

（一）穿透型估值

1. 方法概述：如企业能够定期获取产品的底层资产清单与估值信息，建议采取此方法。通过穿透至底层方式，结合企业内部建立起的标准化资产估值方案，合理计量相关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以此得出资管产品净值。

2. 适用范围：可穿透，且非分级类产品。当发行人能够为投资者提供该产品底层资产明细清单，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名称、资产类型、现金流结构、起始/到期日期、预期收益率、杠杆使用情况等底层信息，或在产品存续期内，如果底层项目发生轮换、出售、新增等变动情况，产品发行人会及时通知投资者，以使投资者能够及时获取并更新底层信息，且不存在优先偿付结构。

3. 估值步骤：步骤一：获取穿透后的底层资产、负债等项目清单，及其估值相关信息。步骤二：根据底层项目类型特征选取合



图1 非标资管产品估值应用决策树

适的方法、技术与模型分别加以估值。步骤三：汇总后计算得出可穿透型产品的资产净值，产品净值=（底层资产公允价值-底层负债公允价值）/产品份额。

（二）净值报价型

1. 方法概述：依据发行人定期发布或提供的单位净值信息，与投资人持有份额相乘得到资管产品的公允价值。

2. 适用范围：对底层项目信息无法获知，即无法适用穿透型估值，建议使用此种方法。开放式、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通常没有预期收益，或投资期限。产品会定期开放，投资人在开放期内可以进行申购赎回等操作。

3. 估值步骤：步骤一：判断净值生成是否符合公允价值要求。如果产品发行人或管理人定期提供产品净值，投资者首先需要对获取的净值进行分析，确认该净值的计算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有关公允价值“三层次”定义，以及《资管新规》等监管指引有关净值生成要求。

步骤二：判断净值发布频率是否满足入账要求。（1）发布频率能够满足估值频率要求，建议以“产品净值”作为产品的公允价值，定期向产品发行人或管理人获取产品净值；（2）发布频率不能满足估值频率要求，建议参照下述现金流折现法进行估值。但应考虑以定期公布的产品净值对估值模型校准回测，以合理开展估值分析（满足预算考核、财务预测等）。

（三）现金流折现型

1. 方法概述：通过对资管产品未来现金流进行折现，得到产品的公允价值。该方法

的重点在于折现率的确定。

2. 适用范围：不可穿透底层的非净值型资管产品和资管产品的优先级部分。不可穿透至底层的非净值型资管产品一般约定有预期收益率和付息频率，且投资者无法获取产品底层资产的明细信息，或相对滞后，或产品发行人/融资人无强制责任将底层资产的变动情况提前告知投资者。依据合同是否约定产品发行人/融资人在到期时确保偿还投资者本金，又可分为保本型和非保本型两类。资管产品优先级部分是指对应投资者能够优先享有收益、优先受偿本息的产品，一般具有约定的收益率和付息频率等。一些优先级项目与资管产品管理人签订有回购协议或差额补足协议，该部分可视为保本型产品，否则将作为非保本型产品。

3. 估值步骤：步骤一：确定合同现金流。投资者需根据产品的预期收益率、还本付息方式，确定从初始投资日至产品到期日的现金流结构，包括金额与回收日期。

步骤二：确定折现基准曲线。在确定现金流结构的基础上，还需为产品匹配符合其信用风险水平的收益率曲线。对于保本型产品，可从公开市场上获取第三方评级机构发布的产品发行人最新外部评级，映射到相同评级的中债收益率曲线作为基准曲线，如中债商业银行债收益率曲线、中债企业债收益率曲线等。如果无法从外部数据中获取上述实现方式中所需的评级结果，建议投资者为待估值交易合理指定评级，匹配相应的中债收益率曲线，实现基准曲线的构建。对于非保本型产品，因不提供保本承诺，建议依据发行人的主体评级，参考国际评级机构对公开发行优先股的评级方法论，采取“先降级、后映射曲线”的处理方式，统一对于非保本型产品发行人评级下调2小级，如AAA下调至AA+，AA+下调至AA-等。详见表1。

步骤三：市场点差校准。由于待估值产品所在市场与债券市场存在一定的差别，可在估值时引入设置反映市场差别的参数——“市场点差”，将该点数加在估值日的折现曲线上，实现对折现率的校准（无论产品保本与否，一般均需要采用此种校准方式）。

初始投资日，根据产品合同中约定的现金流结构（利率、付息频率、计息基准等），平行加入交易点差以调整折现利率，重新

拟合交易日估值结果使其回溯至实际交易价格，从而求得“市场点差”。例如，假设市场点差为spread，初始投资日当天通过现金流折现方法计算得到的资管产品的公允价值应等于交易价格，进而通过迭代计算得到市场点差：

(1) 计算每期现金流。

$$Cashflow_i = \frac{Coupon_i \times Principal}{f}$$

其中，Coupon为票面收益率，Principal为投资本金，f是每年的付息频率。

(2) 计算折现因子。假设计息方式为单利，则折现因子为

$$df_i = \frac{1}{1 + (\text{spread} + y_i) * t_i}$$

其中，y为对应各期现金流的中债收益率，t为每次付息现金流期限。

(3) 求解市场点差。通过现金流折现方法计算期初公允价值，并迭代计算市场点差，使得投资日估值等于交易日价格。

$$Purchase = \sum_{i=1}^n CashFlow_i \times df_i$$

步骤四：计算估值日公允价值。在估值日，重复上述方法计算剩余期限的现金流，选取估值日对应的中债收益率曲线计算每期现金流对应的收益率，并将市场点差加回收益率得到各期应有的折现率，据此，对剩余期间现金流进行折现，从而得到估值日资产的公允价值。

(四) 倒算型

1. 方法概述：资管产品劣后级的收益分配特点，决定了较难预测其整个生命周期的现金流结构，进而无法通过现金流折现等方式直接估算其产品价值。建议采用间接方式加以倒算：劣后级价值=资管产品整体价值-优先级价值。

2. 适用范围：资管产品劣后级。当资管产品具有分级结构，即存在优先偿还优先级本金与利息，再行偿还劣后级部分的合同安排时，底层资产现金流不足以足额偿付产品整体的本金和收益，劣后级成为优先级的损失缓冲垫。

3. 估值步骤：步骤一：计算资管产品的整体价值。按照底层项目信息对非标资管产品进行穿透估值。

步骤二：对优先级进行估值。按照合同规定的优先级现金流及预期收益率信息，采

用现金流折现模型进行估值，详见上述第3种估值方法。

步骤三：对劣后级进行估值。使用资管产品整体价值，减去优先级价值，计算得到劣后级公允价值。

四、估值应用决策

综上所述，企业应结合自身投资标的持有特点，充分考量各类方法的适用条件与模型输出的合理性、准确性，可参考图1所示步骤，以规范、确定不同非标资管产品的估值应用。

依据合同协议，首先判断所持产品能否定期获取底层项目信息以开展穿透分析。对于可穿透型产品，应再行判断是否具有分级结构。若为分级类产品，保本型优先级产品采用不下调评级的现金流折现法，不保本的优先级产品可采用下调评级式现金流折现法进行估值；而对于劣后级产品，应采用底层基础资产净值减去优先级价值的方法倒算估值。无分级结构的可穿透产品，应直接根据底层项目类型及信息，计算确定产品净值。

对于不可穿透型产品，须首先判断是否可定期获得净值报价。若净值报告的时效性能够满足企业定期估值入账要求，且净值生成过程符合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资管新规》等外部监管指引要求，可采用报价净值法进行估值。若为非净值型产品，还需考虑产品是否保本：对于保本型产品，可使用不下调评级的现金流折现法，不保本的优先级产品则应使用下调评级式的现金流折现法进行估值。

集中收付模式下创新型智慧“票据池”构建与实施

■ 王文广

近年来，我国票据市场发展迅速，规模不断壮大，市场参与者涵盖各类金融机构和企业群体，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电力企业、高载能企业票据使用规模逐年攀升，银行承兑汇票已成为资金结算的重要工具。但随之而来的大量票据沉淀，严重影响企业资金周转效率及运作能力。如何运用“大、云、物、移、智”等现代信息技术盘活票据资产，成为多数企业当务之急。本文以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简称宁夏电网）构建创新型智慧“票据池”为案例，分析其为企业挖掘票据价值、降低资金成本的实现方法，为企业提供经验参考。

一、建设思路及方案设计

宁夏电网结合外部形势和内部管理要求，以资金管控优化提升工作为抓手，以资金收支业务标准流程为主线，实现业务模式、系统流程、票据运作三大转变，提升风险防控、智能处理、降本挖潜、智慧分析四项能力。通过安全收票、自动清分、集中运作、智能分析，实现“六化”目标，即风险内控精细化、业务处理智能化、信息交互自动化、金融服务多元化、决策分析智慧化、综合收益最大化。

（一）智慧“票据池”建设蓝图

如图1，创新型智慧“票据池”总体规划主要包含三个模块，即票据收取阶段、票据运作阶段和票据处置阶段。

票据收取阶段：进行收票管理、风险管理、分类管理、销根管理。

票据运作阶段：从票据信息管理、应收票据管理、应付票据管理、票据台账管理、结算管理五个维度出发，实现票据额度监控，票据准确排程、票据合理处置、票据决策分析、票据风险把控。通过集成ERP系统、财务管控系统、营销系统、非结构化平台、资金结算系统、经法系统数据，在一套系统中实施票据托管模式、票据字段信息、票据通道、业务单据及流程、模型配置、票据影

响六个管理内容。

票据处置阶段：依托中国电财、商业银行实现应付票据开立指令处理、出票已登记处理、收票签收处理、应付票据处置指令处理、应收票据处置指令处理、票据识别管理、票据融资管理。

（二）智慧“票据池”运作模式

智慧“票据池”运作分为两个阶段，集中收取阶段和集中运作阶段（图2）。

集中收取阶段：由资金集约中心进行票据省级直收，通过系统嵌入内控制度、“白名单”管理等手段确保票据收取安全。

集中运作阶段：依托票据台账业务处理操作平台，进行票据托收、票据运作。根据地市公司、直属单位支付申请，系统智能配比、挑票；当资金紧张、票据不足时，确认是否进行票据开立，保证按期按比例支付账款。应付票据到期承兑时，系统关联票据合同信息，自动推送业务单据，制定还款计划，在财务管控系统完成全线上自动处理。通过与中国电财及商业银行直连通道完成所有票据业务操作。

二、新型智慧“票据池”具体做法

（一）贯通信息链路，内嵌风控体系

打通财务信息系统、中国电财、商业银行以及其他业务系统集成链路，实现数据贯通，票据信息实时共享，支撑票据业务全线上处理，在线发送业务处理指令，实时获取信息反馈及票据状态。信息系统与商业银行、中国电财均采用统一标准接口规范，并按照信息安全管理规范要求，采用前置机、加密专线网络、多重防火墙以及多级密钥签名加密等方式，保障数据传输安全可靠。在系统中嵌入票据收取“白名单”，将国有商业银行、中国电财等高信用等级金融机构设为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人“白名单”，非白名单内的低信用小微银行票据由于承兑、变现能力差、流动接收度低不予收取，筑牢票据收取入口关。构建更新机制，由财务、营



图1 新型智慧“票据池”总体构建



图2 智慧“票据池”运作模式

销系统发起销账，营销系统生成实收日报、实收凭证回传至财务管控系统，实现票据“银营财”三方自动对账（图5）。

（四）部署智慧策略，实现自动配票

1. 执行智慧配比策略：根据现金流初始排程情况，按照供应商名称、账号，采购、付款业务类型，对待排程记录执行组合支付策略，将零散小金额支付申请合并生成单笔大额。

2. 执行智慧配票策略：根据业务类型、支付金额，按待支付金额划分配票等级，对



销、法律部门根据票据市场形势及商业银行信用情况，共同会签，及时更新“白名单”，搭建票据管理风控稽核库，严防票据风险，避免经济损失（图3）。

（二）深化业财融合，信息共享共用

深化业财融合，ERP侧支付申请与经法系统强关联，管控侧进行资金“按日排程”，在业务发生时，调用相关的合同、协议、收款方信息并与支付记录匹配。票据开立时自动进行收款方信息校验，自动将对应资料传递中国电财和商业银行进行线上审查，实现信息交互自动化（图4）。

（三）三方数据共融，实时清分对账

从中国电财、商业银行获取待签收票据，票据信息实时同步至营销系统，营销系统通过票据信息匹配用电用户和归属单位。营销清分信息及时传递至财务管控系统进行内控规则校验，校验通过，发起签收指令至中国电财、商业银行执行；校验不通过，触发规则外会签流程，财务管控系统自动发送签收或拒签指令传递至中国电财、商业银行执行。对账阶段，财务管控系统从中国电财、商业银行获取票据签收状态，同步至营

不同配票等级设置配票比例和最低、最高票据面额。

3. 生成支付日历：根据资金存量设置分次基数、分次比例和步长，将单笔大额拆分，形成二次排程结果，生成转账支付日历和票据支付日历。

4. 发起支付流程：对票据支付计划发起智能配票，应用配票决策模型，将电票和纸票、应收和应付票据灵活搭配支付。

5. 合并支付制证：对组合拆分后的同组转账、应收、应付票据预制凭证进行合并制证，减少会计凭证量，提高申请单位对账效率。批量出具付款通知单，方便供应商对账，申请单位可通过付款结算池一键打印银行回单，实现业务智能化处理（图6）。

（五）盘活票据资产，降低资金成本

从纸票、电票两个管理维度，定制个性化金融服务，主要包括回购式贴现、票据开立等业务。通过定制金额（大票拆小票、小



图3 信息链路与风控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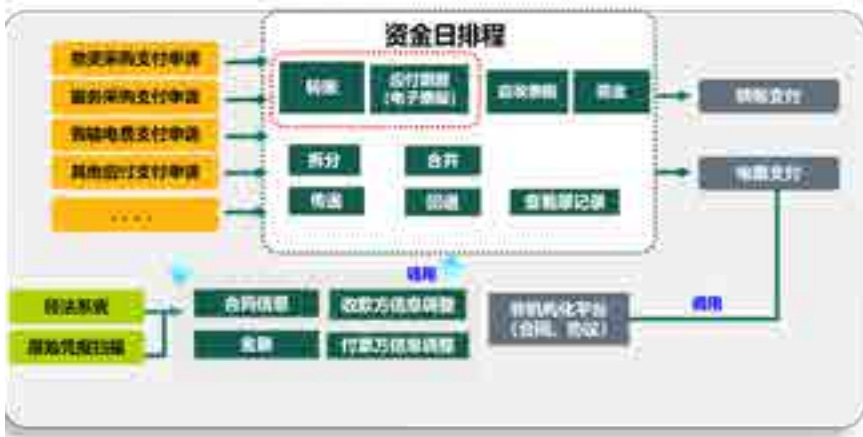


图4 业财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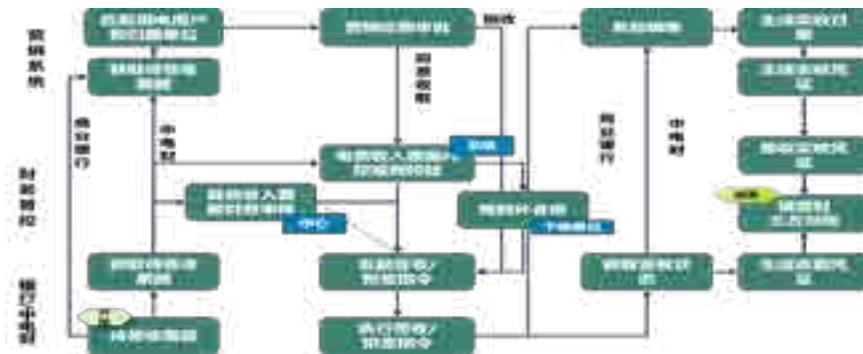


图5 数据共享

票凑大票）、定制期限（长票换短票，短票开长票）、定制介质（电票换纸票、纸票换电票）、票据升级（小银行承兑升级为大银行承兑），解决收付两端的票据“要素不匹配”问题，定制票据池质押融资服务，盘活闲置票据资产，压降融资成本（图7）。

（六）挖掘数据价值，搭建动态模型

充分挖掘数据价值，搭建票据管理智慧决策分析体系。基于公司日常业务管理和分析决策需求，应用多种数据分析方法，构建

票据管理分析指标资源库，搭建票据管理各类动态分析模型，支撑财务人员进行日常业务处理和指标数据分析，数据可层层穿透，直达数据根源，应用多种可视化图表，拖拽友好交互，并支持票据管理各类分析指标大屏展示。针对按年、月、日以及专项票据管理分析报告，支持自定义报告模板或定制化模板，报告数据在线、灵活、多维度抓取，内容在线即时编辑，一键式出具各类票据管理分析报告（图8）。

（七）强化票据运作，提升收益水平

1. 开票决策：根据资金排程，智慧运作模型，确定支付计划，测算资金缺口，依据

充分挖掘数据价值，搭建票据管理智慧决策分析体系。基于公司日常业务管理和分析决策需求，应用多种数据分析方法，构建票据管理分析指标资源库，搭建票据管理各类动态分析模型，支撑财务人员进行日常业务处理和指标数据分析，数据可层层穿透，直达数据根源，应用多种可视化图表，拖拽友好交互，并支持票据管理各类分析指标大屏展示。

银行开票手续费、银行剩余开票额度、银行开票效率、银行开票满意度，智能决策开票银行，制定最佳开票计划。

2. 贴现决策：根据排程测算缺口，对比月内循环贷款与票据贴现融资成本，按融资成本最低原则确定融资方式。根据票据库存，挑选待贴现票据，到期日在当月的进行买断式贴现，到期日在一个月以后的选择回购式贴现。依据各银行贴现利率、票据贴现折算天数等，由智慧模型进行贴现成本对比分析，制定最佳贴现计划。

3. 质押决策：对金额大于1000万且到期日期大于3个月的库存票据，可选择作为标的物进行票据质押，由智慧运作模型依据各银行质押手续费、质押业务范畴、审批效率等因素，进行票据质押成本对比分析，制定最佳质押计划（图9）。



图6 智慧支付系统



图7 定制个性化金融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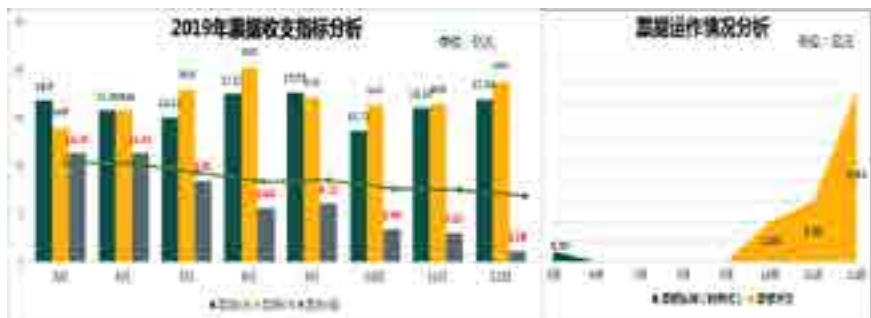


图8 票据管理智慧决策分析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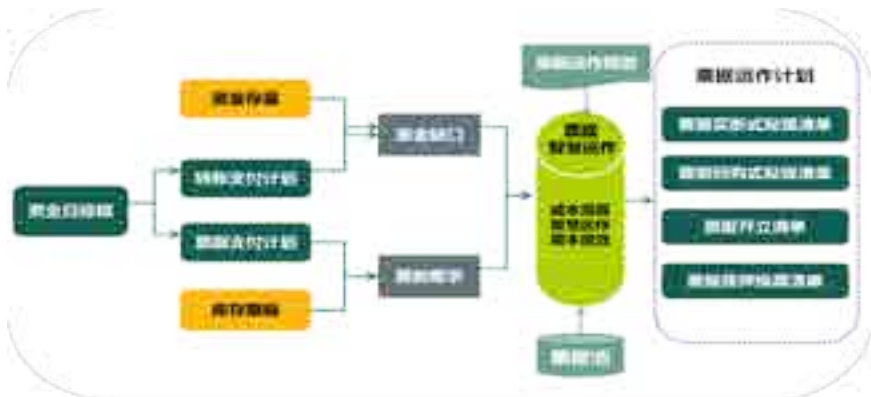


图9 票据智能运作流程

过票号、票据信息自动清分；简化票据背书流程，供应商“一站式”取票，实现业务模式由“属地托管、集中运作”向“集中收取、集中运作”转变。

系统流程方面，打通系统壁垒，搭建银企互联通道，实现票据全业务数据贯通，依托平台实现一键收取、信息共享，系统在线签收、审核，自动销账、推送入池；通过应收与应付、电子与纸质两个管理维度，与收支流程无缝衔接，实现系统流程由“多个系统、手工录入”向“一套系统、自动处理”转变。

票据运作方面，与金融机构深度合作，根据票据排程缺口和实际业务需要，围绕真实贸易背景进行票据线上开立；向商业银行定制个性化金融服务，解决收付两端票据“要素不匹配”问题，盘活闲置票据资产，实现票据运作由“线下操作，普遍单一”向“智能管理，个性多样”转变。

(二) 运作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风险防控方面，统一标准接口规范，应用多种加密方式，保障数据传输安全；植入内控规则，构建会签制度，筑牢票据收取入口关，严防票据承兑风险，巩固三维立体安全防线。

智能处理方面，实现了票据集中收取、智能清分、自动对账、智慧配比。票据开立自动匹配开票资料，关联合同、协议、收款方信息进行校验。

降本挖潜方面，根据资金缺口及现金、票据需求，分析各银行贴现息、短期银行贷款利率、票据开立费用、票据池质押融资成本等信息，综合测算生成最佳票据运作方案，压降带息负债，减少应收票据余额，节约财务费用。

智慧分析方面，建立票据管理分析指标资源库，搭建票据管理各类动态分析模型，应用多种可视化图表，支持多维度票据管理各类分析指标展示。

三、建设成效

(一) 实现了票据管理三大转变

业务模式方面，减少票据收取层级，通

作者单位：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例研究

■ 刘荣军

摘要 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作为近年来数量不断增多的典型侵权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总结实务中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类型，适时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增设“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三级案由和必要的四级案由。在裁判实务中，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裁判文书中对过错责任、责任限额、赔偿顺序等必要法律事实予以认定和写明。此外，应当在《注册会计师法》等规范性文件中明确会计师事务所的追偿权、会计师重大过错的认定标准，以使会计师事务所在实务中的追偿更具指引性和可操作性。

关键词 会计师事务所 侵权责任 实证研究 民事案件案由 追偿权

一、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件概述

本文通过“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进行案例检索工作，具体以当事人“会计师”、案件类型“民事”和案由“侵权责任纠纷”为并列关键词作为检索条件进行检索，共检索到2007年1月至2020年5月4日期间的相关裁判文书共325篇。对裁判文书进行筛选，去掉以下案例：（1）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非因会计师审计业务行为侵权案件裁判文书84份；（2）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诉讼代表人的裁判文书73份、作为原告的侵权责任纠纷裁判文书4份，共77份；（3）因法院不具有管辖权驳回起诉裁判文书1份、移送管辖裁判文书2份、管辖权异议裁判文书2份、驳回重复起诉裁判文书1份、因当事人破产法院裁定中止审理裁判文书1份、驳回起诉裁判文书25份共32份；（4）撤诉裁判文书32份；（5）发回重审但无裁判结果裁判文书6份。此外，对经历多个审理程序但实际上系同一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整合，作为一个案例进行统计，最终得到本文的适格研究案例共计87例。

（一）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裁判年份分布

对上述87份裁判文书按照最终生效年份进行整理，共得：2008年1份，2009年1份，2010年1份，2011年0份，2012年1份，2013年3份，2014年5份，2015年4份，2016年9份，2017年17份，2018年17份，2019年27份，2020年1份。由于各级法院

从2014年开始全面公开裁判文书，因此本文将上述整理的87例适格研究案例按照最终生效裁判的日期从2014起着重进行数据统计，发现从2014年到2019年，有关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的相关案例总体上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尤其是自2016年以来，案例审结数量快速增长。这也反映出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已然逐渐成为侵权领域中的一种典型的侵权形式。照此增长趋势，随着我国法律的普及和公民维权意思的提高，未来有关会计师事务所侵权的案件数量可能还会不断激增，因此统一司法裁判逻辑，厘清其中的重难点问题就尤为必要。

（二）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审级分布

从审级上看，在87例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一审判决结果有35例，占比40.23%（包括简易程序）；二审裁判结果有45例，占比51.72%；再审裁判结果有7例，占比8.05%。从上述数据可见，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上诉率极高。实务中，诉讼当事人对于其侵权责任承担等问题的争议较大。

（三）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裁判情况

通过对87例案件的法院裁判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诉讼请求能够得到法院支持的占比极低。其中，有19个案例被法院驳回起诉，占

比21.84%；有50个案例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占比57.47%，诉讼请求得到法院支持的案例有18个，占比仅为20.69%。

（四）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地域分布

经统计整理，在上述87例案件中，北京8例，浙江7例，广东、河南各5例，重庆、江苏、湖南、河北各4例，福建、山东各3例，上海、山西、安徽、广西、吉林、辽宁、陕西各2例，湖北、四川、新疆、云南各1例。可以看出，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地域分布以中东部省份为主，尤其是经济较发达省份，西部省份虽有此类案件，但数量不多。审计业务数量与公司成立数量正相关，我国中东部经济发展较好，公司企业数量较多，由此可见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关系。

（五）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由归类

随着会计师事务所侵权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多，2007年最高院通过《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审计业务侵权规定》），对出具不实验资审计报告问题进行了裁判实务解释，文件中首次出现了“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一词。颁布《审计业务侵权规定》不久，同年最高院又审议通过了《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发[2008]11号），但最高院并未将“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作为独立案由增加到《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当中，之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历次修改也未增加该案由。

最高人民法院法[2011]42号通知首次将侵权责任纠纷提升为第一级案由，文件规定，在确定侵权责任纠纷具体案由时，优先适用第九部分项下的具体案由，同时规定确定民事案由应当从四级到三级、二级、一级依次适用。实务中，由于缺少“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由，在本文检索到的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例中，法院一般适用第二级案由“侵权责任纠纷”或将该类案件归类于“其他侵权责任纠纷”案由当中。

由于“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由的缺位，造成该类案件在实务中案由适用的尴尬局面，案由适用的困难也造成理论和实务研究者案例检索的困难。在笔者检索到

的325份判决书中，与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行为相关的裁判文书共计132份，占比不到40.62%。笔者认为，随着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件数量和案件类型的增多，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作为新的第三级民事案由，并依据会计师事务所侵权类型的不同适当增加第四级民事案由，以细化、补充和完善我国《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二、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行为类型的多样化

（一）故意侵权行为类型

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专业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从事审计业务，如果存在明显违反规范性文件要求的行为，实务中人民法院一般认定为故意侵权。构成共同侵权的，根据《民法典》第1168条，可能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违规支取验资款。《关于加强公司登记注册入资账户管理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对验资程序、方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事务所和商业银行对于验资款的转入、转出应当符合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得违规支取验资客户的验资款。

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终556号民事判决中，会计师事务所和商业银行即因违规支取客户验资款而被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3年5月22日，陆良同乐会计师事务所向曲靖市商业银行陆良支行出具转账支票，曲靖市商业银行陆良支行凭陆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转款支票，即将黄水清、杜金花的注册验资款项600万元转入陆良同乐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人员方棋明的个人账户，该笔款项用于偿还他人债务。一审法院根据《民法总则》、《商业银行法》，并参照《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规定，判决陆良同乐会计师事务所、曲靖市商业银行陆良支行等连带偿还原告黄水清、杜金花564万元验资款本息。二审法院同样认为，“陆良同乐会计师事务所和曲靖市商业银行陆良支行的共同过错行为违反了各自对于涉案验资款项的法定和约定注意义务，其共同过错行为造成黄水清、杜金花的款项损失，应当连带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赔偿责任”，并判决会计师事务所、商业银行连带赔偿黄水清、杜金花未得到偿还的564万元验资款本息。

2. 故意出具虚假验资证明。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云高民一终字第114号民事判决中，事务所在明知昆明市交通局和检测站（被审计单位）在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营业部未开设账户，实际并未存入1000万元到该营业部的情况下，仍在注册资金验资意见处注明“资金查证属实”并出具不实报告。一、二审人民法院据此根据《审计业务侵权规定》第4条、第5条之规定，判决事务所和被审计单位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3. 违法送达和执行外国法院司法文书。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苏民二终字第0045号民事判决中，被告因违反《民事诉讼法》第265条、第266条规定，在中国境内违法送达和执行外国司法文书而被认定构成侵权。人民法院认为：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一家专业会计师执业机构，应当明知其行为的违法性”，主观上具有明显故意。会计师事务所是由众多会计师和其他职员组成的专业机构，其对法律法规的认知能力应高于社会公众，更应当严格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和会计执业准则、规则，否则造成损害后果的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即是一件因违反我国法律而被人民法院认定主观上具有故意的典型侵权案件。

（二）过失侵权行为类型

1. 错误判断和评价审计证据。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业务中应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严格依据执业准则、规则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根据审计的要求采用必要的调查方法获取充分的审计证据，在实施了必要的验资程序，取得充分、适当的验资证据后出具验资报告，未尽到上述职责出具不实报告的，实务中一般认定为存在过失。在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西中民四终字第00348号民事判决中，由于事务所未亲自向银行询证核实用于出资的货币资金是否到账，人民法院酌定判决事务所承担50%的赔偿责任。又如，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陕民二终字第035号民事判决中，事务所在验资过程中，在未询证并取得银行函证回函的情况下出具验资报告，导致重复验资，法院因此认定事务所存在重大过失，并判决事务所在验资不实的范围内承担15%的赔偿责任。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吉民提字第42号民事判决中，验资报告档案中存档的2枚现金存款单均为复印件，会计师事务所未认真审查

其真实性，因而出具虚假验资报告，被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 错误判断和评价审计依据。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对审计依据保持必要的职业谨慎，综合考虑委托人提供的审计材料，正确确定审计依据。在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4民终1986号民事判决中，事务所即因未全面考虑系列合同、协议的整体性，片面作出了审核报告。一、二审法院据此均认定事务所存在过失，判决事务所对城乡建设局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3. 会计师不具备执业资质。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表明会计师具备相应的执业水准，《注册会计师法》对注册会计师的从业资质作出了规定，即注册会计师应当依法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才能执业。在笔者检索到的相关案例中，部分案件即因事务所未提供负责审计工作人员的执业证明而被法院认定存在过错。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豫法民二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中，商业银行在被审计单位新增注册资本未到位的情况下，出具虚假资金证明，会计所据此出具了不实审计报告。会计所虽辩称其已严格遵守了执业准则、验资过程中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主张免责，但由于其未能提供负责审计工作人员的执业证明，法院据此认为“不能证明负责审计的工作人员执业水准符合执业规定，即国安会计所不能证明其在本案所涉审计业务活动及出具不实验资报告中没有过错”，并判决商业银行、会计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4. 未核实和确认实物权属。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资产评估法》《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1号-验资》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要求进行执业，核查和验证评估活动中使用的文件资料的相关属性，观察、监盘并验证实物的产权归属，未尽到权属核实义务的，需要承担过错责任。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民终6295号民事判决中，事务所作为验资机构因听信刘某章的承诺，未能对刘某章提供的虚假土地使用权证书的真实性鉴别出真伪，也未到相关机关进行核实导致其出具评估报告和验资报告不实，一审法院据此酌定事务所对被审计单位向利害关系人所负债务在出资人刘某章不能清偿部分范围内各承担10%的过错责任。在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1391号民事判决中，事务所没有到实物

房屋处进行查验，也没有对移交证明等验资材料中出资人“曹忠奎”签名的真实性予以核实，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事务所的审计行为存在一定过失，违反了《资产评估法》规定的义务，导致《验资报告》及《验资事项说明》中的内容存在虚假记载和误导性陈述，并判决事务所在不实范围内对利害关系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5. 丢失会计资料。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妥善保管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资料，造成会计资料损毁、灭失、丢失，并导致被审计单位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5）沙法民初字第04701号民事判决中，晨光公司意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公司账目进行审计，遂将数本会计凭证交予会计师事务所，后因会计师事务所保管不善，将该批资料丢失，导致晨光公司无法依据该凭证向债务人实现债权，法院据此认定事务所存在过错，并判决事务所对无法实现的债权承担60%的赔偿责任。

三、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裁判规则

（一）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是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在执业活动中因过错侵害他人权益，使他人遭受损失，应当承担的以损害赔偿为主要方式的侵权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无法完全规避在执业活动中出现的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作为经济和法学领域共同频发的事件，研究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确定会计师事务所责任承担的前提和基础。

1. 行为的违法性。《注册会计师法》《商业银行法》《资产评估法》《证券法》等以及会计执业准则、规则等对会计师执业作出了规范要求，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的违法性主要是违反上述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法定义务。在实务中，认定会计师事务所行为违法性的依据主要是《注册会计师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和会计执业准则、规则的要求。

2. 损害后果。利害关系人损害后果的客观、真实存在是确定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的前提条件。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中的损害，是指因会计师事务所在从事审计业务活动中因过错导致他人权益所遭受的不利后果。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中的损害通常属于财产损害。

3. 因果关系。该要件所要解决的是侵权责任是否成立的问题，大陆法系多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这里所说的因果关系是事务所及会计师的违法行为与他人所受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2015）梅民初字第1481号民事判决中，法院即认为“不实报告与报告使用人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应考量报告使用人是否实际信赖或者使用不实报告”。同时，当损害的发生存在多种原因时，在裁判实务中确定因果关系时，还会考量损害的原因力，以此确定会计师事务所是否承担侵权责任以及责任的大小。

4. 过错。过错是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的主观构成要件，确定是否存在过错一般借助于考量注册会计师的外在执业行为和活动。在执业活动中，通常是由会计师事务所委派的会计师实施相关业务，因此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中的过错通常指的是注册会计师实施不法行为时的心理状态，是注册会计师对自己行为的损害后果的主观态度。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中的过错形式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对于过失的认定以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是否保持必要的职业谨慎，是否严格遵循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为依据。过失可以分为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但在裁判实务中很少对两者类型的过失作出严格的区分。笔者认为，会计师侵权属于专家侵权的一种类型，会计师在执业活动中应尽到“中等偏上”的谨慎、勤勉义务，在立法以及裁判实务中应当结合审计习惯、会计师队伍素质等因素综合确定会计师重大过错的认定标准。

（二）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

在归责原则方面，《注册会计师法》第42条以过错责任原则作为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的归责原则。《审计业务侵权规定》第2条则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不实报告侵权责任领域进一步确立了过错推定原则，该过错推定原则同时包括了推定过错和推定因果关系。在出具不实报告侵权责任纠纷中对过错及因果关系均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归责原则，“但举证责任的倒置并不改变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对权利成立规范要件事实即出具不实审计报告并不受到影响”，利害关系人仍然需要初步举证证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不实和存在过错这一事

实，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三）减、免责事由的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3章对侵权责任减、免责事由作出了一般规定，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作为侵权责任的一种类型，当然适用上述减责、免责事由的规定。例如《审计业务侵权规定》第8条、《侵权责任法》第26条、《民法典》第1173条均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即将被侵权人过错作为减责事由的一种。《民法典》第7编第1章对侵权责任减、免责事由作出了一般规定，笔者认为，今后随着《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和《侵权责任法》的废止，《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的减责、免责事由在今后的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裁判实务中也应将予以适用。此外，根据事务所审计业务活动侵权行为特点，最高院在《审计业务侵权规定》对出具不实报告作出了特殊的减责、免责事由。因此，对于上述法律、司法解释中的减、免责事由，人民法院在审理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件时应当予以综合考虑，会计师事务所也应当积极举证证明上述减、免责事由的存在以作为减轻自己赔偿责任的抗辩事由。

（四）赔偿责任的确定和写明

1. 过错责任的确定。《审计业务侵权规定》第6条规定，因过失出具不实报告的，法院应当根据事务所的过失大小确定赔偿责任。实务中，法院一般在裁判文书事实和理由部分对不实审计金额、赔偿责任作出认定。如在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西中民四终字第00348号民事判决中，会计师事务所因未亲自询证货币资金是否到账，从而出具不实验资报告，法院据此认定事务所存在过失而酌定判决承担50%的赔偿责任。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陕民二终字第035号民事判决中，法院根据事务所过失验资不实的原因力，判决事务所承担15%的赔偿责任，并在裁判主文部分对不实审计金额、赔偿责任均予以写明。

但实务中也有法院并未严格根据过失大小确定赔偿责任的案例。如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吉民提字第42号民事判决中，事务所因过错出具了虚假验资报告，但法院并未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过错大小确定赔偿责任，而是直接判决会计师事务所“在其出具的虚假证明800万元的范围内向杨春花承担赔偿责任”，显然这一裁判思路与《审计业

务侵权规定》的规定并不相符。

《审计业务侵权规定》第6条规定，过失出具不实报告的，法院应当根据过失大小确定赔偿责任；第10条规定，赔偿责任以不实审计金额为限。笔者认为，根据上述条文的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事务所过失出具不实报告的赔偿责任时，不仅应当将不实审计金额在裁判文书中予以认定，而且还应严格依据法律事实和事务所的过失大小确定其赔偿责任，并在裁判正文部分对此内容予以写明，这样才更加符合《审计业务侵权规定》的规定和《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的要求。

2. 赔偿限额及赔偿顺序的表述。《审计业务侵权规定》第10条对因过失出具不实报告侵权的赔偿限额及赔偿责任人的先后顺序作出了规定，赔偿顺序先后为：（1）被审计单位；（2）未足额出资的出资人；（3）事务所。但《审计业务侵权规定》对事务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赔偿限额及故意、过失情形下的追偿权均未作明确规定。实务中，法院一般在裁判主文中写明赔偿顺序。如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陕民二终字第035号民事判决中，案件经过二审，最后的裁判结果即是严格按照被审计单位、未足额出资的出资人、会计师事务所的顺序作出裁判，符合《审计业务侵权规定》的规定。

但实务中也有部分法院对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赔偿限额在裁判文书中未作明确写明。如在昆明市交通运输局与云南西勘建设工程总公司其他侵权纠纷上诉案中，一审法院判决正文部分未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赔偿限额作出明确说明。

笔者认为，与《审计业务侵权规定》第6条相照应，利害关系人因信赖事务所故意或推定明知而出具的不实报告所遭受损失的数额应以不实审计金额为限，这也符合过错责任原则的赔偿精神。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当对不实审计金额这一事实作出认定，并在判决书中明确载明，以减少其他后续利害关系人的证明责任、减少当事人诉累，减少法院后续审理同类案件认定工作赘负、提高法院审理效率。

（五）追偿权——立法上的缺位

1. 对注册会计师的追偿权。在律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中，《律师法》第54条赋予了律师事务所可以向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

律师追偿。会计师事务所侵权，本质上也是由于会计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因此，在该类案件中也应当由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会计师承担最终赔偿责任。注册会计师作为专业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注册会计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执业准则、规则从事审计等活动，并且应当熟知上述规定和规则，若会计师在执业中存在违反上述规定和规则等，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和违法行为的过错程度，分别认定其故意或存在重大过失，在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后，应当赋予会计师事务所向相关会计师追偿的权利。现行《注册会计师法》并未在条文中明确会计师事务所的追偿权，笔者认为，在今后的《注册会计师法》修订过程中应当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追偿权予以明确。

2. 对最终责任人的追偿权。会计师事务所因存在过错而承担赔偿责任，但在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中，会计师事务所并不一定承担最终责任。《公司法》第30条、第93条规定，股东等是公司的出资义务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9条规定，股东的出资义务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可以认为股东等人是公司出资的最终责任人。据此，在因过失出具不实验资报告这一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根据《审计业务侵权规定》的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虽然需要承担与自己过错程度相当的侵权责任。笔者认为，虽然事务所在该类侵权中存在过错并造成利害关系人损失，但并不能据此免除被审计单位出资人的出资义务并转由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这有悖于法律逻辑。因此，被审计单位的出资人应当是赔偿责任的最终责任人，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后理应有权向出资义务人追偿。笔者根据检索到的出具不实验资报告案例的当事人信息，结合“追偿”关键词进行检索，但并未检索到相应的追偿权纠纷裁判文书，笔者分析可能的原因有以下两个：（1）相关裁判文书未或尚未上传到中国裁判文书网；（2）由于缺少明确

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规定，会计师事务所缺少向不实出资人追偿的规范指引。笔者认为，在今后的《注册会计师法》及《审计业务侵权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的修订过程中应当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会计师事务所向最终责任人的追偿权予以明确，以使会计师事务所向最终责任人的追偿更具可操作性，使法律规范体系臻于完备。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梳理，对不同法院的裁判规则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梳理出理论和实务中已出现的问题。在裁判实务中，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裁判文书中对过错程度、赔偿限额和赔偿顺序等必要事实予以认定和写明。此外，由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追偿权、会计师重大过错的认定标准等内容予以明确，造成实务中会计师事务所向会计师追偿存在困难，在今后的法律文件修订或立法过程中，应当及时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追偿权、会计师重大过错的认定标准等内容予以明确，使实务中的追偿更具指引性和可操作性。随着近年来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件数量和案件类型的不断增多，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已不再仅限于出具不实验资审计报告这一类型，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及时总结实务中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类型，适时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增加“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三级案由和必要的四级案由，为今后实证研究会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和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红斌. 论注册会计师的侵权责任. 江西财税与会计. 2002(10)
2. 彭枫. 注册会计师民事侵权责任探析.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10(04)
3. 刘淑春. 注册会计师侵权责任刍议. 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02)
4. 遯天贵, 赵薇. 注册会计师侵权责任探析. 中国审计. 2002(04)
5. 杨信. 论注册会计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会计与经济研究. 2013(02)

股权并购中评估增值对后续利润影响的案例分析

■ 彭瑞清

据《2019年度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资产评估分析报告》（李文秀、王军辉，2020）统计，2017-2019年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中，使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和市场法的平均评估增值率分别为200.57%、513.9%、340.65%，增值率普遍较高；近三年交易价格与评估结果的差异率平均为-0.12%，标准差7.08%，即交易价格基本采用评估结果。

在并购交易方案的设计中，应当考虑在完成收购后，评估增值对后续利润的影响。但是因重组中情况较为复杂，企业会计准则、资产评估准则和所得税法对股权并购交易的不同认定，投后管理或业绩评价的对象通常为被收购企业层面的绩效，很少关注并购项目对收购方合并报表的综合财务影响，直到“商誉暴雷”时才开始反思当初的并购方案是否合理，通过分析并购交易中评估增值、递延所得税负债和与所得税相关的商誉对后续会计利润的影响，总结出了三种解决上述问题的筹划方案。甚至迫使管理层为满足合并报表的业绩要求而采取大量的盈余管理操作。

一、会计准则中有关递延所得税负债和商誉的规定

1. 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自2006年起，我国所得税会计的核算办法由债务法改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的要求，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存在差异的，应当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同时，准则明确豁免了以下两种情况下的递延所得税，即（1）商誉的初始确认；（2）既不是企业合并，也不影响利润或实际纳税的交易。在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各类资产，特别是非流动资产的评估增值情况比较常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的要求，入账价值应当为公允价值。其结果就是被购买方的资产在购买方合并报表中的账面价值很可能高于其在被购买方个别

报表中的账面价值，因而也通常高于该项资产的计税基础。该情况属于企业合并中不影响利润或实际纳税的情况，依准则要求应当计提递延所得税负债。

2. 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计量。根据所得税准则的要求，企业合并和直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者事项涉及的所得税不在当期损益中确认，应当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而在后续计量时，因为评估增值的资产摊销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所以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调整金额也应当计入所得税费用。

3. 商誉的确认和计量。根据企业合并准则的要求，购买方在购买日应当对合并成本进行分配，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商誉的来源由此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由递延所得税负债影响形成的商誉和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确认的商誉。而所得税准则应用指南中指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同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通常应调整企业合并中所确认的商誉。会计实务中，在合并日通常先将资产的增值额以及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计入资本公积，再进行合并抵消，实际效果等同于以递延所得税负债调整了商誉账面价值。此外，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要求，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应当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时，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预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测试结果表明包含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先抵减分摊至该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的账面价值。所以，在资产评估增值产生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情况下，后续计量时的所得税费用（收益）应为贷方发生额，但是因递延所得税负

债而增加的商誉部分金额并不会按相同比例进行摊销，只能计入资产减值损失或处置损益等的借方，由此产生了会计错配。

二、资产评估中对递延所得税的考虑

1. 以交易为目的的企业价值评估。在企业价值评估中，对所得税的考虑是从被购买方作为纳税主体出发的。被购买方既是法律实体也是会计实体，而合并报表并不是法律实体。计税基础是针对法律实体的概念，与会计实体无关，因此企业价值评估过程中不会考虑合并报表层面涉及的递延所得税。从收购方的角度来看，被收购企业各项资产的评估增值已体现在收购方个别报表中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中了，收购的股权计税基础等于其账面价值，不存在暂时性差异；从被收购方的角度来看，并购行为并未改变个别报表中各类资产的账面价值，也无须调整所得税支出，自然不用调整递延所得税项目。

2. 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收购价格分摊评估（PPA评估）。不同于企业价值评估，PPA评估本身是服务于财务报告的，因此必须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确认合并报表中的递延所得税项目。PPA的评估对象是被购买方在合并日可辨认的资产和负债，包括已在个别报表上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因为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公允价值，所以PPA评估大多可以直接使用企业价值评估的结果，但是评估增值导致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是个别报表中资产在合并报表中的衍生品，在PPA评估之前是不可辨认的，自然不在企业价值评估的范围内。在PPA评估之后，就成为了可辨认负债，应在合并报表中进行确认。但实际上，之前大多数公司甚至是上市公司都未严格按照会计准则和评估准则的要求开展PPA评估，导致一些完成并购交易的公司编制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不符合监管要求。如中国证监会在《2017年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中就提示，“个别上市公司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收购标的公司，购买标的公司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远高于计税基础，但公司未相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导致企业合并商誉低估。”

三、案例分析

为展示评估增值导致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商誉对后续会计利润的影响，试分析以下案例：

甲公司作为一家矿业公司，拟从丙公司收购乙公司100%股权，乙公司的资产组构成业务，矿山仅能继续开采5年。假设乙公司与供应商和客户签有5年锁定采销价格的长期合同，折现率取10%，无后续资本支出，无营运资本占用，期末无残值。

乙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为：固定资产100亿元，其中20亿元为采矿相关固定资产，30亿元为选矿设备，50亿元为冶炼设备；无形资产10亿元，为采矿权；实收资本110亿元。乙公司收益法评估结果为200亿元（如表1所示），固定资产无增值，无形资产评估价值100亿元，增值90亿元。

（一）与所得税相关的商誉对会计利润的影响

1. 合并日的主要会计处理。丙公司持有的100%股权计税基础为110亿元，交易价格为企业价值评估结果200亿元，增值90亿元，丙公司缴纳了相应的所得税。此时，甲公司持有的乙公司100%股权计税基础变为200亿元，而乙公司账面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不变。因无形资产评估增值90亿元，应在合并层面计提递延所得税负债22.5亿元，所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200亿元-22.5亿元=177.5亿元。交易对价200亿元超过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商誉22.5亿元。合并调整分录如下：

借：无形资产	90
商誉	22.5
实收资本	110
贷：长期股权投资	2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2.5

在合并日后的各年资产负债表日，除上述分录滚动调整外，还应对评估增值部分和递延所得税负债进行调整。调整分录如下：

借：主营业务成本	18
递延所得税负债	4.5
贷：累计摊销	18
所得税费用	4.5

通过上述分录，合并净利润共减少了13.5亿元。无形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在合并报表中的账面价值分别减少了18亿元和4.5亿元。在合并日的5年后，合并净利润累计调减67.5亿元，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账面价值均为0元，商誉账面价值22.5亿元。经商誉减值测试，项目后期会逐步计提

表1 乙公司收益法评估明细简表

单位: 亿元

	第0年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营业收入	-	130.00	130.00	130.00	130.00	130.00
付现营业总成本	-	67.00	67.00	67.00	67.00	67.00
税前净现金流量	-	63.00	63.00	63.00	63.00	63.00
折旧与摊销	-	22.00	22.00	22.00	22.00	22.00
当期所得税	-	10.25	10.25	10.25	10.25	10.25
税后净现金流量	-	52.75	52.75	52.75	52.75	52.75
NPV=	200.00					

注: 税后净现金流量 = 税前净现金流量 - 当期所得税 = 营业收入 - 付现营业总成本 - 当期所得税。

表2 乙公司各年商誉减值测试情况

单位: 亿元

	第0年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资产组的评估价值	200.00	167.21	131.18	91.55	47.95	-
可辨认净资产原值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累计折摊	-	22.00	44.00	66.00	88.00	110.00
调整的累计摊销	-	18.00	36.00	54.00	72.00	90.00
调整的递延所得税		4.50	9.00	13.50	18.00	22.50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177.50	142.00	106.50	71.00	35.50	-
商誉账面价值	22.50	22.50	22.50	22.50	20.55	12.45
应计提的商誉减值	-	-	-	1.95	8.10	12.45

注: 资产组不含每年留存的货币资金, 仅包括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根据资产减值准则的要求,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组的评估价值以预计现金流量的现值计算。应计提的商誉减值 =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 商誉账面价值 - 资产组的评估价值 = 可辨认净资产原值 - 累计折摊 - 调整的累计摊销 - 调整的递延所得税 + 商誉账面价值 - 资产组的评估价值。

表3 乙公司合并日后5年的损益情况

单位: 亿元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合计
税后净现金流量	52.75	52.75	52.75	52.75	52.75	263.75
折旧与摊销	22.00	22.00	22.00	22.00	22.00	110.00
调整增值摊销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90.00
调整前合并净利润	12.75	12.75	12.75	12.75	12.75	63.75
调整递延所得税	-4.50	-4.50	-4.50	-4.50	-4.50	-22.50
商誉减值损失			1.95	8.10	12.45	22.50
合并净利润	17.25	17.25	15.30	9.15	4.80	63.75

注: 合并净利润 = 调整前合并净利润 - 调整递延所得税 - 商誉减值损失 = 税后净现金流量 - 折旧与摊销 - 调整增值摊销 - 调整递延所得税 - 商誉减值损失。

表4 合并日后5年的损益情况

单位: 亿元

	第1年-第3年	第4年	第5年	合计
商誉减值损失	-	1.05	12.45	13.5
持续经营合并净利润	17.25	16.20	4.80	72.75
处置股权合并净利润	17.25	16.20	27.30	95.25

减值准备。在乙公司的生命周期中, 考虑商誉减值后的合并净利润累计应减少90亿元, 即购买日评估增值部分。

2. 后续计量的主要财务影响。从表2可知, 乙公司资产组的评估价值在前2年高于乙公司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从第3年开始每年计

提1.95亿元、8.1亿元、和12.45亿元的商誉减值准备。

3. 整体分析。从表3可以发现, 经递延所得税调整前的合并净利润各年均均为12.75亿元; 在递延所得税负债和商誉减值的影响下, 合并净利润前2年为17.25亿元, 后3年逐步下降至4.8亿元, 即在与所得税相关的商誉的影响下, 合并净利润呈现整体下滑的趋势。考虑到与所得税相关的商誉、评估增值金额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初始确认的计算逻辑, 即“评估增值金额×所得税率=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负债×股比=商誉”, 相对合理的核算方式, 似乎应是按持股比例计算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摊销金额计提商誉减值, 或者是按照包含少数股东承担的全部商誉减值的金额摊销递延所得税负债, 但当前实务中常用的商誉减值测试方法却很难得出该结果。

另外, 合并调减所得税费用与实际并不相符, 乙公司每年实际支付了10.25亿元的所得税, 但是其中4.5亿元在合并时调回, 冲减了递延所得税负债。更直观的方法可能是增加递延所得税资产, 因为这部分“提前支付”的4.5亿元税款可在处置时用于抵税。

综上, 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 本来平稳的经营成果会在所得税调整的影响下增加前期盈利水平, 并因商誉减值带来后期合并净利润的迅速下滑。现实中的并购交易通常较为复杂, 当与所得税相关的商誉混在持续经营的资产组中, 便很可能对财务报告使用者产生明显的误导, 做出错误的投资业绩评价, 同时也催生了管理层盈利管理的客观需要。

(二) 与评估增值相关的所得税对会计利润的影响

乙公司在第5年末个别资产负债表是: 货币资金263.75亿元, 实收资本110亿元, 未分配利润153.75亿元。若甲公司无处置乙公司股权的计划, 则该并购交易的经济价值就是评估值200亿元。但是, 若乙公司按照“先分配, 后清算”的常规税务筹划方案处理, 则处置价款110亿元与计税基础200亿元相比产生90亿元亏损, 可抵减22.5亿元的当期所得税, 即每年合并层面调增但是已实际支付的所得税款, 会在甲公司处置股权时收回。

按上述带有处置计划的重组方案重新测算乙公司对于甲公司的价值, 在所有评估假

设参数相同的情况下，评估结果为213.93亿元。增加的13.93亿元为第5年抵减22.5亿元所得税的现值。从5年的财务表现来看，前4年利润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第5年的合并净利润在所得税抵减的影响下，从第4年的9.15亿元猛增到27.3亿元，净利润增幅198%。

受到与所得税相关的商誉影响，并购后的持续经营利润通常会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若在项目末期处置股权，虽然会带来不小的所得税收益，但还是加剧了合并利润的



波动幅度，大大增加了盈余管理和市值管理的难度。

四、关于评估增值及与所得税相关商誉的筹划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发现，问题聚焦在两方面：首先是与评估增值相关的所得税部分难以实现抵税价值，其次是与所得税相关的商誉存在大额减值风险。因此，有以下三种基本解决方案：一是分步收购股权方案，可减少确认的商誉；二是不构成业务的企业合并方案，无须确认商誉；三是分立评估增值的资产，无须确认与所得税相关的商誉，且能利用抵税价值。

（一）分步收购股权

根据企业合并准则的规定，商誉的初始计量金额为企业全部商誉×持股比例，所以先收购股权刚好形成控制，再收购少数股东权益至目标持股比例，不仅可减少与所得税相关的商誉金额，也会同比减少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确认的商誉，显著降低盈利的波动性。但是与原收购方案相比并无实质差异，

未改变税务现金流，没有最大程度实现抵税价值。

沿用上述案例，若甲公司合并乙公司时，先购买60%的股权实现控制，再购买40%的股权，则长期股权投资入账价值为200亿元×60%=120亿元。PPA评估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177.5亿元对应60%的股权比例为106.5亿元，因此应确认商誉13.5亿元。合并日应做调整分录：

借：无形资产	90
商誉	13.5
实收资本	110
贷：长期股权投资	120
少数股东权益	71
递延所得税负债	22.5

接下来甲公司再收购少数股东持有的40%股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第47条的规定，应在上述合并分录基础上加做一笔合并抵消会计分录：

借：少数股东权益	71
资本公积	9
贷：长期股权投资	80

在不实质改变交易方案的前提下，这种“60%：40%”分步收购方式和直接收购100%的方式相比，减少了合并商誉和资本公积。

经过上述筹划，整个经营周期的合并净利润较筹划前增加了9亿元，即合并日计入资本公积的部分。虽然第5年仍需一次性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准备，但考虑处置股权的抵税收益后，合并净利润较筹划前的波动性显著降低，5年间最低合并净利润是16.2亿元，而筹划前的最低值为9.16亿元。

（二）不构成业务的企业合并

在形成不构成业务的企业合并时，应将购买成本按购买日所取得各项可辨认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分配，不确认商誉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不适用企业合并准则。《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中指出，合并方在合并中取得的组合应当至少同时具有一项投入和一项实质性加工处理过程，且二者相结合对产出能力有显著贡献，该组合才构成业务。在判断是否构成业务时，也可采用集中度测试简化判断程序：如果购买方取得的总资产的公允价值几乎相当于其中某一单独可辨认资产或一组类似可辨认资产的公允价值的，则该组合通过集中度测试，应判断为不构成业务；否则须全面执行相应的

测试程序。

一般来说，整合矿权、购买房地产项目的股权交易中，通常为不构成业务的合并，对于其他行业通常需预先进行重组安排。上述案例中，甲公司可先收购选矿和冶炼设备，再收购乙公司的股权。因采矿权及其附着物分拆成本重大，应将乙公司的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视同一项单独可辨认资产，按上述规则可通过集中度测试，合并报表中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应按照公允价值入账，不确



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商誉。但因不涉及税务筹划，该方案无法充分利用抵税价值。

（三）分立评估增值的资产

根据财税[2009]59号文，在采用一般性税务处理时，被分立企业对分立出去的资产应按公允价值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并调整计税基础。

本案例中，可通过协议安排，由乙公司按一般性税务重组分立出采矿和选矿相关资产作为丁公司，仅保留冶炼的固定资产。此时丙公司需要为采矿权增值支付22.5亿元的所得税，替代了原并购方案中为股权增值支付的22.5亿元所得税，实际未改变丙公司的税收负担。

分立后，甲公司的并购方案变为收购乙公司100%股权以及丁公司100%股权。乙公司的冶炼固定资产评估无增值，对价50亿元；丁公司采矿权和采矿、选矿固定资产因分立时按公允价值入账，纳税后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均为150亿元。

丁公司的采矿权计税基础增加90亿元

后，其个别报表中税务认可的每年折旧和摊销金额相应增加18亿元，每年少纳税4.5亿元。合并两家公司后各年税后净现金流入提升至57.25亿元，对甲公司的价值从持续经营的200亿元变为217亿元，也大于5年后处置的213.93亿元，显著提升了并购价值，也无须为实现税务价值而进行清算。与方案（二）相同的是，因无须调整合并层面的递延所得税，各年合并净利润稳定在12.75亿元；但与方案（一）不同的是，该方案无法减少不可辨认无形资产确认的商誉金额。

五、结论

综上，若被收购企业的评估增值较高，则与所得税相关的商誉也会较高。在后续经营期间，递延所得税负债以类似“直线法”的方式增加合并净利润，而对应的商誉则只能通过减值测试或处置等类似“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减记，由此带来了明显的会计错配，加大了会计利润的波动，催生了管理层盈余管理的需求。另外，企业价值评估时的现金流假设是购买方持续经营情况下能获取的现金流，未考虑评估增值的抵税价值。所以，在并购交易中应全面制定会计利润和所得税的筹划方案，通过分步收购股权、不构成业务的企业合并、分立评估增值的资产等方式，避免对未来财务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尽快实现评估增值的抵税价值。当然，财务报告使用者也应当恰当识别与所得税相关的商誉，在投资复盘分析时合理还原资产组的经营成果，作出相对公允的投资评价。

作者单位：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从审计项目发生的那些事儿说起

——兼谈审计项目质量管理

■ 王直群

本人从事一线审计近三十载，在此结合曾经主办的一些审计项目，谈谈项目质量管理方面的一些体会。

事件一：项目组正在审计现场按计划向前推进X工程机械企业2012年年报审计工作，



进度尚未过半时，客户相关主管领导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开会，公布X工程机械企业拟正式启动25亿元可转债发行项目（简称：“金蛇计划”），且要求2012年年报公告时间比原计划提前近一个月。听到此消息，我感到时间紧且任务重。当天下午，我就召开了项目组成员动员布置会，对原有工作计划与安排进行调整，并列出了项目进度控制表，包括每个人每天应完成的具体工作事项，即各分子公司调整分录及对应审定循环表的定稿日期、合并抵销分录分批（步）次确定日期（含合并范围内往来抵销汇总底稿编制、内部购销收入、成本和未实现利润的抵销等等），对外披露的合并报表数与附注汇总过渡表逐一与分次（递进）交叉核对，切块（代）编制附注的分步时间控制与多次修改和完善后的电子版本更新，征求客户意见、与管理层和治理层沟通的时间安排等等；与年报同时披露的专项审计（鉴证）报告在项目组内拟稿第

一责任人的落实（含其相关数据的收集等）与其时间安排。同时，还留出“不可预见事项”可能占用的时间。并与各责任人充分沟通后，约法三章，保质保量地完成当天应完成的任务与事项。

按调整后的计划进度表所列，负责附注汇总的A助理将代编附注第一稿交我审阅与复核，当看到长期股权投资等披露的相关数据与合并报表对外披露数不相符，且附注纵向与横向合计多处不符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自己手下的审计助理每1-2年换一批，培养为成熟助理后，要么晋升为项目经理，要么就辞职了，新手对项目审计质量多少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当晚，我即将汇总项目组的人员集中到住处房间，与他们沟通“仔细认真”在审计工作中的特定重要性，并与相关责任人一一落实第一稿所有附注如何修改与完善，当时，A助理情绪较激动，就由B助理顶上，牵头进行相关附注后续修改与完善。

项目组成员齐心协力，加班加点，按时完成了该项目的外勤工作，且积极按照所内质控复核意见，对拟对外披露的报表及附注进行修改与完善，在客户要求时间之前出具了正式审计报告。经审核，中国证监会给X工程机械企业出具了同意其发行25亿元可转债的批复，该项目发行款项已于2013年下半年到账。至此，“金蛇计划”圆满收官。

正如该项目经办律师所说，当看到X工程机械企业的广告牌、正在施工各类工程机械上的专用商标，能为这样世界级、名列前茅的工程机械公司提供咨询及相关中介服务，一种责任感与自豪感油然而生。

事件二：X工程机械企业的2013年年报现场审计正在按计划向前推进，突然，主审其进出口公司（含其境内外子公司）的女项目经理提出了辞职，经几次向部门主任申请，回复是“无增派与调换人员到X工程机械企业年报审计项目”。这将给整个项目组带来极大的挑战，在经过慎重考虑后，我带着进所不到两年的女助理和实习生，投入到其进出

口公司的2013年年报审计的后续工作，当时，之前这位女项目经理现场审计工作量完成约为三分之一，且有几个境外子公司需将“境内原记辅助账”与“境外账”实施“并轨”，其难度可想而知。

通过我们想方设法，突出重点，加班加点，最终按时完成了预定的工作任务。

事件三：2015年3月的一天下午，正当X工程机械企业项目组聚精会神汇总相关数据与资料时，突然一位女审计助理倒在了审计现场的地面上，这可吓坏了现场的同事。我



即请客户派车，还拿出医治费，由另一位助理将这位女助理送到附近的医院抢救，团队其他同事又继续投入紧张的工作；下班时，整个项目团队还到就医医院看了这位被救治的女助理，经检查与救治，她的身体恢复尚好，并无大碍。当时，得知这位女助理当天发生的晕倒主要是由于她每月的生理现象，加之工作疲劳引起……

事件四：2013年圣诞节前夕，领导安排我前往云南做某上市公司（客户）拟收购陆良某彩印有限公司的审计项目，我与一位女助理约好到车站乘大巴车前往机场，在大巴车上女审计助理多次拨打男助理的手机，均无人接听，当时，我俩心急如焚。之后，我俩决定先到禄口机场办登机手续，可当我俩拿着身份证办登机手续时，服务员说“该次航班无你们的相关购票信息”，经询问该航空公司机场服务中心的服务人员，她说“你们原购的飞机票不是这次航班的，是预订之后

某天的某次航班”。为何出现如此差错？真是滑稽之极！经女助理多次与航空公司等相关方沟通，我俩的飞机票改签成功。同时，我让女助理联系男助理，要求他想方设法今天定赶到昆明约定的机场。最终男助理当天下午到达昆明约定的机场。当时，我诚恳地对整个大项目组的同志说：“此事到此为止，请诸位别对其他任何人讲此事，特别是我们事务所的领导，谢谢配合与理解！”当天晚上，我在房间同男助理促膝谈心，他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接下来几天，项目组同事按计划进度向前推进相关工作，按时完成了该项目的审计外勤工作。

从以上事例，本人有以下一些感想与启示：

1. 项目管理与其质量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实施双轨控制，齐头并进，紧紧围绕质量管理这个核心开展相关工作。项目管理与其质量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单纯就质量而进行质量管理，应对整个项目的审计质量实施“宏观管控”和“微观控制”，齐头并进，两者缺一不可。“宏观管控”，是指项目负责人以风险导向的审计理念，对某个重大（重要）项目可能出现的重大审计风险进行把控与合理规避的措施、方法的总称；必要时，项目负责人可向签字合伙人和业务主管领导或风险控制与技术支持委员会请示特定事项的具体处理。“微观控制”，主要是指项目组所有成员，应按规范与要求，仔细地编制与复核每张审计工作底稿，具体体现在每一个审计程序执行上和每位审计人员辛勤与仔细的付出上。总之，项目负责人和签字注册会计师既要站得高看得远，将重大事项把控好，又要脚踏实地，要求团队所有成员需编制（或复核）好每一张审计底稿。

2. 对重大和重要项目多作事先筹划，把可能遇到的主要困难与业务重点和难点考虑周全，并进行动态管理，并依据实际情况对原计划的相关安排适时进行调整。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重大和重要的项目，项目负责人事前应多作筹划，对被审计单位行业特点，主要会计核算的特殊性，作充分的了解与收集，对重大与特殊事项做到“心中有数”，对重大与重要事项必须收集到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该等审计证据应想方设法取得，对此，应有“钉子精神”；绝不能在证据不充分，或带着“疑虑”的

情况下就出具了正式审计报告。同时，把可能遇到的主要困难与业务重点和难点事项尽可能充分估计到，列出清单，一一解决；对整个项目的总体进度应进行动态控制，若需要，可对其适时调整，且需留有较充分的时间余地，避免前松后紧，致使项目（汇总）后期天天加班到深夜甚至凌晨，以致项目团队成员身心疲惫。若是连续对客户几个年度报表进行审计，需充分了解其每年出现的新情况与事项，绝不能“大意失荆州”或“阴沟里翻船”。另外，项目负责人在团队内部，需同时设有A、B角，以防特殊情况出现与发生，确保所经办的项目正常运转。

3. 项目负责人和签字注册会计师对每一张底稿均需仔细复核，并形成复核记录，且落实专人跟踪各自整改情况。项目现场负责人和签字注册会计师对每一张底稿均需仔细复核（两者可作相关分工，避免重复劳动），并形成复核记录，只有通过复核底稿才能发现需修改与完善之处或需补充的相关审计证据。同时，需对复核记录中列出的各责任人的整改情况与结果进行跟踪。实务中，由于各人（特别是实习生）理解能力与掌握的知识程度不完全一致，对复核意见的理解也可能存在偏差，因此，需落实专人（较熟练的“准项目经理”以上人员）跟踪整改情况。在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前，“三级复核”定要落实到位。

4. 对团队成员在作从严要求的基础上，需作“人性化管理”，给他（她）们压担子，制订“跳起来可达到的工作目标”，同他（她）们多沟通，交“知心朋友”，形成和谐的团队文化。我时常在想，在审计项目组，“90后”毕业生越来越多，这些（次）新手的工作结果与所内对审计工作底稿质量的要求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以致对项目整体的审计质量产生相应的影响。在日常工作中，应与他们多沟通、多交流，既要对他（她）们工作上严格要求，也要把握“用人之长与容人之短”的度，营造和谐的团队氛围，让他们有更多的担当与责任，分派“跳起来可达到的工作目标”，多给他们锻炼的机会，勤于思考，从而使他们的综合能力不断提高，使整个团队的审计实务能力得到提升，以达“双赢”之效，提升团队审计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另外，有的项目现场审计时间可能长达3-4个月，甚至更长，每天“两点一

线”，整个团队成员极有可能感到疲惫与厌倦，项目负责人需及时了解各人的主要思想动态等相关状况，项目组发生的突发事件应从容面对。同时，也应注意一张一弛，不可总是绷得很紧，因为人是有限度的，项目负责人应适时调节，力争使整个团队心情愉悦地投入到日常工作，提高项目团队的凝聚力、吸引力与竞争力，形成和谐的团队文化。

5. 审计团队成员需时刻做到“仔细认真”。我时常对团队成员，特别是新入职人员讲：一个好的助理人员或项目经理，应该且必须要做到“仔细认真”，学历能有大专以上即可（除高深难度内容与特别复杂事项外），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助理人员一般为才出学校门，个别人做事粗心大意；才入职工作岗位，有个角色转变的过程，应要求相关助理人员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或知识点犯错或跌倒。鼓励他们通过“仔细认真”地对每个关键知识点日积月累成为“参天大树”。

6. 各业务部门或审计项目团队内部形成“不断交流，互帮互学，取长补短，以老带新”提高质量的执业氛围。依据（所内）执业人员管理的实际状况，团队内部组成人员一般2-3年之内相对较为稳定（除实习生外），可在工作之余，部门或团队内部人员相互交流工作心得，形成同事间“不断交流，互帮互学，取长补短，以老带新”提高质量的部门（或团队）执业氛围。

7. 实施与完善审计工作底稿评比与评优活动，形成“比学赶帮超的羊群效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开展审计工作底稿评比与评优活动，被评为优秀的底稿可在所内定期展示，这样，所有从业人员在提高底稿质量方面就有了目标和方向。同时，请这些底稿的主审现身说“法”，交流执业理念，分享自己执业感受与收获等等，以达到“比学赶帮超的羊群效应”。最终，形成所内积极向上、良好的执业氛围与环境，使所有从业人员力争做到“敢为人先与敢为人优”。

作者单位：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近代英国会计师职业的起源与发展

■ 袁跃华

现代会计师职业起源于近代英国，其发展完善得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和近代个人破产法、公司立法等经济社会立法的相继出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探究近代英国会计师的起源与发展路径，对我国会计师行业发展具有借鉴与参考意义。

一、英国会计师的起源

（一）早期会计师—簿记教师兼职会计师

英国早期并没有专业的会计师，主要是学校讲授簿记的教师，利用业余时间兼职帮助商人或者诉讼当事人处理会计事务，专业技能水平并不高。这些兼职会计师很多是英国早期会计书籍的作者，如英国最早的簿记作者奥尔德·卡斯尔（Hugh Oldcastle），他是一名讲授几何学与簿记的教师。1543年卡斯尔去世以后，其妻子安妮斯（Anice）把卡斯尔的课堂教学遗稿整理汇编为《有益的论文》（A Profitable Treatise），现已散佚，这是英国最早的复式记账书籍。奥尔德·卡斯尔最大的贡献是用英文翻译了“现代会计之父”意大利人卢卡·帕乔利（Lucas Pacioli）的著作。1588年簿记教师约翰·梅利斯（John Mellis）修订了《有益的论文》一书。同样，英国首位撰写借贷记账法书籍《如何把帐记好的方法和格式》（The Maner and Fourme how to kepe a Perfecte Reconyng）的作者詹姆斯·皮尔（James Peele）也是一位簿记老师。

17世纪是英国新闻媒体蓬勃兴起的世纪，最早的会计求职广告可以追溯到1623年，伦敦的罗伯特·哈韦尔（Robert Harwell）刊登了最早的会计求职广告。会计师仍然是教师的兼职行业，如1670年《商人宝鉴》（The Merchants Mirrour）的作者与教师理查德·达伐纳（Richard Dafforne）经常从事国内外手工工场和公司的实际会计工作；1675年《商人会计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Merchants Accounts）一书的作者约翰·柯林

斯（John Collins, 1625-1683）曾请求大法官委任其处理法庭各种繁琐的账目；1670年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 1605-1682）对外宣称“愿意接受监督、编制各种结算报告等雇佣工作。”

（二）首位专业会计师—乔治·沃森

英国公认的第一位专业会计师是苏格兰人乔治·沃森（George Watson, 1654-1723）。乔治·沃森早年在意大利与荷兰地区学习簿记方法，求学过程中精通了算术、会计与簿记，并在学习之余兼职苏格兰商人的代理商。1676年他完成学业返回爱丁堡，1679年被爱丁堡市长雇佣为专业会计师，专职处理会计事务，1696年成为苏格兰银行首位会计师和簿记员。沃森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能够成功判断国内外政治格局的变化，及时规避风险，抓住时机，勇于冒险，这在其职业生涯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会计方法也随着职业经验的积累得到了明显的改进和提高。沃森也是苏格兰知名的慈善家，他是乔治·沃森医院（George Watson's Hospital）的捐助者与创建者，爱丁堡大学常年资助者。此外他还创建了乔治·沃森学院，成为现如今英国知名院所。

（三）现代公共会计的开创者—查尔斯·斯内尔

1720年著名的南海公司泡沫引发了英国金融危机。1711年英国政府为了向南美洲殖民扩张，成立了南海公司，南海公司因有1170万英镑的英国国债而成为英国国债最大的债权人。1720年为了扩大股票发行，南海公司接受投资者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新股，这样就造成了股票供不应求，股价迅速上涨。英国议会为了抑制民间私下发行股票，通过了《泡沫法》，该法禁止民间成立公司。但法律无意助长了南海泡沫的形成，许多政府官员在股票价格高位时，开始出售所持股票，南海公司股价迅速下跌，南海泡沫破灭，受挫者约有3万人。

南海泡沫破灭以后，公众对南海公司的

董事雅各布·索布里奇 (Jacob Sawbridge) 不满, 强烈要求对其进行调查。1721年, 会计师查尔斯·斯内尔 (Charles Snell, 1667-1733) 针对这起事件提供了最早的会计师报告, 这就是《索布里奇及其公司账目调查报告》(Observations made upon examining the books of Sawbridge and Company), 现代公共会计也就此诞生。

二、19世纪英国会计师的发展

随着18世纪贸易范围的拓展, 人们对簿记的需求日益增加, 商人需要雇佣会计人员



记账, 由此出现了专为商人提供会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1780年乔赛亚·韦德 (Josiah Wade) 在布里斯托尔建立了英国首家会计师事务所。但到了19世纪初期, 英国大部分会计师已不再担任任何形式的簿记教师, 但仍不是固定从事会计师行业。根据1822年到1824年的城市职业记载, 大部分会计师兼职从事代理人、拍卖商、估价人、审计员、调解人和国内外贸易商等职业。19世纪工业革命蓬勃兴起, 推动了英国的经济从农业向工业、手工工业向现代机器工业的转变, 彻底改变了英国的全貌, 引起了社会巨大变革。而社会经济、政治、技术的改变与革新也促进了会计师的职业化, 其中个人破产法与公司法的颁布与实施是其主要推动因素。

(一) 会计师发展的里程碑—1831年破产法

英国会计师发展与个人破产制度的完善有着密切联系。1604年破产法与1705年破产法均涉及到了破产者的账册问题, 个人破产

财产清算是早期会计师承担的主要工作。比如在1817年议会特别调查委员会报告中, 会计师威廉·史蒂文森 (William Stevens) 写到: “现在的会计师经常被雇佣编制账目, 并代为管理破产者的资产。” 会计师威尔金森 (J. H. Wilkinson) 也经常被债权人雇佣担任破产财产管理人, 然而对会计师职业发展真正起着促进作用的是1831年破产法的颁布与实施。

1831年, 破产法首次在英国建立破产法院, 规定了负责个人破产财产管理清算的官方破产管理人必须由商人、银行家或者会计师担任。这是英国议会制定法第一次肯定了会计师的地位, 在法律意义上极大程度提高了会计师的职业威望, 对会计师职业发展起到了明显促进作用, 这部法律也因此会计师的发展史上被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许多会计师受益于这部破产法的实施, 被任命为官方破产管理人。比如彼得·哈里斯·阿伯特 (Peter Harriss Abbott, 1774-1850) 是政府登记在册的一名会计师, 1829年他被任命为破产专员委员会的一员, 主要负责保管公共账目。1831年破产法实施以后, 他被破产法院任命为官方破产管理人, 其主要职责是在破产者出庭之前编制完成资产负债表。阿伯特一直恪尽职守, 被称为英国公共会计师的奠基人。

会计师威廉姆·德罗洛伊特 (William Deloitte, 1819-1898) 在伦敦破产法院担任了官方破产管理人12年之久。之后, 于1845年在破产法院的对面开办了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 这就是现如今著名的德勤会计公司的前身。会计师威廉·特克安德 (William Turquand, 1818/9-1894) 是1831年第一批官方指定破产管理人, 此后在1846年到1847年再次担任此职位, 1852年开设会计师事务所, 行业地位得到显著提高, 后成为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第一任主席。个人破产制度的完善不仅提高了会计师的地位, 还直接促进了会计师从业人数的增加。由于1831年破产法的颁布实施, 1820年到1843年, 英国会计师的总人数翻了三倍。

1831年破产法也直接提高了会计师的收入水平。官方破产管理人没有固定的薪水, 而是获得“公正与合理”的报酬。破产法院基于破产者财产的数额支付给官方破产管理人报酬, 会计师威廉·特克安德1840年

年收入为3022英镑，1841年一年共获得2053英镑的收入；会计师哈丁·普伦（Harding Pullen）1848年总收入中的52.6%来源于个人破产清算；1858年恩斯特和惠尼（Ernst & Whinney）会计师事务所总收入的93%来自于个人破产清算。破产法提高了会计师的收入水平，有利于会计师职业化发展，同时专业化的会计师能够更加科学地管理破产财产，促进个人破产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1842年《无力偿还债务人法》（the Relief of Insolvent Debtors Act 1842）规定了任何非商人或者拥有300英镑以下财产



的商人均可以向破产法院提交破产申请，同时需要准备一份完整真实的债务清单。该规定明显促进了会计师人数与报酬的双增长。1849年《个人破产法》要求破产者准备一份资产负债表与账目清单，破产管理人审阅资产负债表与账目清单并制定报告。破产者是否可以通过破产法院的质询并最终获得破产免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方破产管理人制定的报告。报告主要呈现了账目的准确与详实，如果账目出现错误纰漏，则破产者很难通过破产法院的质询。账目的专业性、复杂性和重要性是聘用专员会计师的重要原因，这样就使得破产者雇佣专业的会计师成为了一种普遍做法。许多会计师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建立了良好的行业声望。

（二）会计师发展的助推器—1862年公司法

工业革命促进了现代工厂的建立，而这些工厂大多是采用家庭合伙制形式，实行的是无限责任。家庭合伙制具有管理不规范、

风险抵抗力较弱、无法快速扩大生产等问题。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由股东出资设立，以认缴出资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于是，公司法人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全部责任的现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产生，这种新的组织形式采取了不同于家庭合伙制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风险承担方式和所有制形式。1844年《股份公司法》首次允许注册成立公司，该法也规定了注册公司需要提交完整详细的资产负债表，并需任命至少一位审计员负责公司审计。1845年英国修改《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的账目应当由会计师审计”，这是世界史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的会计师审计制度。1855年《有限责任法》颁布实施，该法开始确立公司法人的独立财产制与股东的有限责任制。公司为了获得有限责任的特权，需要履行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已经登记注册的公司为了获得破产清算资格，需要制定独立的财务审计。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和更复杂、更专业的簿记系统极大刺激了对公司经营管理进行监督、检查的需求，会计师业务需求量激增。

19世纪下半叶，英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大公司纷纷崛起。为了适应大公司时代发展的需要，1862年《公司法》规定由专业会计师担任官方清算人，负责破产公司的财产清算。1863年到1893年，共有44435家公司注册成立，但有26074家公司被破产清算或兼并，比例高达58%。1866年英国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公司和银行破产，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欧文德格尼有限公司（Overend, Gurney & Co Ltd.），其破产清算程序从1866年持续到1893年，前后历时近30年。知名会计师威廉·特克安德与罗伯特·哈丁（Robert Harding）担任官方清算人，共获得7万英镑的报酬，其事务所职员共获得1.5万英镑的酬劳。1878年格拉斯哥银行破产倒闭直接导致了《公司法》的修订，《公司法》要求对所有注册银行进行每季度义务监督，这进一步增加了银行对专业会计师的需求。据资料统计，1841年英国共有4260名会计师，到了1881年共有11517名专业会计师，40年间数量增长了170%，这比同时期人口增长率62%还要高。

三、英国会计师团体的早期发展

（一）英国第一个专业会计师协会—爱

丁堡会计师协会

随着会计师从业人数的增多，为了维护会计师职业利益，1853年1月17日，爱丁堡61位会计师联合成立了一家会计师协会（the 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in Edinburgh），标志着注册会计师职业的诞生。爱丁堡会计师协会是英国首个会计师协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注册会计师协会。1854年爱丁堡会计师协会接受女王特许状，成为爱丁堡会计师公会（the Society of Accountants in Edinburgh）。1855年，格拉斯哥会计师与精算师公会成立。1867年亚伯丁会计师公会成立。

（二）英国首个全国性会计师团体—英格兰会计师公会

英格兰地区会计师团体成立浪潮始于19世纪70年代。1870年4月20日利物浦地区成立了首个英格兰地区特许会计师协会（Chartered Accountants Institute），其成立目标主要为了维护利物浦会计师良好的地位与声誉，诚信实践，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制定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商讨解决会计师行业共同利益问题。同年11月，伦敦会计师协会成立。随后曼彻斯特于1871年、谢菲尔德于1877年相继成立了会计师协会。1872年首个全国性会计师团体英格兰会计师公会（Society of Accountants In England）成立。1880年，五个协会成功获得皇家特许状组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England and Wales）。在由女王颁发的成立特许状中明确了会计师的主要职能：“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公共会计师在为数众多的职业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公司清算程序中他们发挥着清算人的功能；在个人破产清算与破产和解程序中担任信托人和接管人的职位；此外他们还在众多法院里履行信托人的职责，在公共公司和合伙等其他组织机构里履行监督账目的职责。”该机构努力培养专业的会计师，其组织目标是“促进各个方面会计事务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尤其包括审计、金融管理和征税。”188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成立之时共有599名成员，1890年共有1700名成员，到了1992年共有超过10万名成员。目前该组织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会计师协会组织。

随着社会民主化趋势的加强，英格兰

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的开放度也越来越高。1920年玛丽·史密斯（Mary Harris Smith）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会员，成为世界上首位女性注册会计师。1924年埃瑟尔·瓦茨（Ethel Watts）成为首位通过考试获得资格的女性。1999年戴姆·希拉（Dame Sheila）成为首位女性主席。

四、结论

当代会计学者W. T. 巴克斯特（W. T. Baxter）指出，“社会文化越是专门化，越是需要会计。”从簿记教师兼职行业到专业会计师、从个人到会计师事务所再到会计师协会、从少数群体到官方法律认可的发展道路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专业化与分工的细化。社会生产日益复杂化、精细化，对注册会计师的社会需求也就越多，对会计师职业技能要求也就越高。19世纪英国个人破产制度与公司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高了会计师的社会地位与专业化程度，培养了现代化会计师队伍，完成了会计师的职业化。职业化的会计师对个人破产、公司财务等实现了有效监督与管理，促进了英国现代个人破产制度与公司企业制度的形成，实现了经济社会的成功转型。毋庸置疑的是，专业会计师作为一种新型职业，在资本市场与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着关键性的地位与作用。

本文为2019年度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近代英国个人破产制度研究（1542-1883）”（项目编号：2019YJSB125）、2018年度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学术新人资助项目“近代英国破产法研究（1542-1914）”（项目编号：2018BSXR008）的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

财经信息 FINANCE & ECONOMY

更多改革自主权！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出炉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0月11日对外发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方案指出，以设立经济特区40周年为契机，在中央改革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下，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是新时代推动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又一重大举措，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关键一招”，也是创新改革方式方法的全新探索。方案明确，2020年，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城市空间统筹利用等重要领域推出一批重大改革措施，制定实施首批综合授权事项清单，推动试点开好局、起好步。（摘自证券日报）

中国经济实现平衡复苏 有望再创佳绩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当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仍在防控新冠疫情以遏制经济衰退之际，中国经济已重回正轨，实现平衡复苏，今年可能再创佳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世界银行数据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或将上涨1.1个百分点，为去年占比的三倍。CNN报道说，中国通过采取严格防疫措施有效控制疫情传播，同时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发放消费券等刺激消费，成效显著。今年中国国庆中秋长假期间的经济数据“振奋人心”，中国人民生活逐步恢复正常，消费需求得到释放。经中国旅游研究院测算，今年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6.37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79.0%；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665.6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69.9%。（摘自新华网）

前八月新增减税降费超一点八万亿元，利好企业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8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1877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监测的1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景气调查问卷显示，89.4%的重点税源企业预计四季度生产经营形势为“平稳”或“好转”，较三季度预测提高4.7个百分点。2018年国家推出了深化增值税改革三项措施，2019年又提出了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深化增值税改革成为减轻企业负担“重头戏”。税收成本的降低，激发了创新创业活力，也有助于推进转型升级。“十三五”时期，国家多次优化调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鼓励创新政策，2017年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并于2018年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享受主体扩大至所有企业。（摘自人民日报）

雄安海关完成首票以数字货币形式缴纳风险保证金业务

9月27日，石家庄海关所属雄安海关完成首票以数字货币形式缴纳风险保证金业务。该票业务为雄安新区等四城市获批全国数字货币试点城市后，首票数字货币在石家庄海关业务领域的应用。以雄安新区成为国家数字货币试点城市为契机，雄安海关勇于改革创新，会同中国银行河北雄安分行，为辖区企业加工贸易手册备案进口的124.3万元天然乳胶料件办理数字保证金缴纳业务。据悉，雄安新区海关辖区企业已经通过在中国银行河北雄安分行开立的电子钱包成功缴纳数字保证金。（摘自新华财经）

央行下调远期售汇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至零

中国人民银行10日宣布，自2020年10月1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市场预期平稳，跨境资本流动有序，外汇市场运行保持稳定，市场供求平衡。为此，人民银行决定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加大，总体呈现由贬转升的走势，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近期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显著，此时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下调为0，一方面有助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继续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银行降低远期售汇成本，增

财经信息 FINANCE & ECONOMY

强企业对此产品需求，以更好地利用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摘自中国经济网）

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或作个别下调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10月12日表示，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关注。总体上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仍应坚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既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经会同有关方面反复研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拟“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另一方面，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在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方面做好衔接。（摘自中国经济网）

债券市场规模突破百万亿元 国际投资者踊跃配置中国资产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8月末，中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达112万亿元人民币。作为直接融资的渠道之一，债券融资规模的增长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在这背后，是中国债券市场种类更趋齐全，结构更加合理，多个品种债券发力增长。在规模扩大和品种丰富的同时，债券市场风险管理机制和工具也不断健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新华社记者从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境外机构持续增持中国债券，月均交易量超7500亿元，月均净买入量超1200亿元，目前境外机构持债总规模超过2.9万亿元。（摘自人民网）

英国加速建设新自由港 最早2021年底完成

英国政府10月7日发布公告称，将在脱欧过渡期结束后加快建设新自由港，第一个自由港预计最早于2021年底前完成。公告称，新自由港的地址招标工作将于2020年底开始，竞标者将就英格兰地区的航空、铁路、港口等标的进行竞争。英国首个新自由港预计将于2021年底开放。新自由港将采取一揽子优惠措施，其中包括：简化规划流程、减免相关税收、简化海关程序等，以期抓住脱欧后的新机遇，增加英国经济增长新引擎。新自由港采取的政策核心是借鉴国际最佳实践经验，推行雄心勃勃的“新海关模式”，以“灵活模式”改善现有和以往的海关政策。同时，对新自由港及周边地区发展，政府将“加快规划进程，加速政策推出”，并鼓励创新者提出新想法，以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摘自新华财经）

美国约3500家企业向法院提起诉讼

据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约3500家美国公司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起诉美国政府，要求法院裁决美政府依据美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非法”，并退还企业缴纳的相应税金。诉讼主要针对美政府2018年9月和2019年9月对总价值3000多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提起诉讼的公司包括特斯拉、福特汽车、塔吉特百货公司等。这些公司在起诉书中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单方面关税政策，指出美政府加征这两轮关税的时间，已超出美国法律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在“301调查”结束后12个月内采取行动的期限，同时未能遵循相关行政程序，包括未能给予利益攸关方足够机会发表意见、做出关税决策时未充分考虑相关因素、未明确解释其决策理由等。（摘自人民网）

美国、欧盟、瑞士松绑金融监管为经济“加油”

9月17日，欧洲央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银行将被暂时允许对杠杆率这一财务实力指标的计算方法进行调整，新的计算方法将剔除银行在各央行的存款。欧洲央行希望通过放松银行杠杆率的监管要求，促进银行增加对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贷款，从而实现推动该地区经济复苏的目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经

财经信息 FINANCE & ECONOMY

济遭受重创。对此，多个经济体已经放松金融监管用以抵御经济下滑。除了欧洲央行四度放松金融监管要求之外，包括美国、瑞士在内的多国金融监管者也纷纷采取举措为银行“解缚”，用以刺激银行放贷和推动投资。对于这些举措，大多数市场人士表示肯定和欢迎。但也有观察者表示，监管者应当密切关注相关风险，以防埋下更深层次的金融危机“种子”。（摘自新华财经）

德国权威研究机构联合报告下调今明两年德国经济预期

新华社柏林10月14日电德国五大权威经济研究所14日发布联合经济预测报告，下调今明两年德国经济预期。报告预测今年德国经济将萎缩5.4%，比春季预测的萎缩4.2%更糟；明年德国经济将增长4.7%，低于上次预测的5.8%。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斯特凡·库特斯在当天一份声明中表示，虽然因疫情导致的生产下降已恢复了相当一部分，但若回归至常态，接下来的恢复过程将更加困难。他指出，经济恢复进程受阻于那些特别依赖社交接触的行业，如餐饮业、旅游业、航空运输业等。报告还认为，疫情还将对德国就业市场产生“明显影响”。报告预计，德国今明两年失业率将升至5.9%，2022年将微降至5.5%。（摘自中国经济网）

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萎缩4.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13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中国经济将增长1.9%，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报告说，随着经济逐步重启，全球经济正走出低谷。中国作为重要贡献者，帮助全球贸易自6月份起复苏。但由于部分地区疫情蔓延加速，很多经济体自8月起放慢经济重启步伐。基于第二季度经济强于预期、政策支持和汇率维持在当前水平、社交距离持续至2021年等基准假设，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不过，由于IMF根据新的购买力平价权重对6月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进行了修正。与修正后的数据相比，最新预测上调了0.8个百分点。（摘自人民网）

国际会计职业动态 GLOBAL ACCOUNTANCY DIGEST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呼吁设立国际可持续性准则理事会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发出倡议，根据投资者、政策制定机构和其他相关方等提出的建议，呼吁设立国际可持续性准则理事会（ISSB），通过提供一致的、可比较和可信赖的专业意见，帮助企业实现价值创造和可持续发展，满足投资者、政策制定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需求。IFAC建议ISSB应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级别相等，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Foundation）监督。

据悉，建立ISSB的目的是为了构建一个协调一致的、相辅相成的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报告制度的生态体系。其中，ISSB将偏重于企业表现、经济及环境决策等非财务信息报告制度的建设，而IASB则继续专注于企业财务信息报告的工作，二者将在必要时相互协调，避免职责缺位。

IFAC认为，在疫情影响下，得益于欧洲会计师联盟（Accountancy Europe）、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以及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OSCO）工作组等多个组织的努力，全球会计行业可进一步增强公众信任。鉴于此，各方应抓住机遇，在相关机构的支持下，由IFRS基金会协调创建ISSB。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提示警惕后疫情时期报告与欺诈风险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发表题为《后疫情时期职业会计师面临的报告与欺诈风险》的文章指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职业会计师或监管机构，都需要对可能会出现的报告和欺诈风险提高警惕。对于职业会计师来说，公众期望与其实际职责往往存在着差异，这就需要职业会计师发挥职业怀疑的作用，提高对风险可能性的认识，同时要警惕外部环境不稳定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在这方面，职业会计师可以参考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IESBA）发布的相关出版物，以更好地应对此次疫情带来的压力。监管机构应尽到义务，提醒企业开展职业判断，并要求企业重视对准则的运用及疫情给财务报告带来的影响等。

文章提示，职业会计师需着重考虑企业报告及欺诈风险涉及到的三个方面，包括：企业管理层的需求明确，管理层应明确告知员工，公众对其所在组织的评价取决于企业如何应对危机、企业价值观和道德守则、企业报告和财务报表、如何处理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及如何维护企业声誉等；企业的质量控制环境有效，疫情导致工作地点及工作方式改变，致使企业的内部控制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财务报告程序和可信度；就特定业务重新评估欺诈与报告风险。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发布2019年国际准则全球现状报告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发布《2019年国际准则全球现状报告》，公布了国际准则的采用及实施情况，强调准则在提升透明度、提供高质量财务信息等方面的作用。

报告公布了国际准则在全球范围内的采用及实施情况、职业会计组织在准则制定方面的参与度、中小企业实施准则情况等方面的相关统计数据，同时列举了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良好实践。报告指出，迄今为止，IFAC 90%的成员组织所在国家和地区已经采用包括国际审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等在内的专业准则；80%的成员组织所在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质量检查、调查与惩戒等机制；为了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约有近三成的IFAC成员组织对帮助中小企业更好地运用准则开展了培训。

国际注册专业会计师协会：把握会计和报告发展趋势对未来会计教育的影响

过去十年，会计和报告领域的重大进展提高了未来会计师的门槛，对会计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注册专业会计师协会（AICPA|CIMA）认为，“对标普500强公司来说，无形资产的价值已超过总市值的80%”，因此，会计师不可能再仅仅负责记录有形资产，报告资产金额，他们更需要关注价值创造，需就

国际会计职业动态 GLOBAL ACCOUNTANCY DIGEST

如何创造价值及如何将价值创造融入企业决策，以实现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提供建议。这要求会计师具备完备的技能，尤其是职业价值观、职业道德、沟通能力、非财务信息披露及批判性思维等。

AICPA|CIMA在题为《全球管理会计原则》的报告中指出，对会计师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通过分析业务开展情况，在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信任，从而在更宽泛的背景下理解价值创造过程。未来的年度报告需要展示更广泛的绩效模型，而不仅仅是审计合规检查表，这要求未来的会计师能掌握新技能，理解商业模式，迅速抓住机遇，理解利益相关方愿景，从而帮助企业做出决策。因此，未来的会计课程必须强化定量和定性信息以及前瞻性和回顾性分析等内容。